

“西方马克思主义”

的

陈振明
陈炳辉 著
骆沙舟

社会政治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8077

2105/30
“西方马克思主义”
的社会政治理论

陈振明 陈炳辉 骆沙舟 著

[本书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



20012342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陈振明等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ISBN 7-300-02302-9/D·295

I. 西…

Ⅰ. 陈…

Ⅱ. 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研究

N. D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0552 号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

陈振明 陈炳辉 骆沙舟 著

出版 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175 号 邮编 10087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丰台区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7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23 000

定价：20.00 元

序 言

奚广庆

陈振明、陈炳辉、骆沙舟三位青年学者的新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已经落笔。这本新著是两个中华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由于我参加了项目成果的鉴定工作，得以先睹为快。于是，陈振明同志就囑我为之写篇序言。我对青年教师致力于科研工作，一向取支持态度。前些年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和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已有所涉猎，对这一新著自信还是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的，就欣然应允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它是一种货真价实的全面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思潮。尽管它的批判矛头有时也对准了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但它对当代资本主义那些入木三分的锐利的剖析抨击，确实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大家知道，本世纪50至6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并迅猛发展的新科技革命，把人类社会生产整整地提到了一个新的更高阶段，深刻地改变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但其表现形式已与昔殊异。由于受教条主义的束缚，我们对当代变化着的资本主义的研究相当滞后，提出一套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科学观点，仍然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任务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当今最先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及其国际政策进行系统批判研究的重要思潮之一。因此，在当代，研究资本主义社会，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不重视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我们的国家，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伟大历史变革的驱动下，正在健步走向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先进地区甚至在奔向工业社会的更高阶段。这些深刻剧烈的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问题、矛盾和弊端。研究和解决长期存在的这些问题和矛盾，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重大任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包含着对当代资本主义这个高度工业化（或称为后工业社会）和发达市场经济社会的矛盾、冲突、弊端和病态的尖锐揭露与无情剖析，甚至还提出了医治社会弊病的种种药方，尽管往往流于空想和空谈。显然，它的这些观点，它批判研究的锋芒取向，独特的视角和思路乃至它的失误和败笔，对于我们研究和探索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演进的特点和规律、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分析与解决，都不无借鉴的作用，可以成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

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也要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为坚持和发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服务。我在1987年就认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来研究，更要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潮来研究（参见《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25页）。陈振明、陈炳辉、骆沙舟三位在他们的书中也明确地提出：“甚至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社会政治理论”。首先是我们今天的事业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我们要借鉴吸取当今世界上一切有益的东西来推进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同时，统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和整体内容，不难看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的批判是它的主要理论使命和主要历史课题。它的哲学观点是丰富的，但也是为这一主题服务的，并在适应解决这一主

题的需要中演进发展的。因此，抓住它的社会政治理论进行研究，才能把这一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才能对我们当前的历史运动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是我为本书写作序言的根本原由所在。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思想文化的批判性的观念反映，庞杂、曲折而丰富。对之作出准确的界定、科学的概括、完备的阐述绝非易事。这本新著，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它作了一个开拓性的研究和阐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主要是它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科学技术观、阶级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社会心理理论、社会变革理论和未来社会模式设想以及对苏联模式的批判等等作了多视角的比较系统的概述。这在国内尚属首次，其意义作用恐须充分肯定。尤其是本书的结论部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性质及研究意义专门作了阐述，提出了许多深刻见解，更值得重视。当然，这样重大的课题，不是一部甚至几部著作所能详尽，但它毕竟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有益于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我主张结合当今世界的巨变、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进、当代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来对这一理论进行深入的、系统的研究讨论。讨论中必然发生歧见和争论。有争论、有碰撞才有发展。开放研究，推动讨论，促进思想碰撞，乃是当代科学研究的发展之路。而这又要依靠扎实深入的研究作基础。我非常希望在深入扎实的研究基础上，大家能坐到一起进行讨论、争论和切磋，把我们的研究提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九九六年六月八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林园

目 录

绪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基本框架 ·····	1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由来、发展与特征·····	1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	17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34
第一章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危机趋势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	48
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49
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危机 趋势·····	64
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趋势·····	84
第二章 当代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及政治效应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	101
一、科学技术与生产力·····	102
二、科学技术与生产关系·····	113
三、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	125
四、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	138
第三章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意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	150
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意识·····	150

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	162
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	177
第四章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结构和职能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国家理论·····	186
一、现代国家的性质·····	187
二、现代国家的结构·····	201
三、现代国家的职能·····	212
第五章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及人道主义	
理论·····	226
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异化的社会·····	226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种主要异化理论·····	238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论克服异化的途径·····	255
四、异化及人道主义理论的地位·····	262
第六章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	272
一、意识形态概念·····	272
二、工具理性批判·····	290
三、实证主义批判·····	302
四、大众文化批判·····	304
第七章 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心理根源分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心理理论·····	316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心理理论的兴起·····	316
二、对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心理分析·····	325

三、对消灭法西斯主义的途径的探索·····	341
第八章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模式的批判·····	349
一、对苏联模式批判的三个阶段·····	350
二、对俄国十月革命途径的评价·····	356
三、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批判·····	364
第九章 人类解放之路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变革	
的理论·····	383
一、社会主义变革的动因与主体·····	383
二、社会主义变革的途径或道路·····	400
三、社会主义变革的战略及策略·····	416
第十章 未来社会构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未来社会主义的	
特征和模式·····	433
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433
二、“新社会主义”的模式及蓝图·····	442
三、“新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	464
结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性质及	
研究意义 ·····	487
一、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	
性质问题·····	487
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	
现实意义·····	494

附录 世纪之交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	506
——苏东剧变之后的研究现状与前景	
参考文献·····	522
后记·····	531

绪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基本框架

“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或“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是一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思潮,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它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作为一种自称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为方向的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宽阔,几乎涉及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领域。它不仅关心纯哲学问题,而且更关注社会政治理论问题。甚至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社会政治理论。在绪论里,我们将先概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与特征,然后勾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基本框架。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由来、发展与特征

“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初是20年代初期由匈牙利、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观点及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及策略提出批评而兴起,继而在20年代中期以后,由西方学者加以理论的展开而逐步成长成为一种广泛的世界性思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有特定的内涵,“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有一些基本流派及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其形成和发展过

程以及某些共同的理论倾向或基本特征。

1.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是两个相近的但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在国内学术界，人们有时将它们当作同义词来加以使用，有时则当作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与特征，更好地明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研究范围，有必要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源流作一简要的考察。

从现有的文献看，最早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不是别人，正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的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他在1930年所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文中首次使用了这一概念，他在该文中两次提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并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或“苏联马克思主义”明确地对立起来。他说，围绕“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一场有关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状况的基本争论已经开始”，争论的双方分别是“以考茨基的旧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和新的俄国的‘列宁主义’正统派的联盟为一方，而以当代无产阶级运动中所有批判的、进步的理论趋向为一方”^①。前者是“新老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列宁主义或苏联马克思主义），后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欧马克思主义”或“西方共产主义”。这两种马克思主义在思想路线上是根本对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黑格尔思想的渊源性、辩证法的革命批判性和主观意识革命或总体性革命的重要性；而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则使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化、自然主义化，使辩证法变成了旧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忽视了意识的能动创造作用。

^① [德] 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57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1955年，“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写了一本名为《辩证法的历险》的书，其中有一章专门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他明确地将卢卡奇和科尔施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将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称为“西方共产主义的圣经”^①；认为此书与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复活了革命的青春和马克思主义的青春”^②。他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内容及特征归结为如下四个方面：（1）突出主体能动作用的主体客体辩证法及其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对立；（2）为意识和意识形态恢复地位的“意识形态理论”；（3）把阶级意识等同于实践的“实践哲学”；（4）注重偶然性的“历史相对主义”。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因为列宁主义在哲学上是一种独断论、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在政治上则是一种极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与列宁主义的激烈对抗中产生，没有对列宁主义的批判就不能形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尽管卢卡奇本人对梅洛-庞蒂所确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存在并把他奉为这一思潮的开山祖一再提出抗议，说这是一种阴谋和伪造，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由于梅洛-庞蒂的这本书而逐步流行起来。

英国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并从形式的转移和主题的创新等方面去规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存在种种的分歧和对立，却仍然构成一种具有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③。他将

^{①②} Maurice Merleau-Ponty. *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s*. London, 1974. 7, 58P.

^③ [英]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3页，台北，台湾光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0。

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本雅明、霍克海默、德拉-沃尔佩、马尔库塞、列斐伏尔、阿多尔诺、萨特、戈德曼、阿尔都塞、科莱蒂等人都列入“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名单里。安德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有它的独特性，使它作为一个完整的传统且具有明确的定义和区分的界线。西方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① 这种脱离产生了它的另一个特点，即“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哲学”^②。他又指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群众实践之间相互统一的破裂，造成了两者之间应有的联系纽带不可避免地转向另一轴心，由于缺乏一个革命的阶级运动的磁极，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指针不断摆向当代资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无产阶级实践的关系，却微妙地被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所取代。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本·阿格尔(Ben Agger)则扩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消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地域上的含义。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有别的，赋有特定意识形态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不管它来自于何方（东方或西方），只要具有这些意识形态的特征，都可以包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名称之下来加以研究。他说：“在1920年后的一段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置身于第二国际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控制的第三国际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之间。他们试图捍卫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和拯救马克思的辩证法；他们认为，这种辩证法既保持了理论分析的客观—科学性，又保持

^{①②} [英]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36、61页，台北，台湾光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0。

了它的主观—哲学性。”^①阿格尔把东欧“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或“东欧修正主义”）、北美的马克思主义和一些并不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理论家（如“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者”恩卓·佩奇、保罗·比康等）列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之中，该书用了大量篇幅摘录了30多位“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典型言论。阿格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接近于后来许多学者所使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许多学者则使用“新马克思主义”概念，并将它等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两者交替使用。如R. 戈尔曼（Robert A. Gorman）在《新马克思主义》一书中，E. 霍布斯（E. Hobbes）在《马克思主义史》一书中就采用了这种用法。他们强调，凡是超越第二国际的科学社会主义、第三国际的列宁主义及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管它出现在东方，还是出现在西方，均可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重新发现”和“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它主张回到马克思尤其是青年马克思的著作，重新解释和重建马克思主义，从而形成了一种既有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阐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又有别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戈尔曼在他主编的《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词典》中介绍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竟达205位之多。他声称这份人物名单“是经过和世界上每一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长时间的反复磋商之后产生的”，而且他们仅仅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而已。因此，入选者的数目可以很容易成倍地增加，就看从哪里划线。很明显，戈尔曼等人的“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包容十分广泛的概念，它所包括的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很不相同，有些人甚至与马克

^①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180～18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思主义没有多少共同之处。

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时也被人们当作一个单纯的地域性概念，即把它理解为西方的或西欧的马克思主义。例如南斯拉夫学者 A. 格尔科奇科夫在 1983 年 10 月举行的世界社会主义国际研讨会上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东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东方马克思主义”即是指原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指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指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

显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对它的内涵及外延的规定差距甚大。科尔施、梅洛-庞蒂及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是原初意义上的、较为严格的概念，它既包含地域上的内涵，即主要起源和发展于西方，又强调它的思想路线上的内涵，即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对立这一基本特征。阿格尔、戈尔曼等人则扩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外延，将它等同于“新马克思主义”，既消除了它的地域上的内涵，又消除了它与列宁主义对立的突出特征。而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地域概念，则使这一概念失去了它的特定的含义。因此，我们倾向于从科尔施、梅洛-庞蒂等人的较严格的意义上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把它理解为包括一些特定的代表人物及流派的一种思潮（下面将对此展开讨论）；而将“新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个上位概念，在外延上既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东欧“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学”等等。当然，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究竟包含哪些流派和人物，在国内外学术界也存在很大的争议，甚至某些被列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名单的人物也不承认自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2.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沿革

迄今为止，“西方马克思主义”已有 70 余年的历史，它经历

了从形成、发展到鼎盛及解体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及流派。

“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于 20 年代初期，它的诞生以 1923 年卢卡奇 (George Lukács) 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问世为标志。因此，卢卡奇、科尔施 (还有葛兰西) 相应地被推崇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

青年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极端重要性，强调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方法论的革新和扩展来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批判性。围绕这一中心，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基础问题进行探讨并作出新的解释。他以黑格尔主义的精神来更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并将总体性范畴放在辩证法的中心地位，又将总体性解释为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进而考察实践概念。他断言，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只是一个社会范畴”，辩证法只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而马克思主义则仅仅是一种社会历史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由此他批评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他力图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考察物化和阶级意识问题，强调主观意识 (无产阶级意识) 在创造历史中的巨大作用。

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显示出了与《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相似理论倾向，它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科尔施宣称本文的任务是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其方法是利用黑格尔和马克思分析历史时所采用的辩证观点来分析整个上层建筑问题，以便达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和实践相互关系的原则性和明确性。他认为必须既反对脱离实践的理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又反对脱离理论的实践——修正主义。科尔施宣称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是同一个东西，主张通过黑格尔哲学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识，给马克思主义重新确定方向。他也特别强调总体性观点和主观意识

的创造作用，反对唯物主义反映论。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观点更复杂一些。尽管他的不少观点与卢卡奇和科尔施的观点有较大的差别，但他的基本思想倾向与他们有一致之处。这也正是他被推崇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的主要原因。葛兰西也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独特的解释，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唯物主义一元论，也不是唯心主义一元论，而是“实践一元论”或“实践哲学”；他将实践理解为物质和精神、人和自然的统一体，主张用“合理的辩证法”概念取代“唯物辩证法”概念。他不同意卢卡奇和科尔施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批评，但并不反对他们将辩证法局限于历史领域的观点。葛兰西还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重大意义，批判第二国际的机械论和宿命论观点。

由此可见，卢卡奇、科尔施等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一种既不同于恩格斯、列宁等人所阐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又不同于以伯恩斯坦等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观点的解释，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传统，确立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新发现和设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向。

2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传播，并与这些国家的社会文化传统尤其是流行的哲学思潮相结合，出现了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流派，从而使“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一种世界性思潮。

在德国，出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流派——法兰克福学派。这个学派是20—30年代围绕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及其刊物《社会研究杂志》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M.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T. W. 阿多尔诺

(Theoder W. Adorno)、F. 波洛克 (Friedrich Pollock)、F. 纽伊曼 (Frani Neuman)、O. 基希海默 (Otto Kirchheimer)、W. 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E. 弗洛姆 (Erich Fromm)、H. 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以及法兰克福第二代的 J. 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A. 施密特 (Alfred Schmidt)、K. 奥菲 (Claus Offe) 等人。法兰克福学派从一开始便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为方向，实际上直接继承了青年卢卡奇和科尔施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并将其社会批判理论（简称“批判理论”）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他们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批判苏联模式和“正统马克思主义”，重新解释或重建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在许多问题上承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观点，如用黑格尔主义的精神来解释马克思主义，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否定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把辩证法局限于社会历史领域，归结为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进而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归结为人道主义等等。另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拓宽了研究领域并形成自己的理论特色。例如，加强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尤其是这一社会的思想文化及意识形态的研究，展开对科学技术社会政治效应和社会心理的研究，用各种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等等。法兰克福学派主要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开了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相割裂的先河。

在法国，出现了一些相当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及流派，包括 L. 戈德曼 (Lucien Goldmann) 的“法国马克思主义”、H. 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J-P. 萨特 (Jean-Paul Sartre)、M. 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L. 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 等人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在法

国较早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人物是卢卡奇的学生戈德曼，他的著作在当时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颇有影响。他在许多方面继承和发挥了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其理论被人们称为“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列斐伏尔是一位颇有知名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些学者认为他代表了法国马克思主义走向存在主义思潮的一个阶段，应当把他的思想与萨特的思想并列作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主要形式。列斐伏尔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解释，试图以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为基础，发展出一种适应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条件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一整套论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去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增长、阶级、国家、革命和意识形态等问题；他也提出了一种“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法国乃至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流派，它的显著特征是把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按照存在主义的精神去解释和重建马克思主义。这种把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企图是从40年代中期梅洛-庞蒂的著作开始的，后由萨特加以系统、详尽的发挥。按照萨特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同存在主义是关于自由和行动的两种可能和谐共存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必须将存在主义关于人的学说，当作“人学的基础”加以吸收，为马克思主义补充上主观的方面。他同样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人学”），将它的基础归结为人道主义；他只承认历史辩证法，反对自然辩证法，并着重发挥了他的匮乏与异化的社会存在本体论。

60年代初，法国出现了将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趋势，形成了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与稍早在意大利出现的“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同属“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方向，与以黑格尔主义和人道主义为基调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或“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义”（即卢卡奇、科尔施、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人物的观点）方向相对立。“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宣称要用纯科学去排除马克思主义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依照结构主义的精神去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化和现代化。阿尔都塞等人用结构主义的观点抵制卢卡奇、萨特等人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反对那种他认为是内在于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过分简单的经济唯物主义。他的两个著名的论点是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的认识论断裂以及“依据症候阅读法”去理解马克思的思想。

在意大利，则出现了以 G. 德拉-沃尔佩 (Galvan Della-Volpe) 和他的学生 L. 科莱蒂 (Lucio Colletti) 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德拉-沃尔佩既反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反对从卢卡奇、科尔施到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或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同现代科学的逻辑统一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科学化。他坚决抵制任何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黑格尔派来理解的企图，认为黑格尔的从抽象到具体，再回到抽象的辩证法，混淆了概念的发展进程和实际事物的发展进程，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则包含了把握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这样一个按科学规律建立起来的认识论。可以说，德拉-沃尔佩和阿尔都塞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科学主义方向的传统。

除了上述的人物及流派之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流派是所谓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流派的开创者是奥地利的 W. 赖希 (Welhelm Reich)，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人也被人们列入这个流派之中。这个流派的首要特征是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补充”或“修正”、“深化”马克思主义，在此基础上研究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人问题，特别是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苏联模式。

从 60 年代末开始，特别是 70 年代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通过 60 年代末“新左派”及学生造反运动，特别是法国的“五月风暴”，“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声名大振，但也立即走下坡路，尽管他们的理论在某些方面得到修正和补充，但大势已去。另一方面，70 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心转变，在英美及其他北美国家，出现了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流派及代表人物，研究的主题、范围也发生了变化。

首先，先前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流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和后起之秀，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以及总结“新左派”造反运动的经验教训，修正或推进各自所属流派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马尔库塞，在“五月风暴”之后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加以重新分析，修正他的发达工业社会理论及政治策略；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 60 年代末之后则力图用语言学去补充和修正早期的批判理论，实现批判理论由意识哲学到语言哲学的转向，并加强了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列斐伏尔则通过对发生在他身边的“五月风暴”的分析和反思，进一步扩展他的“异化—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特别致力于国家理论的研究，将这方面的研究与异化理论的研究并列，作为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整体性的两条主线。沿着“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A. 高兹（Gorz）把“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运动、后工业社会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政治生态学”、“后工业社会主义”等理论，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 70、80 年代在法国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活动领域。沿着“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向，N. 普兰查斯（Poulantzas）则以提供“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国家学说而闻名于世。

其次，从 70 年代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心由德

国、法国和意大利转向英美及其他北美国家，研究主题则由哲学、文化转向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领域，并日益与西方新社会运动结合起来。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颇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流派。在英美，出现了以 G. A. 柯亨 (Gerald Allan Cohen)、J. 埃尔斯特 (John Elster)、J. E. 罗默 (John E. Roemer) 等人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该学派试图将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结合起来，用现代逻辑、数学和模式工具去研究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剥削等问题，它以强调抽象原则、重视马克思主义微观基础探索和主张非教条式研究马克思主义为特点。在北美，则出现了以 W. 莱易斯 (William Leiss)、B. 阿格尔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它及时地将生态问题和生态运动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出现了以伊曼纽尔·华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世界体系论”等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和以 R. 米利班德 (Ralph Miliband)、R. 奥康纳 (James R. O'Connor) 等人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此外，在意大利出现了以 S. 丁伯纳罗 (Sebastiano Timpanaro) 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法国 80 年代以来则有以乔治·拉比卡为代表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

值得一提的是从 50 年代中后期到 60 年代末形成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潮。该思潮包括原东德 E. 布洛赫 (Ernst Bloch) 的“乌托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 G. 彼得洛维奇 (Gajo Petrovic)、M. 马尔科维奇 (Mihilo Markovic)、P. 弗兰尼茨基 (Predrag Vranicki) 等人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实践派”，以 L. 科拉科夫斯基 (Leszek Kolakowski)、A. 沙夫 (Adam Schaff) 等人为代表的“波兰哲学人文学派”，以 K. 科西克 (Karel Kosik)、R. 李希塔等人为代表的“捷克存在人类学派”，以 A. 黑格杜斯、A. 赫勒 (Agnes Heller) 等人为代表的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等。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在与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冲突中发展起来的，而且也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就其理论倾向来说，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致力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重视对社会主义问题、异化问题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正因为这个原因，本书在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有关问题时，将适当引证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3.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

“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物及流派众多，观点繁杂，其内部也存在着种种对立、分歧。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或相似的理论倾向，形成某些共同的学术传统。或者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有某些共同的基本理论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张“革新”或“重建”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回到（青年）马克思”的口号下，要求“重新发现马克思”，通过马克思本人的著作特别是早期的著作来“革新”或“重建”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一方面，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较之于马克思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出现了新趋势和新特点；而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 19 世纪的社会理论即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论，它的许多原理所赖以成立的现实基础消失了，不能解答现时代提出的各种问题，因而过时了，必须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以适应于当代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由于马克思的理论被恩格斯及其后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歪曲，已变得面目全非，所以需要正本清源，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建立一种“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来与恩格斯及其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对立。

第二，逐步脱离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

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之一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工人运动的产物，反过来成为无产阶级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逐步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则，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局限于学术研究的圈子里。这就是安德森所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最根本的特点是，它在学术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学院式特征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它的奠基人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积极参与者，他们都力图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只是到了30年代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才开始脱离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主要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这种变化最初是从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表现出来的。霍克海默在30年代初创立批判理论时就明显地脱离工人运动，法兰克福学派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正是沿着一条离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曲折道路而前进的。

应当指出，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具有学院式特征，主要是就它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关系而言的，并不是说他们不关心现实问题，相反在他们的理论中，可以看到他们所探讨的许多论题是当代社会的紧迫问题，也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

第三，在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的旗号下，主张用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来“补充”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新或重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有效的途径，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即马克思主义向各种学术思潮开放，吸收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成果来“补充”、“修正”或“发展”自己。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

哲学中寻根探源，续马克思主义的家谱，即利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体系来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解释，以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从黑格尔主义哲学中寻找根据，主张通过黑格尔哲学来恢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批判性；“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则从其他方面寻根（如休谟、康德、斯宾诺莎等被认为是马克思的先驱），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二是主张吸收当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因素补充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潮相融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主要流派基本上是将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当代各种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混合的产物，它的奠基人的思想也深受资产阶级哲学、文化的影响。如卢卡奇的思想便深受 M. 韦伯、齐美尔、伏尔泰等人观点的影响，葛兰西的思想也受到克罗齐观点的深刻影响。

第四，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批判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各执一端，相互否定。

马克思主义是批判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它既是科学的，又是批判的。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革新”或“重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却往往只强调一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接受马克思对当时社会的批判及其表现出来的批判方法，宣称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在他们看来，实证知识是从属于现有社会结构的思想上的附属品，对现实的批判非但无益反而有害。“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只强调马克思对当代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实证科学知识的贡献，只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忽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性。他们赞赏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科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却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孔德、穆勒、李嘉图等古典社会科学家以及现代实证主义者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区别，即马克思对现存理论和现实的存在形式始终作了彻底的批判。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 资本主义社会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理论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反思的结果。从一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强调要认识现时代，解决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因此，时代的发展及主要社会事件，成为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现实基础。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的视角、主题及重点有所变化。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形成、发展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年代）：对20世纪早期历史的反思。在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着重研究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并反思20世纪初期的主要历史事件。理论的主题是，早期垄断资本主义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的特点，这个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以及阶级、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问题。

这个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从而引起欧洲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纪元。此后几年，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先后爆发了革命起义，但到1922年都相继失败了。在20年代初，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而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了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处境艰难，正致力于巩固和发展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共产国际着手总结革命经验，积聚力量，准备迎接新的战斗。“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卢卡奇、科尔施以及葛兰西这一时期理论探索的主要着眼点是当时变化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条件，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物化结构与阶级意识问题；并总结欧洲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探讨复兴革命的道路。他们从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即欧洲革命失败的原因不是革命的客观条件不成熟，而是主观条件不具备，即存在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危机”。

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等人也对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当今的时代，竞争、自由的资本主义已经衰亡，大型的、有组织的工业已经产生；随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意识有所提高；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超越阶级体制的潜在性，而关于社会主义即将到来的理论有其合理性。但是，革命不会自动产生，有毁灭革命希望的种种力量和机构存在。

第二阶段（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期）：对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国家批判。在这个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集中批判作为垄断资本主义产物的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国家，特别是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社会心理根源，中心理论主题则是德国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经济与国家的关系。

1929年秋，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和文化及精神危机，世界在动荡、分化，法西斯主义的势力迅速在德国、意大利等国崛起。希特勒在德国的掌权宣告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破产。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不仅镇压人民的反抗，而且取消了资产阶级的一切形式上的民主，并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时间，野蛮、屠杀、恐怖笼罩着整个世界。历史本身提出了一个严肃而重大的课题，即为什么会出现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必须回答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这一问题，以便防止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的东山再起。这构成了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中心主题。

法兰克福学派将法西斯主义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霍克海默在《欧洲犹太人》一文中说，“那些不愿讲资本主义的人就应该对法西斯主义保持沉默”^①。法兰克福学派的大部分成员都赞同马尔库塞的如下观点：“从自由主义的国家向总体极权主义国家的转变是在单一的社会秩序的框架中出现的”^②。自由资本主义的崩溃被认为是使法西斯主义成为可能的条件，法西斯主义的产生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相联系。对这两者是如何确切地联系在一起的问题的探索，使得法兰克福学派在很大程度上转向对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变化着的资本对政体关系问题的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对法西斯主义及极权主义的批判中，不仅分析其产生的社会、经济和阶级根源，而且更重视分析它的社会心理根源。为此，他们普遍借助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最终走上将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道路。

第三阶段（4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末期）：对科学技术及当代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在这一时期，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的重点转入对当代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全面分析和批判，特别是集中在对该社会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分析批判上，从而形成了较系统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或“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发达工业社会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尤其是5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一场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新科技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哈贝马斯所说的“科学与技术日益相互依赖而成为第一位生产力”的历史趋势。新科技革命对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

① M. Horkheimer. Die Juden und Europa.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Vol. 8, 1/2 (1939), 115P.

② H. Marcuse. The Struggle against liberalism in the totalitarian view of the state, in his Negations.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19P.

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它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改善了劳动条件，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使股份公司这一资本所有制形式成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一个基本形式；使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的比重加大，加快了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步伐；它使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出现新情况和新特点，尤其是中间阶层的壮大及作用日益突出。但另一方面，新科技革命也带来了一系列消极的现象。科学技术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中日益变成统治和奴役的工具，加剧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异化，使人更感压抑和沮丧；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还产生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其他社会问题。所有这一切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客观基础，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分析批判，并把焦点对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最引人注目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涉及的主要课题有：当代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及其危机趋势；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及政治效应；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关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在当代的适应性等等。尽管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仍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方面，但是这种分析并不占主导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日益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的批判取代对它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他们日益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转而求助于当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如马克斯·韦伯的社会政治理论）。

第四阶段（60年代以后）：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的修正、扩展和深化。从60年代末开始，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由顶峰走向解体，它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在某些方面得到修正、扩充或深化。这一时期的理论焦点是阶级和国家问题。

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左派”及青年学生的造反运动蓬勃发展，特别是1968年出现了法国的“五月风暴”。这实际上是一场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新阶段相联结的新型抗议运动，被人们称为“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状况的第一次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它为接着而来的生态运动、女权运动、争取参与民主运动等扫清了道路；同时，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科技革命向纵深发展，科学技术的消极效应更加明显尤其是生态危机加强；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仍在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加剧。这些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在60年代末以后发展的背景。

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主要流派的某些代表人物及后起之秀，通过分析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情况以及总结“新左派”及学生造反运动的经验教训，推进他们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是修正已有的理论，如马尔库塞在“五月风暴”以后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重新分析，修正他在《单向度的人》（1964年）一书所提出的发达工业社会理论。在该书中，他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一个植根在消费需要上面的全面融合的社会，而在1972年出版的《反革命和造反》一书中，则看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体系这个“快乐的消费者社会”已在解体，并据此修改他的政治战略。二是加强了对阶级和国家理论的研究，这是以前被“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忽视的问题。60年代末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阶级理论的著述大量出现，这些著述者中有列斐伏尔、奥菲、普兰查斯、米利班德、奥康纳等人。他们补充或丰富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阶级和国家问题方面。三是加强了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研究，形成“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社会学理论，这主要是北美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例如美国的华勒斯坦提出了所谓的“依赖发展理论”。四是深化科学技术社会政治效应的研究，特别是科学技术对环境的影响及生态问题研究，出现了以莱易斯和阿格尔等人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按照阿格尔的说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两种分析观点：“一方面它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主义的动力导致资源不断减少和大气受污染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它力图评价现代的统治形式——人类在这种统治形式中从感情上依附于商品的异化消费，力图摆脱独裁主义的协调和异化劳动的负担”^①。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涉及面很广，内容也相当丰富，我们将它归结为如下的基本论题及观点：

1.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危机趋势

与早期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出现了哪些新发展、新变化和新特点?它的一般危机趋势以及变革前景如何?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立足点。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有关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的理论尤其是危机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用不少概念来表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例如:“垄断资本主义”(基希海默等)、“国家资本主义”(波洛克)、“后竞争资本主义”或“后市场社会”(阿多尔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哈贝马斯)、“发达工业社会”(马尔库塞)等等。这些概念的含义不尽相同,有时指19世

^①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42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纪末 20 世纪初以来的现代资本主义,有时则指二战以后的当代资本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及新特征。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波洛克以纳粹德国为蓝本,描述“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认为这种新的秩序或制度是私人资本主义的后继者;国家担负起私人资本主义的重要职能;资本主义的机制仍起着重要作用等等。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按技术的观念和结构而运转的政治系统,定义为“单面社会”、“畸型社会”。哈贝马斯则认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是这样一个社会:(1)经济集中的过程——一国和随后的多国公司的兴起——以及组织商品、资本和劳动的市场;(2)随着职能差距的扩大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①他认为对经济过程的国家干预补充和部分取代市场机制,使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有别于早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他将科学与技术日益结合而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并列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历史趋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认为,由于这些新的历史趋势,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较详细地分析了科学技术进步给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域所带来的一体化影响;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中较全面地剖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行政制度、法律制度和阶级结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眼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变化及特征主要有:科学技术成为主要的生产力和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及所有制关系已经改变,国家职能及政治—行政结构发生变化;资本主义危机的形式及重点已转

^① 参见 J.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5. 33P.

移；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再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统治的权力正逐步由资本家转向技术专家，统治的方式从经济剥削和人身摧残转向思想意识方面的奴役；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取代等价交换的意识形态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合理性辩护的工具；如此等等。

60年代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哈贝马斯、米利班德、奥康纳、莱易斯和阿格尔等）特别着力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问题，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颇有“创见”和“特色”的方面。哈贝马斯在这方面的观点最系统全面和引人注目。他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划分为经济的、政治—行政的和文化的三个子系统，然后列出四种形式的危机，即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动因危机、合法化危机，此外还有生态危机（他认为这是所有工业社会都存在的）。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陷入全面危机的社会，尽管在该社会中经济危机仍然存在，但它已不是主要的危机形式，现在危机转移到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上，特别表现为合理性和合法化危机。米利班德等人也讨论过合法化危机问题；奥康纳则着眼于财政危机；“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莱易斯、阿格尔等人则主要讨论生态危机问题。

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讨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可能性问题，他们在这方面的观点和态度比较复杂。但似乎可以说，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持乐观态度，而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采取悲观态度。

2. 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及政治效应

对当代科学技术的批判，对科学技术社会功能及政治效应的分析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眼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在科技进步基础上形成的发达工业社会，如何看待当代

科学技术，“成了理解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①；而且在四五十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日益用对科学技术和文化的批判来取代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尤其是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崔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著作里，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及政治效应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在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予以高度的重视。他们将科学技术进步当作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础来加以研究，当作该社会的新的控制形式和矛盾异化的根源来加以批判。他们的主要着眼点是当代科学技术社会功能及政治效应的消极方面，中心主题是当代科学技术是如何造就当代资本主义的单面、畸型社会的，科学技术是如何蜕变为新的控制形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围绕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关系及社会制度、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科学技术与合理性、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科学技术与人类未来等方面的关系展开对科学技术社会功能及政治效应的论述，从而形成了较系统的科学技术社会学及科学技术政治学理论。在这一理论中，有如下几个独特而有影响的论点：

第一，当代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一种独立的变数和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哈贝马斯认为，由于当代科学、技术及其应用日益相互联结、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结构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科学技术成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主要手段等原因，科学技术在当代成了首要的或第一位的生产力。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准自动进步成了一种独立的变数，即成了一种最重要的是，独一无

^① J. Habermas.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0. 100P.

二的系统变数——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变数，以至于社会制度的发展似乎是由科技进步的逻辑所决定的；^① 科学技术的进步已成为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因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过时了。

第二，科学技术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创造了一个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逐渐趋同或融合的（后）工业社会。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关系已发生了改变；科学技术革命“凌驾于”或“超脱于”不同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制度而展开自身过程，并且它以自身的进程不断地自动取消现存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他们认为，科学技术革命产生着一种具有强大兼容力的社会政治效果。马尔库塞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看作是同一个由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所支配的工业社会的两种模式；由于科技进步，存在着一种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趋同的有力倾向。

第三，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它取代以往的政治权力而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当代科学技术不仅仅是生产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它取代传统的意识形态（以公平交换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辩护。他们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已失去了以往人对人的奴役及采用恐怖手段的特性，科学技术本身的程序取代了民主政治的程序。技术不仅是仪器、工具的总和，而且也是新的控制形式，它们决定着社会所要求的职业、技能、态度以及个人的需要和志向。因此，马尔库塞的著名公式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增长的财富＝不断扩大的奴役”。

第四，当代科学技术是当代社会全面异化的万恶之源，因而

^① 参见 J. Habermas,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0. 105P.

它在现有形态上不是一种革命或解放的力量。“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造就具有单面思维方式的单面人，造成经济生活和消费方式的一体化，带来了政治的封闭，并造成全球的环境危机及其他社会问题；它使高层的文化艺术失效，使工具理性和实证主义横行。因此，在现存的形态上，科学技术不可能是一种解放力量。马尔库塞进而认为，人类要获得自由解放，必须依赖于新型的科学技术。

3. 现代国家的本质、结构、职能及类型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国家（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结构、职能及类型进行剖析，并由此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一套系统完整的国家理论，因此，必须加以补充。科尔施早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中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在社会革命对国家的态度上，“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已丧失了对国家问题的判断能力，不能正确处理好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因此，正确把握国家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列斐伏尔则将国家理论与异化理论并列，作为他恢复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两条主线，他要“根据国家的概念来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科尔施和葛兰西着力于重新界定国家机器的范围，并把各种意识形态工具和文化手段视为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重新界定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法兰克福学派则把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当作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来加以考察。早在 30 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通过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就已注意到现代国家问题。霍克海默、波洛克等人研究了以法西斯主义为代表的极权主义国家或独裁国家问题；马尔库塞则以美国为蓝本，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哈贝马斯和他的学生奥菲则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职能、结构、活

动特点、合法性及其危机等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列斐伏尔也致力于国家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国家的消亡问题加以分析。60年代中后期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加强了对国家问题的研究，特别着力于对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体现出来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这种干预所引起的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的研究，形成了种种的国家学说。哈佛大学政治学家斯科玻尔将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分为三派，即法人自由说、政治功能说和阶级斗争说。以米利班德、奥康纳等人为代表的法人自由说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工具，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而认为，有远见而开明的资本家利用国家功能的扩大来解决资本主义危机（因而，这一派也往往被称为“工具论”）；以普兰查斯为代表的功能说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功能在于保持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条件，资本家没有直接搞政治、操纵国家机器的必要（由于普兰查斯借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分析其特质，所以，他的观点也被称为结构论）；还有一些学者更多地遵循马克思主义传统，将国家看作阶级斗争的产物。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国家学说方面涉及的主要论题有：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别是它是不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问题；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与职能问题，尤其是国家日益干预经济生活的实质问题；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由于官员激增，行政管理范围扩大，国家干预加深，引起国家权力的膨胀，国家能否摆脱资产阶级的控制而成为自主的问题；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及其危机问题等等。

4. 阶级、阶级关系及阶级意识

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结构及阶级意识的分析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卢卡奇、科尔施及葛兰西从一开始就重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分析，

但是他们的阶级理论最有特色的方面则是阶级意识理论。他们认为这是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最薄弱的方面，而欧洲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客观条件不成熟，而是因为存在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危机。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发展出一个系统的“阶级意识”理论，探索阶级意识的含义、特征、功能及历史发展，特别要突出强调自觉的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重视阶级意识研究成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发展的一个传统。

许多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认为，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基础的剩余价值学说已经失去根据，更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的改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了，因此，他们鼓吹阶级融合论和阶级调和论。马尔库塞认为，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尽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仍然是基本阶级，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改变了这两大阶级的结构和作用，即它们不再以历史转变的动因出现，一种维护和改变现存制度的共同兴趣，把从前敌对的阶级联合起来，质变的概念让位给进化的概念。^①他认为使无产阶级的结构和作用改变的“主要决定性因素”是：第一，机械化日益减少消耗在劳动中的体力的数量和程度；第二，职业分层中白领工人增多，蓝领工人减少；第三，劳动与生产工具特征的变化，改变了劳动者的态度和意识，劳动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日趋整合；第四，新的劳动技术手段进一步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否定地位，它不再表现为现存制度的活生生的对立面。^②哈贝马斯则认为，国家管理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对公开阶级斗争所产生的资本主义危机所做出的反应，它的一整套办法

^{①②} 参见〔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4、22～2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可以调和阶级冲突，或使这种冲突成为潜伏的；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经济调节和政治操纵的技术统治制度已经取代了任何可以明确规定的阶级统治，并且在制度化的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创造了跨越阶级界限的忠诚，这使阶级矛盾隐而不见了，以致于最大可能的冲突是社会结构的部分冲突。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随着机械化、自动化的发展，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比例正在迅速下降，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非生产性的工人尤其是科技人员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出现一个“新工人阶级”。马勒和高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运用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巨变，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的现象已不再存在，工人阶级内部的结构、他们的素质和愿望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特别是出现了一个与传统的以体力劳动者为主的工人阶级不一样的“新工人阶级”，这个“新工人阶级”是革命的新主体。列斐伏尔也讨论“新工人阶级”问题，但他否认“新工人阶级”具有革命性。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兰查斯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著名的“阶级理论家”。他从多元决定论出发，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结构方面”去探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结构问题。他提出划分阶级的“新”标准，认为经济不是唯一的划分阶级的决定性因素，政治倾向和思想意识也是决定的因素。依这一标准，他把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划分为无产阶级，除此之外，其他领取工薪的工人（商业雇员、白领工人、服务人员、脑力劳动者等）都属于“小资产阶级”。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所涉及的主要论题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问题；阶级划分的标准问题；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革命性问题；“新无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问题；阶级意识及其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问题；马克

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在当代的适应性问题；等等。

5. 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重点在于文化及意识形态方面。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认为，自2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主题的“创新”，即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而是自始至终地关注文化意识形态问题。这种说法尽管有点夸大，但的确指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的一般趋势。

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永恒的理论主题。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讨论了意识形态概念，分析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并强调说，在危机的时刻，革命的命运取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作用。科尔施也有类似的观点。葛兰西则指出，掌握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前提条件。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这一传统，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认为，文化意识形态今天已成为维护统治的主要力量，对文化意识形态的彻底批判已构成解放的主要途径。因此，他们往往将其批判理论看作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学说。例如，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便以“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作为副标题；哈贝马斯则宣称批判的社会理论采取意识形态批判的形式。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因袭了注重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这一传统。

“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方面的理论主要包括如下内容：（1）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发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戈德曼、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等人都有专门的论述，他们对意识形态的含义、特征、功能及演变等问题进行研究，形成较系统的意识形态理论。（2）工具理性批判。这主要是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作。他们对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进行全面的

剖析，揭示它的特征、危害及其与批判理性的对立，并致力于批判理性的重建。(3) 实证主义批判。卢卡奇首先发起对实证主义思潮及将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化的倾向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主义发动了全面的攻击。在他们那里，实证主义是一个广义概念，相当于“科学主义”。因此，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整个科学主义思潮的批判，这种批判涉及实证主义的起源、演变、特征及危害等方面的问题。(4) 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们揭露当代资本主义“肯定文化”的危害，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加以批判。他们着重揭示这种文化的形成、呈现的特性和消极后果，认为大众文化呈现商品化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性；大众文化所产生的标准化、齐一性扼杀了个性、创造性；它是一种控制的力量，具有强制性。(5) 传统美学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大都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对资产阶级美学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是他们的文化、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在当代西方美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6. 异化和人道主义

异化和人道主义可以说是贯穿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理论的一根红线。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异化和人道主义作为概念工具，用于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异化现象；另一方面，他们试图以异化和人道主义为基础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异化及人道主义问题的关注也是从卢卡奇开始的。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整个当代西方思想史上第一本论及“物化”或异化的著作，《历史和阶级意识》继承、发挥了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的异化思想，将“物化”（在卢卡奇那里，物化=异化）首次当作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来加以考察，形成了较系统的“物化”理论，开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现代西方

思想史上有关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讨论的先河。1932年，马克思论异化和人道主义的主要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正式出版，这是后来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成为讨论热点的另一个契机。

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卢卡奇的影响下，通过研读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尤其是《手稿》，大大加强了对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他们主张以卢卡奇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基础，发展一种具体的批判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将异化和人道主义当作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概念工具，用以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的矛盾异化现象，并将克服异化当作争取“新社会主义”纲领的一个中心论题。他们提出了种种异化理论，如总体异化论、科技异化论、消费异化论、日常生活异化论、人生异化论等等。同时，以卢卡奇、科尔施、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所谓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以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及人道主义理论为基础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要确立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

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还重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心理和个人意识的研究。卢卡奇、科尔施等人开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主观意识作用的传统。许多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则将社会心理和个人意识的研究放在突出的地位，并认为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他们特别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去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心理机制或社会心理根源；并且认为，德国工人阶级之所以未能成功地阻止希特勒上台，与资产阶级长期的思想意识的奴役、德国工人阶级丧失革命斗争意识有关。他们进而分析当代发达工业社会政治统治的特点，认为现在的统治方式主要是对人的思想意识的控制，即统治者借助技术手段将自己的意志内化为被统治

者的心理意识，使人失去独立判断和批判能力，从而失去革命意志。正是这种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心理和个人意识研究的重视，促使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马尔库塞、弗洛姆和赖希等人走上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相结合的道路，从而形成所谓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两个密切联系的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又批判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寻求一条既不同于当代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现存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或“新社会主义”。他们批判反思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揭露批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弊端，在关于西方社会变革的动因、主体、途径及策略以及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与蓝图等方面提出了各种观点，形成了种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如科尔施的“实践社会主义”、葛兰西的“工厂委员的社会主义”、列斐伏尔的“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马尔库塞的“自由社会主义”、弗洛姆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阿格尔等人的“生态社会主义”、高兹等人的“后工业社会主义”、罗默等人的“市场社会主义”等等。在这里，我们先简要描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的由来及发展，然后对他们的社会主义观的主要论题及观点加以评介。

“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作为共产国际内部的左倾激进思潮而出现的，它的奠基人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批评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批评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战略和策略，批评苏联的内外政策，探讨西方革命的途径、战略和策略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蓝图等问题，形成了一套既不同于列宁主义，又不同于第二

国际修正主义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理论（即左倾激进主义理论）。因此，从一开始，社会主义观及革命理论就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

在 20 至 30 年代，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直接参加者、革命理论家或领导人，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这几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总结欧洲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为复兴革命作准备。因此，对十月革命道路的评价和对西方革命的途径、战略和策略以及未来社会的特征和蓝图的探讨便是他们的社会主义观的中心论题。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着重论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及其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论及总体革命尤其是主观革命战略、无产阶级的组织方法论以及阶级与政党的关系。科尔施批评列宁主义的革命和国家理论及其哲学基础，探讨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观前提及总体革命战略，并提出了一种“实践社会主义”（“社会化”）的未来社会主义模式；葛兰西批评苏联模式，提出一套相当完整的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包括对十月革命道路的评价，西方革命的战略与策略，主观革命及掌握文化领导权问题，政党、阶级、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工厂委员会”的社会主义模式等等。

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及流派从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的这种理论传统出发，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现实或历史发展情况，展开了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和对第三条道路及“新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尽管从法兰克福学派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流派及代表人物逐步脱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研究失去了历史依托，但是，对当代西方社会变革及其出路的关注，仍然是他们的社会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时期，这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和对第三条道路及“新”社会主义的探索的侧重点、深度和广度有所不同。

从 30 年代末到 40 年代中期，以法兰克福学派和“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结合对法西斯主义批判这一理论研究的中心主题，展开了对苏联模式的批判。他们将苏联与法西斯主义国家并列作为极权主义国家，将苏联社会与西方社会视为同一个工业社会的两个变种来加以同等的批判；他们集中批判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揭露它的种种弊端特别是官僚主义和缺乏民主，抨击苏联的意识形态（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断定苏联社会与马克思社会主义理想不符，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是解放的社会。在此基础上，他们探讨西方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及其前景，并论及未来社会主义蓝图以及社会主义社会中如何处理好专政与民主、集权与分权、党与政、计划与市场、社会解放与人的解放等方面的关系问题。

4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初，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展开以及随之而来的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特别是 1953 年斯大林逝世以及 1956 年苏共 20 大召开等历史事件的出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主要流派及代表人物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或方面展开了对苏联模式的全面和系统的批判，并致力于探讨适应于西方的革命发展道路、战略和策略，提出了各种“新”社会主义模式。卢卡奇在苏共 20 大之后，一改 30 至 40 年代对苏联模式保持沉默的姿态，猛烈抨击苏联模式特别是斯大林主义，批评斯大林滥用专政、压制民主、个人独裁和对外搞霸权主义，并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根源归因于苏联的社会制度。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也猛烈抨击苏联模式，提出一套革命新理论和“新”社会主义模式（“自由社会主义”、“解放社会主义”或“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锋芒毕露。列斐伏尔在苏共 20 大之后致力于批判苏联的国家制度，尤其是集中抨击它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和苏联的政治异化，并提出了一套“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模式。萨特

在匈牙利事件之后，抨击苏联模式，特别是斯大林主义，对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历程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历史分析，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的自由和解放；梅洛-庞蒂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开始尖锐抨击苏联模式，说战争爆发，意味着苏联社会主义的终结；“乌托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布洛赫在1956年之后也积极批判斯大林主义模式，揭露它的实质及其危害，并认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应允许各国搞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

60年代末之后，随着“新左派”及学生造反运动的失败和新技术革命向纵深方面发展，西方社会又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继续批判苏联模式，并展开对第三条道路及“新”社会主义的探讨。他们力求将社会主义变革的理论与时代的精神和西方社会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及新社会运动结合起来，寻找革命的新动因、主体和策略，并提出一些“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一方面，一些原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如马尔库塞和列斐伏尔）通过总结“新左派”及学生造反运动的经验教训，修正他们原有的革命理论尤其是革命战略；另一方面，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流派或原有流派的新秀则根据时代的发展提出种种“新”的革命理论和“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剖析苏联模式，并力求确定它的历史地位；同时也探讨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新动因、主体及前景问题；“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后起之秀普兰查斯批评夺取政权的“列宁主义模式”，提出一种“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战略；“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秀高兹则提出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战略，并设想一种“后工业社会主义”模式；“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莱易斯和阿格尔抨击苏联的官僚主义，设想一种分散的、工人自治的和非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即“生态社会主义”模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罗默等人则提出一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在50年代中期以后，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批判，对苏联东欧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管理体制、国家及意识形态等作了全面剖析，揭露它所造成的极权主义、官僚主义、忽视民主、缺乏人权、阶级斗争至上以及意识形态严密控制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一种既不同于旧的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模式的“新”社会主义模式，即所谓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

我们从下面三点来概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的基本内容：

1. 理想与现实：对苏联模式的批判

这里的理想是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现实是指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对苏联模式的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的一个基础部分。所谓的苏联模式也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及社会主义发展的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模式的批判主要围绕下列三个方面来进行，即对十月革命道路或途径的评价；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批判；以及对作为苏联意识形态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首先，关于十月革命道路的评价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葛兰西、马尔库塞和普兰查斯等人认为，十月革命道路是俄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和革命形势的产物，它不具有普适性，不适应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变革，因此，必须探索适应于西方社会的革命新途径。葛兰西称十月革命为“反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的革命”^①，因为按照《资本论》的逻辑，在像俄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是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的，然而十月革

^① 《葛兰西文选》，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命胜利的事实驳倒了马克思。葛兰西进而认为由于西方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同，不能走十月革命或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普兰查斯则批评十月革命道路或所谓的夺取政权的“列宁主义模式”，认为这一模式与当代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不适应，如果采取这一模式，必将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陷入绝境。

其次，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批判方面，几乎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它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群起而攻之，不遗余力，大加鞭笞。他们批判的要点有四：一是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加以比较，断言苏联社会并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解放的社会，而是一个极权社会主义或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二是批评苏联模式过于狭窄，说它片面强调政治夺权，经济上改变所有制，忽视思想文化革命和民主政治建设；片面强调集中和纪律，忽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着力抨击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认为它是与法西斯主义一样的极权国家或独裁国家和官僚制度，其特征是高度集权、党政不分，在经济体制上则片面强调计划，排斥市场机制；四是断言苏联社会和西方社会一样，是同一个发达工业社会的两个变种，都建立在技术进步基础上，以技术合理性作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因而是一个压抑、异化的社会。

再次，关于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批判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作为它的核心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及其后的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认为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已丧失了它原有的生命力（即它的批判否定精神），变成苏联官方为自己的统治、为现实和政策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因此，要彻底批判苏联模式，就必须揭露这种模式的理论基础或指导思想，指出“苏联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背叛马克思主义而成为为统治合理性辩护的工具的。

2. 解放之路：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动因、主体、途径及策略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当代已经失效，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也不适应于当代西方的社会主义变革；他们既反对以暴力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道路，也反对民主党人的议会斗争道路，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因此，他们对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动因、主体、途径及策略进行探索，形成了较系统的理论。

关于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新动因。“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动因及革命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因而不再出现马克思所期待的无产阶级革命；现在出现了新的革命动因和条件，并将导致一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变革。马尔库塞宣称，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中，无产阶级之所以要起来革命，主要是为了改变贫困的状态，这是革命的动因，但是在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科技进步导致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并改变了无产阶级的贫困状态。因此，这种革命的动因已经不存在，更由于在该社会中阶级关系的改变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性的丧失，所以不可能出现马克思所讲的无产阶级革命了。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其他的革命新动因，这就是发达工业社会所造成的异化、压抑和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等等，由此产生一种新型的革命，即“产生于厌恶的革命”，这种革命的目的是爱欲的解放或人的自由解放，因而将导致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哈贝马斯则认为，在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所指出的两个革命化条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且无产阶级具有革命意识，能被组织起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已经消失，因此，不可能再出现真正的或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运动。归根结底，乃是革命主体出现意识形态危机，社会的乌托邦力量也衰竭了。但是，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所说的革命条

件不存在，不等于其他的革命条件不存在。实际上，在该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革命条件或动因，如这个社会的基础削弱，出现合法化危机，对可实现的福利的厌恶心理，官僚化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带来的压抑等等。这些新动因特别是人的本质受压抑的动因，使得社会变革成为必要和可能。这种变革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产生于厌恶的革命”，革命的目标不是发展生产力，增加物质财富，而是“美好生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莱易斯和阿格尔则将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新动因归结为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以及由此引起的生态危机，因此变革的目标是通过确立稳态经济，消除生态危机而进入“生态社会主义”。

关于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新”的主体。大部分后起的（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代西方社会阶级、阶级关系及结构已发生根本变化，无产阶级已不再作为历史转变的动力出现。因而他们在无产阶级之外去寻找革命的“新”主体。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认为，无产阶级曾是最卓越的革命阶级，因为它体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绝对否定；无产阶级所遭受的全部苦难、异化及受社会的排斥，促使它搞激进的暴力革命，而这种革命正是马克思学说所要求的。但是，在当代，随着科技进步对劳动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同化，失去了以往的革命性，不再是革命的主体了。那么，当代西方社会变革要靠谁来实现呢？他认为必须在现存制度之外建筑革命力量，发展有组织的激进左派，这些革命力量包括知识精英、青年大学生、黑人、少数民族等下层阶级以及第三世界的没有特权或为生存挣扎的人等等。哈贝马斯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在当代西方，无产阶级的两大特征——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贫困化——已经消失，无产阶级也已丧失了革命意识，再也意识不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们不再是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了，甚至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不再是无产阶级了。因

此，哈贝马斯将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主体确定为“扩大了工人阶级”，即以中间阶层、职员、知识分子和大中学生为主的工人阶级，而不是原来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无产阶级。又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的无产阶级已丧失了作为革命主体的资格，因此，他们把“新无产阶级”或“新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新主体。在列斐伏尔看来，这种作为革命新主体的“新无产阶级”包括中产阶级、白领工人、未被纳入生产过程的农民、青年、知识分子、黑人和外籍工人等等，而不是原来的工人阶级；在马勒和高兹看来，作为未来社会主义革命主体的“新工人阶级”是一种以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受过专门训练的工人组成的工人阶级。再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莱易斯和阿格尔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中间阶级”，即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过，他们又认为，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参与。

关于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途径、战略及策略。“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种种新的变革途径、战略或策略理论。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提出了一种总体革命尤其是注重主观革命或文化意识革命的理论，强调掌握意识形态及文化领导权对于革命取得胜利的极端重要性。葛兰西还提出了一种所谓的“阵地战”战略，即通过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市民社会）中不断渗透，一个个夺取资产阶级的文化机构，在掌握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础上最后夺取政权的战略。马尔库塞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不同的革命途径或战略。他既不同意走议会道路，又不主张暴力革命，而是主张一种“非暴力的反抗”。这种“非暴力反抗”的途径，通过意识、本能和文化革命来进行（《爱欲与文明》），或者通过“大拒绝”——拒绝一切从事苦斗和充当帮凶，拒绝对统治者服从——的战略（《单向度的人》），或者靠穿越机构或体制的长征——在为现存的体制服务时做反对这种体制的工作（《反革命与造反》）。高兹提

出一种“争取社会主义的新战略”或反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战略，这种战略拒绝在一个晚上就夺取政权的观念，而包括一系列可以导致夺取政权的改良措施，首先是争得由工会控制整个劳动场所和工资规模的权利，以工厂企业和劳动场所的变革为主要基地，注重权力的变革，即注重企业的控制权问题。这种战略与总罢工的方式不同，它以合法斗争和逐步变革来进行。普兰查斯提出一种“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即“把政治上的自由和代议制民主的机构同增加直接民主的形式和大量出现的自治团体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把国家内部进行斗争同与国家外部进行斗争结合起来。这种战略反对彻底砸烂或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做法，主张把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相结合。此外，列斐伏尔主张通过克服日常生活异化或日常生活革命来实现西方社会的变革；赖希主张通过意识革命和性革命来实现变革；阿格尔等人则主张走生态革命道路，如此等等。

3. 未来社会：“新”社会主义的模式与蓝图

“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套与现存社会主义模式特别是苏联模式不同的“新”社会主义模式，构想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的本质及目的并不在于改变所有制或政权的性质，不在于发展生产力和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因为这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或否定的条件；社会主义的本质及目的是人的自由解放、人的全面发展或人的本质、潜能的实现，这正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要义所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新”社会主义模式主要有：

“实践社会主义”。这是科尔施所提出的，以他的“工人委员会”和“社会化”理论为基础。他为建立在工人委员会基础上的国民经济精心地阐释了一种假设的经济体系；每一个工厂都由工厂委员会来管理，工人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在《什么是社会化》（1919）这一论著中，他设想一种经济组织体制，叫做

“工业自治”，认为国民经济的每一部门都应由一个协调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利益的委员会来管理。每一个工厂在其行业内应有有限的自由。决策将涉及产量、工作条件和利润的分配。在这个体系的第一阶段，生产资料被社会化，而工人则根据产量而获得报酬；在第二阶段，劳动自身也将被社会化；工人那时将按需要而获取报酬。

“工厂委员会的社会主义”。这是葛兰西根据 1919—1920 年意大利都灵等地的工人阶级运动实践而提出的一种未来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国家模式。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从资产阶级国家的体制中产生出来，它是一项全新的创造。问题不在于夺取政权，而在于要以日常生活为基础，通过一系列形式使无产阶级革命得到充分的发展。当务之急是要从无产阶级的权力中心去找答案，那就是工厂委员会。在他看来，工厂委员会与工会不同，代表着由工厂中一切生产者对生产过程的直接民主控制，它是无产阶级教育自身、集合经验、获得责任意识的手段。葛兰西强调把生产者的直接民主引入生产领域，是未来社会的关键。因为在未来社会中生产者变成生产过程的主体，而不是生产过程的简单执行者。葛兰西将工厂委员会称为“无产阶级国家的模型”，认为它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础问题，并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的自主性和首创性。

“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这是列斐伏尔在 1966 年的《工人自治的理论问题》一文中提出的一种“新”社会主义模式。列斐伏尔认为，苏联模式的特征是国家支配社会、高度的中央集权以及忽视市场机制的作用等；而他所向往的是一种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核心是社会成员通过自治，把他们的生活掌握在自己手里，把它变成自己的产品。按照这种工人自治社会主义理论，经济社会本质上是和政治社会、国家相对立的，生产者和劳动场所在否定着统治者，国家只是消费者的抽象化装，而真正的社会则是劳动

和生产的具体整体。因此，在这种社会主义中，政治制度、国家应从属于社会经济形态。在政治上，自治否定国家，倾向于超国家而使其消亡，自治的本质是分权，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相对立；在经济上，它并不排斥、否定市场机制、价值规律的作用，相反，自治必定通过解决市场的组织问题，恢复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地位和作用。

“自由社会主义”或“解放社会主义”。这是马尔库塞在《乌托邦的终结》等论著中提出的一种“新”社会主义模式。马尔库塞区别“现存社会主义”和“自由社会主义”：前者是与当代资本主义不同的工业文明的另一种体制，虽然由于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人的物质需求得到极大的满足，减少了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增加了生活乐趣，但仍然不能带来人的解放，人仍受控制、奴役和压抑；而后者作为未来社会的蓝图，则大大不同于前者，它是从“美学—性欲”方面来考虑的，特点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劳动和娱乐”的结合，即社会的必要劳动能被组织成与人的解放的真正需要相一致，从而消除对人的一切压抑和约束。“自由社会主义”将人的“道德和美学需要”变成人的基本需要，并使之得到满足；它之所以是自由的，乃在于它能使人达到“感官的、伦理的和合理的需要的满足”。因此，它是一个具有美感、道德的社会。马尔库塞还认为，尽管这种未来社会蓝图是乌托邦的，但具有历史的可实现性，因而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从科学到乌托邦，而不是从乌托邦到科学”。

“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这是弗洛姆等人提出的一种新模式。弗洛姆认为“现存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没有本质差别，它不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道主义社会”，一个以全面发展人的个性为宗旨的社会，它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又不同于苏联的共产主义。这种未来的社会就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在那里，

人摆脱了经济决定论的枷锁，人的精神得到完全的解放，人性得到恢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存，人与人之间“以爱为基础”和睦相处，是人人处于爱的体验中的“健全的社会”。

“生态社会主义”。这是莱易斯、阿格尔等人提出的模式。莱易斯认为，即将来临的生态灾难，迫使我们思考现在的工业化生产方式，迫使我们转向一种分散的、放缓增长速度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改变消费方式。因此，在未来的社会，必须发展一种新型的需要观、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行“稳态经济”，即“稳态社会主义”。阿格尔则主张通过消除异化劳动、异化消费，消除集中化和官僚化，建立起一个分散化、非官僚化和工人自治管理相结合的稳态经济的社会主义，即“生态社会主义”或“非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

“后工业社会主义”。这是高兹借用“后工业社会”和生态学理论而提出的一种后工业社会革命理论或乌托邦共产主义方案。他认为，为了避免生态灾难及世界末日，唯一的出路是停止经济增长，改变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建立一种以民主技术为基础、能够全面克服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综合症、促进个人自主及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社会。在这种未来的社会中，将扩展个人自主的领域或确立个人自主领域的首要性，限制经济和政治的必然领域；因而它是一个双元社会：即把社会空间划分为自主领域和受外界支配的领域，扩展前者限制后者；它本质上是一个自治的社会，该社会通过自动化去限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供自由地接近“欢乐工具”的机会，去制造和生产具有美学价值和解放时间的目标。

“市场社会主义”。这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罗默等人提出的将公有制或国有化与市场机制结合的社会主义新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西方学者和前苏联东欧学者一般把市场社会主义视为一种既有别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资本主义”，又有别于以前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的一种独立的社会主义

义经济体制；它具有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又利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按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约翰·罗默的观点，共产主义经济制度失败的原因是未能在计划制定者、企业家和劳动者之间建立起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必须靠市场社会主义来克服弊端，摆脱困境。这种市场社会主义的特征是：（1）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前提下保留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2）建立证券经济——某种形式的公有制，也就是把全国所有企业的资本以证券形式平等地分配给所有的成年居民；（3）平等地分配企业利润，劳动者凭证券获自己企业和其他企业的红利；（4）计划体制通过差别利率对投资进行社会管理。

以下各章，我们将展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各个专题的分析。

第一章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 发展与危机趋势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

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早期垄断资本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三个阶段。与自由资本主义及早期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已发生很大变化，出现了某些新的发展趋势，并显示出一系列新特征。对这些新变化、新趋势及新特征的分析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首要主题。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20年代分析当时欧洲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和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当代的适应性问题时，已经涉及了当时的西方社会即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及特征问题（如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物化结构和阶级关系的研究，葛兰西对当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阶级结构的分析）；从3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出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批判法西斯主义，对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剖析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以及它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40年代末、50年代初以后，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加强或展开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的全面

研究，力图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新特征。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趋势等问题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理论和危机理论。下面，我们将围绕这三个方面来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理论。

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用不同的概念来表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例如，“垄断资本主义”（基希海默）、“国家资本主义”（波洛克）、“后竞争资本主义”或“后市场社会”（阿多尔诺）、“发达工业社会”（马尔库塞）、“晚期资本主义”、“先进资本主义”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哈贝马斯）、“有机资本主义”（列斐伏尔）、“后工业社会”（莱易斯）等等。这些概念有时指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资本主义，有时则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当代资本主义。尽管存在着这种差别，但是，所有这些概念都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表示一种在自由资本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新形式，即一种有别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新时代。

那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眼里，是什么东西使得当代资本主义区别于自由资本主义及早期的垄断资本主义呢？换言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新变化、新趋势及新特征究竟表现在哪里呢？我们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主，来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点。

法兰克福学派在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的理论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他们由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转入对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的全面研究。批判理论家们把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霍克海默说：“那

些不愿讲资本主义的人就应该对法西斯主义保持沉默。”^① 马尔库塞则说：“从自由主义的国家向总体极权主义国家的转变是在单一社会秩序的框架中实现的。”^② 在批判理论家们看来，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的产生以自由资本主义的崩溃作为条件，或者说，它的出现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相联系。因此，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变成了对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

法兰克福学派将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国家看作一种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相应的政治形式，而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新阶段称为“垄断资本主义”（纽伊曼、马尔库塞、古兰德和基希海默等人就采取这种用法），或称为“国家资本主义”（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和波洛克等人主要采取这种用法），这实际上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特征的两种不同理论。后一种观点认为，尽管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极权主义国家产生的一个关键条件，但这种国家产生的广泛社会条件或背景却不能简单地称为“垄断资本主义”，它有一些新的和独特的性质。对此，波洛克和霍克海默等人作了详尽程度不等的分析。

波洛克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作了相当详尽的分析。他在1932—1941年这10年间写了不少论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论国家资本主义的论文（这些论文大都先发表在《社会研究杂志》和《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后收入《资本主义的诸阶段》一书）。波洛克根据经济的集中和中心化来解释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他也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成长模式并未在垄断的制度

① M. Horkheimer. Die Juden und Europa,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Vol. 8, 1/2 (1939), 115P.

② H. Marcuse. The Struggle against liberalism in the totalitarian view of the state, in his Negations.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19P.

内遭到破坏，一系列的全国或跨国经济系统的不平衡和不成比例的结果（如日益增长的通货膨胀和失业，不协调的国家政策等）产生了更严峻的经济问题和政治动荡，这使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成为必要，也只有通过这种手段，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国家干预的模式只能使上述局势更严峻和恶化，因为国家对高度相互联系的经济的支持和资助增加了大企业抵抗价格降低的能力和利用价格升高的能力，大企业可以依赖于国家的扶持。随之而来的是国家日益干预经济，保护资本主义的发展。

波洛克的分析以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蓝本。他认为，经济活动向大企业的集中，政府对信贷和外贸的控制，贸易协会的半垄断地位，大规模的劳工失业以及政府对失业者补助的巨额开支乃是自由资本主义衰落的几个标志。^①现在，垄断组织不再作为“捣乱的入侵者”而起作用，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垄断组织对国家的干预越来越多地为限制竞争和市场控制提供合法根据。波洛克将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秩序称为“国家资本主义”（state-capitalism），认为这个术语比其他的术语能更好地反映这种新制度的如下几个特征，即（1）这种新秩序是私人资本主义的后继者；（2）国家担负起私人资本家的重要职能；（3）资本主义的体制如同劳动力的买卖或利润一样仍然起着明显的作用；（4）它不是社会主义。^②

波洛克区别了两种理想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极权主义型”和“民主型”。他致力于前者（主要是纳粹德国）的分析，但认为得出的结论也适应于后者。他认为，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响下，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所有基本的组织原则已

① 参见 F. Pollok. *State Capitalism.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 1941. 202P.*

② 参见 F. Pollok. *Is national socialism a new order?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Vol. 9. 1941. 450P.*

改变，基本的资本主义体制已转变，国家对旧的经济秩序结构的干预由于其总体性和强烈性而由量转化为质，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①波洛克注意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如下几个发展趋势：（1）作为一种间接的需求控制手段的市场已被直接的国家计划所取代；（2）作为稀缺性管理中介的价格已失去了其作用，变成了一种“被紧密地控制了了的工具”；（3）存在着一种个人利益对一般计划利润的服从，利润仍然是有效投资和管理等的诱因，并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工具而起作用，资本家日益变成食利息者；（4）猜测未来市场需求的神秘企业艺术被一种综合的技术合理性所取代；（5）整个系统由一个强有力的官僚机构和最大企业的资源管理者加以协调。波洛克还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即资本主义的矛盾可以通过非社会主义的政治形式来加以解决，他拒绝了垄断资本主义因其自身的内在矛盾而必然崩溃的观点，认为随着经济集中和中心化的发展，集中化的行政管理的成长等因素可以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发展而避免崩溃。^②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也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问题作了一些分析。例如，霍克海默在《极权主义国家》（或译《独裁国家》）中认为，独裁国家即是国家资本主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当代的独裁国家”）。这种国家在经济上的特征是抛弃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变成了总体的资本家，剥削仍然存在着；国家统治者使自身摆脱了对私人资本的依赖，剩余价值的获得和分配也是在国家的控制之下进行的。这种国家在政治上的特征则是：中央集权并不是权力的倒退，而是权力的发展；在完整的中央集权制之下，警察将极端的官僚主义权威几乎强加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霍克海默看来，如果把“独裁国家”看作列宁所说

^{①②} 参见 F. Pollok. Is national socialism a new order? Stud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Vol. 9, 1941, 445, 454P.

的“垄断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它同时也应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将垄断资本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最后形式或最高阶段,但实际上,“独裁国家”这一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形式并没有显示出“垂死的”样子,相反,却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它通过对市场经济的控制,防止了由于危机而造成的崩溃,因而使统治者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使生产能持续地发展。由此他断言,国家资本主义要比自由资本主义存在得更长久。^①

纽伊曼和古兰德等人则不赞成用“国家资本主义”来表示当代资本主义。纽伊曼认为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他说:“‘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不能担负起从经济学观点上的分析,一旦国家变成生产工具的所有者,那么它就不能对资本主义的经济起作用,它破坏了那个保持经济活动循环的机制。因此,这样一种国家就不再是资本主义的。”^②在纽伊曼和古兰德看来,国家所有权的加强、集中化和中心化是现有秩序的重要构成特征,但是,这些发展与私人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在关于资本主义在何种程度上是“有生命力的和好的”以及在何种范围上它是一个国家这两点的说明上是使人误入歧途的。此外,“国家资本主义”的倡导者们在方法论上也是成问题的,他们习惯于使用理想类型或模式的神话,这些模式试图抓住一种尚未实现的东西,因此,这种方法论是行不通的。

纽伊曼等人主张用“垄断资本主义”(monopoly capitalism)或“极权的垄断资本主义”(totalitarian monopoly capitalism)来表示现有的资本主义秩序。他们认为,经济集中和中心化创造了一个相互依赖、相互联结的经济系统,其结果是每个企业变得越来越

^① 参见 M. Horkheimer.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in Larry Ray (ed.), *Critical Sociology*. England: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0. 46~65P.

^② F. Neuman.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4. London: Gollancz, 1944. 183P.

依赖于其他企业，每个工业部门的命运日益依赖于其他部门的命运；这种经济秩序没有多少灵活性，并容易受经济波动的损害；经济单位之间依赖的网络充其量只能保证一种脆弱的经济平衡，对经济生活的任何骚动和破坏能够潜在地由这整个系统来加以放大。古兰德指出，为了避免这种经济体制的高度敏感性中产生的骚乱，国家干预在很早的阶段就是必需的。^① 垄断秩序的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性要求对潜在的威胁情况作出迅速的反应。因此，干预机器的扩展就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这个系统中的内在变化的日益尖锐的效果（如高失业率、政治—商业周期的波谷和波峰之间的波动等）和外在因素的影响（如因受国际事件影响的原材料的短缺）必须加以认真的处理。在古兰德看来，“垄断使资本主义的调节机制陷入瘫痪状态”^②。纽伊曼等人还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变化着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关系，他们同意马尔库塞的如下观点，即总体极权主义产生了与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相联系的组织和社会理论。他们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锻造了一种新的政治妥协结构。^③ 纽伊曼将纳粹德国称为“总体垄断资本主义”，因为德国经济有两个广泛的、引人注目的特征：它是一种垄断的经济和一种命令经济，是“一种由极权国家管辖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④。与波洛克等人的观点不同，纽伊曼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没有完全控制经济，也不能控制国家目标，它不能消除各种矛盾和对立，这些矛盾和对立在更高、更危险的层次上存在着；特别是该社会仍然存在着尖锐的阶级对立。但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崩溃不会自动出现，必须通过被压迫群众的自觉行

①② 参见 A. Gurland. *Technological Trends and Economic Structure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Vol. 9, 1941, 230, 227P.

③ 参见 O. Kirchheimer.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Compromise*,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Vol. 9, no. 2, 1941.

④ F. Neuman. *Behemoth*. London; Gollancz, 1944. 230P.

动才能推翻它。由此可见，纽伊曼等人的观点更接近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积累过程内在地不稳定并产生了集中和中心化的观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霍克海默批评纽伊曼的观点过于正统和机械。

50年代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特别是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以及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着重分析新技术革命给当代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剖析“发达工业社会”或“后期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或译《单面人》）和《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等论著中，刻画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他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为“发达工业社会”，进而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按技术的观念和结构而运转的政治系统。在他看来，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最显著的特征是科学技术取得统治地位，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他着力分析科技进步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给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影响和变化。在经济方面，技术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使大多数人特别是非特权阶层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分享到了消费社会的舒适；技术造就了现代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这些方式一方面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要，另一方面则潜移默化地将人们整合到现存的制度中；发达工业社会正是通过制造和满足这种虚假的需要来左右人们的意识，支配人们的生活，并使人们与现存的制度一体化；它有效地窒息了人们要求自由解放的真正需要，而同时又容忍和赦免了富裕社会的破坏性和压抑作用。在政治领域及阶级关系方面，技术的发展已带来了一个封闭的政治领域，它成功地实现了政治对立面的一体化，因而消除了危害社会继续存在的政治派别；它消除了传统的骚乱之点并控制了混乱的因素，创造了军事、政治与经济的联合体；它使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同化，使公司老板与劳工领导人同化，使不同社会阶层的闲暇生活和志向同

化；它促进学术成就与国家需要之间的前定和谐，通过舆论和家庭聚会侵蚀私人事务，使卧室向大众传播媒介开放。他特别指出，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中，尽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仍然是基本阶级，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改变了这两个阶级的结构和作用，即它们不再以历史转变的动力出现，一种维护和改进现存制度的共同利益，使从前敌对的阶级联合起来，质变的概念让位给进化的概念。在文化及意识形态方面，技术的发展使高层文化与现实同一起来，工业社会使高层文化失效，现实超越并否定了高层文化，使它成了物质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中心成了商业中心或市政中心的合适场所；在艺术领域，社会的同化力消除了对立的内容而挖空了艺术，最矛盾的作品与真理绝对和平共处；艺术的理性让位给技术的理性，艺术失去了它的传统功能；甚至语言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该系统排斥了语言中的对立表达；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分析哲学的盛行标志着单面思维的胜利。于是，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一切文明的成就，本应成为人们解放的前提，而现在却成了统治的工具。^①因此，马尔库塞得出的结论是：当代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异化的社会、畸型的社会和病态社会，因为“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不能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存在（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那么，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②。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进化》和《文化与批判》等论著中论及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历史趋势问题。他将当代资本主义称为“晚期资本主义”（late-capitalism），“先进资本主义”（advanced-capitalism）、“有组织或国家调节的资本主

① 参见[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3~1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② [德]马尔库塞：《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载《哲学译丛》，1978（6）。

义”(organized or state-regulated capitalism),认为这一社会的组织原则及结构,使其有别于早期资本主义。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是指如下两个现象——它们都可以归因于积累过程的高级阶段:一是“经济集中的过程(即本国的和随后的跨国公司的兴起)以及货物、资本和劳动的市场组织的建立”;二是“随市场职能缺陷的扩大而产生的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这种市场机制由国家干预的补充和部分取代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的结束”^①。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则说:“自从19世纪的最后25年以来,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历史趋势:国家干预的增强以保证制度的稳定;科学研究与技术日益相互依赖使科学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已经摧毁了特殊的体制框架的布局和那些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特征的目的一合理行动的子系统。”^②因此,依照哈贝马斯的观点,晚期资本主义的最显著的特征或历史趋势是:(1)经济集中的过程;(2)国家日益干预经济生活;(3)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

哈贝马斯具体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行政制度、文化制度和阶级结构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新特点。在经济制度方面,哈贝马斯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分成两个部分来加以分析、对比:一是私人生产部门是市场取向的(其中的一部分仍由竞争来调节,另一部分则由容忍小竞争的垄断寡头的市场战略来决定);二是公共生产部门(特别是军火工业和宇航工业)则是垄断的,几乎不受市场影响的。它们各自的特点是:在竞争性部门,劳动密集型企业占主导,工人的组织程度较差,公

① J.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5. 33~34P.

② J. Habermas, *Technology and Science as Ideology*, in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0. 100P.

司不能实行合理化；而在垄断部门，资本密集型企业占主导，公司要面对强大的工会，公司不需要合理化。在政治—行政制度方面，国家机构执行着经济系统的许多职能，特别是通过总体计划调节整个经济周期，并创造和改善利用过剩积累资本的机会。但国家的总体计划受到私人自发处置生产资料的限制，也受到避免不稳定措施的限制。从这一点看，对商业周期的财政和金融调节以及那些旨在于调节投资和整个需求的各种措施在目标系统的框架中都具有避免战略的特征；当总体计划控制私人企业作出决策的边界条件以便纠正市场机制功能失调的副作用时，国家实际上取代了市场机制，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来创造和改进资本实现的条件。在文化制度（合法化系统）方面即意识形态领域上，随着市场功能的削弱和调节机制功能失调的副作用的出现，以公平交换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崩溃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导致了对合法化的要求；国家机构不再像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那样仅仅是保证生产的一般条件，而是积极参与其中，因此，像前资本主义一样，国家也必须加以合法化。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合法化被还原为两个剩余的要求：一是公民的利己主义——即不过问政治，只关心职业、闲暇和消费的态度；二是通过精英理论或技术统治论来证明公共领域的结构上的非政治化。在阶级结构方面，尽管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中，生产关系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政治化了，但阶级关系的政治形式并没有得到恢复，相反，阶级统治的政治隐蔽性被社会隐蔽性所取代了；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成功地决定性的领域将阶级冲突保持在潜在的状态之中。这样，阶级的社会同一性就破裂了，阶级意识也残缺不全了。^①

^① 参见 J.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5. 33~39P.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这些组织原则和结构特征使得它与自由资本主义或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明确地区别开来，因为自由资本主义的组织原则是“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这一组织原则的基本特征是：（1）阶级关系的非政治化和阶级统治的隐蔽化；（2）国家权力在社会系统中的行使受到限制；（3）建立起以公平交换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4）依靠科学技术来实现资本的积累。^①由此可见，与自由资本主义比较，晚期资本主义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其他流派及代表人物也讨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问题。例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在《资本主义的幸存》一书中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它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析。他将当代资本主义称为“有机资本主义”，因为这种社会是建立在国家干预和借用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的。他特别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增长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增长的不同之处。在他看来，19世纪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发生的，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不仅要负责，而且是它的决策人；同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增长日益与科学技术紧密结合在一起。具体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增长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科学变成了增长的工具，连社会科学也变成了利用这种增长进行政治控制的工具，即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又出现了混合；二是各门科学通过作为统治阶级的资本和作为国家财产的技术和机器，直接汇入生产过程之中；三是资本主义积累改变了它的性质，它不再是简单的积累财富或生产资料的问题，而是积累技术信息和知识的问题，国家保护集权化的组

^① 参见 J.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5. 20~22P.

织，并使之处于决策的中心。因此，现代资本主义是“有机资本主义”。^①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将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刻画为经济的集中化和中心化、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和国家日益干预经济生活等历史趋势，并具体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阶级关系等方面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特点，从而将当代资本主义看作一个区别于自由资本主义及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式、新阶段或新时代。对于他们的这一资本主义新发展及特征理论，我们有必要作简要的分析评价。

我们知道，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资本主义有其自身形成、发展及走向衰亡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可以有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自身的某些特点或特征而区别于其他的阶段。与马克思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以及列宁所处的早期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当代（二战后）资本主义的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用某些学者的话来说，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展开，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及阶级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甚至发生了部分质变。具体说，科技进步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历史趋势的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关系发生了部分质变：即由私人垄断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结构及管理方式出现新特点；这个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关系及阶级斗争也出现了某些新变化，特别是白领工人或中间阶层的日益壮大，劳资对立呈现新的形式；在资本主义高生产、高工资和高消费政策引导下，社会向消费主义的方向发展，出现了

^① 参见 H.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London, 1976. 110~112P.

某些非政治化的倾向；国家暴力统治相对减弱或更加隐蔽，管理职能增强（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范围扩大、力度加强）；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及生态问题；资本主义的矛盾异化现象加深、加剧等等。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发展和新变化，必须在理论上加以认真的研究，这可以说是在当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要任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力图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体验和观察的基础上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其特征问题，他们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或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首先，在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和列斐伏尔等人抓住了当代科技进步或科技革命这一关键，抓住了科学技术在当代成为第一生产力这一重要事实，这的确可以说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大特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的，但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这种依赖并不显著，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特别是二战后，科学研究与技术日益相互渗透，使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和推动力。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之所以出现空前的繁荣，最根本的原因乃是科技进步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的出现。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科学技术变成第一位生产力这一点视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大历史发展趋势是有道理的。

其次，在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他们分析了这种生产关系出现的新变化或“部分质变”。例如，哈贝马斯指出，由于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朝着“资本社会化”的方向，被迫进行调节，这种调节表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表现为股份公司普遍化与股权的分散化，私有企业国有化和国有企

业私有化等形式。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我调整的原因、过程、表现形式等问题作了颇为深入的分析，他的这些观点包含着合理的因素，是值得我们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参考的。

再次，在上层建筑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国家日益干预经济生活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大趋势或特征也是有根据的。为了弥补市场失灵，避免周期性危机的打击，当代资本主义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国家由原来作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变成“入侵者”，从原来的创造和保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条件的保障职能变成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来调控经济运行的调控职能。同时，这种干预也日益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在以前被认为是私人领域的公共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哈贝马斯等人对每个问题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哈贝马斯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经济职能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国家经济职能加以比较，将国家经济职能及社会管理职能的加强看作当代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上出现的新变化，这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

最后，在阶级关系问题上，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因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关系出现的某些变化而鼓吹该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根本改变，无产阶级不再是历史的动力，阶级矛盾缓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理论过时了等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他们在对该社会的阶级关系、阶级结构的分析中，也提出了某些有益的见解，如关于第三阶层（白领）的出现和壮大对当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和阶级结构的影响；关于生产力发展，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变化，准政治的工资结构的出现，社会福利政策等对工人阶级的地位、革命性的影响；关于劳资对立出现的新特点、新内容以及社会变革主体的扩大等问题的分析都有可借鉴之处。

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及基本特征理论是有重大失误的。最主要的一点是，割裂当代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及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联系，基本上将当代资本主义看作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变化、新趋势、新特点而错误地断言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改变了。诚然，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如上述的一系列的新变化、新趋势及新特征，这使得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中出现“部分质变”，标志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既有别于自由资本主义，又有别于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但是，我们却不能将“部分质变”等同于“根本质变”，将资本主义出现的这个新阶段视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或资本主义的全新形式。资本主义之所以是资本主义仍在于它有自身一系列的质的规定性，特别是它的某些本质的规定性。作为同一社会形态，不管在何种发展阶段上，这些本质的规定性将不会改变。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根本改变，必须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加以考察，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别乃在于生产关系的本质不同，而这些不同生产关系又是建立在不同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在一种生产方式内，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可以保持不变，它的某些局部或表现形式可以变化；变化的根源则是生产力的发展。在一个社会内部，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某些局部的变化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随之发生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变化，正是这种部分的质变，而非根本的质变。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发展变化及一系列的新现象，如财产占有形式的国有化的发展及工人持有小额股票，生产调节方面的计划化，管理体制上的工人参与管理，分配方面的福利措施等等，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物或伴生现象，它们的出现并未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主要矛盾。因此，当代资本主义只是资本主义

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不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

与此相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另一个主要错误，是否认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在当代的适应性。他们宣称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只是关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论，它不适应于当代资本主义现实，因而过时了；他们基本上否定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说充其量这个理论不过是描述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且许多论点是错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反对当代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必将因其自身的矛盾而走向灭亡的论点，断言当代资本主义能够克服自身的矛盾，包容各种危机，使经济持续发展，因而断言，当代资本主义将比自由资本主义更有生命力，更长久。显然，在这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站到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立场上去了。事实证明，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危机的社会，当这些矛盾和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就会使资本主义发展、繁荣的局面终止，并最终敲响资本主义社会的丧钟。7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出现的以高通货膨胀、高失业和低经济增长为特征的“滞胀”，80年代以来的贫富分化的重新加剧等现象就是明证。

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阶级关系等方面出现的具体变化时，也有许多片面的、错误的观点。这一点在后面各章将陆续加以讨论。

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危机趋势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趋势的分析及由此形成的危机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中的一个有特色、创新和影响的方面。60年代末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沿着两个方向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研究：一是哈贝马斯、

米利班德和奥康纳等人对该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危机的研究特别是对所谓的“合法化危机”的研究；另一个是沿着法兰克福学派传统，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对生态危机的研究。而其中最全面系统、最有影响的是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他的《合法化危机》就是专门讨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问题的著作）。下面，我们将以哈贝马斯的观点为主，结合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来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

1. 关于经济危机的趋势

哈贝马斯的当代资本主义一般危机趋势理论是建立在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行政和文化等系统的分析基础上的。他从对这些系统的特征的分析转入对危机趋势的分析，并从经济危机趋势的分析开始。这不仅因为经济危机理论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而且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的其他类型也是由经济危机转化而来的。

哈贝马斯围绕下列四个方面的问题来展开他的经济危机理论：（1）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否仍然存在着经济危机？（2）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危机又有何区别？（3）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否仍然适应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4）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与其他危机类型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哈贝马斯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仍然存在着。原因在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那种自发的、盲目的经济运行方式。他说：“如果在先进资本主义中的经济危机仍然存在着，那么，这就表明政府为实现过程的干预行为与交换过程一样服从于自发起作用的经济规律，结果，它们服从于利润率下降趋势所表达的经济危机趋势。”“因为危机趋势仍然是由价值规律所决定的——即雇佣劳动与资本交换中的必然的不相称，所以，国家的活动不能弥补利润率的

下降趋势，充其量只能缓和它，即通过政治手段使它达到顶点。因此，经济危机还将表现为社会危机，并导致政治斗争，使资本所有者和依靠工资为生的群众之间的阶级对立又变得明朗化。”^①

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的第四章（“经济危机原理”）中对上述观点作了较详细的论证。他指出，国家干预并不是晚期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而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存在了的，只不过是在晚期资本主义干扰的范围扩大、强度加强了。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国家提供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外部环境，创造自由竞争的条件，但这时国家的职能是补充市场机制，而不是从属于市场机制；这种干预活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经济自身运行的规律，因而不能消除经济危机。而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不仅维护生产的一般条件，而且自身也成了价值规律的执行机构，政府的活动并未阻止价值规律的自发运转，反而从属于它。归根结底，政府的干预没有消除经济危机，相反还会加剧经济危机；阶级斗争则仍然是“资本运动的契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的根源乃在于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性质。在哈贝马斯看来，在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因国家干预而出现了新的所有制形式——私人垄断所有制和国家垄断所有制，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即它仍然是私有制。他还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规律仍然起着作用（因为竞争在一定范围内和某种程度上进行下去，凡是存在竞争的地方，价值规律就将发生作用），但这种作用比较曲折和间接。（注意，哈贝马斯在这里的观点与他在论述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和趋势时的观点是矛盾的，在那里，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本质已改变。）

既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经济危机，那么，这时的经济危机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危机形式又有何区别呢？或者

① J.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5. 45~46P.

说，它有何新特点呢？哈贝马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范围、程度大大扩展和加强了。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不仅作为价值规律无意识、自发的执行机构在运转，而且作为联合的“垄断资本”的计划代理人在运转，现在经济活动已离不开政府的干预。这导致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出现新特点。

哈贝马斯将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活动分为四类：（1）为了建立和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它持续存在的先决条件，国家维持以保护财产和契约自由为核心的民法体系；保护市场体系免受自我破坏作用的威胁；它实现作为总体的经济的先决条件；促进国家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竞争能力；通过对外扩张，维护民族尊严和对内部敌人的镇压来再生产自身。（2）资本的积累过程要求采用与新的商业组织、竞争和金融等新形式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如通过调整银行法、商业法和操纵税收系统）。在从事这些活动时，国家将自己局限于市场的补充作用，使自己适应于而不是影响市场的动态过程，因此，社会的组织原则和阶级结构并未受影响。（3）上述活动有别于国家的市场替代职能，后者并不是合法地独立地出现，而是针对市场驱动力的弱点，使积累过程继续成为可能（而不是让积累进程自我运转）。因此，这样的行动创造了新的经济事态，或者通过创造或改善投资机会，或者通过改变了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的组织原则都受到了影响。（4）国家对于积累过程的功能失调后果作出补偿。因此，国家一方面负责处理私人企业的外溢结果（如生态破坏），或通过结构性政策措施保证陷入困境的产业部门的生存；另一方面，应工会和改良主义政党的要求，实施某些旨在改善失去独立能力的工人的社会状况的调节和干预。^①国家既从事前两种活动，更主

^① J.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5, 53~54P.

要的是从事后两种活动。这时国家不仅要以更强有力的手段和在更大的程度上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续存在的先决条件和补充市场机制，以满足市场控制的积累过程的需要，而且它要首先完成填补市场功能的缺陷，干预积累过程，弥补其所造成的政治上不可容忍的结果。这样，社会的组织原则受到了影响，生产关系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哈贝马斯列出了三种主要变化：第一，一种改变了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影响了社会的组织原则，即反思劳动（reflexive labour）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发生作用，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成了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这影响到社会的组织原则；第二，一种准政治的工资结构，反映了阶级妥协，并使非政治性的阶级关系被搁置；第三，对政治系统合法化的日益增长的要求刺激了各种以使用价值定向的要求，因而就必须有新的意识形态来为政治系统的合法化辩护。正是生产关系所产生的这些新变化，使晚期资本主义产生了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是危机采取了新的形式。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危机，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表现为危机——停滞——恢复——繁荣——危机的循环；而在晚期资本主义中，这种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不可能再出现。尽管这时的危机也是一种产出危机，但问题出在可消费价值的分配上，危机的形式则表现为：持续的通货膨胀，政府的财政赤字，连续不断的生产停滞以及公共贫穷与私人财富的日益增长的不平等。二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发生了转移，即从经济系统转移到社会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而且与后两个系统的危机相比，经济危机已不再是主要的危机形式。

2. 关于政治危机的趋势

哈贝马斯由经济危机的分析转入对政治系统危机趋势的分析。他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危机趋势划分成两种形式：合

理性危机 (rationality crisis) 和合法化危机 (legitimation crisis)。对于这两种危机的含义、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哈贝马斯作了如下的说明：“政治系统要求尽可能广泛的群众忠诚的投入，产出可以有效地加以执行的行政决策。产出危机具有合理性危机的形式，它是由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完成来自于经济系统的指令所造成的；输入危机具有合法化危机的形式，当来自于经济系统的调节指令被执行时，合法化系统不能把群众的忠诚维护在一个所需水平的时候，合法化危机就出现了。尽管这两种危机趋势都产生于政治系统，但它们的表现形式不同。合理性危机是一种被转移了的系统危机，它与经济危机一样反映了代表非普遍化利益的社会化生产与各种调节指令的矛盾。这种危机可以通过国家机器解组的方式而转变为对合法化的撤退。相反，合法化危机直接地是一种同一性 (identity) 危机。它并不是以使系统的一体化陷入危险的方式展开，而是派生于如下事实，即履行政府各项任务将使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的结构成问题，从而也就使保证私人自主处置生产资料的形式上的民主成问题。”^① 在哈贝马斯看来，所谓的合理性危机实际上是国家机器尤其是行政机关不能很好履行经济职能所造成的，是一种行政管理的危机，即行政管理合理性的缺乏或赤字 (deficit)。他说：“公共行政管理的合理性的缺乏意味着在特定的边界条件下，国家机器不能有效地调节经济系统。”^② 所谓的合法化危机则是一种认同感的危机，是人民大众对现存制度缺乏信任感，即群众忠诚不足的危机。所以，他把合法化危机说成是合法化的缺乏或赤字，说“合法化的缺乏意味着不可能通过行政手段将规范结构维持或建立在所要求的范围上”^③。哈贝马斯对这两种危机形式分别作了详细的论证。

^{①②③} J.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5. 46, 47, 47P.

关于合理性危机，哈贝马斯指出，只有当合理性危机取代经济危机时，才谈得上名副其实的合理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实现问题的逻辑不只是反映另一种操纵手段，即以合法权力的手段，而危机逻辑自身因来自于市场交易中各种相互矛盾的指令转移到行政系统而改变。这种论断有两种说明：一是用大家熟悉的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构成市场交易组成部分作为出发点。一方面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制订计划以保证资本实现的需要日益增长；另一方面，私人自主处置生产资料要求对国家干预加以限制，不允许对各个个体资本家的矛盾着的利益作出有计划的协调。另一种说明是由奥菲提出的，即认为尽管国家弥补了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不足，并且接管了对之加以补充的任务，但是，由于其控制手段的逻辑所迫，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来因素进入系统；由资本实现的指令所控制的经济系统的各种问题，若没有向异于其结构的方面蔓延，就不能从行政上加以接收和处理。

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对合理性危机产生的原因的不同侧面的说明。第一种说明将合理性危机归因于国家无法对各个个体资本家相矛盾的利益加以有计划的协调，即国家无法同时满足自相矛盾的要求，实现相互矛盾的指令，因此不得不在期望干预和被迫放弃干预之间徘徊。^① 第二种说明则把合理性危机的原因说成是由于出现一些外在因素妨碍行政管理机构作出合理的决策，这就意味着合理性的缺乏。哈贝马斯认为，奥菲指出了导致合理性缺乏的三种外在因素，即（1）在公共和垄断的部门的有组织的市场中，做出战略决策的边界条件改变了；（2）与公共部门的功能相联系，出现了一个具体劳动日益取代抽象劳动的领域，特别是决策的职业化导致了政府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3）不能通过

① J.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5. 62~63P.

劳动力市场再生产自身的非自立人口和自立人口相比有所增长。这三种因素的出现，“破坏了国家干预这一重要手段得以运行的条件”，并产生了“与危机相关的瓶颈”^①。

关于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和《现代国家的合法化问题》（载《交往与社会进化》一书）等论著中对这一危机形式作了详尽的论述，这是他的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理论的颇具特色的方面。什么是合法性和合法化？哈贝马斯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一书中有清楚的说明。他说：“关于合法性，我把它理解为一个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合法性要求则与某个规范决定了的社会同一性的社会一体化之维护相联系。合法化被用来证明合法性要求是好的，即表明现存的制度如何，以及为什么适合于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运用政治力量——在这种方式中，对于该社会的同一性具有构成意义的各种价值将能够实现。”^②又说：“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行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③所以，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秩序值得被人们所认可。这里，合法性与政治秩序相联系，它只能运用于政治领域，同时，只有当一种统治秩序是否合法尚在争论之中，才能运用这一概念。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只有政治秩序才拥有或丧失合法性，只有它们才需要合法化，跨国公司或世界市场不会有合法性问题。”^④合法化则是指对合法性的论证方式，即证明某种政治秩序为什么值得认可。哈贝马斯认为历史上出现过四种论证合法性的途径：早期文明社会的统治家族借助于原始神话证明自身的正当性；古代文明帝国的统治者借助

^① J.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5. 67P.

^{②③④} [德]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188~189、184、184~18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以宇宙论为基础的伦理学、宗教和哲学；在近代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之后，则主要借助于自然律理论；到后来，由于卢梭和康德等人的努力，证明的形式条件自身获得了合法化的力量。他考察了随现代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合法化问题，他认为合法化问题产生于由大帝国阶级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其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从内在方面说，现代国家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经济系统分化的结果，该系统乃是通过市场（即一种非中心化、非政治化的手段）对生产过程加以调节；从外在的方面讲，现代国家不是作为一个个体，而是作为诸多国家构成的一个系统而出现的。由于这两个方面，现代国家迫切要求合法化，现代国家的逐步形成是同对合法性要求的不断增加密切联系的，或者说国家建构的过程必然对集体同一性的形式发生作用，帝国的同一性在现代国家结构的压力下发生作用。^①

哈贝马斯着重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合法性问题。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中，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问题导源于一个基本事实，即“社会福利国家与大众民主”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导致国家在处理市场缺陷中处于自相矛盾的窘境：“一方面，对缺陷的限定和处理缺陷的成功标尺存在于必须加以合法化的政治目标中，因为如果国家打算承担上述各种任务，就必须运用合法化的力量；另一方面，国家在承担各项任务的过程中，又不能采取通常的方式运用合法化的力量，不能通过对决策的约束做到这一点，而只能通过调整他人的决策，这个他人的私人自主性可能还没有被侵害。”^② 哈贝马斯认为，国家有效实现合法化的任务受到四个方面情境的限制：（1）国家和经济之间的互补关系导致了某种目标冲突（尤其是稳定政策和改革政策之间的冲

① 参见〔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197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② 〔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20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突)；(2) 世界市场的发展、资本和劳动的国际化也已经确定了民族国家行动范围的外部界限；(3) 由于世界范围的系统一体化机制与地区性的国家社会一体化之间的不相称等因素，已不能借助于民族主义的手段遏制合法化危机；(4) 社会结构的条件也特别不利于对意识形态的规划。

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哈贝马斯将合法化危机的原因归结为：(1) 系统的局限；(2) 对文化系统的干预的不可预料的副作用（政治化）。他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政治系统不仅将它的边界扩展到经济系统，而且扩展到社会文化系统。当组织合理性传播时，文化系统受到了损害和削弱。然而，传统的残余必须逃避行政的控制，因为对于合法化至关重要的传统不能从行政上获得再生。此外，对文化事务的操纵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副作用，它使以前由传统确定下来的并属于政治系统边界条件的意义和规范成为公开讨论的主题。这样，思辨的意志形成的范围扩展了，这是一种动摇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该领域对于系统的传统生存至关重要——的过程。”^①他认为，国家干预领域的扩大，产生了一种副作用，即对合法化需求的不合比例的增长，不仅因为行政机构处理的事务增多，必须为国家活动的新职能而保持忠诚，而且因为作为行政机构处理事务日益增多的结果，与文化系统相比，政治系统的边界发生了变化。于是，原先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作为政治系统边界条件的文化事务，便被纳入行政计划领域。这种对文化事务的干预，加速了以前属于私人范畴的生活领域的政治化，使文化传统所产生的“公民私己主义”（civil privatism）——这是文化传统维护合法性的主要东西——陷入危险，导致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导致合法化的困境；更由于阶级结构的存在，使得合法化危机不可避免。在哈贝马斯看来，国家对文

① J.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5. 47~48P.

化事务的干预，把文化事务搞糟了，使意义成为稀缺的东西，从而产生合法化危机，于是他又转入对社会文化系统危机趋势的分析。^①

3. 关于文化危机的趋势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文化系统从经济和政治两个系统中获得了采取货物和服务、法律和行政规范、公共的和社区的安全等等形式的投入，经济和政治两种系统的危机是输出危机，是由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失调并转化为对合法化的撤退引起的，即这两种危机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因为社会的一体化依赖于这一系统的输出——直接依赖于它以合法化形式向政治系统提供的动因，并间接地依赖于它向教育和职业系统所提供的实施动因。既然与经济系统相对照，社会文化系统并不组织自己的输入，因而不可能产生输入危机，所产生的总是输出危机。当规范结构依其内在逻辑发生变化以致国家机构和职业系统的必要条件与社会成员所理解的需求和合法性期望之间的互补性受到干扰时，我们就必须考虑社会文化危机即动因危机 (motivation crisis) 趋势了。合法化危机导源于现有的合法性不能满足政治系统的变化；而动因危机则是社会文化系统自身变化的结果。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动因危机在文化传统 (道德规范和世界观) 和儿童教养系统的结构变化层次上已变得相当明显，因此，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和社会劳动系统赖以生存的传统残余被蚕食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已变得成问题，即公民的利己主义和家庭—职业利己主义陷入危机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残余 (科学信念、后奥拉特艺术和普遍的价值体系) 构成了一种功能失调的规范结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一种它不能满足的“新”需要。^②

① ② J.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5. 74~75, 48~49P.

哈贝马斯进而分析说，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由社会文化系统引起的最重要的动因是公民利己主义和家庭—职业利己主义所构成的。所谓的公民利己主义是指大众追求消费和安逸而不过问政治的倾向；而家庭—职业利己主义则是指在职业选择上通过激烈竞争来求得地位、成就以保证安逸的生活。哈贝马斯认为，这两种动因模式对于政治和经济系统的持续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主要是由文化系统提供的，文化系统是它们滋生的土壤。但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系统已经不可能再提供这两种动机模式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从长远的观点看，社会文化系统已不再能重新产生作为系统存在必要条件的这两种利己主义了。”^①主要原因在于：（1）前资产阶级的传统残余即这种公民和家庭—职业利己主义产生的土壤已被非再生地摧毁了；（2）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因素，如占有个人主义、成就取向已被社会结构的变化所损害；（3）资产阶级文化中的世界观残余不能产生取代被破坏了的利己主义动因模式的新模式；（4）避免动因危机的道路已被堵死。因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文化结构既不能从积极的方面提供动因模式，也不能在危机的苗头出现之后制止危机。

在分别讨论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系统、四种危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因危机）趋势之后，哈贝马斯对这四种危机趋势的关系及产生的原因作了总结。关于四种危机的关系，他列出了下表^②：

起 点	系统危机	同一性危机
经济系统	经济危机	—
政治系统	合理性危机	合法化危机
社会文化系统	—	动因危机

①② J.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5. 78. 45P.

关于四种危机产生的原因，他归纳为下表^①：

危机趋势	所提出的解释
经济危机	(1) 国家机构作为无意识的自发的价值规律的执行机构在运转； (2) 国家作为联合的“垄断资本”的计划代理人在运转；
合理性危机	行政合理性的破坏是由下列两种因素引起的： (3) 个体资本家之间直接对立的利益； (4) 外在于系统的结构的产生（这对于持续生存是必要的）；
合法化危机	(5) 系统的各种局限性； (6) 对于文化系统的行政干预的出乎意料的副作用（政治化）；
动因危机	(7) 对于持续生存至关重要的传统的腐蚀； (8) 普遍价值体系的超负荷（“新”要求）。

哈贝马斯上述的危机理论有其合理性。这首先表现在他试图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趋势作出全面系统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论点。与当代许多资产阶级学者不同，哈贝马斯坚持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危机的社会，相反，它是一个陷入全面危机的社会。他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形式的特点。在对经济危机的分析中，他说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干预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价值规律以曲折和间接的方式仍在起作用，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依然存在；但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趋势和新变化，使得经济危机具有新的表现形式，即表现为系统

^① J.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5, 50P.

的产出危机，并以滞胀和财政危机等形式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经济危机发生了转移，成为政治和文化系统的危机。在对合理性危机的分析中，哈贝马斯得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结论，即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行政机关（政府）由于其结构性障碍而无法做出合理的决策。当代西方的不少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政策分析家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决策方法的科学化，使得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做出合理的决策，有效地调控经济和社会生活。哈贝马斯通过分析有力地说明，这是一种神话：由于其结构性障碍，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总是陷入诸如“提高税率还是减少福利”一类的相互矛盾的政策困境之中；基于同样的分析，哈贝马斯令人信服地说明：当代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有计划的资本主义”。在对合法化危机的分析中，哈贝马斯指出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即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失去其合法性，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缺乏群众忠诚的投入；这也说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者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仍然是尖锐对立的。在对动因危机的分析中，他则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及意识形态日益没落的趋势，并论证了这个社会的统治已失去了思想文化基础。此外，在对当代资本主义各种危机的根源的分析中，哈贝马斯往往将它们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联系起来加以探讨。

其次，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的新颖和独到之处在于，他不是孤立地、片面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而是从系统的角度，对这些危机趋势的联系和转化加以考察。他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个系统，将这一系统划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子系统，并从系统的输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来讨论各种危机趋势的联系和转化。这种联系和转化简单说来就是：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该社会的经济危机表现出新的形式，即表现为产出危机——没有生产出必要数量的可供消费的价值，同时危机转移到

政治系统；自相矛盾的调节指令由市场转移到行政系统，出现行政系统的产出危机，即合理性危机——行政系统没有产出必要数量的合理决策；而这种产出又是与没有投入“群众的忠诚”相关，因而在行政系统上产生了合法化危机——即没有提供必要数量的普遍动机；这些投入到行政系统的动因是由文化系统产出的，由于对资本主义的生存至关重要的文化传统被损害，所以它没有产出必要数量的能激发人们去支持决策者的动因，没有产生必要数量的能激发人们行动的意义，因而出现了动因危机。由此可见，这四种类型的危机是密切相关、层层推进和互为因果的。从哈贝马斯关于各种危机的联系和转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已不再局限于哪个领域、方面或部分，而是涉及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领域，这些危机不能分别加以解决，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一大特点。由此可见，危机范围扩大了，程度加深了。

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对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趋势及其相互联系，对于克服西方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中片面强调经济危机、忽视其他危机趋势的倾向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如果我们将哈贝马斯的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与其他学者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相比，可以发现哈贝马斯往往是技高一筹的。的确，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特点及表现形态作了相当详细、系统的分析，但是他们往往局限于经济系统讨论经济危机，忽视社会政治、文化系统的危机形式，更谈不上对各种危机形式之间的关系作出分析。哈贝马斯超越了经济学家的眼界，对经济危机的转移，它与其他危机形式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提出了一个更广博、深刻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理论。当代西方的一些社会理论家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也对当代资本主

义社会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特别是揭露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异化现象，但是他们更多的是对这些矛盾和表面化现象的列举，缺乏对其内在原因的分析；相比之下，哈贝马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停止在表面现象之上，而是试图从资本主义社会去探索矛盾危机的原因或危机的机制。同时，与当代一些资产阶级的学者的观点相比，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更具批判性。当代流行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如丹尼尔·贝尔的理论）往往公开宣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矛盾和危机的社会，一个意识形态终结的社会，它能够包容或克服自身的危机趋向；或宣称由于国家干预，当代资本主义已成为“有计划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加上决策的科学方法及技术，使资本主义国家能做出合理决策，从而端正社会的发展方向。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明显地否定了这些论点，更具批判性。

但是，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是有严重缺陷的，这不仅因为它的危机理论往往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在于这个理论不成熟，有许多牵强附会、自相矛盾的东西。我们着重从下列三个方面来讨论他的危机理论的局限性：

第一，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能否包容系统危机尤其是经济危机的问题。

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的焦点是合法性危机和同一性危机。他的主要论点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类型已不再是系统危机（经济危机和合理性危机），而是合法性危机和同一性危机。尽管在该社会中，经济危机仍然不肯销声匿迹，但是，它爆发的可能性不大，它日益转移，被其他危机形式所取代。在他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系统危机尤其经济危机已被潜在地包容了。当然，这种危机包容以国家日益面临越来越大的合法化压力作为代价。哈贝马斯的论证依赖于这样一个论断，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控制它的潜在的系统危机（特别是经济危机），因而经济危机已不再

是主要的危机形式了。然而，哈贝马斯的这一论断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是不能成立的。

从理论上说，哈贝马斯关于经济危机的论证是建立在对民族国家的考察，即建立在一个理想—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中国家与经济日益变化着的关系的考察的基础之上的。他对过去、现在的经济趋势的讨论很少注意到国际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考虑到了一些与价值规律相联系的问题，但是，他的参照系和脉胳背景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没有考虑国际资本主义的关系。资本主义世界的创立依赖于国际市场，在当代更依赖于国际贸易。在断言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可以被包容之前，必须对一国之内的经济危机与国际市场中的危机趋势加以更好的研究。哈贝马斯并没有作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因而他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逻辑便值得怀疑，因为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的约束比哈贝马斯所设想的更难控制和处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发展的不平衡、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关系和矛盾，对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有着重要的影响。没有从这种关系的高度的讨论，就不能够断言当代资本主义能够潜在地包容经济危机。在这方面，后起的“新马克思主义”的依赖发展理论包括华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的分析比哈贝马斯的讨论要高明得多。

从实践上看，哈贝马斯的论点——当代资本主义能够包容经济危机——已被事实所驳倒。近几十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并不能克服经济危机。战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不断深化，即经济危机向纵深的方向发展，危机的次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频繁，再生产的周期呈现缩短的趋势。战后几十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不但出现了几次重大的经济危机，而且以持续的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高失业率为主要内容的“滞胀”，严重地威胁着发达资本主义的世界。

第二,关于合法化危机与动因危机的边界及它们的地位问题。

哈贝马斯对于合法化危机与动因危机的划分边界是模糊不清的。他在这两种立场——将它们视为两种有明确区别的危机形式和将它们设想为一个单独的事件序列——之间徘徊不定。后一种立场在于他无法对与这两种危机分别联系着的“普遍化的动因”(generalised motivation)、“行为激发意义”(action-motivation meaning)作出明确的区分。依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合法化危机和动因危机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合法化危机是一种“普遍化动因”的危机,一种依赖于传统的“行为激发意义”损害的危机;而动因危机则是一种缺乏群众忠诚的危机。这种混乱部分地产生于哈贝马斯对社会凝聚方式的不充分的了解(即不恰当地强调分享范式和价值在社会一体化中的中心地位)和过分强调“内在化”在个人同一性和社会秩序的产生中的作用。对于哈贝马斯来说,社会的一体化表示“那种言说和行动主体在其中是社会上的相关的体制系统”;而社会系统则被设想为“那些被象征性地结构化了的生活世界”。由这种观点出发,人们可以将“一个社会的规范结构(价值和体制)主题化”;各种事件或状态可以从它们对于社会同一性的依赖性的观点上来加以解释。在哈贝马斯看来,一个社会的再生产是直接地与成功的社会一体化相联系的,仅当社会的一体化受到威胁时,社会的动乱才能使该社会的生存陷入危险。尽管哈贝马斯认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价值系统与由个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意义结构存在着差别,但他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中没有充分应用这种差别,他更没有将统治阶级的规范、意义标准与人民群众的动机区别开来。这种超阶级的分析合法化和动因危机的观点是不可能成功的。哈贝马斯也过高地估计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一体化,因为在该社会,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是不可能被整合到资本主义制度中去的。

哈贝马斯过高地估计了合法化危机及动因危机在当代资本主

义总危机趋势中的地位，将它们抬高到危机主导形式的地位，从而否认了经济危机的基础性地位。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是决定性的、第一位的东西，上层建筑则是被决定的、第二位的东西；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政治的或观念的上层建筑迟早会发生变化。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危机（包括政治危机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危机）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危机所决定的。哈贝马斯关于各种危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论述可以说是本末倒置的。这种片面夸大政治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的作用的观点反映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的确，我们承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严重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危机，但却不能因此而否认经济危机的存在，否认经济危机是主导性、基础性危机。哈贝马斯的错误在于他过高地估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被合法化所威胁的程度，似乎合法化、思想文化成了社会生活的唯一支柱，忘记了一个社会存在以及维护统治还有更基本的东西——经济基础。

第三，关于如何看待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问题。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主要是关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理论，已不适应于当代或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趋势的分析，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了。这是他在《合法化危机》和其他著作中反复强调的一点。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危机已不再主要在经济系统中出现，而是转移到政治和文化系统，主要的危机形式不是经济危机，而是合法化及动因危机，即使尚未转移的经济系统的危机，也不再是马克思所论述的那种危机形式，而是以新的形式出现。因此，哈贝马斯要用他自己的危机理论特别是合法化危机的理论来

取代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实现危机理论的“现代化”。在这里，我们不必去全面论证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在当代的适应性问题，只要指出这样一点，就足以说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的强大生命力，那就是哈贝马斯为了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观点，论证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仍未消失时，不时地偷运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价值规律及阶级关系等方面的观点来说明问题。

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相距甚远或背道而驰的。这一理论的方法论及理论根据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而是马克斯·韦伯的社会政治理论。他明确承认他的危机理论以韦伯的观点作为主要依据，在《合法化危机》一书的第三章中还专门讨论了他的危机理论与韦伯的社会政治理论的关系。哈贝马斯的许多概念和观点直接取之于韦伯的著作，他关于“合法化”、“合理性”的概念，关于合法化问题在当代社会的中心地位，合法化的论证方式等观点都是从韦伯那里承袭下来的。日益离开马克思主义而借助于韦伯的理论乃是哈贝马斯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的社会政治理论的一个特点。

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的非马克思主义性质还表现在于：他主要是从改良主义的立场来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趋势的。尽管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作了全面的揭露和分析，但是他的分析批判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推翻或改变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从维护整个制度的目的出发，分析危机的病根，寻找解救良方，揭露矛盾和危机，是为了寻求摆脱这些矛盾和危机的对策，提出改良主义的建议。因此，正如有些前苏联学者所指出的，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把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批判理论的主要成分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稳定以及充分发展“合法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目标结合起来。显然，哈贝马斯的这种改良主义立场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特别是马尔库塞的激进批判立场相比，大大地后退了一步。

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趋势

对于生态危机趋势的研究是 70 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一个热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科技革命的展开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的使用，造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以及社会问题，并引发了声势日益壮大的“生态运动”。在这种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加强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研究，甚至将生态危机或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提高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高度来加以认识，从而形成了较系统的生态危机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本·阿格尔将这一理论与哈贝马斯、米利班德等人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并列，作为 70 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两个基本的、互补的方面。由此足见生态危机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中的重要地位。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论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问题。他考察了该社会的科技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即人对自然的奴役的状况，并提出了“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以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和《理性之蚀》等著作中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生态问题作为一个理论主题来加以讨论。他们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的异化、受奴役以及人类的解放问题联系起来考察，认为人对人的统治以人对自然的统治为基础，而人的自由解放以自然的解放作为前提条件。在现存压抑的社会（资本主义社

会)中,人与自然的的关系处于异化的状态中,人类凭借科技进步,使用技术手段,将自然作为征服、掠夺的对象,从而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而在未来的自由社会中,将发展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从而避免生态危机。卢卡奇、霍克海默等人的这些观点构成了后来特别是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问题讨论的先导。

马尔库塞可能是法兰克福学派中对生态危机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论述得最多和最充分的人物之一。他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著作(如《单向度的人》、《论否定》、《论解放》、《反革命与造反》等)都讨论了这一主题。马尔库塞继承和发挥了霍克海默等人关于人对自然的统治构成人对人统治基础的论点,认为,对自然进行愈加有效统治的科学方法,“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统治提供概念和工具”;“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处处得到合理化——技术合理性是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命理性”^①;“对人的统治要借助于对自然的统治”^②。他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生态危机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他说:“在现存社会中,越来越有效地控制的自然已经成了扩大对人控制的一个因素:成了社会及其政权的一个伸长了的胳膊。商业化的、受污染的、军事化的自由不仅从生态的意义上,而且也从生存的意义上缩小了人的生活世界。它妨碍着人对他的环境的爱欲式的占有(和改变):它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己,无论是异化的彼岸,还是此岸;它也使人不可能承认自然是自主的主体——人和这一主体一起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③马尔库塞不仅将生态危机看作是由科技进步所引起的危机,而且看作是一种政治危机、制度危机,即认为生态危

① [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4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②③ [德]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载《工业社会与新左派》,129、1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机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政治制度密切相关。他说：“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噪音、工业和商业强占了迄今公众还能涉足的自然区，这一切较之于奴役和监禁好不了多少。这方面的斗争是一种政治斗争，对自然的损害在多大程度上直接与资本主义经济有关，这是十分明显的。同时有人费劲地想使生态的政治作用‘中立化’，并利用它来美化现存的东西。尽管如此，今天我们必须反对制度造成的自然污染，如同我们反对精神贫困化一样。”^①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是资本主义用于加工制造的原料，是物质，是加强对人和物质的剥削性管理的原料”^②。在这种制度下，自然屈从于一种特殊的合理性，即“一种适应于资本主义要求的、工具主义的合理性”^③。

马尔库塞探索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异化及生态危机的途径，考察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自然的解放力量及其在建设一个自由社会时的重要作用的发现将成为推动社会变化的一支新力量”^④。他将自然的解放当作人的解放的手段或前提，自然的解放包括属人的自然（即作为人的理性和经验基础的人的本能和感觉）的解放和外部自然（人的存在环境）的解放两个方面。但这种自然的解放并不意味着倒退到技术前状态，而是把它向前推，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技术文明的成果，以达到人和自然的解放，并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毁灭性中解放出来。^⑤马尔库塞甚至主张发展出一种新型的或解放的科学技术。^⑥他认为，既然人对人的统治依赖于人对自然的统治，那么人的解放同样依赖于自然的解放，自然成了反对剥削社会斗争的同盟者。自然的解放就是恢复自然中产生的向上力量，恢复与生活

①②③④⑤ [德]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载《工业社会与新左派》，129、127、128、127、1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⑥ 参见陈振明：《评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社会学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1）。

相异的、表示着自由新特性的感性美的特性，这就难怪“资本主义的精神要嘲弄这种解放自然界的思想了”。他认为有两种对待自然的方式，它们分属于两种社会形式：一种是用那种作为损害手段的科学方式对待自然，而不是把自然作为一种“保留物”加以保护而让其独立发展，这只是为了达到控制自然的目的，把自然当作无价值的原料、物质，这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社会）；另一种是用科学技术保护自然并重建生活环境，让自然自由发展，这属于一种自由社会形式（社会主义社会）。马尔库塞还认为，这种将自然的解放当作人的解放的手段思想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中心主题，说马克思把对自然的“属人的占有”和“一切属人的感觉特性的彻底解放”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在这一点上，可以将马尔库塞的观点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 A. 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人与自然关系和乌托邦”一章中的论点相比较。在这一章中，施密特集中讨论马克思的自然观与他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人与自然关系是社会理想的关键问题。马克思本人并不承认自己是乌托邦主义者，因为他自认为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克服了对人类全部关系的一切幻想和虚构；马克思一生不断地批判乌托邦主义者，但是，“马克思关于人自身的自然以及人对外部自然关系的理论”和青年马克思的“人的自然本性的完全解放”、“自然的人化同时也是人的自然化”的梦想则是乌托邦的，马克思甚至是“哲学史上最大的乌托邦主义者”^①。显然，施密特与马尔库塞不同，他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人的解放与自然解放关系的理论持否定的态度。但在当代科技发展对自然所造成的损害这一点上的看法则与马尔库塞相同，他断言，当今人类控制自然的

^① [德] A. 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技术已数倍于以往的乌托邦主义者的梦想，但反过来转化为一种破坏力，它不是使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和解，而是导致灾难性的结果。^①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另一个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等著作中也讨论了生态危机趋势问题，但是他并不把生态危机看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而是将它看作当代整个人类世界所遇到的共同难题。他认为，在当代，国际社会体系把它的势力范围远远扩展到周围的自然环境，导致了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两方面都达到了极限：前者导致了生态平衡的破坏，后者则导致了人类学平衡及人格系统的破坏。关于生态危机，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是，有效地解决了经济增长问题，它迫使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和生产都不断增长，这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关键在于人口增长和对自然的不断开发这两个方面的经济需求，面临着两大物质局限性：一是可居住和可耕种的土地、淡水和食物以及非再生性原料等有限资源的供应；二是一旦遭到破坏便无法弥补的某些生态系统吸收污染物的能力，也就是说，人口和生产的急剧增长，即对外部自然控制的加强，终有一天会达到生物学的环境能力的极限。哈贝马斯强调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法克服生态平衡的破坏，即无法克服生态危机的问题。他说，除非资本主义社会放弃其组织原则，否则，就无法遵循将增长控制在一定界限的规律。要把无计划的、自发的资本主义的增长转变为有质量的增长，就必须根据使用价值有计划地组织生产。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能在不违背系统规则的前提下，脱离交换价值的生产的。与外部自然或生态平衡破坏相对应的是人类学平衡的破坏。人在生产过程中占用外部自然，而在社会化过程中则占用内部自然。随着对外部自然控制的加强，内部自然的一

^① [德]A. 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7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体化也加强了，内部自然一体化对人类本身的影响的直接后果是人类学平衡的破坏，而人类学平衡的破坏就意味着人格系统的异化、人性的丧失。由于一体化，人变成了机器上的零件，变成彻底的消费者。^①

70年代产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沿着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的理论传统，直接将生态危机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作为中心研究主题，形成了较系统的“生态危机理论”。其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威·莱易斯，加拿大的本·阿格尔（有时人们也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高兹列入其中）。按照阿格尔的说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是与哈贝马斯等人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并列的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两种不同的、又相互补充的趋势。这种生态危机理论认为，不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而且生产过程据以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两种分析观点：一方面，它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主义的动力导致资源不断减少和大气污染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它力图评价现代的统治形式——人类在这种统治形式中从感性上依附于商品的异化消费。力图摆脱独裁主义的协调和异化劳动的负担”。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是双重的，它要设计将打破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控制的社会主义未来”^②。

莱易斯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的观点，并将之与生态学理论相结合，奠定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在《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这两本著作中，他阐述了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观点特别是生态危机理论。《自然的控制》一书着重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双重统治”——对人的

① J.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5. 41~44P.

②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42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统治以对自然的统治为条件的论点，说明“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①。他把对自然的控制或统治的根源追溯到古代基督教传统，以及这一传统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移或削弱对人的统治，而是加剧了对人的统治。这种由对自然的控制到对人的控制是靠科学技术的手段来实现的。人们通过技术操作，即通过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的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与霍克海默一样，莱易斯认为，对自然的控制和对人的控制遭到自然的反抗，即来自外部的自然和内部自然的反抗，前者以生态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后者是人的内在欲望的非理性的爆发。

在《满足的极限》一书中，莱易斯则着重论述了生态危机及摆脱危机的途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生态危机，在他看来，自然并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客体，它并不服从社会的意志，这就是非人自然的需要。因此必须把作为社会构成部分的自然和不是社会构成部分的自然，把受人控制的和不受人控制的世界区分开来，人类要生活就必须尊重自然的界限，人类正是通过在技术上操纵、适应自然环境而形成自己的历史的；人类只有适应自然，才能生存和发展。过去人类在意识形态上、在技术上强调控制、征服自然，这种倾向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资本主义生产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资本家的唯利是图、急功近利造成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生产力和资源的严重的浪费；同时，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中，随着对自然和对人统治的加剧，科学技术变成统治的工具，变成新的生产力和破坏力的因素，而无产阶级则无力阻止这种情况。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已导致了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导致人的异化

① [美]威·莱易斯：《自然的控制》，（序言）6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和自然生态系统自动平衡的破坏，引起了生态危机。莱易斯认为，为了使工业文明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发展一种新的需要观、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实行稳态经济——这种经济要求缩减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和扩大资本主义国家的调节作用，重新评价人的物质需求，并大大削减这种需求。面对能源短缺、地球自然界的不断萎缩和生态支持系统的日益相互依存，或许还需要一种新的禁欲主义。在莱易斯看来，组织社会必要劳动方式上的质的差别和这种劳动与消遣、闲暇活动的关系，是各种生产活动中产生的满足问题的主要因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是消费活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造就了病态的消费方式，并以消费活动来确定是否幸福，这正是人的异化及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总之，即将来临的生态灾难，迫使我们重新考虑工业化的生活方式：使我们转而采取一种分散的、放缓增长速度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改变现有的消费方式，必须把人的需求问题当作更大的生态相互作用系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阐发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以及摆脱危机的社会变革的战略。他的中心论点是，“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因此，当务之急是“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出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和环境之间的关系”^①。

他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经营资本主义时期大量存在的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即使不是全部消灭了，也逐渐削弱了。

^① [加]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48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这期间,超过资本家有效利用能力的资本积累的趋势已完全改变,引起了阶级的重新组合,因而改变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特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他关于异化劳动的理论也不再能单独用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了。他说,马克思没有充分地分析消费领域,错误地认为只有生产领域中的危机趋势,才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由于资本主义比马克思所想象的更富有弹性,所以他的不完全的危机理论就更加远离发达资本主义的具体现实了(不过阿格尔承认马克思的异化和矛盾理论即辩证法仍有适应性,主张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同他的危机理论的具体历史运用分开)。阿格尔宣称,要用对导源于消费领域的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进行研究,用“异化消费”和“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来“分析目前存在于像受广告操纵的消费与受到威胁的环境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些危机的新形式”^①,并通过“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来克服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他围绕这些概念展开他的危机理论。

阿格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主要是由“异化消费”所引起的,所谓的“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纯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②。他主张通过“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来克服异化消费及其引起的生态危机。所谓的“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指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的时期,本以为可以指望的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而这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足方式从根本上进行重新评价。人们对发达工业社会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能力的期望破灭,最终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即对人们在一个基本上不完全丰裕的世界上的满足前景进行正确的评价”^③。这种辩证法可以使人们看到进行社会主

^{①②③}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490、494、490~49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义变革的动力，一来可以导致人们对需求的重新表达，二来可以使人们对从劳动中获得满足的前景改变看法。因此，阿格尔主张用这种辩证法取代“植根于无政府状态的危机理论的原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变革模式”。他还提出要用“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等具体措施来克服异化消费及生态危机，认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既适应于技术（生产）的过程，又适应于社会、政治过程，通过使现代生活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不仅可以限制工业增长，保护环境，而且可以从性质上改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在这里，阿格尔借用并改造了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提出的“小技术”概念，以“小技术”取代当代工业社会的“大技术”，消除现代社会工业生产的高度集中。他说，小技术的采用不仅意味着改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技术过程，而且意味着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权力关系。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后起之秀高兹把生态学、生态危机和生态运动及时地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提出了一种“政治生态学”理论（正由于这一点，他被列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单里）。他在《生态学即政治》这一论著中认为，在当代西方，随着科技发展及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资源的滥用导致资源的枯竭，空气、水、土壤的工业污染特别是核污染正摧毁全球的生态体系，世界人口的激增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要改变这种状况，避免世界末日的唯一出路是停止经济增长，改变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改使用不可再生能源为可以再生能源。他把现代技术分为两种：一种是高度集中的技术即核技术，这是一种独裁主义的政治选择，它导致决策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有利于对人民的控制，具有独裁和加强资本力量的倾向；另一种是分散的技术，它可以用来开发再生性能源，它服从于大家的控制而不能创造利润，具有潜在地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因此，人们必须在两种社会之间作出抉择：一种是建立在独裁主义的技术基础

上的社会——它加强了对人和自然的统治；另一种是建立在民主的技术基础的社会——它促进个人自主及与自然的协调。^①

我们已经简要地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趋势及一般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那么，应该如何评价这一理论呢？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这一理论具有新颖、合理之处。其一，这一理论有其现实基础或历史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疑感受到当代社会发展的脉搏，敏锐地抓住了因科技革命而日益提上突出位置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生态危机问题，将它纳入自己的理论研究的范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展开以及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严峻的人与自然的冲突或生态危机的威胁：空气污染、核威胁、温室效应等困扰着西方社会及整个世界。随之出现的是西方国家的生态运动或绿色和平运动，这一运动由最初的自发组织到组织政党，由最初的院外活动到登上政治舞台，由少数国家发展到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声势和影响日益壮大、深远，成了西方新社会运动的一大趋势。从其本质上说，这是一场西方国家的人民群众抗议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另一方面，60年代末之后，西方“新左派”及学生造反运动处于低潮。面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政治、经济和文化危机以及“新左派”及学生造反运动衰落的现实，70年代以后的一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马尔库塞、莱易斯和阿格尔等人调整自己的研究策略，把自己的理论探索与大众所关心的问题密切地结合起来，特别是将生态问题及生态运动及时地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努力开拓一条既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又能赢得大众支持的道路。因此，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及生态运动的现实在理论上的一种反映，

^① 参见 A. Gorz. *Ecology as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75. 120P.

它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尤其是危机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的现实以及生态危机的种种现象，并探索异化及危机的根源，将之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合理地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并不被当作人与之和解、协调的对象，而是被当作控制或统治的对象；技术手段被当作非人地掠夺自然的工具，这种技术同样被用来对付人，成为对人的控制或统治的新形式，对自然的这种掠夺性态度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及社会问题。因此，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种悖谬的状况：一方面是对自然控制能力的增强，人化自然的扩大，另一方面则是人的异化、不自由和受奴役的程度的加深，人的生存环境日益缩小，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而将异化和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异化和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所致，因而要克服这种异化和危机就必须粉碎这种逻辑本身。在这里，他们也往往自觉地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问题（如借助马克思的异化和矛盾理论）。因此，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危机的分析比一般生态主义者对生态危机的分析更深刻，因为后者往往局限于描述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种种现象，将之归因于科技进步或人性的弱点。

其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并探讨了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系。目睹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技术手段非人地掠夺自然所带来的种种消极后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应是统治（控制）与被统治（被控制）的关系，而应是一种平等、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关系；他们要求保护自然环境，防止生态失衡或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要求顺应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承认自然有其界限，主张人与人、人

与自然之间实行自主的、创造性的交往或交换；强调让自然得到解放，让它自由发展，反对无限制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把自然的解放与社会主义问题联系起来，将自然解放当作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这是有合理因素的。

其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探讨人与自然关系及生态危机趋势时提出了其他一系列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如关于必须加强对消费领域及消费异化的研究，以“补充”或扩展马克思主义对生产领域的研究的问题；关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充当对自然和对人统治的工具，变成新的破坏力量的问题；关于劳动—休闲一元论，在劳动过程中得到满足，注重提高生活品质或生活质量的问题；关于通过分散化、非官僚化和工人自治管理来实现社会主义变革、克服异化和危机问题；关于一种小技术或分散的技术的可能性以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科学技术观的发展问题；关于“红”（马克思主义）和“绿”（生态运动）相结合的可能性问题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问题都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看法，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及生态危机，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科技社会学理论和危机理论有某些启迪作用。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趋势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我们着重指出如下几点：第一，借口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在当代的适应性，用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而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主要类型。法兰克福学派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相联系，它在当代已经“过时”，主张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异化理论）与他的具体的危机理论（经济危机理论）分开，用他的方法来分析揭露新的危机形式，以取代经济危机理论。也就是说用生态危机来取

代经济危机。很明显，这在理论与实际上都是错误的，这不仅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着经济危机的事实，而且因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相联系，与其说生态危机决定经济危机，倒不如说，生态危机是经济危机的伴生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危机的同时态、历时态爆发的复杂可能性。

第二，不恰当地夸大生态问题的重要性，用人与自然的矛盾来取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产生的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诚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或矛盾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始终的一种基本关系或矛盾，随着科技进步及科技应用产生的副作用，在当代这个矛盾更加突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是注意到这个问题的。然而，他们却不恰当地夸大了这一矛盾的地位，以至于用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取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主要矛盾。同时，尽管他们声称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况有关，却往往离开社会生产方式尤其是生产关系去抽象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在生产活动中的确不断改造、征服自然，并调整与自然的关系，使自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然而人类的生产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单纯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中进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到生产方式以及与这种方式相联系的社会制度的制约或影响。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是相互交织着的，在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不同的内容及表现形式。因此，在一个社会形态中，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是更基本的或主要的矛盾。“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显然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这两对矛盾之间的关系。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错误地将科学技术当作当代资本

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异化及生态危机的总根源，并幻想一种废除“大科技”的“小技术”以及一种解放的科学技术观。尽管他们也经常谈到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但是实际上却把科学技术当作对自然和对人的控制和奴役、当作人与自然关系异化及生态危机的终极根源来加以批判。在他们眼里，科技进步使自然遭到破坏，尤其是当代的大科学、大技术导致了人类的生态灾难；同时，作为征服自然工具的科学技术反过来变成了对人控制的手段。因此，他们主张废除大科学、大技术及大工业，提倡一种小技术、人性的技术，并确立一种乌托邦式的新的科学技术观。其实，就其本质而言，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力量”，“历史的杠杆”，科学技术加强了人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能力，极大地提高生产力，为人类的自由解放创造物质基础，并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科学技术的滥用的确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及生态危机，但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以及生态问题的解决还得靠科学技术；现代大科技是人类社会发展尤其是生产工具进步的一个突出的表现，那种试图放弃大科技，而回到“小技术”或“分散技术”的做法不过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

第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缺乏全球视野，忽视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广大的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矛盾。应该指出，当代生态危机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造成的，因此这些国家应负主要责任，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益把有害于环境或人的健康的产业转移到第三世界，甚至建设危险的工艺设备、转移核废料。而第三世界面临发展经济的迫切任务，因而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大科技，改善生活环境。因此，全面、系统的生态危机理论中须采取一种全球视野，特别注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或南北对立问题），这样做有利于更深刻地揭露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的实质，提出更合理的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或方法。显然，这一点是“西方马克

思主义”的危机理论所缺少的。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趋势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有其自身的优劣成败。如果将这一理论，特别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一般的生态主义理论（如罗马俱乐部的观点）相比较，就可以发现它的特点和优点。罗马俱乐部（成立于1968年）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年代、所处的背景大致相同，它是一个研究“人类困境”即生态危机及其他社会问题的未来研究会，它的目标是促进和传播对人类困境较可靠的和有深度的见解，并为人类克服困境提供新的战略措施。为实现这一宗旨，罗马俱乐部在70年代及80年代初组织研究和发表了一系列的报告，如《增长的极限》（1972）、《人类处在转折点上》（1974）、《重建国际新秩序》（1976）、《人类的目标》（1978）、《学无止境》（1979）等。在这些研究报告中，罗马俱乐部的成员对人类的困境，特别是生态危机的性质和内容作了广泛而详细的分析；他们将人类困境看成人类缺乏自然界其他物种的生存智慧、自我调节机制和动态平衡的危机以及社会政治组织赶不上物质革命的危机，分析成政治发展同技术进步结构发生矛盾的危机和人的内部危机。他们列出人类困境或生态危机的种种表现，如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核威胁及军备竞赛、科技发展的无政府状态、东西对抗和南北对峙等等。罗马俱乐部的人类困境理论的特点及优点在于，它们以定量分析手段，以具体的材料和数据，向人们展示人类困境特别是生态危机的严重性，提醒人们注意对人类生存造成威胁的全球问题，呼吁各国合作共同解决生态问题，并提出一些可供借鉴的解决方案。但是，罗马俱乐部对人类困境的分析所采取的是——一种超历史、超阶级和超社会制度的“全人类”观点，即它所分析的是一种超越社会制度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它将人类的困境及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归咎于人性的因素，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它要人们抛开社会政治因素方面的考虑来共同克服人类困境。这

里的局限性和消极性是显而易见的。与罗马俱乐部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的特点及优点在于，它宣称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法和理论来分析生态问题，把生态危机的产生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并把生态问题的解决与社会主义的变革及人的自由解放挂钩，即把摆脱危机的出路寄望于社会变革，这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更具有批判性的味道。

第二章 当代科学技术的社会 功能及政治效应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

对当代科学技术的批判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一个基础方面。可以说，不解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它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因为在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眼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科学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发达工业社会，如何看待科学技术，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而且从40年代末50年代初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日益用对科学技术及文化的批判来取代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一方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观的对象是当代科学技术，主要着眼点是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及政治效应。他们通过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关系、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与合理性、科学技术与人类未来等方面问题的分析，形成了较系统的科学技术社会学及科学技术政治学理论，即科学技术观。下面，我们以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为主，来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方面的理论。

一、科学技术与生产力

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首要和基本方面。早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时期，马克思就提出并论证了科学是生产力的原理。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加强，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主导因素，科技进步尤其是新技术革命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动力。这给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注入了新的内涵，值得从理论上加以深刻的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观首先涉及的是这方面的问题。他们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在社会经济（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上发生的变化，提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之间关系问题的一些新论点，特别是哈贝马斯提出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点。因此，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方面的理论尤其是哈贝马斯的论点，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之间关系方面的理论，更好地把握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及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论及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他们一般同意马克思关于科学是生产力的观点。例如，霍克海默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中，科学被看作人类的生产力之一，科学以多种形式使现代工业体系成为可能；科学可以用作创造社会价值的手段，即就它作为生产方法而言，科学建构起生产的手段。^① 马尔库塞则将科学技术当作发达工业社会的最主要的基础，当作一种起着主导作用的生产力、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① 参见〔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又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将科学技术看作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或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认为在该社会中，“经济发展日益和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增长有三个特点：一是科学变成增长的工具，连社会科学也成了利用这种增长进行政治控制的手段，即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又出现混合；二是各门科学通过作为统治阶级的资本和作为国家财富的技术、机器而直接汇入生产过程；三是资本积累改变了它的性质，它不再是简单的财富的积累或生产资料的问题，而是积累技术、信息和知识的问题。^①

不过，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问题论述最多、最明确且具有新意的要首推哈贝马斯。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这是他为祝贺马尔库塞70岁生日而写的长文，后收入《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一书）等论著中，不仅明确提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论点，而且对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机制以及它与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两者的关系作了具体的论证。他把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技术的科学化以及科学、技术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合为一体，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等作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主要依据。

首先，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日益相互依赖，这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新特点，也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一个基本依据。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以往社会形态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依靠科学技术来发展生产力。但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不太突出，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之间往往是相互分离的，科学研究并不具有明确的实用或技术目的。而到

^① 参见 H.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London, 1976. 110~112P.

了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科学研究与技术日益相互渗透、相互依赖，这使得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哈贝马斯说：“与古老的哲学科学相区别，经验自然科学自伽利略时代以来，已发展出一种参考框架，这种框架反映了可能的技术控制的超越观点。因此，现代科学产生了这样一种知识：通过它的形式（而不是通过科学家的主观意图），这种知识是技术上可开发的知识，尽管这种可能的应用是后来才实现的。在19世纪末期以前，科学和技术并不是相互依赖的。到那时为止，现代科学并没有为技术的发展作出贡献，也没有造成自下而上的合理化的压力。可以说，它对现代化过程的贡献是间接的。”^①又说：“自19世纪最后的25年以来，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两种日趋显著的发展趋势：国家加强干预以保证制度的稳定，研究与技术日益相互依赖，使科学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a leading productive force）。”^②或者说，“技术和科学成为第一生产力”^③。

其次，哈贝马斯将技术的科学化以及科学、技术与生产上的应用的一体化当作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另一个重要论据。哈贝马斯认为，科学由潜在、一般的生产力向现实、直接的生产力的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机制，即通过从科学—技术—生产的转化过程，或者说以应用于生产之中为条件。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解决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机制问题。这时，技术日益科学化，科学、技术及其在生产（工业）上的应用组成一个体系，即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一体化，科学和技术一起成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哈贝马斯说：“从19世纪末开始，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特征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日益变得重要，这就是技术的科学化（the

①②③ J. Habermas.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0. 99, 99~100, 104P.

scientization of technology)。通过引入新技术来增加劳动生产力的体制压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总是存在的。但是，在此以前，革新依赖于零散的发明，尽管这些发明也是由经济所引发的，但毕竟其本性仍然是偶然的。当技术发展随现代科技进步而进入一种反馈关系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改变了。随着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的来临，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应用结合为一个系统。从那时开始，工业研究已经与政府委托的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首先促进军事部门的科学进步，然后，信息由那里流回民用部门。”^①

第三，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独立的系统变数和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这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又一个重要标志或根据。在他看来，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取代人（活劳动）而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手段。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来说，最重要的东西不是通过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延长工人劳动时间来增加剩余价值，而是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科学技术的进步成了一种独立的变数，成为一种最重要的单一的系统即经济系统所依赖的变数。因此，出现了这样一种前景：即社会制度的发展似乎是由科技进步的逻辑所决定的”^②。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状况的出现，使得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的理论发生作用的条件消失了。因为在非熟练（简单）劳动力的基础上来计算在研究与开发中资本投资的数量已没有意义。当科学技术进步已经变成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时，直接劳动力这种被马克思考虑为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的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了。^③

在这一点上，马尔库塞也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机器（死劳动）在生产过

^{①②③} J. Habermas,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0, 104, 105, 104P.

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劳动者（活劳动）的作用越来越小。所以，剩余价值不再主要来源于活劳动，而是来源于科学技术。马尔库塞说，技术变化趋向于废除作为单独的生产工具，作为“独立单位”而出现的机器，这种变化似乎取消了马克思有关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和剩余价值创造的理论。按照马克思有关的观点，机器决不创造剩余价值，而只是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剩余价值依然是剥削活劳动的结果；机器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具体体现。通过它，以往的劳动即死劳动保存着自身并决定着活劳动。现在，自动化从根本上改变着死劳动和活劳动的关系，它造成了生产率为“众多的机器而不是为个别产量”所决定的趋势，进而个别产量的计算便成为不可能的了。^①简言之，剩余价值已不再是工人的活劳动创造的，而是机器创造的，剩余价值学说被取消了。

此外，哈贝马斯还论述了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这两者的关系，即指出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必须以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为前提（这一点后面将会论及）。

显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理论特别是哈贝马斯关于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论点有合理之处，包含着一些深刻、新颖且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见解。第一，哈贝马斯透过当代科技进步以及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抓住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实，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命题，并对此详加论证，他提出的一些主要论据是颇具说服力的。例如，他提出的在当代科学研究与技术日益相互依赖、技术日益科学化的论据是符合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实际的。我们对西方资本

^① 参见[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2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主义社会迄今为止出现的三次产业革命或技术革命的历史的回顾便可以说明这一点。第一次技术革命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结束于19世纪60年代（主要标志是蒸汽机和纺织机的广泛应用）。在这次革命中，技术作用优先于科学，蒸汽技术主要是为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开矿和纺织中的动力需要而发展起来，并不以科学研究为先导。在这一阶段里，技术与科学研究的联系是松散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20年代结束（主要标志是电力的广泛应用），它是科学的全面发展特别是电磁学理论所带来的成果，即在这次革命中，科学研究明显走在技术前面，技术进步依赖科学研究。第三次技术革命即新技术革命始于二战后（主要标志是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生物工程等的应用），它直接依赖于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学科的革命性进程。这次革命的显著特征是科学研究和技术相互依赖、密切结合，使科学技术迅速转变为生产力。尽管在第二次技术革命中，科学走在技术前面，但科学家往往并没有认识到他的研究的应用前景（法拉第对电磁感应的研究、赫兹的电磁波实验均属这种情况），科学家并没有把他们的理论应用到生产过程，而是一些工程师、技术人员来做这项工作，科学理论转化为技术的周期也较长。到了第三次技术革命时，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研究直接为解决工业中提出的技术问题服务，许多科学理论马上被应用科学家和工程师加以分析，探求它们实用的方面；这一时期的技术与科学不再截然分开，探求新原理的科学家和发展新工艺、新产品的技术专家往往是同一个人，他们“一身两任”；科学和技术融合，科学有明确的技术目的，技术自觉地以科学为指导，如声障研究是为了实验超音速飞行，核聚变研究是为获得新能源，基因重组是为获得新品种。由此可见，三次技术革命的过程也就是科学研究与技术分离到两者不断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过程。

又如，哈贝马斯将科学、技术及其在工业上的应用的一体化

作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又一主要论据也是可以成立的，他实际上揭示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或途径。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与科技的关系来看，的确出现哈贝马斯所说的科学、技术及其在工业上的应用一体化的情况。将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过程，促进经济发展，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特征。但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与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有着不同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或过程。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转化机制或转化过程是“生产↔技术↔科学”，即生产既是科学、技术的起点，又是它们的归宿。而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特别是二战后的当代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科学、技术、生产”走向一体化，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的新的转化机制或转化过程。一方面，通过科学理论转化为技术，通过技术发展转化为生产，构成科学对技术、技术对生产的作用；另一方面，生产活动过程不断产生新的问题，需要通过技术加以解决，技术问题又有赖于科学理论的解决，从而形成了生产对技术、技术对科学的反作用。在这个双向循环中，科学已经成为推动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动力；生产力的发展往往取决于科学理论的突破。二战以后出现的一系列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中间试验、新产品试制和批量生产融为一体，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起到第一位的先导作用。

再如，哈贝马斯等人所说的科学技术在当代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主要手段，并将之作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论据也是有道理的。在第一次产业革命期间，蒸汽机、纺织机等发明和利用，使资本主义在不到100年的时间“所造成的生产力比过去世代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马克思语）；在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随着电动机的发明和使用，世界工业生产总值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增长了20倍。而在第三次技术革命时期，随电子计算机等的发明和使用，人类进入电子时代或信息时

代，使劳动生产率持续高速增长。据统计，在本世纪初，科技进步因素在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中所占的比例为5%，50年代上升为50%，到80年代则高达60%~80%。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率年增长3%，其中的3/4是依靠科技进步取得的。80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及社会财富的增长，主要依靠开辟“知识密集型工业”、“信息工业”的途径，即主要依靠科技因素，而不是主要靠增加劳动力、资金或资源。同时，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商品的周期也越来越短。这种转化周期，在1860年以前平均为78年，在1870至1900年平均为32年，到20世纪则缩短为6~7年。这充分说明，科学技术已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手段。

第二，哈贝马斯关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理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马克思根据他所处的时代即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科学是生产力的论点，说“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①，并赋予这一命题以丰富的内涵。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科学是生产力，一方面是以知识形态存在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可以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因为第一，在社会生产力的诸要素中都渗透着科学的因素；第二，科学作为一般的生产力可以物化为一般的生产力，即通过物的途径转化为新的劳动工具和新的劳动对象，通过人的途径，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马克思进而分析了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相互作用，指出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即这种转化是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在他看来，机器生产的过程实质上是应用科学的过程，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2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他说：“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就是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① 马克思还英明地预见到科学在今后的生产力发展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说：“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②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来特别是二战后，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加强，科技进步尤其是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力。面对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这种变化，从理论上加以反思，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与生产力关系的理论，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问题并没得到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和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倒是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哈贝马斯注意到了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中的重大作用，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并且着力探讨了当代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机制，即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日益相互依赖以及它们与生产一体化，科学技术才成为第一生产力。这就表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只有当原初以知识形态出现的科学转化为可实际利用的技术、劳动者的技能和生产装置时，科学才能由一般的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哈贝马斯的这些观点，无疑在某些方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论点。大约 20 年之后，邓小平同志根据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是生产力观点的理解和对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巨大社会功能特别是它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的考察，独立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点，并作了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23 卷，505、66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论证，远远超越了哈贝马斯。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说哈贝马斯还是有相当的理论洞察力的。

第三，哈贝马斯关于在当代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它不仅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把握当代科学技术的巨大社会功能特别是生产功能，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点的理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社会学理论，而且有助于我们坚定地制定和执行科技兴国的基本国策，确定科技发展战略，加快科技体制改革特别是形成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有效机制。例如，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主要标志，乃是科学技术成为当代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首要推动力；当代各国的经济、军事及政治之争归根到底是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之争，也就是说，在当代，一个国家强大与否，它的国际地位如何，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特别是科技发展水平。因此，各国都把科技立国作为基本国策。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更应重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依靠科学技术来推动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更应增强科技立国意识，坚定不移地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并确定好科技发展战略。又如，哈贝马斯的理论也告诉我们，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关键是形成有效的转化机制，即科技与生产的一体化。这正是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为经济发展服务中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没有形成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有效机制。这既制约科技本身的发展，也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加大力度改革我国的科学技术体制，特别是在科学—技术—生产的转化机制上下工夫，加速科研成果转化为商品的周期，使科学技术更好地变成现实、直接的生产力。

但是，必须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马尔库塞和哈贝

马斯关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理论是有缺陷的。这主要表现在,他们把生产力看作一种独立的变数,看作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否认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具有明显的技术至上主义的倾向。哈贝马斯等人把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独立变数,成为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作为当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一个论据,实际上将科学技术夸大为唯一的生产力,夸大为社会财富和剩余价值的唯一创造者;他们也将科学技术看作决定社会制度的主要力量,即看作当代社会起支配作用的组织原则。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理论,特别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首先,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不是说它可以独立创造价值,而是必须渗透到生产力的三种因素中,并与之紧密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其次,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不是说它是生产力、社会财富的唯一创造者。马克思说过,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尽管在当代,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社会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自然条件一类的因素作用下降,但它们毕竟也是生产力、社会财富增长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再次,科学作为第一生产力,并不出现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所说的社会系统以及政治制度的发展,乃是由科技进步的逻辑所决定的情况。影响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尖锐化的程度、阶级关系及其力量对比、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等),不能仅仅归结为科学技术的结果。在这里,哈贝马斯等人具有明显的技术至上论或技术统治论倾向。最后,不能因为科学技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第一生产力而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实际的情况并不是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应用前提告吹了。因为

即使在科学技术发展造成的自动化条件下,剩余价值的产生仍然是由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的剩余价值所决定的。自动化的机器是不变资本,它只能把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而不能发生价值增殖;自动化的设备也离不开人的操作,被雇佣者(不管他是蓝领还是白领)的无偿劳动才创造价值;况且,科学技术本身也是活劳动的产物。因此,即使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特别是剩余价值学说并未过时或失败。由这几点看,不能将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特别是邓小平同志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点相提并论。

二、科学技术与生产关系

科学技术与生产关系的互动是科学技术观中的一个重要而又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问题。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生产关系对科学的影响或制约,即科学技术是如何在生产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的;二是科学技术对生产关系的作用或影响,即科学技术是如何通过转化为生产力而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关系问题的这两个方面都有所论及。通过对他们观点的评述,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理论的认识。

关于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制约或影响问题,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特别是离不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制约和影响。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考察了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根源,考察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近现代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之间存在一种

亲和关系。这种亲和关系意味着资本主义以相同的方式产生了实在领域的现象和认识领域的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纯粹”的事实，从而产生出自然科学。在卢卡奇看来，自然科学代表了一种合理性类型，而这种合理性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历史产品。但问题是，说自然科学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的产物，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或实现的可能性，还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自然科学的有效性提供逻辑上的先决条件？卢卡奇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回答。

法兰克福学派的奠基人霍克海默也肯定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应用受历史环境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制约或影响。他坚决反对把科学研究看作一个自我封闭的王国的观点，强调科学研究是社会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环节。他认为，科学活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劳动分工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① 科学这一行当是劳动或人的历史活动过程中的一个非独立的环节^②；理论的创立、修改和发展都是一般社会活动的组成部分^③；而在阶级社会，由于科学家分属于不同的阶级或集团，所以，理论与一般社会活动的关联方式也就不同。他说：“由于理论构造物的作者所属的社会阶级不同，它们与一般社会活动的关联方式也就不同。因此，当资产阶级首次出现于封建社会的时候，随之出现的纯粹科学理论主要倾向于摧毁现存状况，攻击旧的活动形式，在自由主义时代，这种理论被人类普遍接受了。今天，决定发展的主要不是在改进物质生产手段和产品方面互相竞争的普通个人，而是在各个层次上控制着经济和政府的、互相冲突的全国性和国际性领导集团。”^④ 因此，霍克海默提出了一

①②③ 参见 [德]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188~189、191、196 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④ [德]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196 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个颇具历史主义色彩的科学观，即认为科学理论的发展包括科学发现、事实和理论的联系、理论的检验、接受和修改以及科学的应用受社会历史因素包括生产关系的制约。他说：“实际上，有助于更新现存知识的大量新发现的实际联系，以及这种知识对事实的应用，都不能由纯粹逻辑或方法论的根据中推出，而只能在现实的社会过程中加以理解……新观点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即使科学家本人只是由内在的动力推动就改变他的观点，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不同。”^①

关于科学技术对生产关系的作用或影响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著名论点，即科技进步导致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趋同。他们认为无论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还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都属于发达工业社会，是同一个由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所统治或支配的发达工业社会的两种模式或样板。在这种社会中，建立起工具理性、物化关系和机器的全面统治。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制度是由科学技术进步的逻辑所决定的，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这一历史趋势的出现，资本主义原有的制度结构以及作为子系统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布局受到破坏或摧毁；而在苏联，为了与资本主义进行竞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发展科学技术，从而导致了其体制结构与资本主义趋同。

马尔库塞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首先提出科学进步导致两种社会制度趋同的理论。他认为，苏联和西方社会都是建立在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工业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技术和合理性被应用到工业和社会组织之中，现代工业的合理性要求对机器的标准化的一致和准确的服从；它所要求的是调整和反应，而不是自主性。在苏联，工业化系统的合理性要求对机器过程的服从，个人的创

^① [德]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187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造力屈服于效率和绩效。因此，苏联的劳动和社会组织的目的是统治和劳动者对机器的顺从，而不是使劳动者的潜能得到发挥，于是，工业化的进步也就是统治的进步。马尔库塞指出，西方社会与苏联社会之间的基本差别被一种朝向同化的强有力的趋势所拉平，这两种制度显示出其共同的后工业文明的特征：集中和控制取代了个人的事业和自主性，竞争是组织化和合理化了的，存在着种种将经济的和政治官僚主义相结合的规章制度，大众由传播媒介、娱乐工业和教育等来加以调控、协调……如此等等。因此，只要生产是中央化和从上而下对人的控制的话，那么，国有化，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废除，并不构成一个本质的差别。没有首创性和由“直接的生产者”来自下面的控制，那么国有化只不过是加速生产力发展，为它们来自上面的控制（中央计划）服务的一种技术—政治手段，一种统治方式、统治流水线(streamline)的变化，而不是废除统治的先决条件。

《苏联马克思主义》一书1958年出版后，马尔库塞的趋同论受到了人们的激烈批评。因此，他在1961年的新版序言中为自己辩解，说：“必须澄清一点由于我的不充分的论述所引起的过多误解。本书反复强调某些使西方和苏联社会同化、同一的趋势……我宁愿使自己从这种立场中解脱出来，虽然我仍然坚持发达工业社会中那些围绕机器过程所产生的政治特征。也正是这种机器过程的总特征限制着西方与苏联社会走向同化和同一的趋势，并产生非常不同的发展潜能。”^①然后，他强调说，苏联不同的体制是为不同的发展所设计的。他解释说，苏联在与西方的竞争中，将刺激技术进步、自动化和劳动的减轻；认为国有化经济并没有对技术进步合理化加以外在的限制，这将加快在必要劳动领域中工

^① H. Marcuse, *Soviet Marxism: A Critical Analysis*. New York: Vintage Paperback edition, 1961. XI--XIII.

作的减少。因此，马尔库塞认为在苏联可以看到比起西方要大得多的通过自动化和技术的潜在解放潜能。然而，在1964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一书中，他又明确地主张趋同论，声称苏联与西方都是建立在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发达工业社会，它们是同一个发达工业社会的两种翻版，都以技术合理性作为社会组织原则；它们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单面、异化、畸型的社会。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确已注意到科学技术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生产关系及社会历史因素对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应用的制约以及科学技术对生产关系及社会政治制度的巨大作用的事实，力求揭示科技进步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霍克海默所提出的科学研究及科学理论的发展（包括发现、检验、修改、承认等等）受社会历史因素（社会实践、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等等）的制约的观点是颇有见地的，这成了后来科学历史主义的先导。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观点基本上是错误的、不可取的。一方面，尽管他们口口声声称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应用受生产关系及历史条件的制约，但一旦涉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问题，他们就离开生产关系及所有制形式来看问题，抹煞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科学技术社会功能及政治效应的差别，将科学技术看成一种超时间超历史的万恶之源。另一方面，他们夸大了科学技术对生产关系及社会政治制度的作用，将之变成唯一的决定因素，并鼓吹科技进步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的理论。这是十分错误的。科学技术当然是生产关系及政治制度变革的一个基本动因，但却不是唯一的动因。生产关系及政治制度的变革是多种因素（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尖锐化程度、阶级关系及其力量对比、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相互作用的结果；科技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尽管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革命性因素，但社会革命的发生及政治制度

的变迁并不是由科技进步的单方面因素所决定的。如果把社会制度的发展看作是由科技进步的逻辑所决定的，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科技发展水平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会出现不同的社会制度这一现象。

显然，在鼓吹“趋同论”这一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与西方“(后)工业社会”理论家们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几乎所有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家都宣称，当代科学技术创造了一个使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后)工业社会”。因为这种社会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所以是一致的，它超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的分野。丹尼尔·贝尔认为，“苏联和美国都是工业社会，它们之间是彼此一致的”^①。因此，可以“把这两种制度归入同一种标题”^②。雷蒙·阿隆宣称，当代欧洲并不存在根本不同的两个世界：苏联世界和西方世界。它们都属于工业文明，苏联和资本主义社会是同一类型的两个品种，或者是同一社会类型（即发达工业社会）的两种形式。托夫勒则断言，科技革命的发展以及信息社会的到来，已经取消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他说，生产资料所有制“本质上是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的问题。左派的一切分析都从这里着手；它在100年前还有用，现在就越来越不切合实际了”^③。

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看待科学技术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问题的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一方面，科学研究活动、科学向直接生产力的转化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或实现的，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科学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是不同的；另一方面，科学通过技术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从而引起生产关系

①②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7、8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③ 《预测与前提——托夫勒未来对话录》，107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4。

的变革。下面，我们作一些说明，先看第一方面的问题。

诚然，自然科学的理论或定律是对自然界的本质规律的认识，具有客观真理性，不会因为生产关系及社会制度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科学是没有国界、不分民族、阶级、国家的，它是全人类的共同成果，自然科学的成果可以为不同的生产关系及社会制度所利用，所不同的只是看它怎样利用以及用来达到何种目的。但是，肯定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性和无阶级性，并不意味着否定生产关系及社会制度与科学技术之间的联系。

所谓的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它由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 and 交换关系、产品分配关系及消费关系等部分所组成。在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最基本的方面。包括科学在内的人类改造和认识自然的活动，是在具体的社会条件下，通过具体的生产关系来进行的。生产关系以一定的方式影响一个社会总体及一切社会现象（包括科学技术）。它使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体结构和社会主体的利益得以形成；它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和科学技术研究的体制；它们在各种社会机构中发生着作用，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借助于这些机构而得以实现。当然，我们首先承认科学技术认识活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科学技术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

人类社会历史以及科学史表明，科学技术越发展，它们在社会生产及生活过程中的作用就越明显，而它们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过程，也就越来越受到生产关系或社会制度的制约。当代两种对立的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为科学技术发展创造条件、科学技术应用的范围及应用性质等方面都有着质的区别。

近代实验科学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几乎同时诞生，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早期的资产阶级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反对封建阶级和神学，非常注重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成了它手中的

有力武器。资产阶级文明的“秘密”就在于，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却同时把进行劳动的人同私有制控制下的一般社会劳动条件分离。当然，“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样一来，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和直接劳动相分离，而在以前的生产阶段上，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①。在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科学从属于资本，而与劳动相对立。马克思指出：“科学及其应用……虽然它们——从它们的源泉来看——又是劳动的产品，然而在它们进入劳动过程的一切地方，它们都表现为被并入资本的东西。”^②因为并入资本所有，所以，在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条件下，这一点也不会改变。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科学日益加强资本的权力，仍与劳动脱节，与劳动对立，科学作为生产力与它为人的充分发展提供种种条件，两者并没有有机的联系。

既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它就按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方式运转，被纳入整个资本主义的工业结构，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科学理论通过机器和工艺流程得以物化，变成物质产品或商品，通过交换创造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以前的出于个人爱好、属于个人事业的学术研究的情况已经改变，科学研究不再是私人的事业，而是一种职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逐渐改变科学活动的结构，以适应资本的利益，工业研究或应用研究成为科学研究的中心，而传统的学术部门降低到从属的地位。科学研究的的方向和课题重点，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所决定的。科学内部的所有制关系也发生了改变，科学成果不属于科学家所有，而属于资本主义的企业或公司，科学家及技术人员实际上成为出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7卷，5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第1册，4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脑力劳动的雇佣劳动者。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的发展、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发挥受到很大的限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能创造出实现科学发展的各种合乎理想的条件，即使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进步的规模，也与现有的科技潜力远不相适应。科学技术被当作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对科学技术的片面的“有用性”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也使科学技术的发展畸型，往往迫使科学技术离开了改进人类生存条件、改善社会生活和使人类获得自由解放的目标，使科学技术逐渐丧失了它的解放的功能。当它们被应用于自然的时候，自然变成了纯粹的被征服、掠夺的对象；当它被应用于社会的时候，人则变成了被统治和奴役的对象。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科学的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也不否认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的高度发达。马克思说过：“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①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有着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阶级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② 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垄断组织对科学技术的限制作用，并没有完全阻止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了自身的利益，垄断组织局限在某些方面上，采取一切手段，超过一切限度来发展科学技术，实现科学技术的某些实践职能，同时在另一些部门或另一些方面，则停滞不前。因

^①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2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6卷，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此，不能使科学技术得到合理的发展，这就促使科学技术的某些研究和应用变成一种对社会有害的潜在破坏力量。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加深干预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然而由于这种干预实质上只不过是出于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利益，所以不可能为现代科学技术创造完全适合的社会条件。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科学技术革命的展开加强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必然性。

科学技术本质上是一种全社会的事业，它的本性与一切私有制相矛盾，它不能容忍私有，其本质上要求公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指出，社会主义为科学的高度发展，为科学功能的良好发挥创造了条件。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克服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的潜能，使人类摆脱自然的束缚和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获得真正的自由解放。著名英国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也雄辩地论证，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事业，与公有制有着天然的联系。美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则将公有主义或共产主义（communism）和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概括为科学精神气质的两个基本的方面。他认为，科学是社会合作的产物，因而属于全社会，它不应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科学的共产主义气质与作为垄断组织私有制来应用科学技术成果是不相容的。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奠定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而科学技术则成为改造自然和社会的重要手段。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应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科学技术通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尤其是公有制而找到了它的最恰当的运动形式。现在，科学技术作为“一般社会劳动”与总的社会劳动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它消灭了科学作为一种异己力量而与劳动对立的状况，社会主义能有效地限制科学的消极应用，消除它的资本主

义使用方式带来的生态危机和一系列社会问题。

科学技术进步尤其科技革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图景。当代科学技术能够产生两个主要的、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结果：一方面，由于科学日益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所以在生产活动以及生产结构中引起种种变革，大大推进工艺技术的发展。现代技术手段逐渐取代人力而完成许多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作为生产力的人本身的发展，为科学技术开辟了广阔的天地。随着技术的进步，劳动者的技能、组织性以及它们的专业知识都在不断提高，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能得以充分发挥，从而促使人在生产力结构中的地位逐渐提高。这充分展现出科学技术的真正本质和社会功能。

从上述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得出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影响的几点结论：第一，生产关系制约着科学技术如何转化为生产力和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生产力。科学理论能不能由工艺流程变成直接的生产力关键不取决于科学理论自身，而主要取决于生产、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因而也就受生产关系的制约；第二，生产关系及社会制度决定着科学技术应用的目的和性质，科技成果被用来促进生产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还是阻碍社会进步，对人类生存是福，还是祸，这是不能以科技成果本身来决定的，而主要是由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来决定的。第三，生产关系及社会制度影响着科学本身发展的速度，这主要是通过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来制约科学的发展。

关于科学技术对生产关系的作用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科学技术通过转化为生产力尤其是生产工具而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因而科学技术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特别是机器是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因素，是一般生产方式发生革命的起点。他说，机器的发展是使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因素之一：“机器表现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的、

使一般生产方式发生革命的起点”^①。他认为，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所引起的生产工具的变革及生产力革命，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②。马克思还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③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蒸汽、电力和自动纺纱机称为“危险万分的革命家”^④。

恩格斯表述了与马克思完全一致的观点。他指出，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⑤。他认为，科学技术进步导致社会革命，说“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⑥。他盛称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革命力量的观点，并将其与马克思的两个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相提并论。他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⑦又说：“没有一个人能像马克思那样，对任何领域的每个科学成就，不管它是否已实际应用，都感到真正的喜悦。但是，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7卷，5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2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2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6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3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力量。而且他正是把科学当作这种力量来加以利用。”^①

总之，科学技术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同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问题密切相关，只有将科学技术与生产关系联系起来考察，才能正确揭示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及政治效应，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理。

三、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即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互动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影响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应用于自然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②现代科学越发展、越复杂，它的方法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③。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加以批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②③ [匈]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提出了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同一思路，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他们的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其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思·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中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

“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总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思·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的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①“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②。

^{①②} [德] 马尔库塞:《马克思·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载《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106、108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①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造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融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使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用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②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③。“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④。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

^{①②} 参见〔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导言)4、6~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③④} 同上书,10、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艺术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理学”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了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①。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 and 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

^① H. Marcuse,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Boston: Beacon Press, 1972. 4P.

严的丧失。”^①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的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科技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他领域。”^②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③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④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

① H. Marcuse.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Boston: Beacon Press, 1972. 14P.

②③④ J. Habermas.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0. 81、82、84P.

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①。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W. 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②。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 20 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③。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

① J. Habermas.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0. 84~85P.

②③ [美] 威·莱易斯：《自然的控制》，6（序言），130 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

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①。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且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现代西方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17至18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

① [美] 威·莱易斯：《自然的控制》，138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理论，再到当代实证主义以及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科技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19世纪开始，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工业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沦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发展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

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的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窠臼,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予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历史的罪恶根源,看作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方面,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了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从根本上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

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影响。与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相反，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①。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

①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① 马克思主义坚决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认为，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② 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内容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首先，国家和大垄断组织日益应用科学，加强了国家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导致了科学组织以国家垄断的形式出现；其次，科学应用于军事目的，使科学技术与政治的结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军备竞赛充分显示了科学技术在制造和改进军工产品方面的巨大威力；再次，科学活动和国家的结合使科学日益“政治化”，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控制自然，也被用来统治、控制和奴役人，即科学技术被用作统治工具。这种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使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危险性，产生了一系列生态危机和社会问题，不仅损害了个人价值，而且甚至会毁灭人类本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2卷，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6卷，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消除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倾向，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关系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使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确立一种良好的关系，使政治体制、科技体制及文化体制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如同它与经济的联系一样，是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一个重要标志。科学技术逐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和发展的源泉，成为对实现内外政策具有重要意义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的作用首先表现为，科学技术同制定和完善社会政治领导，同确定国家政治方向有着直接的联系；科学技术参与确定群众活动的基本任务和方向，参与制定政治纲领与决议；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参与社会的政治管理。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它渗透到政治管理的各个领域，成为政治管理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科学技术的政治作用还表现在，它们被用于人道主义的方面，用来满足人们的物质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科学技术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条件、必不可少的因素或有机的组成部分。科学技术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若没有科学技术，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象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与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方向是一致的，要表达和揭示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规定整个社会活动的目的，就必须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同时，人民当家做主，参加社会管理与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密不可分的，科学技术又是社会主体本身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掌握科技知识便成为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一个条件。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日常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四、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

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是当代科学技术观争论的一

个焦点，也是当代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或制约着各种社会问题，并执行着某些意识形态功能。同时，社会意识形态的诸形式构成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精神环境，制约着对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功能的理解。这些情况使得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一方面，当代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并没有减弱，各阶级的斗争意图都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意识形态对社会心理及人的意识有着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对当代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众说纷纭——或断言科学技术万能，或断言它对解决人类问题无所作为；或乐观地把它看成通向人的自由解放的一种手段，或相反地把它视为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的祸根——在很大程度上无不与意识形态因素相关。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论及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一般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科尔施、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强调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密切联系或等同；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则主张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分离或对立。在这里，我们主要评述前一种观点，特别是评述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观点。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命题与他们关于科学技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第一生产力和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是密切联系的，或者说，它们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相互联系着的方面。在他们那里，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主要是依靠科学技术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来实现的；而科学技术之所以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能成为意识形态，其基本前提或先决条件则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将科学技术看作新的意识形态并探讨它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的联系，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理论的独特而新颖之处。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涉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他有时将“意识形态”当作自觉阶级的理论表现，看作一种系统化的抽象理论体系，即从中性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有时则将“意识形态”等同于虚假意识，即从否定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他划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分别看待它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关于自然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没有说自然科学是意识形态，但认为自然科学执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它掩盖社会矛盾，并阻止社会变革；说自然科学被应用于社会时，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关于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卢卡奇明确断言，社会科学就是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就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他主张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代之以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青年卢卡奇的这些观点可以说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观点的先导，后者的观点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霍克海默已经把完善的科学技术手段、工具理性看作客观上可以对目标进行合理论证，并导致社会堕落的东西。早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一文中，他就提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观点。他说：“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科学之所以是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说它是意识形态的，并不是说它的参与者不关心纯粹的真理，任何一种掩盖是非真实本性的人类行为方式，即使是建立在相互争执的基础上，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①

^① [德]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或更确切地说，科学技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职能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在1962年提交给第五次世界社会学大会的一篇题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的论文中，他论述了西方工业社会随着科技高度发展，意识形态出现的种种新变化。在1964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一书则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全面的批判，特别是对科学技术及技术理性成为意识形态的批判。在他眼里，科学技术取得合法统治地位，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因此，在他看来，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首要的是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批判。

马尔库塞认为，作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当代科学技术绝不是价值中立的，它们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执行意识形态的职能。他坚决反对技术中立性的观点，他说：“面对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征，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维持。技术本身不能独立于对它的使用；这种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这个系统在技术的概念和结构中已经起着作用。”^① 马尔库塞通过批评技术中立性观念来论证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观点。

何谓技术中立性？它的主要含义有二：一是指满足于各种需要的纯粹的工具性，或说它是工具手段中立性的一个特例；二是说技术不仅与需要无关，而且与社会文化和社会制度无关，技术可以用于任何社会类型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技术显然不同于法律、宗教等社会体制，这些体制不能轻易地转换到一个新的社会类型之中，因为它们深深地植根于它们所由产生的社会体制、结构之中。相反，技术从一社会转移到另一社会似乎只受资本的限制。

马尔库塞提出了关于技术的政治意向性，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三个论点来批驳技术中立性的观念。这三个论点是：第

^① [德]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一，技术作为工具或手段并不是政治上清白的，因为即使技术被当作一般的需要（如增加生产力）的手段，它在现存工业社会中的特殊的设计和应用也构成了人对人统治方式的基础。技术创造出一个极权社会，它为特定的历史规划所固有的目标服务。因此，技术不可能是真正价值上中立的。第二，技术作为一种总体体系，一种文化形式，在为现存社会的合理性辩护中，取代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地位。因此，它预先封闭了对社会的不满和反抗，阻碍人类向自由解放方向的迈进，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及政治统治的连续性。现在技术进步的前景不可能是真正自由和民主的新社会的到来。第三，科学技术合理性先验地适用于维护社会统治，它排除了个别性、特殊性，要求普遍性、共性，其本质就是统治的合理性。科学技术的单向性、实证性、功利主义、反辩证法以及对现存事物的顺从主义使它们自身成为统治工具，成为意识形态。在上述三点的基础上，马尔库塞认为，技术中立性的要害是价值中立，然而正是这种中立性现实地确立了它的政治意向性：它有助于特殊的社会组织，这正是科学技术所具有的形式化和职能化，在附加任何条件之前，它就是具体的社会实践的纯形式。在反对技术中立说时，马尔库塞一反他关于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科技进步使两种不同制度趋同的说法，认为技术与文化尤其是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选择有关。

马尔库塞认为，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并没有使该社会看起来更少意识形态性，相反更加意识形态化。他说：“把思想意识吸收到现实之中，并不表明‘思想意识的终结’。相反，在特定的意义上，发达工业文化较之它的前身是更为意识形态性的，因为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完全在生产过程之中，以某种更加争议的形式，该命题揭示出现代技术合理性的政治成分。”^①

^① [德]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已随着科学技术的普遍运用而溶入生产过程,工艺或技术的合理性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和政治的合理性,因而意识形态并未衰弱,相反,以更强大的、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在这里,马尔库塞否定了以贝尔、利普塞特、达伦多夫、布热津斯基等人为代表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家”的“意识形态终结论”。

哈贝马斯进一步发展了马尔库塞的观点,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的命题,并对科学技术为什么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为意识形态的机制加以深入探讨。在他看来,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日益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进一步清除了技术与实践之间的差别。因此,必须重新确立技术及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范围。哈贝马斯根据技术规则在技术系统中区分出“手段”和“应用”。他将技术手段看作无足轻重的东西,而赋予技术应用以特殊的意义,认为正是目前社会领域中普遍使用的合理方针的行动,能够把任何对象或环境作为技术手段而吸收到“工具应用”的范围之中,这是社会生活中科技进步的主要结果。

那么,为什么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够成为意识形态呢?哈贝马斯认为,关键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国家日益干预经济生活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这两大历史趋势。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韦伯系统中所谓的合理化的普遍进程,技术系统在对社会制度的吸收中,破坏了历史上形成的政治制度同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联系,出现合法化危机。现在政治出现了新的趋向,它已经不受某种政治或经济利益的操纵,统治成了一种残余现象。而由于国家的干预,统治者也试图将政治问题转变为“技术问题”,把原来需要通过舆论界交给公众讨论的问题,变成了由科层组织中专家使用技术来解决的技术问题,这样就将实际问题“非政治化”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哈贝马斯

所说的当代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与当代资本主义两大历史趋势之间的密切联系；由于国家日益干预经济生活，使传统的以公平交换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失效，出现合法化危机即意识形态危机；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则产生了一种新意识形态，因为科学技术不仅大大提高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形成一种高标准的生活方式，而且造就了一种与这种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思想行为方式即意识形态，通过这种思想行为方式，证明对人的统治和压抑的合理性。简言之，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实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而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则实现了人对人的统治。

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就是“技术统治论”意识的流行。他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由解放的潜在力量变成为统治的合理性提供思想依据的手段。晚期资本主义由于不能为自己对传统文化思想资源和社会相互作用领域的破坏性侵蚀辩护，只好从技术统治论中寻找根据，并步其后尘，借口说是科学技术本身的需要，用技术统治论的变种来取代社会存在的思想和目标的传统意识形态纲领。与传统的意识形态相比，这种技术统治论的新意识形态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传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多或少都包含某种超越现实的“美好生活规划”或理想，也包含了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而科学技术这种意识形态尤其是技术统治论则抛弃了理想和价值，而且阻碍对现实（社会基础）的反思和批判，其目的是现实的永恒化，因而更具辩护功能。^①第二，科学技术变成偶像的意识形态，较之于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不可抗拒和无孔不入，因为它掩盖了实践问题，不仅仅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特殊阶级利益服务，压抑另一个阶级的局

^① J. Habermas.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0. 111~112P.

部的解放要求，而且又侵蚀了人类要求解放的旨趣本身。^① 第三，同以往的意识形态相比，科学技术这种意识形态具有“较少的意识形态性”，因为它不具有老式意识形态的那种“欺骗的不透明性”（即不靠制造幻想、蛊惑和宣传等欺骗手段了），它是透明的、直接的，即直接把自己的力量诉诸客观的合理性。^②

哈贝马斯还指出，技术作为潜在的意识形态还深入到不过问政治的群众意识之中，并且还形成了一种合法化的努力，这种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奇特效果就是：社会的自我理解脱离了交往行为的关联系统，脱离了以象征为中介的相互作用概念，而为一种科学的模型所取代。同样，在合理行为和适应行为范畴内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文文化对社会生活所作的一定的自我理解。技术作为意识形态，一方面为新的、完成技术使命的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它又常常遇到这样一些确定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能够对我们称为体制的框架，导致隐秘的侵蚀，权威国家的牢固统治屈服于技术管理的操作压迫。

下面，我们对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观点作一些评论，并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阐明我们关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观点。

显然，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看到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某些联系，提出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正在变成意识形态的问题，特别是揭露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宣扬技术统治论，用科学技术充当传统的意识形态角色，用技术统治意识来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辩护这一事实，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技术统治论意识形态的特征及其危害，这有它的合理之处。但是，问题在于，他们

^{①②} J. Habermas.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0. 104~111P.

片面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在二者之间划等号,并错误地断言,科学技术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技术统治论已取代了传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实际上,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功能是一回事,科学技术等于意识形态,并取代了传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则是另一回事;资产阶级制造的技术统治论这种虚假的意识形态是一回事,科学技术本身是直接的意识形态又是另一回事。的确,科学技术由于其深刻的社会影响而履行着某些意识形态功能,但是,它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取代传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成为一种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传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价值观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仍起支配作用。“技术统治论”只能说是西方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愿望。此外,尽管哈贝马斯等人对技术统治论作了一定的批判,但就其将科学技术抬上意识形态的宝座,宣扬科技进步的逻辑决定社会制度发展而言,他们的思想本身就是属于技术统治论意识的。

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特别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必须作一些比较深入的分析,指出它们的联系和区别。科学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科学作为一种专门的精神生产形式,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殊的部分便独立出来了。科学是一种知识的体系,它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的正确反映,表现为系统化的知识,特别是经过理性加工过的理论知识。而对于意识形态概念,人们并没有一致的理解。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意识形态是“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的必然升华物”,表现为哲学、宗教、道德等一系列形式。换言之,意识形态是由哲学、法律、道德、美学等观点组合而成的,这些观点反映出一定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根本利益。社会意识形态也具有系统性和知识性的特征,但是它还具有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反映特定阶级的利益,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在

阶级社会里，这种性质表现为阶级性，它只为一定的阶级服务。

科学虽然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然而却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它从属于人与自然斗争的生产力，而不是社会意识形态。科学以它特有的属性和功能（如知识性、系统性、非阶级性等），而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区别开来，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这种特殊性质表现为，它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总是处在向物质形态的不断转化过程中，它的生命力、它的存在价值和它对社会进步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一种文化、一种意识形态，而且在于它是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能够转化为生产力而使整个社会产生革命性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科学既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围，又属于生产力范畴，它对社会的作用可以概括为“自然科学→技术→生产力→社会进步”这样一个公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向来没有把科学归入意识形态的范畴，而是将它归入生产力的范畴。在他们看来，科学不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而属于一般社会生产力，并可以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科学在本质上并不是意识形态，它所反映的是客观规律或自然界的本质关系，不受阶级利益的支配，没有阶级性。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科学与意识形态没有关联。科学与社会意识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与意识形态既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又不断地处于或明或暗的相互冲突之中，意识形态是为了维护、加强或改变某一社会制度服务的。科学的领域，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也是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舞台。科学的发展受意识形态的制约，意识形态也影响科学。科学史的研究已经证明，科学理论的发现、检验、修改、发展、应用无不受意识形态（世界观、宗教、道德等）的制约和影响。反过来，伟大的科学发现则往往影响意识形态的内容及形式，特别是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同时，科学成就也常常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利用，被用于论证和维护特定的政治制度。

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表现及性质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资产阶级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所以，那时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曾对科学起过促进作用，推动科学争取自主权以及争取科学活动自由权的斗争。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科学被纳入资产阶级的“普遍福利体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也变得日趋复杂起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表现，它对待科学远非是客观中立的，它与科学经常发生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则已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列宁语）。马克思主义的功绩在于，它把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它以分析社会发展规律和全面评价各种实际条件为基础作出科学预见；它把理想变成了社会运动的实际目标，它同革命斗争实践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成了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因素，它通过科学家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他们的活动动机，给科学以重要的影响。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同人类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直接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反映人类的根本利益而与整个社会的进步相一致，从而为科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文化精神环境。

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曾经是西方学者（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讨论的热门话题。但西方学者往往不能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或者将科学与意识形态看作是毫不相干的，或者将它们等同起来。西方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最早来自于知识社会学的创立者们，尤其是帕累托、韦伯、谢勒和曼海姆等人。这些学者中就有人主张将科学与意识形态分开。例如，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根据培根的偶像说，将意识形态分为四类，指出其本质乃是逻辑形式掩盖下的一种情绪，而科学研究则是“在某种程度上摆脱自己的情绪、偏见和信仰”。显然，他将科学与意识形态隔绝开来了。实证主义则把科学与意识形态完全对立起来，它在“拒绝形而上学”的口号下，要求科学放弃一切与社会迫切相关的见

解，要求科学排除一切世界观的因素，对各种冲突采取“不干预”的态度。它将理论与实践、知识与价值相割裂，不承认价值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作为正统的技术统治论者，当代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家们鼓吹“非意识形态化”，实际上也将科学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非意识形态化”理论的一般含义是：意识形态作为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只是对不发达的社会有意义，对发达的工业社会来说，它们已失去其功能，不再适应科技革命时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它们已让位给“技术的解决办法”。该理论的出发点是断言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革命的变化时期已终结。因此，与它相关的思想意识失去了一切基础，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应从工艺的方面来加以解决。他们认为，现代发达工业社会的活动不应受意识形态动因的支配，而应以科学信息和准确的知识为基础，而这正是由专家对社会机制的结构和职能进行研究之后提供的。由此可见，意识形态终结的鼓吹者也正是技术统治论的提倡者，“非意识形态化”观念的流行，表明了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深刻危机，它以特别尖锐的形式表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没落。“非意识形态化”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它本身就是一种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到70年代，这种论点便宣告破产了。因此，它的鼓吹者们不得不从“非意识形态化”转为“重新意识形态化”。

在这种脉络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观点，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等同起来。这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对以往割裂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一种解毒剂，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他们却走到另一个极端，即夸大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联系，以至于在二者之间划上等号。总之，在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上，我们既要看到它们的差别，又要注意到它们的联系，将它们截然对立起来，或将它们完全等同起来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章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 阶级关系和阶级意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

阶级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甚为关注的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阶级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从总体上来说，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由于发生了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新的科技革命的成果被广泛运用，推动了原有产业和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使得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急剧下降，第二产业也缓慢下降，而第三产业急剧上升。与此相联系，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结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问题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他们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意识、阶级结构、阶级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当代的适应性等问题上。

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意识

阶级意识的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中的一个

焦点问题。被看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的卢卡奇、葛兰西和科尔施形成了一套有关阶级意识的理论，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都非常重视研究这一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经济、政治危机，但是欧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没有相应地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即使某些国家内发生了工人阶级的起义也很快都失败了。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都力图寻找当时工人运动失败的原因。既然在客观条件上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危机已经发生，那么工人运动又为什么会失败？面对客观危机的形势与革命失败的反差，他们试图从工人阶级的主观条件上去寻找革命失败的原因。正是由此导致了他们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系统考察。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中都涉及了阶级意识的理论，而卢卡奇则在著名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最为系统地阐发了阶级意识的理论问题。

1. 阶级意识及其形成

什么是阶级意识呢？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提出十分完整明确的有关阶级意识的定义，没有建立起系统的阶级意识理论，为此他立志要解决这一重大问题，并且写下了以《阶级意识》为题的长篇论文。卢卡奇将阶级意识看作是一个阶级能够自觉到这个阶级自身的利益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阶级意识既不是组成这个阶级的每个人的意识的总和，也不是组成这个阶级的每个人的意识的平均数。他认为“阶级意识就是理性的适当反应，而这种反应则要归因于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典型地位。阶级意识因此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①。卢卡奇强调，必须把阶级意识同凭经验作出的判断区分开，同心理学意义上的观念区别开来，它不是现实生

^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04～1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活中的阶级成员的主观思想，而是一个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赋予的意识，是一个阶级自觉意识到自身的利益、客观地位和历史作用时所具有的意识。葛兰西在其著作中虽然没有像卢卡奇那么系统明确地阐述阶级意识，但是与卢卡奇相似，他也是把一个阶级成员的自发的感情、建立在日常经验上的本能，同一个阶级的阶级意识区别开来，认为这种阶级成员的感情、本能虽然并非是错误的，却需要上升到阶级意识的水平。

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形成。在前资本主义时代，阶级意识就其本质而言，还不可能具有十分清晰的形式，这是因为“阶级意识被规定为是一个要归因于阶级利益的问题”^①。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当中，阶级利益决不能以十分清晰的经济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社会的客观经济结构中，经济因素和政治的、宗教的等等因素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②，经济关系不可能纯粹地被意识到，作为人们行为动机背后的真正推动力——经济利益（亦即阶级利益），只是隐蔽在动机背后的历史发展的盲目力量，它没有被人们清楚地、自觉地意识到。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随着等级制的废除，随着纯粹的经济划分的社会的建立，阶级意识就进入了一个可能被意识到的时期”^③。较之过去时代的错综复杂和隐蔽的关系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要简单得多，作为历史动力的阶级的经济利益在这个时期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这时候阶级意识才能真正形成。

但是，在卢卡奇看来，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也是无法自觉地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的，因为这两个阶级的存在并不完全是以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为基础的，而是和等级社会的残余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它们的意识是摇摆多变的，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悖的，“它们的意识要在

①②③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18、110、1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直接规定的历史现实中得到发展是不可能的”^①，谈不上有作为一个阶级的自觉意识。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才是两个纯粹的阶级，才会真正具有自己的阶级意识。

2. 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及其功能

卢卡奇指出：“在别的阶级那儿，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总是阻止着阶级意识的形成，而在资产阶级那儿，这些因素却促使阶级意识的发展，只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一开始起和由于它的本质的原因——会遭受悲剧性的灾难，即在它发展的顶峰会陷入和自身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并因而必然要屏弃自身。”^②资产阶级的意识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辩证的矛盾，它用“自由”的名义进行反对封建等级制的斗争，但在取得胜利的时刻，这种“自由”就必然变为一种新的压迫；资产阶级使得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以纯粹的形式出现，然而却又总想把阶级斗争从社会意识中抹杀；资产阶级一方面赋予个性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意义，另一方面却又通过个人主义的经济条件，通过商品生产建立起来的物化取消任何一种个性。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这种辩证矛盾只是资本主义极其深刻的矛盾的反映。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作为私有财产的功能和它的客观的经济功能处于一种相互之间不可解决的辩证矛盾之中，资产阶级的思想始终地和必然地从个别资本家的立场出发来观察经济生活，因此也就造成了个人和超个人的“自然规律”之间的尖锐对立，这不仅造成了在冲突中个人利益和阶级利益的对立，而且也使得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所带来的问题成为不可能的。这种事实和状况迫使资产阶级意识到某种东西，但它又无法理解这种东西。因为这些事实和状况后面所隐蔽的可以理解的

^{①②}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18、1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理由，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如果资产阶级意识到这一点的话，那就意味着资本家阶级的自我否定。这样，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限制也就变为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限制，资本主义的矛盾也就转变为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矛盾。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式上是同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相适应的，但是他们的地位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理解、也不愿意承认：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就是资本自身，不可能理解、也不愿意承认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是否定资本主义自身的革命，这样资产阶级意识只能是一种“虚假意识”。

“当资本主义发展的没有被意识到的革命原则由于无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而被社会意识到了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在思想上被逼进了自觉反抗的境地。”^①这时候资产阶级“虚假意识”中的辩证矛盾加剧了，“虚假意识”变为了“虚伪意识”，原先只是客观存在的矛盾变成主观的了，理论问题变成了一种虚伪的道德立场，它决定性地影响了资产阶级的实际立场。

资产阶级的这种状况决定了其阶级意识在资产阶级为取得对社会的统治而进行斗争的功能，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欺骗别的阶级，使别的阶级没有清楚的阶级意识，就成了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基本功能。资产阶级力求按照自己的利益把整个社会组织起来，它就必须创立一种自圆其说的关于经济、国家和社会的学说，并且使自己相信和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就是进行这种统治和组织。由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是少数人的统治，而且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的，因此掩盖现存社会的性质，欺骗别的阶级，就成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为此他们才会提出“超越”阶级对立的国家学说，“公正”的司法等等，这表明了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虚伪性质。

^①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及其功能

在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中，重点阐述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及其功能，而葛兰西和科尔施也论述了这一问题。

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既不是个别无产者的个体心理意识，也不是他们全体的群体心理意识，而是“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①，或者说可以这样理解，“人们在特定生活状况中，如果对这种状况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利益能够联系到它们对直接行动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予以完全把握，就可能具有的那些思想、感情等等”^②。换句话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是无产阶级对于自己的历史地位，包括对自己的阶级利益、阶级作用、阶级使命的意识。他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心理相区别，并且指出机会主义的根子就在于：“混淆了无产者实际的心理意识状态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③

卢卡奇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称为“被赋予的阶级意识”，就是历史所赋予无产阶级的那种意识，进一步说就是无产阶级的客观的历史地位所赋予无产阶级的那种意识。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是历史进程中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体，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通过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得到实现的。当无产阶级达到了对社会本质的意识，并依照这种意识改造社会时，当无产阶级达到了对自己的历史地位的意识，并依照这种意识去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时，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就达到了真正的统一。而在其他阶级那里主体和客体是相分裂的，它们的阶级意识与客观的经济结构是不相称的，比如资产阶级，它们没有能意识到自己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因此，“它们的行动的社会意义对它们自己来说却是一种秘密，并且是由发展过程的‘理性的诡计’支配的。但是无产

①②③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33、135、1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阶级则被历史赋予了自觉地改造社会的任务”^①。正因为无产阶级是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体，所以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就不是以“理性的诡计”秘密支配着他们，而是会被他们自觉地意识到，所以是被历史赋与了自觉改造社会的任务。

正是基于无产阶级是主体和客体相统一、无产阶级的客观历史地位和主观的阶级意识相统一的观点，卢卡奇赋予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极其巨大的功能。无产阶级意识，“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后的阶级意识，一方面必须要和揭示社会本质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必须实现理论和实践的越来越内在的统一。对无产阶级来说，它的‘意识形态’不是一面扛着去进行战斗的旗帜，不是真正目标的外衣，而就是目标和武器本身”^②。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是外在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东西，相反，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实现。换句话说，无产阶级只有自觉到自己的阶级意识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对无产阶级来说而且只是对无产阶级来说，正确地洞见到社会本质是首要的力量因素，甚至也许是决定性的武器。”^③只有无产阶级真正认识到社会的本质，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确立起自己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实现才是真正可能的。资本主义的灭亡、无产阶级的胜利并非是客观必然性自身在脱离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之外自然实现的，并非是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所认为的客观经济进化的自然结果，相反，“当最后的经济危机击中资本主义时，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④。

这样，卢卡奇通过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功能的分析，赋

^{①②③④}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30～131、129、127、1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予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以巨大的历史作用，阶级意识成为决定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的基本前提，甚至是关键性的因素。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的葛兰西、科尔施虽然没有像卢卡奇这样详尽地论述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都强调了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都把阶级意识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必要前提。葛兰西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他认为当时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没有发生或者是失败，是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取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资产阶级意识所控制，不能真正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没有形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为此他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取得政权，而且要取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使得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思想的控制，确立自己的阶级意识，才能保证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科尔施同样将1918—1920年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工人阶级缺乏意识上的准备。他指出：“由于缺乏夺取政权的社会—心理前提，在1918年11月之后那关键的数月中，当资产阶级有组织的政权被粉碎而且表面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再有什么障碍时，却未能把握这一有利时机。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对于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决定性信仰，而正是这种信仰才能带领群众一道前进，并使人们认识到应迈出的最初几步的性质。”^①他同葛兰西一样将革命失败归因于工人阶级缺乏革命意识，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观性前提。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又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性一面，论述了意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巨大作用。从理论和实践、意识和存在、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观点出发，强调意识是存在的组成部分，主张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同时，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确立无产阶级的意识，并将其视

^① [德]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英译版序言）1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

卢卡奇等人虽然认为无产阶级在革命实践中能够达到对自己的历史地位的自觉意识，能够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能够自发地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相反，他和葛兰西都主张将无产阶级的实际心理、自发意识同自觉的阶级意识区别开来，并论证了将无产阶级的实际心理、自发意识上升为自觉的阶级意识。卢卡奇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自觉的阶级意识的载体，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体现者，只有通过共产党，无产阶级才能实现自己的阶级意识。葛兰西也认为，只有有机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表述者和指导者，要由共产党向群众灌输先进的意识。

上面我们概述了卢卡奇、葛兰西和科尔施等人的阶级意识理论。这一理论的合理性首先表现在强调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积极作用。他们实际上都是在对当时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阶级意识的理论，强调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巨大作用，将阶级意识的确立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前提。这样，他们的阶级意识理论就将被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所忽略的问题凸现出来了。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严重地歪曲了马克思主义，陷入了机械决定论，忽视了意识的能动性，忽视了阶级意识的巨大作用，将社会主义革命仅仅看作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結果。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都坚决地反对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的观点，正像卢卡奇所指出的那样，客观的经济进化虽然能创造无产阶级在经济生产过程中的地位，给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机会和必需，但是这种改造只能是通过无产阶级的自觉行动才能实现，只能是在无产阶级确立阶级意识后的自觉行动中才能实现。应该说，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积极作用的肯定，纠正了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更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主客观的辩证法，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作用，无疑是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在

理论上的一个突出贡献。

卢卡奇、葛兰西和科尔施不但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积极作用，而且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阶级意识理论，包含了许多合理的见解。其中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尤为突出，他考察并分析了阶级意识的概念及其形成，分别阐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功能，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且富有新意的阶级意识理论，其中的不少观点是合理的。比如，他将阶级意识定义为一个阶级自觉到自身的利益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并将其同阶级成员个人的实际心理和意识区别开来；他从阶级意识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出发，说明了阶级意识只能在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形成，并就此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农民的阶级意识的局限性；他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深刻地分析了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辩证矛盾，考察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如何从“虚假意识”演变为“虚伪意识”，揭示了资产阶级阶级意识所具有的欺骗性的功能；他又详尽地考察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主客体辩证统一的基础上，说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必然性是通过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来实现的，从而赋予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以巨大的历史作用。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的阶级意识理论，对推动丰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

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的阶级意识理论的最大的缺陷在于带有相当浓厚的黑格尔主义的痕迹，使其整个理论带着黑格尔式的思辨色彩。他们都是在主客体统一、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框架下，强调了主观意识的作用。虽然这样的思路克服了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将主体和客体割裂的机械决定论的片面倾向，赋予被机械决定论所忽视的阶级意识以巨大的功能，但是他们自己又趋向了某种片面性，过分强调了主观意识的能动性，过分夸大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作用，而淡化了客观现实对阶级意识的制约，因此在他们的著作中很难找到对当时的社会条件的详尽分析。正像卢卡

奇 1967 年《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新版序言中所反思的那样：“当时，我想要勾画出正确的、真实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将它与经验主义的‘民意测验’（这个术语当时自然尚未流行）区别开来，并赋予它一种无可争辩的实际客观性。然而，我未能越出‘被赋予的’阶级意识这样一种概念。这里我是指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到的同一内容。他认为，社会主义的阶级意识与自发产生的工团意识不同，它是‘从外面’，也就是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的。这样，我主观上所想达到的东西，以及列宁对社会总体内的实际运动进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所获得的东西，在我的说明中，却成了纯粹思想的产物，从而成了某种直观的东西。所以，这种‘被赋予的’意识在我的表述中竟变为革命的实践，从客观上来说，只能使人感到不可思议。”^①当卢卡奇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变为“纯粹思想的产物”，变为“革命的实践”的时候，他显然就陷入了唯心主义。而葛兰西、科尔施的理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唯心主义的倾向。

卢卡奇、葛兰西和科尔施的阶级意识理论，对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致“阶级意识”问题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意识的分析，有两个问题特别突出，其一是将阶级意识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的问题，其二是关于工人阶级丧失了阶级意识的问题。

卢卡奇、葛兰西和科尔施尽管都强调了阶级意识在阶级分析中的重要性，把被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所忽略了的阶级意识凸现出来，但是他们毕竟没有明确地将阶级意识作为阶级划分的标

^①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 1967）12～13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准。而后来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比如普朗查斯、米利班德等人则明确地将阶级意识看作划分阶级的标准。普朗查斯的“多元决定论”的阶级划分标准，主张从意识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三个方面来区分阶级、分析阶级，尽管经济是划分阶级的主要标准，但却并非唯一标准，经济标准不能代替意识标准和政治标准，正是根据这种标准，他将白领工人划归为“新小资产阶级”。（普朗查斯的这一观点我们还将下面详细阐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理论家米利班德，在1977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中，实际上也是把阶级意识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的，他认为：“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概念，既包含有‘客观’决定的一面，又包含有‘主观’决定的一面。可以归结为一点：没有觉悟，工人阶级只是一批人；当它有了觉悟之后，它才成为一个阶级。”^① 他这里所说的觉悟，就是指阶级意识，“阶级觉悟可以理解为某一阶级的成员意识到了自身的‘真正’利益”^②。按照米利班德的理解，只有一批人具有了自己那个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成为那个阶级的成员，否则他们只能算是一批人。这样，他实际也就把阶级意识作为能否成为一个阶级的标准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意识的理论，最为集中的是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而法兰克福学派又最为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问题。法兰克福学派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卢卡奇等人的阶级意识理论的影响，在他们最早的社会批判理论中，注意分析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抑制工人革命意识的作用。霍克海默在1937年发表的《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中，就认为不能假定工人阶级一定具有革命的意识，而认为当时欧洲的工人阶级受到了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的控制，只有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使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得以恢复。后来的法兰

^{①②} [英]米利班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26、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一般都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丧失了自己的阶级意识。哈贝马斯也认为，阶级意识或革命的阶级意识，今天在工人阶级的核心部分都看不见了。他们在分析欧洲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发生的原因时，都将其归于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丧失，对此，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等著作中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他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工人阶级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在生活消费的方式上，已经趋向于同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体化，成为单向度社会中的单向度的人，因此丧失了革命的、否定的、批判的意识，也就是说丧失了阶级的意识。因此寄希望于这样的工人起来造反、革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由此他否认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体，而去寻找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之类具有新的革命意识的新主体。

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

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引起了阶级结构方面的改变。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白领工人”的迅速增加和“蓝领工人”的相对减少，所谓“白领工人”就是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的工程师、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它区别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人”。随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应用相联系的“白领工人”在雇佣劳动者的队伍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白领工人”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了“蓝领工人”，比如在美国，从1965年起“白领工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蓝领工人”，到了70年代，“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的比例是5：4。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的另一个变化是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增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趋势。一部分拥有资本所有权的资本家，由

于缺乏专门的科学知识、技术和管理的经验，因而无法直接指挥生产、管理企业，不得不聘请各种专家进行专门的管理。这就产生了一批具有科学知识的管理专家，他们成为了高级经理，享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管理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批人有非常高的薪俸收入，有高水平的生活条件，而且对工人阶级有支配的权力，但是他们又是受资本家雇佣的人。“白领工人”队伍的迅速扩大，由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产生的高级经理阶层的出现，对西方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未碰到的新情况。“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的变化，力图对其作出新的分析，形成各种理论，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普朗查斯的“新小资产阶级”理论、马勒的“新工人阶级”理论和高兹的“非工人的非阶级”的理论。

1. “新小资产阶级”

普朗查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重要的阶级理论家，在《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当代资本主义中的社会阶级》等著作中，提出了划分阶级的新标准，并依据这个新标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结构进行了独特的分析，其中影响最大的并引起很大争议的就是他对“新小资产阶级”的分析。

作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普朗查斯运用结构主义的概念和方法，从阿尔都塞提出的“多元决定论”出发来探讨阶级问题。他认为传统上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所作的解释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解释，“根据这种解释，社会阶级仅仅存在于按照经济主义的方式设想出来的生产关系方面，也就是说，社会阶级被说成是承担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地位及他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①。

^① [希]普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5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按照普朗查斯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对社会阶级的分析，从来都不只是从经济结构（生产关系）去分析，而是将其放在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结构的整体中去分析，这个整体既包括了经济方面的因素，也包括了政治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社会阶级是结构整体及其相互关系的产物，所以“分辨一个社会阶级既可以从经济方面，从政治方面，也可以从意识形态方面”^①。当然，普朗查斯认为对于阶级来说，“一切问题的发生首先在于经济方面，其次在政治方面，再次在意识形态方面”^②。这其中，经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政治和意识形态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经济在划分阶级时尽管是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但是却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社会阶级》一书中，他更明确地指出：社会阶级是由社会成员组成的集团，社会成员在生产过程中，即在经济领域中的地位是划分阶级的主要的标准，但并非是唯一的标准。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对社会阶级具有主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一经济地位就可以确定社会阶级，分析社会阶级既要考虑经济标准，也应考虑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标准。

普朗查斯正是根据“多元决定论”的阶级划分标准，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白领工人”的巨大队伍，划归为“新小资产阶级”。普朗查斯所说的“新小资产阶级”，主要包括企业中的管理人员、科学技术人员及商业、银行部门中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员是随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科技革命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大量涌现的。普朗查斯之所以称其为“新小资产阶级”，就是为了区别于传统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为主体的旧的小资产阶级。说它是新小资产阶级，因为它是随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而

^{①②} [希]普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6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新出现的，而且它不像传统的小资产阶级那样随着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趋于被消灭，而倒是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扩大。

普朗查斯从经济方面确定阶级的时候，最为强调的以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来作为划分阶级的界限，就是依据这个界限，他将管理人员、科学技术人员和商业、银行中的工作人员即“白领工人”，排除在工人阶级队伍之外，将其划归为“新小资产阶级”。在他看来，“白领工人”在经济上没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占有资本，因此不是资产阶级，而且他们又确实是为资本家所雇佣的雇佣劳动者，是以工资的形式取得劳动报酬的。但是，普朗查斯并不认为作为雇佣劳动者的“白领工人”属于工人阶级，因为他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限定为生产性劳动者，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体力劳动者才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定义不是根据一个简单的和固定的否定性标准，即它被排除于所有权之外，而是根据生产性劳动这个标准来确定的。”^①“白领工人”虽然不享有所有权，是领取工资的雇佣劳动者，但是并非所有的雇佣劳动者都是生产劳动者，那些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雇佣劳动者不是属于工人阶级，又因为他们不属于资产阶级，所以普朗查斯就将其看作是“新小资产阶级”。

普朗查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只有生产性劳动才是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它在生产剩余价值的同时，也直接生产着作为剥削关系的基础的物质要素，只有生产性的劳动才是真正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劳动。因此只有直接从事生产性的劳动，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那些人，才组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即工人阶级。那些在资本流通领域中的雇佣劳动者，像

^① N. Poulantzas,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5, 210P.

商业人员、财会人员和银行工作人员，从事的只是非生产性的劳动，虽然他们的劳动有助于剩余价值的实现，但并不生产剩余价值，因此就不是工人阶级。那些从事各种劳务活动的律师、医生、教师，还有各种娱乐部门的服务人员，以及国家机关中的文职人员，他们的劳动有助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扩大再生产，但是他们并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从事的只是非生产性的劳动，因此也不是工人阶级。至于科学家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作也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劳动，科学成果本身不会产生剩余价值，因此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也不算是工人阶级。

普朗查斯依据经济方面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将管理人员、服务人员、科学技术人员、律师、医生和教师排除出工人阶级的队伍，又从政治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将这一大批人划归为“新小资产阶级”。

从政治关系上看，普朗查斯认为那些管理人员和监督人员，实际是对工人劳动进行管理和监督，实际上体现着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支配关系。他们从资本家那里获得支配工人的权力，行使着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的职能，他们维护和支撑的是资本对工人的统治关系。所以，尽管他们不占有剩余价值，自己也出卖劳动，并受资本家剥削，但是从政治关系上来说，他们处于支配工人的地位上，不能算作工人阶级。当然由于他们不占有剩余价值，并为资本家所剥削，因此又不能算作资产阶级。因此普朗查斯就将他们划归为“新小资产阶级”。

从意识形态上看，普朗查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工程师和技师等脑力劳动者，所从事的工作实际上是发生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标志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本身是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密切交织在一起的。工程师和技师在科学技术应用的过程中，实际上支持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关系的再生产，体现着资本对工人的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体现的是意识形态关系上资本对工人的统治、支配的关系，作为脑力劳动者的工程师、技师的工作，所维护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上资本对工人的统治关系，所以他们并不属于工人阶级，而是属于“新小资产阶级”。

在普朗查斯眼里，所谓“新小资产阶级”指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生产性的劳动者，他们是受剥削的雇佣劳动者，却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这个阶级的范围包括管理人员、科学技术人员、国家机关的文职人员等，也就是现在人们通常所指的“白领”阶层。这个阶级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作用是维护和支撑资本对工人的统治关系。他们一方面为资本家所统治，另一方面又统治着工人阶级。

“新小资产阶级”理论一经提出，就在西方社会引起很大的反响和争议。有人认为，普朗查斯根据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来区分阶级，从而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别混淆为阶级区别，这并不符合马克思本来的思想。有人认为，普朗查斯的“多元决定论”的阶级划分标准，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夸大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在阶级划分中的作用。也有人认为，普朗查斯的“多元决定论”的阶级划分标准，仍然还是承认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仍然没有摆脱经济主义的解释。特别是普朗查斯的阶级结构分析，把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雇佣劳动者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划归为“新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引起了很多人的批评。

“白领”是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迅速扩大的一个阶层，它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一个重要现象，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还没有出现的新情况。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理所当然应该关注并研究这一新的问题。普朗查斯力图对“白领”阶层进行深入的分析，他的许多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的认识，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他的“新小资产阶级”理论确实存在明显的缺陷。他的“多元决定论”的阶级划分

标准，是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来划分阶级，并将此视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分析方法。其实，“多元决定论”的阶级划分标准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起源于纯粹的经济原因，“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①。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② 划分阶级只能根据经济标准。当然，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一个以经济关系为基础，包括着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的社会范畴，但是政治关系、思想关系归根到底是经济关系的表现和反映，所以阶级的划分只能以经济关系作为根本标准，而不能将这一标准与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相提并论，否则只能引起阶级划分的混乱。普朗查斯却是将政治关系、意识形态关系与经济关系平行，作为划分阶级的三大标准，容易引起混乱，依据他的标准，将“白领”阶层都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划归为“新小资产阶级”。这样就把发达国家中占劳动人口的一半以上直至三分之二都划归为“新小资产阶级”，其数量还超过工人阶级，这种结论显然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实际的阶级结构状况。

2. “新工人阶级”

普朗查斯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进行分析时，将“白领工人”看作是“新小资产阶级”，而法国的马勒、高兹则将其看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马勒、高兹在对“白领工人”的阶级属性的分析中，提出了著名的“新工人阶级”的理论，成为“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3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列宁选集》，3版，第4卷，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工人阶级”的理论最早出现在 50 年代末的法国，是从 1959 年法国《论证》杂志上关于“法国新工人阶级是什么？”的讨论开始的。当时，受“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一些法国知识分子认为，法国社会阶级结构已经有了新的变化，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工人阶级的新的工人阶级。他们认为，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革命和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所采取的社会福利政策，带来了工人阶级队伍的结构、思想愿望的很大变化，出现了“新工人阶级”。这种理论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马勒和高兹。

马勒 1963 年发表了《新工人阶级》一书，对“新工人阶级”的产生、构成、特征及其历史作用作出了全面的论述，成了“新工人阶级”理论的代表作。在该书中，马勒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与这三个时期相应的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发生变化。“新工人阶级”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第三时期，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

资本主义发展首先经历的是原始积累的阶段，马勒称其为家庭或群体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存在的是自产自销自己的产品的许多小企业，每个企业都生产完整的产品并自行出售。同传统的手工业工人不同，这个时期的工人不再占有生产资料 and 他们的劳动产品，原来由手工业工人自己掌握的生产资料和最后产品，被资本家所占有。因此在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要求是夺回被资本家所掌握、控制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恢复原先手工业劳动者对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所有权。这时期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要求，处于蒲鲁东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水平上，相信蒲鲁东的“财产就是偷窃”，要求收回被资本家所“偷窃”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

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原始积累已经基本完成，生产资料集中到相对少数的资本家手中，随着大机器生产的发展，随着

装配线的推广，工人变为随着机器运转的奴隶，福特、泰勒所倡导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生产线，创造了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感受到自己是一个被剥削的无产者，他们不再像资本主义初期那样仅仅要求重新占有被资本家偷窃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而是要求消灭剥削，因此无政府工团主义不能适应这一阶段的工人阶级的要求。为了消除剥削，工人要求参与政治。因此这一时期产生了工人阶级的工会、政党和议会斗争等具有政治性质的工人运动。

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资本高度集中，出现了垄断的总趋势。劳动条件不断自动化和合理化，资本主义进入自动化生产时期。由于生产过程的自动化，传统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界线模糊了，以前在生产线上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现在变成生产过程的监视者。先进的自动化生产技术的需要，产生了一大批工资优厚又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人员，其中最主要的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经过高技术训练的，能够开动、修理复杂机器的高技术工人，一部分是作为机器的发明者的研究单位的工程师，正是这两部分人成为“新工人阶级”，他们不同于传统的工人阶级。

传统的工人阶级由于其悲惨的社会地位，因为其贫困化的生活，因而消除剥削、改变一无所有的状况就是他们的基本要求。而对于“新工人阶级”来说，他们享有优厚的工资和其他的社会福利，在消费领域的基本要求多半能够满足，因此，他们提出的是消费领域以外的要求。最主要的是“新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在生产和企业中的非自主的地位，不能分享对生产资料和劳动过程的控制，因此，他们要求工人的自我管理，反对等级制，恢复已经失去的自主性。与此相应的“新工人阶级”的理论要求，是一种现代形式的工团主义、“群众性的工团主义”，要求工人群众自己管理自己，并拥有对公司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的控制权。

马勒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在生产中

的迅速运用，使得科学技术成为具有决定性的生产力。因此同科学技术知识相联系的“新工人阶级”必然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新工人阶级处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复杂的机械装置的中心，它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快地认识到这个制度的固有矛盾”^①，在变革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占据核心地位。“新工人阶级”不仅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而且由于其活动和工作的客观条件，因此是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卓越的先锋队。

马勒“新工人阶级”的理论提出后，在法国以至于在整个西方引起了一场关于“新工人阶级”问题的讨论。高兹在1964年发表的《劳动战略与新资本主义》（英文版译名为《劳动战略》）一书中，支持了“新工人阶级”的理论，并对“新工人阶级”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讨。高兹是深受萨特影响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力图在存在主义的基础上来对“新工人阶级”进行分析。他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由技术人员、工程师、新闻记者、教师和各种研究人员所组成的“新工人阶级”，有了较为丰富的收入，生活水平已经提高，他们不像传统的工人阶级那样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因此消除剥削、克服贫困并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主要关心的不是薪水，而是工作意义。高兹认为，资本的专政不仅在财产的生产和分配上进行，而且也在对生产的方式、消费的方式、劳动、思维及生活的方式上进行。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言，主要的问题已经不是经济剥削，而是人的异化。激发人们的变革的动力不是来自物质的匮乏，而是来自异化，来自人们对现存的被支配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方式的厌倦，来自人们对一种消除异化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发达资本主义的高度复杂的科学技术的生产过程，提高了受过高等教育的脑力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同时降低了蓝领工人的地位。因

① 转引自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605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此“新工人阶级”就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以脑力劳动者为主的“新工人阶级”，也是被异化的劳动者，他们是受生产过程控制的，要消除异化就要反过来控制生产过程本身，这就要提倡工人的自我管理，通过工人自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等级制，变成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

1968年法国爆发了著名的“五月风暴”，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在运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发挥了突出的作用。马勒认为自己提出的“新工人阶级”的理论以及工人自治的主张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因此进一步坚持并阐发了“新工人阶级”的理论。但是高兹却从对“五月风暴”的反思中，逐步抛弃了“新工人阶级”的理论。他在1972年发表的《劳动分工：现代资本主义中的劳动过程和阶级斗争》中，重新考察了科技人员的属性问题，他指出：认为产业中的科技人员属于生产性、被剥削、被异化的劳动者的范畴是正确的话，那么，认为他们纯粹地是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却是不正确的。高兹现在认为，工程师、高级技术工人以及具有监督职能的劳动者，不仅被委托去设计劳动过程，使生产达到预期的技术标准，而且也在维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等级结构，使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永恒化。在高兹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生产和管理的分工，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技术问题，而且也是一种统治关系、等级关系。科学技术在意识形态上不是中立的，而是融合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分割的。因此科技人员在设计生产过程的同时，也就是在维持现在的等级制、现存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他们在生产过程的作用，就是使体力劳动者服从机器，从而也就是服从资本的统治。因此他们会被体力劳动者（蓝领工人）看作是资本的代理人，他们同体力劳动者的关系就成为等级制的关系，他们处于指挥、组织、控制和监督体力劳动者的地位上，体力劳动者则处于服从他们的地位上。这样，高兹实际上就放弃了将科

技术人员作为工人阶级的“新工人阶级”的理论。他认为在“五月风暴”中，技术人员也参与造反，但并非是作为工人阶级造反，而是反对把他们当作工人阶级来看待。他们在“五月风暴”中，并没有把自己同生产工人融合在一起，而是表现出自己不属于工人的优越感，并没有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产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工人队伍中的各种科技人员的大幅度增加，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分析工人阶级的状况时所没有碰到的。马勒、高兹在分析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状况时，提出了“新工人阶级”的理论，对当代工人阶级的结构作出了新的探索，这对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状况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新工人阶级”的理论之所以会引起那么巨大的反响，原因也在于此。应该说，马勒及60年代高兹对“新工人阶级”的分析是有其合理之处的。比如他们在对“新工人阶级”与传统的工人阶级的不同点作出区分的基础上，仍然将“新工人阶级”看作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这比普朗查斯将“白领工人”划归为“新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更符合实际。当然，马勒和高兹都深受法国的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因此他们对“新工人阶级”的分析是建立在存在主义的基础上的，这就影响了他们的分析的科学性。

3. “非工人的非阶级”

70年代，高兹在抛弃了“新工人阶级”理论后，又在1980年发表的《告别无产阶级》中进一步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的理论，在对“后工业社会”的阶级结构分析中，提出了独特的“非工人的非阶级”的理论。

高兹认为马克思所讲的工人阶级，是按照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来定义的，是按照工人阶级的劳动来定义的。工人阶级是在对物质的改造活动中，亦即在劳动过程中体验到自己的力量

量、地位和作用，意识到自己这一阶级利益的同一性，孕育出自身的阶级意识的。

但是，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的发展，在后工业社会中，劳动已不再是工人自己的活动，而是一种消极的预先安排好的活动，工人完全服从于一架大机器的运转，因此在劳动过程中根本谈不上工人劳动者的首创精神的发挥，劳动本身变成为征服着工人的物化的活力量。工人在这种异化劳动中，丧失了同劳动的同一，因此不再有从劳动中产生的同一阶级的感受，无法在这种劳动中体验到自己的力量、地位和作用。在后工业社会中，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工人从这种劳动中解放出来，变为控制劳动的力量，而是拒绝这种异化劳动、拒绝劳动的本质和内容，不是占有劳动而是废除劳动，只有废除劳动，才能废除一切统治。因此，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关于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主张，在后工业社会的条件下已经丧失其意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工人阶级是在生产劳动中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历史使命，组织成为一个阶级，完成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政权、掌握生产资料的使命。而在后工业社会的异化劳动中，是无法形成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因此现在需要的是拒绝这种劳动的新的社会主体，这个社会主体就是“非工人的非阶级”或“后工业的新无产阶级”。

高兹的“非工人的非阶级”，指的是在后工业社会中潜在地或现实地失业的人，主要包括今天社会生产中的杂工，他们是一些临时工、试用工，只是暂时地部分地受雇佣，处于潜在地或现实地、部分地或完全地失业状态。这些人因为没有固定的职业，没有形成确定的阶级同一性，因此他们算作是“非工人的非阶级”。由于他们是临时工，不可能专注地对待劳动，劳动对他们来说，不再是一种活动，不再是一种职业，临时的劳动、临时的职业对他们的生活来说只是一种边缘性的事情，只是为了维持生活所必须有的的一种临时性的活动。正是这个“非工人的非阶级”才会把劳

动当作一种外在强加的义务，对这些人来说，不是从劳动的经验中，而是从非劳动的经验中，获得自我同一性。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方式使人失去个性，这种劳动限制了个人的自主范围，为此就要废除现存的这种劳动方式。而正是“非工人的非阶级”把这种劳动当作是外面强加的义务来体验，具有“废除劳动”的意识，能够打破现存劳动方式的限制，扩展非劳动的生活，扩展个人自主活动的范围。只有“非工人的非阶级”才是与后工业社会的发展目标相一致的。

高兹认为“非工人的非阶级”，亦即后工业的“新无产阶级”具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特征。其一，它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非阶级”。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被赋予作为一个阶级的历史使命，由此获得了这个阶级的先验的统一性；而“非工人的非阶级”，不过是由那些临时工、杂工所组成，谈不上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阶级，除了组成的人之外，并没有阶级历史使命的先验规定，只是一个“非阶级”。其二，对于“非工人的非阶级”来说，它不但不是依照劳动来定义，不是在劳动中形成一个阶级，这个“非阶级”没有在社会化的劳动中找到潜在力量的任何源泉，相反是在劳动中发现机器的力量和自己的无力，因此厌恶、拒绝现存的劳动。而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是在劳动中被确定了自己的地位和使命的。

高兹认为，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大大缩减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果人们的消费只是要满足衣食住的基本需要，那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每天劳动两小时就可以满足社会的基本需要。这样就为所有的人创造出大量的自由时间，个人就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地去活动，可以主动地实现自己的创造性的欲望，自己动手劳动创造出自己需要的物品，自己演奏音乐，而不是聆听别人的演奏，自己参加运动而不是观看别人的运动。总之，后工业社会的革命目标，就是限制经济和政治的必然性领域，扩展个

人的自主领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把劳动变成了一种异化劳动，使人失去个性，失去个人的自主活动，后工业社会的革命就是这种劳动的废除，就是时间的解放，使人能够获得个人自主活动的时间，在高兹看来，只有“非工人的非阶级”才是与后工业社会革命的发展目标一致的，只有“非工人的非阶级”才是后工业社会革命的主体和动力。正是这个“非阶级”有废除现存的劳动方式的要求，传统的工人阶级的否定性已经转移到了“非工人的非阶级”的身上，并且获得了一种更为激进的形式。如果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是要将自己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进而成为劳动的新主人的话，那么现在的“非工人的非阶级”则是要拒绝、废除这种劳动，扩大个人自主活动的领域。因此“非工人的非阶级”就是一种代表着后工业社会的革命方向的力量。“由今天的社会的分解所产生的非阶级，只能设想它是其预示的非社会。当然非阶级不应意味着没有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而是被用来意指社会领域中扣除一个在经济合理性和外部强制的彼岸的个人主权领域的过程”^①。这个个人主权领域，就是个人自主活动的领域，这个个人的自主活动是同经济目标、功利无关的自由活动、个人创造、美学享受、热爱生活的个人自主活动，“非工人的非阶级”就预示着这样的社会生活。

“非工人的非阶级”是高兹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时所提出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概念。由于工业自动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计算机的广泛运用，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确实存在着—支失业、半失业的队伍，欧美不少发达国家都为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难题所困扰。高兹提出的“非工人的非阶级”的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一理论对我们观察分析后工业社会的阶级结构无疑具有启发的意义。但是“非工人的非阶级”的理论，是

^① A. Gorz, *Farewell to Working Clas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2. 75P.

高兹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后提出的，是建立在存在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它就不可能对“非工人的非阶级”作出科学的分析，而带有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高兹关于后工业社会的革命目标的设想，具有浓厚的乌托邦的色彩，与这个乌托邦相联系的新的革命主体“非工人的非阶级”，也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高兹想以它取代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作为后工业社会的革命主体，只能是一种空想。

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进而对当今西方社会的阶级关系重新进行考察，提出了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的新观点。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有关理论特别突出，让我们看看他们的观点。

1. 阶级对立关系的消除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关系已经消解，原因是剩余价值学说的过时和国家干预的加强。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的理论是建立在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的。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在于他们无偿地占有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是工人创造的劳动价值的一小部分，而其中的大部分是被资本家无偿地占有，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正是其利润的来源。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所在，从而揭示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利益上的根本对立。马克思主义认为源自于经济利益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是无法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内得以调和的，要消除这种阶级对立，就要消除产生这种对立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却认为，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由

于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已经过时，因此建立在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的阶级对立的理论已经不适用了，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的关系已经消解。

按照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观点，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自动化生产水平的提高，机器(死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剩余价值主要的不是工人的劳动创造的，而是科学技术、机器本身创造的。因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已经不适用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否定了剩余价值学说，势必否认建立在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既然剩余价值主要的不是工人的活劳动创造的，那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也就不存在了，从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也就过时了。

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且正确地把科学技术看作当代社会的第一生产力。但是他们由此否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进而否认源于经济利益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的观点却是错的。因为，不管自动化生产如何先进，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有多大，再先进的机器和技术总是劳动的产物，是劳动赋予其价值的。资本家占有先进的机器，但是再先进的机器也总是需要人操作的，仍然是雇佣劳动者的活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科学技术的进步本身并不能使得剥削自动消失，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依然存在的话，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事实是不会改变的，那么根源于经济剥削的阶级对立同样是不会消失的。

法兰克福学派又从国家干预职能的增强来论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对立的消失。哈贝马斯认为国家的干预作用的加强，也能够起到平息阶级对立的作用。他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日益干预经济生活，现在国家不仅要考虑到资本家中的不同派别的各种利益，还必须考虑到居民的普遍利益，并且把居民的利益维持在必要的程度上，为此国家就要直接调节分配领域的矛

盾，以确保依靠工资为生的民众对现存制度的忠诚。通过国家对普通民众的补偿，来缩小分配上和消费上的阶级差别，满足民众对经济利益的要求，这又使得源于经济利益的阶级对立的关系得到消除。按照哈贝马斯自己的说法，这样就使包含在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冲突，较大可能地潜伏起来，退隐到其他冲突之后。既然阶级冲突潜伏了，那么能够从政治上组织起来的阶级斗争的可能性，毫无疑问地就不存在了，因此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范畴就不再能够适于今天的情况。但是，哈贝马斯又承认，国家的干预作用的增强，并不意味着阶级对立的完全消失，阶级间的差别继续存在，但那只是源于集团的文化传统形式、生活水平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它不能被看作马克思主义意义上那种社会学、经济学的阶级对立。阶级对立关系的消除或者说潜伏，使得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从原先阶级对立引起的革命危机，转变为一种“合法性危机”。

哈贝马斯的学生奥菲，在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机制的分析中，也认为现代国家具有一种掩饰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将国家活动的阶级性质掩盖起来，而且国家采取掩饰机制时，它就可能采取不利于个别资本家，而表面上有利于民众的政策，通过这种政策满足民众的某些利益要求，从而起到平息阶级冲突的作用。马尔库塞则直接指出，国家是一个蒙蔽人的事物，它力图将自己打扮成是服务于整个民族的，从而达到模糊阶级对立的界线的目的。除了法兰克福学派以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流派的一些理论家，如普朗查斯、米利班德等也都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加强国家的干预职能，能够满足无产阶级的某些经济的要求，从而达到消除阶级对立的目的。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职能的加强，为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冲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应该说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没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

理论家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夸大了国家干预职能在消除阶级对立关系中的作用，比如哈贝马斯就认为国家的干预使阶级对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消失了，因此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理论就过时了，这显然言过其实。当代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能够起到缓和阶级冲突的作用，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中它是无法真正消除阶级对立的。连哈贝马斯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无法完全否定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冲突，而是认为国家的干预使阶级对立处在一种潜伏的状态，是一种“潜在的冲突”。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的关系已经消失，阶级冲突已经平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过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从根源于经济利益、阶级剥削的阶级冲突转变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冲突、文化的冲突。所以，法兰克福学派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基本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批判的社会理论一开始就把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作为自己首要的研究任务。在他们看来，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不合理，已经不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不是工人阶级的日益贫困化，而在于文化对大众意识的控制，在于这种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文化，使得大众丧失了否定性和批判性，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主要是一种“合法性危机”、“文化危机”，而不是由阶级对立的关系所引起的危机。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就不是根源于阶级对立的革命，而是要求摆脱现存的生活方式的意识革命，革命的主体不是要求推翻资产阶级的剥削的无产阶级，而是那些对现存生活方式不满的流浪汉、嬉皮士、青年学生。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已从阶级对立的矛盾化解为生活方式、文化意识的矛盾。

2. 工人阶级一体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普遍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冲突

已被消除，阶级斗争已经平息，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已经消失，两者已经融为一体，而这种融合是以无产阶级丧失自己的革命性、否定性为前提的。最能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观点的是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工人阶级一体化”的理论。

马尔库塞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的分析中，提出了“工人阶级一体化”的问题，它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的一个非常突出并且有巨大影响的理论，所谓“工人阶级一体化”指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已不再具有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革命性、否定性，他们已经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同化、所融合。

马尔库塞关于“工人阶级一体化”的理论，是建立在它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是单向度的社会的分析基础上的。他认为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无对立面的社会”，“工人阶级一体化”正是“无对立面的社会”的一种表现，发达工业社会导致一个统治和协作的体系，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在这种体系中，在这种方式中，一切相对立的力量得到了调和，一切能导致不同制度、不同生产过程的新方向，一切能引起人类生活的新方式的质变，亦即一切的社会变化，在单向度的社会里都得到遏制。发达工业社会中“普遍赞同国家目标，两党政策，多元论的衰落，在强大国家内部劳资双方的串通，这一切都证明了对立面的一体化”^①。

在这种对立面已经消失了的单向度社会，原先资本主义社会里针锋相对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已经不再像先前那样对立、矛盾着。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仍然是基本阶级，“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两个

① [德]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阶级的结构和功能，致使它们不再像是历史变革的动因。一种维护和改善制度现状的凌驾一切的利益，在当代社会最发达的地区把以前的对手联合了起来”^①。劳资之间已经逐渐同化。马尔库塞以美国为例，说明了资方与有组织的劳工之间的勾结和联盟，他引用了民主制度研究中心1963年出版的《劳工看劳工：对立》一书中对这种情况的描述：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工会在它自己看来，与公司几乎无甚区别。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象，工会与公司共同进行院外活动。当工会与公司为更大的导弹合同而进行院外活动，并力图把其他国防工业也纳入这一地区时，或者当工会与公司怀着碰巧能签订什么合同的希望，共同奔赴国会，共同要求生产导弹，而不生产炸弹，或者要求生产炸弹而不生产导弹时，工会将不能使制造导弹的工人相信他们为之工作的公司是一个工贼集团。^②这样代表工人的工会与作为资本家的公司，是在为共同的目标和利益而共同奋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已经一体化了。

马尔库塞认为工人阶级同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体化，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 生产劳动方式上的一体化。原先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是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为明显特征的，如今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自动化生产的普遍推行，传统的工人正逐渐摆脱繁重的非人的体力劳动，这样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原来资本家作为脑力劳动者、工人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差异消减了，生产劳动方式已经一体化。当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没有改变异化劳动的性质，而是一种新的奴役和统治，但是主要已经不是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现在工人和主人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主人和奴隶之间的辩证关系。主人和奴隶都封闭在内的恶性循环，在当

^① [德]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② 参见上书，1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今的生产劳动方式内，不但工人阶级作为个人，而且统治者作为个人，都已经成为社会机器的一个零件。作为个人，统治者和工人、主人和工人，大家一样在生产过程中被机器、技术所控制，所统治。

(2) 物质利益上的一体化。原有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互对立的物质利益，两大阶级的对立是源自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马尔库塞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没有克服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但是在发达工业社会的经济生产过程中，却存在着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相互依存的趋势，公司或工厂的发展不但关系到资本家的利益，而且也直接关系到工人的利益，公司的生产搞得好对资本家和工人都有利，因此工人也能关心企业的发展，积极参与管理，参与生产问题的解决。

(3) 生活方式的一体化。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生产的发展，社会提供的产品越来越丰富，全社会都过上了富裕的物质生活，生活水平都获得了提高。在富裕生活的条件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生活标准、闲暇活动、各种生活愿望的需求方面都趋向于同化。“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所，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像她的雇主的女儿一样花枝招展，如果黑人挣到了一辆卡德拉牌汽车，如果他们都读同样的报纸，那么这种同化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那些用来维护现在制度的需求和满足在何种程度上被人民所分享。”^①虽然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体化，并没有消灭阶级，但是当工人劳动者享有与资本家同样的需要和满足时，他们对现存社会的反抗意识、否定意识必然就降低了。

(4) 意识形态上一体化。由于生产劳动方式、物质利益和生活方式的一体化，必然导致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上同资本主义社

^① [德]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会的一体化，原有的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丧失了，满足于现有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丧失了否定的、批判的、革命的意识，从而变成为与资本主义社会相一致的“单向度的人”，这使工人阶级不再能够成为否定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力量。

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还从现代的生产劳动过程中对“工人阶级一体化”产生的原因作出了具体的分析。即，第一，机械化使花费在劳动中的体力的数量和强度日益减少；第二，在职业分层中进一步显示出同化趋势；第三，劳动特点和生产工具的变化，改变了劳动者的态度和意识；第四，新技术的劳动方式迫使工人阶级的否定立场日益衰弱。

马尔库塞的“工人阶级一体化”的理论是有其合理之处的。他是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激烈否定，来阐述工人阶级的一体化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制度、生产过程、生活方式，是对工人阶级的新的奴役和统治，用他的话来说是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它使无产阶级丧失了否定性、革命性，扭曲了他们的心灵、意识，使他们成为单向度的人。这实际上是马尔库塞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控诉和批判。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一体化”的理论，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丧失，因而无法起来革命，这一深受卢卡奇等人的阶级意识理论的影响的观点，有其合理之处，是值得深思的，一个缺乏革命意识的阶级是不会有革命的行动的。

客观地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确实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但是是否像马尔库塞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所认为的那样，由于“工人阶级一体化”，工人阶级已经被资本主义制度所融合，从而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消失了，阶级冲突平息了？诚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已大大提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距正在缩小，白领工人的数量正在增加，这些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否能由此推论出工人阶级已经被完全融

合，完全和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了呢？今天，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的改善，消费水平的提高，并没有能改变无产阶级受雇佣的地位，并没有消除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依然存在，他们仍然在榨取着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这正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根源所在，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没有变，只要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依然存在，只要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依然存在，那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就无法真正消除，也就谈不上“工人阶级的一体化”。

第四章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 性质、结构和职能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国家理论

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国家职能、国家机构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和特征。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国家的经济职能的扩大与增强，与此相应，国家的权力扩大了，政府的机构膨胀了，而议会的权力却削弱了，传统的三权分立的平衡逐步被打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新的分析和探讨，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这一学说具有强烈的反对教条主义的倾向，他们中的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已经被第二国际的教条主义所歪曲，有些人则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他们试图根据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变化，重新解释和“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既不系统地探讨国家的起源和本质，也不系统地探讨历史上各种类型的国家的制度、职能及其发展，而是集中于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批判。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主要涉及的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结构和职能等问题。

一、现代国家的性质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西方发达国家的权力、职能、机构、制度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国家的阶级性质并没有改变，它们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国家权力仍然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国家的根本职能仍然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国家机构与制度上的变化是资产阶级为了适应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阶级结构的变化所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在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上，正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一般都否认国家具有阶级统治的性质，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大唱赞歌，将其视为自由民主的典范，视为“政治现代化”的唯一模式。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般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批判性的态度，他们中的多数人认为现代国家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有的人还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质，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和分析，最为著名的是普朗查斯对国家阶级性质的结构主义分析和米利班德对国家阶级性质的工具主义的分析。

1. 对现代国家阶级性质的结构主义分析

普朗查斯运用结构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重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质作出了独特的分析。从1968年至1978年的10年期间，他就发表了《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法西斯主义与独裁》、《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阶级》、《独裁的危机》和《国家、权力与社会主义》等有关阶级和国家问题的重要著作，在西方政治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普朗查斯是站在结构主义的立场上，去研究社会、研究国家的。他把社会看作是一种由各种要素组合成的结构整体，这种结构整体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各种部门组合而成，国家就是这个结构整体中的政治部门，因此必然要从整体中去理解国家，

从整体的各个部门的结构中去把握国家，弄清楚国家在结构整体中的地位 and 职能。普朗查斯认为，在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部门结合起来的整体中，经济部门这个环节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但却并非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并非是一种直线性的决定关系。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各个部门是相对独立的，各自能起决定其他部门的作用，是一种多元决定论。

在普朗查斯看来，在社会的复杂整体中，“国家是调合一个社会形态的统一因素”，“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概念的原意，即国家是一种社会形态的‘秩序’或‘组织原则’；但这并不是指现代意义的政治秩序，而是就它能够起着—个复杂的统一体的所有各个方面调合的意义而言，并且是作为调节这个体系综合平衡的因素而言”^①。国家作为社会形态的统一因素，起到一种调合作用，维持社会形态的统一平衡。但是这种调合作用并非是中立性的，国家是由一定的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它的调合作用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国家机构的主要作用是通过集中和批准阶级统治，并由此复制社会关系，即阶级关系来维持—个社会形态的统一和团结。”^②就是说，国家的调合作用，是维护统治阶级所需要的那种社会形态的统一，维护现存的阶级关系、阶级统治，从而具有阶级的性质。

普朗查斯着重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发挥自己的调合作用，从而维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统一的。无论是奴隶制国家还是封建制国家，都是通过公共法则，通过各种等级制度，从制度上公开固定阶级奴役的结构，对被统治阶级加以限制，使其处于从属的被统治的地位，奴隶制、封建制国家以公开的政治制度的形式来维持各自的社会形态的统一。而资本主义国家同奴隶制、

① [希]普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3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② 蔡声宁主编：《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问题》，81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封建制国家不同，“在这种国家体制里总是没有建立起政治上的统治。它本身就代表一种大众阶级的国家”^①。“资本主义国家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即在其实际机构中无论哪里都不会有这种严格的政治统治形式，也就是以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形式出现。在这种国家机构中，一切行事看来都好像并没有阶级‘斗争’存在。”^②资本主义国家恰恰是通过似乎没有阶级统治的形式，来达到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来起到一种统一的、调合的作用。那么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普朗查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经济领域中，一方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另一方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双方形成了一种对立的阶级关系，存在着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结构，却能够把阶级关系掩盖起来。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关系中，大家都表现为个人主体，而丧失阶级成员的身分，这样就把经济领域中的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变为孤立的个人。在资本主义政治、法律制度中，每个人都以自由平等的公民的身分出现，国家则声称自己代表了全体人民。但是事实上，当国家作为全体人民的代表出现时，并没有让被统治阶级分享政治权力，相反却通过自由平等的政治体制，向被统治阶级隐瞒了自己的阶级特性。国家通过政治、法律制度，一方面将经济生产过程中劳动者阶级个人化了，另一方面又将这些个人在政治领域中重新组织起来，当然不是作为工人阶级被组织起来，而是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被组织起来，这时候工人们已经被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所同化，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民，完全个人化了。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样的政治法律制度中表现出瓦解被统治阶级的职能。

^{①②} [希] 普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129、20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普朗查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己的政治制度瓦解了被统治阶级，与此同时却把资产阶级组织成为一个统治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是要从政治上瓦解被统治阶级，而与此同时却从政治上来组织统治阶级；防止被统治阶级在国家中心作为阶级出现，但导致统治阶级在那里作为阶级出现”^①。资本家在经济领域中是相互竞争的，他们各自都会为私人的利益而牺牲整个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们自身无法把自己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唯有通过国家才能建立自己的政治统一，把自己组织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资本家本身是分裂的，相互竞争的，而资本主义国家以“国民大众国家”的面目出现时，能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将经济上竞争的资本家组织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

资本主义国家以国民大众的国家的面目出现时，能够起到瓦解被统治阶级、组织起统治阶级的双重作用，从而起到维持现存的社会关系的作用，起到一种统一、调合的作用。

普朗查斯虽然承认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但是他从结构主义的理论前提出发，强调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否认国家是统治阶级的简单工具的观点。在早期的《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中，他就提出国家的权力关系实质上是一种阶级关系，国家机构自身严格说来是没有任何权力的，而是阶级的权力被组织在国家机构中，“国家权力并不是一台机器，并不是一种工具，并不是各个阶级都可以觊觎的一种简单的目标；国家权力也并不是分成为各个部分，这些部分如不归这一部分人掌握，就会自动地落入另外一些人的手里”^②。这实际上蕴含着否认国家本身是一个自身具有权力的实体的思想，到后来则进一步发展为国家本身只是一种关系的思想。

^{①②} [希]普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205、32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在《现代资本主义中的阶级》中，普朗查斯指出：“国家不是拥有内在的工具性质的‘实体’，它本身是一种关系，更准确地说，是集中起来的阶级关系。”^① 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国家、权力与社会主义》中又说：“不应把国家看作是像资本那样的一个固有的实体，倒不如说，它是各种权力之间的一种关系，或者更精确些说，它是阶级和阶级派别之间的关系的物质凝聚，以一种特别的形式表现在国家之中。”^② 国家不是实体，而是一种关系，是一种集中起来的阶级关系，因此国家本身充满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国家是阶级矛盾集中的场所，是阶级斗争的战场。从这种观点上看，“国家政策的制定必须被看作内在于国家结构中的阶级矛盾的产物”^③。国家政策既不是统治阶级把自己的意志简单地强加于国家这个工具的结果，也不是国家本身的绝对自主的权力产生出来的结果，而是内在于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结果。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内在于国家之中，“阶级矛盾正是国家的要素，……国家的政策也就是阶级矛盾在国家中作用的结果”^④。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场所，国家政策的制定就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结果，在这个战场上，谁取得了优势，谁就会制定有利于自己的阶级的政策。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中，普朗查斯是最为重视国家与阶级问题的思想家，他运用结构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进行了独特的分析，说明了现代西方国家是如何以国民大众的国家的的名义，起到瓦解被统治阶级，组织起统治阶级的作用，并进而提出了国家是阶级关系的凝聚，是阶级斗争场所的观点。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需

^① 蔡声宁主编：《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问题》，81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②③④} N. Poulantzas.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128~129, 132P.

要指出的是，他在对国家阶级性质的结构主义分析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的著名观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将留待后面作进一步的考察。

2. 对现代国家阶级性质的工具主义分析

米利班德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国家理论在欧美被称为工具主义的国家理论。普朗查斯从结构主义的立场分析了现代国家的阶级性质，而米利班德则从工具主义的立场对现代国家的阶级性质作出分析。

米利班德指出，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种种政治理论，不管它们之间的区别有多大，但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国家是代表着社会整体，站在利益集团和阶级之上，保证各种利益集团和阶级之间的竞争得以有秩序地进行。米利班德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国家不可能是各个阶级的共同托管人，不可能代表社会整体。虽然社会上各个阶级利益存在着恰好相合的情况，但从本质上看各自的阶级利益是不可调和、相互冲突的，国家不可能是各个阶级的共同托管人，它总是偏袒统治阶级的利益。他认为，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活动的集中，引起了大公司的经营管理专业化的日益发展，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日益明显，但这种变化并没有带来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根本变化。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仍然贫富悬殊，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并没有推翻贫富不均的事实，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依然存在。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和冲突中，国家并非各种利益集团的公正裁判者，而是偏袒者，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旧秩序的保卫者，维持的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布局。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的性质。

米利班德从下列三个方面说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会为资产阶级服务，说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会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

第一，从国家的领导成员的阶级性质看，资产阶级的成员占据了国家系统中的行政管理、立法、司法、镇压机关的重要位置。“在国家系统中控制着所有指挥权的那些人，就他们的社会出身、教育和阶级地位来说，大部分甚至占压倒优势的是来自实业和财产界，或者是来自于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员。这里必须强调指出，不仅是在依靠委任的那些国家部门，如行政管理机构、军队、司法机关，而且在那些依靠普选和竞争的经常变化的政治部门，在其他领域占人口大多数的下层阶级，总是处于一种十分可怜的地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着这样的基本事实：绝大多数的男女在社会冲突中，是受那些具有经济上社会上的优势地位和相对疏远的阶级所控制、代表、管理、裁决和指挥的。”^① 米利班德认为，国家权力是通过国家机构的权力体现出来的，资产阶级的成员成为了各种国家机构的领导人，也就是掌握了国家的权力。他还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来说明这一点。比如在美国，20世纪前50年，内阁成员的60%是属于资本家的那些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是政治领导人，而且各种高级文官、军队、警察的领导人、高级法官大多是来源于中上层的社会阶级。由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官制度，出身中下层阶级的那些人也有可能进入国家系统中的精英位置，但这并不表明资本主义国家领导成员性质会有所改变，因为那些从中下层补充进国家系统的人，一旦进入这种体系就很容易被资产阶级所同化，成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属于资产阶级的那些人掌握着各种国家机构的领导权力，他们由于共同的社会背景和出身、教育、社会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关系，从而形成了一系列的共同的、思想、立场、态度和价值观念，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比其他任何制度都要优越，因此就会

^① R. Miliband.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66~67P.

设法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为资产阶级服务。

第二，资本家阶级凭借着自己的经济权力，凭借着对经济和其他资源的占有和控制，能够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资本主义的企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疑能够成为最强大的“压力集团”，资本主义企业对经济上的控制及其由此所拥有的力量，是政府无法抗拒的。企业的状况会带来经济的增长，使政府得到利益，政府制定政策不能不考虑到企业，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经济巨头，“这些强大的联合企业显然必定成为政府的重要衡量标准”^①。特别是现在这些强大的资本主义联合企业有许多是多国公司，所以政府在作出决定的过程中如果会涉及这些多国公司时，它就除了考虑多国公司本身的利益外，还得仔细考虑到与多国公司有牵连的其他国家及其国际机构、国际联合组织的态度。这就意味着资本家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的政策制定施加更多的压力和影响，资本家的企业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最强大的“压力集团”，能够影响政府制定出有利于自己的国家政策。

第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经济自身具有一种“结构性的”强制力，对政府行为具有约束力。米利班德指出：“国家是附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面的”，“国家的性质是由生产方式的性质和要求决定的。任何政府都不能忽视也不能逃避这种‘结构的强制力’，不管这些政府是什么情况、有什么愿望和做过什么许诺，资本主义的经济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对这一点任何政府迟早总要屈从，而且往往较早就屈从了”^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结构本身具有一种强制力，就像一种客观的非人格的力量，政府的行为不能不受这种强制力的影响和制约，使得政府无法完成自己的意识形态的目标。有的政府在上台前许诺要进行深远的改革；但一旦政府通过竞选上台后，却无法实现自己许诺的

①② [英]米利班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77、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改革计划，那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的运作的客观制约，使它无法实现诺言。这种生产方式的结构强制性，迫使政府只能按符合资本家的意愿、符合现有生产方式的正常运作做出自己的决策。

米利班德认为，要对为什么国家会成为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的工具的问题做出充分回答，上述三个方面的解释都是需要的。在1969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中，他说明了资产阶级不但是统治阶级，而且对国家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此，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质的分析被称为一种工具主义的分析。但是，实际上米利班德与普朗查斯一样，反对把国家仅仅看作阶级统治的工具，主张国家的相对自主性。

3. 国家的相对自主性

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中的一个独特而又重要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的一个重要“修正”。这种观点认为，国家虽然具有阶级统治的性质，却并非是阶级统治的简单工具，而是具有相对自主性。提出这种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普朗查斯、米利班德和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的奥菲。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这一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国家具有阶级统治的性质，是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掌握了国家机器的统治阶级，利用并操纵国家机器为自己那个阶级谋利益，并且损害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普朗查斯、米利班德一方面承认资本主义国家具有阶级统治的性质，另一方面却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为此提出了“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观点。什么是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呢？他们认为一方面，国家是以阶级统治为基础的，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另一方面，国家又是相对自主于或相对独立于统治阶级的。在国家与统治阶级的关系上，国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但是这种自主性又是相对的。如果国家是绝对自主的，它就完全

超脱于阶级之外了，就不再是统治阶级的国家了。国家既不是绝对的自主的独立主体，又不是没有自主性的简单工具，而是具有相对的自主性。这就是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的基本含义。

普朗查斯和米利班德都认为，“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普朗查斯在《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中，米利班德在《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中，都列举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波拿巴主义”的分析，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是把法国的“波拿巴主义”看作是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的一个实例。普朗查斯还引用了恩格斯这样的一段话：“我愈来愈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直接进行统治的能力，因此在没有一个英国那样的寡头政治为了得到优厚报酬而替资产阶级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地方，波拿巴式的半专政就成了正常的形式；这种专政维护资产阶级的巨大的物质利益，甚至达到违反资产阶级的意志的程度，但是，它不让资产阶级亲自参加统治。”^①按照普朗查斯的理解，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就是波拿巴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波拿巴式的专政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但是它却会违反资产阶级的意志，甚至不让资产阶级参加统治。显然，波拿巴主义的国家是相对自主于资产阶级的。但是他们两人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把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看作是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现象，看作是各个阶级力量处于均衡的特殊条件下的一种特性，换句话说，阶级力量处于均势的状态下，国家才具有相对于统治阶级的自主性。普朗查斯和米利班德都认为，相对自主性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特征，它并非只是在阶级力量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出现的特有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国家同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之间的一般关系的模式，也就是说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相对于资产阶级的相对自主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1卷，2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资本主义国家具有相对的自主性，那么它就不是完全为统治阶级所左右，它有时会违背统治阶级的利益，也会满足被统治阶级的某些利益要求。问题在于，国家既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它又为什么会相对自主于统治阶级呢？为什么也会违背统治阶级的利益呢？普朗查斯区分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并不直接代表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是代表它们的政治利益”^①。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但是它并非直接服务于资产阶级一时的经济利益，而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在于掌握国家的政治权力，从而通过国家机器维持现存的社会关系，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有了现存的社会关系，资产阶级就终究能够依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获得经济利益。这是资产阶级通过维持自己的政治利益，维持现有的社会制度，最终达到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不是直接地维护自己的一时一事的经济利益。为了更好地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国家就必须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国家有时候就可能会损害、牺牲统治阶级眼前的直接的经济利益，而对被统治阶级作出一些让步。资本主义国家对某些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作出让步时，虽然可能限制统治阶级的某些经济利益，却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的。当国家给予被统治阶级一定的经济利益的时候，其目的正是要从政治上瓦解被统治阶级，换取被统治阶级对现存国家的支持，从而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和国家机器不受到损害。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限度内它能够满足被统治阶级的一些经济利益。此外，它能够在使其政治权力不受影响的条件下做到这一点”^②。普朗查斯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政策的，

^{①②} [希]普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287、20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这种政策满足了被统治阶级的一些经济利益，与此同时也就保证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和统一，从而保证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福利国家”正是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的一种形式，“福利国家”虽然会满足被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却永远不会给它政治利益，虽然会损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却永远不会损害它的政治利益，并且恰恰是为了它的政治利益。从结构主义的立场出发，普朗查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是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结构有关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环节与经济环节是相对分离的、相对独立的，“国家对政治上的统治阶级或派别的相对自主性是资本主义形态中各个环节相对自主性的反映”^①。

与普朗查斯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不同，米利班德运用经验主义的方法论证了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如前所述，米利班德从国家的领导成分的成分说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质，属于资产阶级的那些人占据了国家机构的位置，控制了国家权力，因此他们总会偏袒资本家的利益，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尽管如此，米利班德也像普朗查斯那样，反对把资本主义国家简单地看做资产阶级的工具，而主张国家具有相对的自主性。既然资本主义国家权力是由资产阶级掌握和控制的，它为什么又会相对自主于资产阶级呢？米利班德区别了直接掌握了国家权力的统治者和经济活动领域的资本家。虽然直接掌握了国家权力的统治者是为资本家谋利益的，但是他们毕竟不等于就是资本家，他们对本阶级的利益的看法与资本家对自己的阶级利益的看法是有区别的。“资本家主要关怀他们自己的具体的经济领域，并且作为资本家，要听命于他们所控制和管理的资本的迫切要求（或者是他们认为的迫切要求）。大臣们、民政机关和其他机构公务员必须看得远一些，他

^① [希] 普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28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们所关心的事项各不相同……可能需要办一些为大部分甚至整个资本家阶级所不乐意的东西。”^① 这就是说，资本家往往看到的是自己眼前的经济利益，而作为资本家的代表的国家的那些人则要着眼于这个阶级的全局的长远的利益。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国家也并非都是推行当时的资本家赞成的政策，相反，国家也可能推行一些与当时的资本家的利益相左的政策，国家不是简单地服从资本家的一时的经济利益的要求，从而表现出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法兰克福学派的奥菲也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问题作出了分析。奥菲是哈贝马斯的学生，他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结构和机制有着精湛的分析。他区分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三种选择机制：其一是消极选择，即从国家活动的系统中，排除掉反对资本家利益、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对抗的政策、方案；其二是积极选择，国家在消极选择的基础上，选择那些有利于整个资本家利益的政策、方案，而不是选择仅仅有利于个别资本家集团的狭隘利益的政策、方案；其三是掩饰选择，国家从那些有利于整个资本家利益的政策、方案中，选择那些具有超阶级的外观，能够掩饰阶级性的政策方案，以维持国家在表面上的中立性。按照奥菲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选择机制的分析，国家也不是简单地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的，通过积极选择、掩饰选择，它选择的并非有利于每一个资本家的政策方案。国家的积极选择、掩饰选择，正是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的表现，而并非是直接听命于资本家的工具。

我们已经概述了普朗查斯、米利班德和奥菲等人的国家相对自主性观点。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观点呢？本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职能大大地增强了，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推行“福利国家”政策。国家积极干预社会的经济生活，举办

^① [英] 米利班德：《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各种社会保险，缩短工人的劳动日，改善劳动条件，推行一系列的社会福利制度，从而改善了劳动群众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满足了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在经济利益上的一些要求。“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的理论就是产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的。由于福利国家的出现，许多资产阶级学者认为，国家的阶级性质已经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已经过时，资产阶级正统的理论家一般不承认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质，否认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而普朗查斯、米利班德和奥菲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却仍然认为国家具有阶级统治的性质，并试图通过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的理论，来说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如何为资产阶级服务，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的客观现实。在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的理论中，普朗查斯注意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区别，米利班德分析了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与经济领域的资本家的区别，奥菲则分析了国家制定政策的选择机制，从而说明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现代国家，为什么也会损害个别资本家的经济利益，会满足劳动群众的某些利益要求，这就更深入地说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为资产阶级谋利益，它有助于我们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这就是它的合理价值所在。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用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来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则是完全错误的。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的观点，并没有、也不可能驳倒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事实上，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并不丝毫减少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的性质。即使按照普朗查斯、米利班德自己的看法，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归根到底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统治的，甚至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必要条件，那么相对自主性不过是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一种具体形式。换句话说，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使得国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独立性，使得它能够更好地为资产阶

级谋利益，归根到底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所左右，那么它就不能不是阶级统治的有力工具。

二、现代国家的结构

“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现代国家的结构，不是传统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结构，不是研究国家整体与部分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实际上，从葛兰西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概念，比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国家的概念是大大地扩展了，因此在分析现代国家结构的时候，葛兰西认为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而阿尔都塞沿着葛兰西的这一思想进一步做出了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相结合的国家结构分析，这就把传统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组织，如学校、教会、工会等社会团体都看作是国家结构中的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学派，则把对国家结构的分析，扩大到社会的一切方面，提出了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理论。

1. 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

被看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之一的葛兰西，最早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结构作出新的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危机，各种矛盾更加尖锐，俄国的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而从1918年到1923年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起义和革命却失败了。为什么俄国的十月革命能够成功，而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却相继失败了？葛兰西通过认真的思考分析，发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结构与俄国不同，由此引发了他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结构的考察。与俄国这个落后国家的不同在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一个稳固的市民社会，正是这个市民社会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基础，为此他提出了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著名公式。

通常人们只是把国家理解为政治社会，理解为政治机关及其制度，而葛兰西则认为国家也包括了市民社会。在《狱中札记》中，他提出了独特的国家概念，认为“国家的一般概念中有应该属于市民社会概念的某些成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冑的领导权）”^①。这就超出了原有专指政治社会的国家概念的那种涵义。他甚至说：“市民社会也是国家，并且不仅如此，市民社会恰好构成国家。”^②显然，葛兰西所说的国家结构，既包括了政治社会，也包括了市民社会。

从政治社会的角度看，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包括国家中的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等等，统治阶级要运用国家机器，实行暴力专政，进行强制性的政治统治。葛兰西并不否认国家是强制性的统治，并没有忽略国家结构中的政治社会的一面。但是，他却注意到了被人们所忽略的一面，亦即国家结构中的市民社会的一面。他认为统治阶级在运用国家机器，实施强制性的同时，也要控制市民社会，国家的强制性统治，要求有一个同意这种统治的市民社会作为补充，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支配的市民社会构成支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基础。

葛兰西所使用的市民社会的概念同传统意义的市民社会的概念有所不同。“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是18世纪产生的，“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③。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沿用了市民社会的概念，它指的是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当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形成的时候，就以“经济基础”的科学概念，取代了市民社会这个术语。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市民社会的关

①②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222、2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系是属于经济基础的，而葛兰西则认为，市民社会具有作为上层建筑、作为国家的某些成分。在他看来，可以在两个层次上确定上层建筑，一个是政治社会，另一个就是通常称为“私人的”领域的市民社会。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葛兰西，都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理解资本主义的关键性因素。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注重的是市民社会的物质关系对国家的决定作用，而葛兰西则注重于市民社会的思想文化在一个国家中的重要作用。

葛兰西不仅把国家的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看作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把市民社会中的各种组织团体看作是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教会、工会、学校等市民社会的团体，“它们总合在一起构成统治阶级政治的或文化的领导机关”^①。“现代民主制度的坚强机构——作为国家各种组织和公民生活中团体组织的复合体。”^②这也就是说现代资本主义的民主制是由国家的各种组织机关和市民社会的各种团体所构成的。

在葛兰西看来，政治社会的特征是强制，而市民社会的特征是同意。“这个市民社会的活动既没有制裁，也没有绝对的‘义务’，但是习惯、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道德等方面产生具体影响，并且能达到客观的结果。”^③市民社会形成了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道德习惯，使人民大众同意现存的统治。正是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支配的市民社会构成了支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支柱，国家的政治机器的统治，需要有一个同意这种统治的市民社会作为补充。政治社会体现了国家的强制性的特征，而市民社会中形成了政治统治所需要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道德习惯，可以达到国家通过强制性的统治所要达到的效果，维持现存的统治。市民社会是通过人民的同意，从而形成国

①②③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217、192、1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家统治的基础。葛兰西所说的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也就是等于说国家是强制+同意，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依靠政治社会的强制，也依靠市民社会中的人民的同意来进行统治。

葛兰西具体分析了东西方的国家结构的不同，“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初生而未成形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调整的相互关系。假使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面。国家只是前进的堦壕，在它的后面有工事和地堡坚固的链条”^①。这里葛兰西使用的是传统意义的专指国家政权的国家概念。在葛兰西看来，东方国家的市民社会是不成熟的。国家的稳定主要依靠国家政权亦即政治社会来维持，国家政权本身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政权本身就是一切，市民社会的因素相对是无足轻重的。而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不仅拥有国家政权，控制着政治社会，而且牢固地掌握着市民社会的领导权。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成熟的坚固的市民社会，而国家机器的作用相对比较小，国家政权只不过是一条外围的堦壕，在这堦壕之后的市民社会则是一个工事和地堡阵地，这个坚固的市民社会阵地，能够承受住各种经济、甚至是政治危机的打击，它是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统治的重要基础。

葛兰西通过东西方的国家结构的比较，通过对现代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的实际分析，认为现代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结构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结合，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特征就是强制和同意的结合。“在实行典范的议会制度的国度里，‘正常’实现领导的特点是采取各种平衡形式的强力与同意的配合，而且避免强力过于显然地压倒同意；相反地，甚至企图达到表面上好像强力依靠大多数的同意。”^②葛兰西并没有否

^{①②}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180、197～1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定国家是以一定的强力为基础的，但是他更强调了国家的另外一个基础是同意。葛兰西强调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是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并非是为资本主义国家作辩护；相反，它从另一方面更进一步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秘密，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控制了市民社会，使人民大众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同化，无法意识到现存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统治的本质，从而同意了现存的政治统治。

在葛兰西对现代国家结构的分析中，政治社会是强制性的因素，市民社会是同意性的因素。那么在他看来，国家的消亡就是强制性的因素逐渐弱小，人民同意的因素逐渐扩展的过程，是市民社会取代政治社会的过程。“有一种关于国家的学说认为国家注定要结束自己而溶化在被调整了的社会之中……可以设想，国家的强制的一面将由于确立起来了被调整了的社会（即伦理社会或市民社会）的越来越多的因素而逐渐结束自己。”^①在这里，葛兰西把未来的市民社会看作是以共同的道德、文化、精神为基础的伦理社会。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需要政治社会的强制，另一个方面也需要人民的同意，当然这种同意是建立在人民大众被蒙骗的基础上，是一种虚假的同意。一旦一个社会完全确立在人民的真正同意的基础上，不需要依靠强制来维持的时候，原来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就消亡了，政治社会就不存在了，这就是国家注定要结束自己而溶化在市民社会当中，那时就剩下市民社会而没有政治社会，也就是没有国家了。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强调国家是政治压迫的暴力机器，甚至将其视为特殊的武装队伍，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根据当时国家的实际情况得出来的正确结论。葛兰西在对20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结构的分析中，提出了国家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结合，

^① [意] 葛兰西：《狱中札记》，2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是强制和同意的结合，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一个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同化的市民社会，正是这个市民社会构成了现代国家的重要基础。这种对国家结构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现代西方国家的认识，它对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阿尔都塞正是在葛兰西的这一思想的启发下，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

2.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中颇具影响。阿尔都塞并没有系统地探讨国家问题，没有形成自己的系统的国家学说。他在早期著作中很少谈到国家问题，只是到后期才涉足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1970年，他在法共机关刊物《思想》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论文，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由此也奠定了阿尔都塞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上的一席之地。

阿尔都塞就是在葛兰西的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思想影响之下，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他将现代国家的结构分析成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并侧重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了独特的分析。阿尔都塞认为，葛兰西“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想法，即国家不能归结为（镇压性）国家机器，而是像他说的包含有若干‘市民社会’的机构：教会、学校、工会等”^①。但是，在他看来，葛兰西没有将这一思想系统化，还只是停留在《狱中札记》中一种非常零散的状态。葛兰西只是把教会、学校、工会等看作是市民社会的领域，而阿尔都塞则明确地将这些社会组织看作就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

^① [法]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8（4），251页。

器，并且阐述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特点，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从而阐述了由他本人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并且以此作为对马克思主义“镇压性国家机器”的理论的补充，“完善并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和列宁都将国家看作是镇压性机器，正是这个镇压性机器保证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使工人阶级屈从于资本主义的剥削，这种将国家看作是镇压性机器的定义，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抓住了国家问题的要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方向，它确实是正确的。但是，将国家看作是镇压机器的观点，还只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开端，还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纯理论”，而只是对国家的一种“描述性理论”，科学“要求这一理论继续发展，超出‘描述性’的形式”^①，如果只是停留在“国家是镇压性机器”的阶段上，就不能得出科学的国家理论。正是为了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从描述性理论发展为科学的纯理论，阿尔都塞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观点，以此作为对“镇压性的国家机器”的观点的补充，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他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同镇压性国家机器是一样实在的东西，是确实存在着的，是整个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就是不完整的。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家机器通常指的是：政府机关、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等等，阿尔都塞认为这些只能算是镇压性国家机器，国家机器还有另一部分，那就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宗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各种教会体系）、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各种公私立学校的体系）、家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法律意

^① [法]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8（4），248页。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不同政党在内的政治体系）、工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信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出版物、广播电视等）、文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文学、艺术、体育）”^①。这样，阿尔都塞就把人们通常看作市民社会领域的宗教、家庭、学校等等都视为国家机器，从而将国家机器的外延大大地扩展了。在他看来，只要某种机构能够执行国家职能的，都可以称之为国家机器，宗教、家庭、学校、工会、各种文化机构都能够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执行国家职能，因此，也应当看作是国家机器。尽管它们中的大部分是私人的机构，从而不同于镇压性国家机构，后者具有公共的机构的性质。但是只要私人机构能够执行国家职能的话，就可以被看作是国家机器。

阿尔都塞继而比较了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不同特点。

其一，“（镇压性）国家机器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意识形态国家则是多样的、不同的、‘相对独立’的”^②。由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由许多相对独立的部分所构成，因此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失去了整个镇压性国家机器；却依然能够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某些部分保持自己的阵地；被统治阶级虽然尚未取得镇压性国家机器，却能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某些部分找到表现自己的手段和机会。这使得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充满阶级矛盾，成为阶级斗争场所。

其二，镇压性国家机器的统一性是由中央集权组织来保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统一性则是由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来保证的。尽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且充满矛盾和斗争，但是一般说来，它是统一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下面的。如果

^{①②} [法]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8（4），251～252、254页。

统治阶级能支配镇压性国家机器的话，那么它的意识形态也会最终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占统治地位。如果它不能把意识形态统一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话，就会危及镇压性国家机器的稳固。

其三，“镇压性国家机器‘以暴力方式’执行职能，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以意识形态方式’执行职能”^①。这是两种国家机器的基本差别，也是两者各自具有的最本质的特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向人民大众宣传、灌输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维护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正是这一主要特点，使得它能与镇压性国家机器区别开来。阿尔都塞进一步指出，虽然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执行职能，但是二者的基本作用却是共同的，归根到底是要保证某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剥削阶级国家中就是保证剥削关系的再生产，二者的不同只是“分工”的不同。

阿尔都塞将国家结构看成是镇压性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对葛兰西的“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理论的进一步发挥，他们两人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阿尔都塞的贡献在于他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系统地阐述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特点，又独到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然能否将阿尔都塞所讲的教会、工会、学校、家庭、文化机构都看作是国家机器，这本身还是有待讨论的一个问题。但是阿尔都塞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说明了这些机构对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国家和现存的社会关系，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一分析是符合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的。

3. 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

当葛兰西将现代国家结构看作是政治社会+市民社会，阿尔

^① [法]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8（4），257～258页。

都塞将现代国家结构看作是镇压性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时，他们都把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国家的概念扩大了。国家结构的分析就不仅是对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国家制度的分析，而且包含了市民社会的其他团体，如学校、工会、家庭、文化、信息等机构。其实对国家结构的这种广义的分析是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国家学说的共同倾向，这实际上反映了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的趋势。

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经历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逐步分离的过程，国家的活动局限在政治领域内，市民社会是从事经济活动的领域，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经济活动采取放任主义政策，主要是起到维护市民社会的秩序和环境的外在保护作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从洛克到黑格尔的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理论；同样，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亦即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学说，也是对当时国家与社会的现实关系的客观反映。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却明显产生了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的趋势。随着国家对经济的日益增多的干预，随着国家对社会的全面管理，国家与社会不再像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那样截然分离，国家结构与社会结构的界限不再那么明显，而是趋向重合。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现代西方国家结构，将其扩展到市民社会领域的现实原因。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哈贝马斯对现代国家结构的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的特征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和研究。

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析，现代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首先是由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引起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由国家控制、支配的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活动局限在政治领域，市民社会是个人经济自由竞争的领域，而现在国家直接参与了经济过程，因此社会活动的一切领域变为国家活动的一切领域，按照波洛克的说法，原先社会中的经济关系变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时期

的政治关系，国家政治中的权力关系延伸到社会的经济关系，甚至权力关系已经取代了经济关系，因此国家与社会不再体现为政治与经济的分离，而是混为一体了。哈贝马斯在《合法性危机》中分析道，现代国家“重新把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联在一起——这在某种程度上使生产关系重新政治化——导致合法性的要求。国家机构不再像在自由资本主义时那样，仅仅是确保生产的一般条件（为继续进行再生产创造必要条件），而是积极参与其中”^①。国家直接介入经济过程，从原先的单纯维持社会秩序的职能过渡为积极地塑造社会生活的职能。这使得国家与社会不再是可以分离开的两个结构领域，按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只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他甚至把现代西方的福利国家称为“社会国家”。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已经不适用，社会与国家已经一体化了，它们之间不再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了。

法兰克福学派还从现代国家与文化结合的角度，说明了现代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结构。法兰克福学派早期对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分析，就不仅注意到法西斯国家的暴力控制的一面，而且分析了法西斯国家通过宣传机器、文化媒介，建立起自己的全面统治，而在对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分析时，更重视现代国家与文化相结合的一面，从而把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归结为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批判。现代国家的统治不再是国家的政治统治，而是政治统治和文化控制的结合，统治已经扩张到社会的文化、教育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变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那种高度一体化的“单向度的社会”。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市民社会不仅是自由的经济活动的领域，而且也是一个自由的文化生活的领域，它属于国家权力范围之外

^① J.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5. 36P.

的事情，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析，现代国家与文化结合起来，国家侵吞了市民社会的日常的文化生活、市民社会的文化不再是独立、自由的。依照哈贝马斯的看法，国家的行政系统渗透到市民社会的公共文化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把文化、教育都纳入了国家的行政计划的范围，因此一个独立的市民社会已不复存在了，国家与社会完全结合在一起了。

按照马尔库塞的看法，现代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现代国家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生活的全面控制，摆脱现存的统治状态，就不是仅仅拒绝现存的国家政权的统治，而是摆脱整个社会的统治，是从总体上超越现存社会的“总体性革命”，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的夺取国家政权的政治革命。在哈贝马斯看来，在现代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着国家行政系统对市民社会的文化系统的侵蚀，导致了市民社会的文化生活的行政计划化，导致了自由讨论的公众圈的衰落，从而文化系统同经济、行政系统的结构失衡，产生了现代国家由这种结构性不平衡引起的“合法性危机”。

三、现代国家的职能

与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职能是大大地增强了，扩大了。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突出特征。现代国家的职能在哪些方面增强并扩大了？为什么国家的职能会趋向于增强和扩大？国家职能的增强和扩大对国家本身、对社会、对阶级问题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所着重研究的问题。关于现代国家的职能的研究，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国家职能的理论，最主要集中在下面的两个问题上：其一 是现代国家的经济干预的职能，其二是现代国家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的职能。二者构成“西方马克思主

义”现代国家的职能理论的主要内容。

1. 现代国家的经济干预职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众多流派中，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国家的经济干预职能进行了最充分的分析。早在30至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霍克海默、波洛克等人就看到了，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取代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迅速地增强。霍克海默指出，现代国家的首要特征就是实行计划经济，取消了市场机制。波洛克也认为，现代国家以直接控制经济的职能，取代了由市场来调节生产和分配的职能，由国家权力来控制经济计划，使得市场规律不再起作用了，从而使一个由经济支配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过渡到了一个由政治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时代了。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另外两个重要人物纽伊曼和基希海默，虽然并不完全同意霍克海默、波洛克的观点，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机制并非完全为国家计划机制所取代，但是他们同样认为现代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是大大地增强了。马尔库塞在60年代对现代发达工业国家的分析中，也指出了现代国家的这种国家经济职能扩大的趋向：“大幅度地增加政府开支和政府指令，按全国和国际的范围制订计划，扩大援外项目，全面实行社会保险，大规模进行公共事业，甚至实行部分国有化。”^①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及其学生奥菲对现代国家的经济干预职能进行了更为详尽的研究和分析。

哈贝马斯把晚期资本主义称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他把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的增强，看作是现代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两种最引人注目的趋势之一。哈贝马斯认为，国家的干预活动的增强，用国家干预来补充和部分取代市场机制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的结束，但是他并非认为市场机制

^① [德]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3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已经完全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活动所取代。相反，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活动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的补充，或者说它能够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在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干预了市场，但是，不管商品所有者的私人贸易在行政上受到多大限制，只要整个社会优先考虑的事项是以无计划类似自然的方式提出的，那么对稀有资源的分配就不能完全用政治计划去实施。所以国家的干预只能是对市场结构的补充和部分代替。显然，哈贝马斯关于国家干预经济职能增强的观点，不同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波洛克的观点，而同纽伊曼和基希海默的分析更为接近。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作为守夜人，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市场经济是私人企业主的领域，国家主要是从外部保障经济运行需要的社会秩序。而在晚期资本主义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期，“国家机关执行着经济体系的许多职能。这些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通过总体计划，国家调节整个经济周期；创造和改善利用过剩积累资本的条件”^①。哈贝马斯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职能具体化为以下几个方面：

(1) 通过组织跨国的经济集团组织，加强国家的竞争能力，确保用帝国主义的手段所造成的国际分层现象；

(2) 增加非生产的国家消费（如武器生产和空间开发）；

(3) 通过与结构政策相一致的指导方针，使资本流向自发市场所忽视的部门；

(4) 改善物质基础设施（交通、教育、卫生、娱乐活动、城市和地区规划、住房建筑等）；

(5) 改善非物质的基础设施（促进科学发展，对研究和发展进行投资，提供专利等）；

(6) 提高人的劳动生产能力（建立普通教育体制、开办职业

^① J.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5. 34P.

学校、制订培训和进修计划，等等)；

(7) 减轻私营生产造成的社会和物质损失(失业补贴、福利、补救对生态造成的破坏)。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国家的经济干预活动，必然保障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国家的干预，亦即国家对于经济发展过程所作的持续性的调整，是在抵御危害制度的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破坏性功能中产生的。私人企业拥有生产资料具有其局限性，市场的职能出了问题，国家必须去解决。在《论晚期资本主义革命化的几个条件》的论文中，哈贝马斯指出：资本主义的私人经营方式，只有通过国家对发挥周期性的、不断起稳定作用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改进，才能得以维持。他甚至认为：“社会性国家的广泛民主和国家干预主义构成了一种制度，它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它从增长中拿出一部分作为与制度相适应的补偿(钱、休假，等等)，因而平息了阶级冲突，而没有触动私人的高额投资与私有财产的结构。”^①

哈贝马斯在分析现代国家的经济干预职能的时候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的国家学说”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自发的经济规律决定的，国家解决不了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国家职能代替市场职能，也改变不了整个经济过程的不自觉的性质，从而无法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哈贝马斯认为这种经济危机理论是不充分的，“是对国家不够信任”。他认为，参与到再生产过程中的国家，有了制定有限计划的能力，并能发挥有限计划的作用从而达到减缓经济危机的目的。“随着时间的延续而有所减弱，以及在其社会后果中有所缓和的周期性危机，被通货膨胀和连续性的社会性的财政危机所代替。”^② 这就是说国家的干预职能，能够减缓经济危

^① [德] 哈贝马斯：《我和法兰克福学派》，载《哲学译丛》，1984(1)，75页。

^② [德] 哈贝马斯：《何谓今日之危机》，载《哲学译丛》，1981(1)，60页。

机，而将其转变为一种可能加以缓解的财政危机，一种持续性的却是波动温和的通货膨胀危机。在哈贝马斯看来，正是现代国家的经济干预活动，使得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理论不再有效，国家的干预由此保障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

哈贝马斯还从另一方面说明现代国家的干预活动保障了现存制度的稳固性。这就是“国家活动能够通过再分配的方法基本上确保经济增长和民众的忠诚心”^①。国家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比如建立社会保险系统，改善社会的福利设施，保障生活的失业补贴、救济等等，这些补偿政策确保了依靠工资为生的民众对现有社会制度的忠诚。这样，包含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冲突潜伏起来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活动，虽然没有使阶级对立消亡，却有效地使阶级冲突潜伏了，因此从政治上组织起来的阶级斗争的可能性毫无疑问就不存在了，这也就保障了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几十年中，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成功地（尽管出现了1968年的巴黎五月事件）使自己关键领域的阶级冲突处于潜在的状态、没有使其爆发出来；成功地延长了经济周期并把定期资本贬值的状况变成具有温和行情波动的持久通货膨胀危机。”^②

哈贝马斯虽然认为，现代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活动能够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解决市场经济出现的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从而保证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但是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并非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它只是使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变为缓慢的、温和的通货膨胀和社会财政危机，它只是使阶级冲突潜伏而不是使阶级对立消亡。晚

① [德]哈贝马斯：《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化的几个条件》，载《哲学译丛》，1983（2），3页。

② J.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5. 38P.

期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着危机,这种危机主要是合法性危机。关于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我们在第一章已讨论过了。

哈贝马斯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预职能的理论,分析了现代国家经济职能增强的趋势,并且指出了国家经济职能的增强对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所起到的重大作用,但是它同样会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新的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应该说这一分析是有助于我们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的。但是他却认为由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政治的上层建筑和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混为一体了,因而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已经过时了。其实,国家作为上层建筑虽然受经济基础决定,却具有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国家的经济职能不是到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才产生的,不过是得到加强而已,由此断定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理论失去作用的观点是错误的。

2. 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职能

强调国家的意识形态职能,注重对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分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倾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显著特色,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对国家暴力镇压职能的强调,形成强烈的对比。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现代国家的理论,都贯穿着对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职能,亦即文化职能的分析。

正像前面所讲过的那样,葛兰西将现代国家的结构看作是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是强制和同意的结合,认为现代国家是建立在人民的积极同意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国家是阶级统治,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那么人民为什么会同意这种统治呢?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葛兰西是通过国家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通过国家的意识形态职能的理论来说明的。

在葛兰西的著作中,领导权的概念通常具有两种涵义。广义

的领导权，包括了政治统治权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他说：“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①但是葛兰西更多地是在狭义上使用领导权这个概念的，最能表明他的独创性的思想也正是狭义的领导权概念。在狭义上，葛兰西把国家的领导权看作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所行使的一种意识形态（包括文化、精神、道德等各方面）的领导权，统治阶级通过教会、学校、工会这样的社会团体，以文化、宗教、习惯、教育等等为媒介，对市民社会行使一种精神上的道德上的指导，从而使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阶级的世界观，认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换句话说，国家掌握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意味着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具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领导地位。统治阶级掌握了这种领导权，也就是支配了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使人民接受、认同统治阶级的观念，从而意识不到国家统治的阶级本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就会同意现有的统治，这就保证了现有政治制度的稳固性。

葛兰西强调了领导权在现代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政治的“第一个要素在于确实存在着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以及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政治的全部艺术和整个政治学都建立在这个原始的事实上”^②。国家的领导权不仅仅是依靠强制使被领导者服从，还要依靠教育、指导，使被领导者积极地同意他们的领导。国家活动的重要内容就是作为统治阶级的领导者对作为被统治阶级的被领导者实施领导权。一个统治阶级一旦失去这个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国家就会进入危机状态。“一般都惯于说‘权威的危机’，而这也就是领导权的危机或整个国家的危机。”^③他指出，一个阶级在取得国家政权之前，就应当确立起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而一旦这个阶级已经取得国家政权后，仍还要继续保持这种意识

^{①②③}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316、117、1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形态的领导权，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保证自己的阶级统治。

正是因为葛兰西看到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重要性，所以他特别注意到现代国家在这一方面的职能，“每一个国家都是伦理的，因为它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是把广大居民群众提高到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从而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一定的文化和道德水平（或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在国家中起特别重要作用的是执行积极的教育职能的学校”^①。因此，国家的职能不仅是暴力强制，而且还要说服教育。葛兰西把学校、工会、教会这样的团体都看作是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构成为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机关，行使着统治阶级的伦理、教育职能。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国家的强制性政治机器，不但具有暴力强制的职能，而且也具有伦理、教育的职能，比如资产阶级的法律，不仅有强制性作用的一面，而且会起到意识形态的同化作用。“假使国家致力于创造和确立一定形式的文化和一定形式的公民（从而创造和确立一定型式的公共生活以及个人之间的关系），致力于根绝一定的习惯和风俗并传布另外的习惯和风俗，那么为了达到这项目的所必需的工具将是法律（除了学校和其他机构以及各种活动之外）。”^②法律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起到强制的作用，而且起到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它有利于确立起统治阶级所需要的那种型式的文明、风俗、习惯。

葛兰西并没有否认现代国家的暴力强制职能，但他却更强调了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职能，国家是强力和同意的结合。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的国家是运用暴力和欺骗的文武两手来维持阶级统治的，统治阶级兼有刽子手和牧师的职能。重要的是葛兰西所说的同意，并非是统治阶级有意识地欺骗的结果，而是现代西方国家的一种社会现实。“舞弊和欺骗处于同意与强力之间的中间地位，它们是一定情况下特有的现象。”^③只有在实施正常的领

①②③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217、194、1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导权发生了困难，而实施强力又会有更大的危险的情况下，才会有欺骗、舞弊这样的特有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常情况下，资产阶级是通过正常的领导权使人民同意他们的统治，而不是有意欺骗。所谓有意欺骗，是资产阶级认为自己的统治不合理，却要故意把它说成是合理的，以欺骗来取得人民的同意。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不是建立在故意欺骗的基础上，而是现实的资产阶级具有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念，在意识形态上占有统治地位，使人民认同了他们的意识形态，从而同意现存的国家制度。应该说葛兰西的这一分析是深刻而独到的。资产阶级国家并不是完全依靠谣言，依靠主观有意欺骗来实施统治的，当然一旦需要的时候，资产阶级也会采取造谣、欺骗的卑鄙手段。但一般情况下，则是依靠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来影响人民，取得人民的认同，维护自己的统治。

葛兰西对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职能的分析，影响了以后几乎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研究国家的意识形态的职能的传统。阿尔都塞就是在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影响下，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并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职能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阿尔都塞认为，不同社会形态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是共同的，就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执行国家职能，保证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但是，不同社会形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的表现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在封建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数目要小一些，在所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教会亦即宗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其次是家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还有像三级会议、议会那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及像商会、工匠会那样的“行会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们各自为维护封建的生产关系，保证封建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发挥自己的功能。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中世纪的历史中，“有一点极其清楚，即当时有一种占有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即教会，它不仅集中了宗教职能，而且集中了教育职能和大部分信息与‘文化’职能”^①。因此，从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的全部意识形态的斗争，从宗教运动的最初冲击开始，都集中地表现为反教会和反宗教的斗争，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宗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中世纪占有统治的地位，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首先就集中在宗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上。

作为当代的思想家，阿尔都塞更为关注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他着重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管是什么，都是为了助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每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助成这一结果。政治机器通过议会、公民投票，造成政治“民主”的意识形态；信息机器借助出版物、广播电视宣扬自由主义；甚至连体育运动都被用来灌输沙文主义的意识形态；其他如家庭、学校、教会也是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宣传、灌输资本主义社会所需要的意识形态。

一般人总是以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政治机器，亦即是普选权和党派政治结合起来的议会民主制。阿尔都塞则认为，议会民主制的政治机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虽然处于前台的位置，却不占有主导地位。他认为教育机器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我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占据前台的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幕后，资产阶级所建立的首要的、即主导的意识

^① [法]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8（4），259页。

形态国家机器是教育机器，教育机器的职能实际上已取代了先前占有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①他是这样来分析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有许多是通过家庭、教会、军队、闲书和电影甚至是通过足球赛传播给大众的。但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能够像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亦即学校发挥那么大的作用。所有的人，从儿童时代开始就要作为义务的受教育者，每周5至6天，每天8小时接受学校教育。学校给儿童灌输包括语文、数学、科学等基本知识，而这些基本知识是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包装着，受教育者在接受基础知识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除此之外，学校还传授那些纯粹状态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比如伦理学、哲学、公民守则等等。大约在16岁时，大量的孩子走出校门，投入生产，这部分接受教育较少的人就成了工人或农民。另一部分人继续多学几年，走上社会后，充当初级和中级技术人员、白领工作人员，或者成为种种小资产者。最后还有一部分人，继续接受高层次教育，成为知识分子群，走上社会后成为经理、行政官吏、神甫等，成为统治阶级的代理人。被学校送出去的每一批人，实际上都具备了充当资本主义社会的某种角色的意识形态。作为被剥削者的工人、农民，具有服从管理的“职业的”、“公民的”意识，统治阶级的代理人则具有了管理、统治的意识。所有这些角色的意识，主要的就是在学校的教育中形成的。

事实上学校传授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培养出了具有这种意识形态的各种社会角色，这就保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维持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学校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显然比其他

^① [法]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8(4)262页。

机器在宣传、灌输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居于主导地位。

必须指出的是，阿尔都塞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时，除了强调教育机器的主导地位外，也强调了家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中世纪是教会和家庭的结合，而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则是学校和家庭的结合，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阿尔都塞将教育（学校）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并对此进行了令人心服的分析，这一见解是有其独到之处的。现代学校的教育，不仅使受教育者掌握了各种知识和技能，而且也培养出了与现实社会相适应的具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角色。这就为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创造了基本的条件。应当说现代西方发达国家都是教育高度发达的国家，这种教育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继续存在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阿尔都塞的分析，为我们认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米利班德在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分析中，也阐述了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职能的问题。他认为，社会秩序不仅需要依靠国家的镇压职能来维持，而且也需要依靠国家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的职能。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能在危机四伏的状态下，维持自己的存在，部分地依赖于国家及其社会秩序所获得的赞同和合法性的程度。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所有管理国家和其他权力机关的人时刻关心着如何能够遏制和减轻民众的压力。要做到这一点，不仅依靠精心的控制，还依靠种种鼓励无所作为和听天由命而绝非鼓励压力和斗争的习惯、传统和规矩”^①。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多地通过自己的思想文化职能，干预社会生活的方式。特别是现代社会

^① [英] 米利班德：《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政府能利用效能极大的通讯工具，影响公民舆论，更加直接地干预意识的形成。国家大规模地介入意识、文化、教育行业，传播那些有利于稳定、保持现状的各种消息、观点，影响人民大众。

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标榜思想、言论自由，其电视、广播、报纸就其不受政府直接控制而言是“独立的”。这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同法西斯国家在思想文化职能上的重要区别，法西斯极权国家直接承担传播官方思想的责任，直接主办广播、电视、报纸、刊物，宣传官方许可的思想，专横地压制非官方的各种思想。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思想文化职能不是通过由政府直接指挥控制各种宣传机器和刊物来实现的。但是却可以通过整个社会背景、文化氛围及比较隐蔽的方法控制宣传机器。比如英国广播公司在日常业务管理上，是对政府保持独立的，但是二者的关系实际上是和谐一致的，主管广播的人同政府处于共同的思想范畴之内。筛选新闻的人，在那种国家的文化氛围、社会背景上，知道选择什么内容，这种广播内容的选择虽非来自唐宁街的直接命令，但是比较隐蔽的政府信息，却能不露声色地控制其广播内容的选择取向。换句话说，广播公司的内容选择正是政府所希望的，它传播了政府所需要的思想文化。这样，国家的思想文化职能在隐蔽的条件下得到了发挥。

法兰克福学派也非常重视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职能的问题，并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的职能进行了充分而深入的剖析，把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归结为通过文化、意识形态进行操纵的极权国家，把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变为文化的批判、意识形态的批判。

重视对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的职能的研究，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在国家统治中的重要作用，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特点。这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强调国家的镇压职能

有所不同。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尤其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强调国家是暴力镇压的机器，是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这是因为当时国家的暴力镇压的特征更为明显突出，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当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都讲到国家的意识形态职能的问题，但这毕竟不是他们当时强调的主要方面，这同当时国家的现实状况是相符合的。但是，20世纪以来，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变化，又确实存在着意识形态职能增强的趋势，“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职能的理论，反映了现代国家这一变化趋势，它无疑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第五章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及人道主义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将当代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异化的、畸形的社会。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的揭露和批判，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一个永恒的理论主题。异化和人道主义可以说是贯穿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理论的一根红线。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异化和人道主义作为概念工具，用于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异化现象；另一方面，他们试图以异化和人道主义思想为基础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

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异化的社会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现象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普遍性、必然性，分析了异化的新特点以及产生异化的根源。青年卢卡奇开启了资本主义异化批判的先河，后起的许多马克思主义流派及代表人物，特别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沿着卢卡奇的传统，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的全面分析批判。

1.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普遍性、必然性

20年代，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就已通过对物化（即异化）与商品生产内在联系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必然性。他认为，物化是商品社会固有的现象，它必然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是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商品交换的原则成为社会活动的最基本的原则，一切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披上了“物—物”关系的外衣。因此，商品交换以及由此产生的物化，使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异化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普遍的社会存在范畴”。卢卡奇还分析了物化在主客观两方面的表现形式。从客观方面看，物化表现为：一个充满客体和事物之间关系的世界拔地而起，控制这些客体的规律虽然正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但人们仍将它视为与自己力量相对立的异在的隐蔽的力量。尽管人们能掌握规律的知识，但他却无法通过自己的活动来改变这一客观的过程。从主观方面看，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一个人的活动成了与他自己相疏远的东西，这种活动变成了附属于社会自然规律的人类以外的客观商品，人的活动是按消费品那样独立于人的方式进行的。总之，卢卡奇指出：“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人所面临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性。”^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从5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发展时期，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各西方国家普遍推行了福利国家政策，人民生活水平也有较大提高。面对这种情况，有些西方学者（如自由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进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社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一些

① [匈]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224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新特点，并没有消除异化现象，反而深化、扩大了异化；不仅原来业已存在的异化得到新的发展，而且产生了许多新的异化形式，异化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仅马克思所描述的那几种异化形式仍然存在并继续发展着，而且伴随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又产生出许多新的异化形式；异化不仅表现在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社会与个人之间、人的理性与本能之间、意识与无意识之间，而且还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在列斐伏尔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犹如一张巨大无比的网，笼罩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人都无法逃避：“异化就这样扩展到全部生活，任何个人都无法摆脱这种异化。当他力图摆脱这种异化的时候，他就自我孤立起来，这正是异化的尖锐形式。”^①

另一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萨特则干脆宣称，异化是现代人的无法摆脱的命运。在萨特看来，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无法逃脱“他人目光”的注视而不得不“自我欺骗”，这就是异化的最普遍形式，所以萨特称异化是人类一种无法克服的“本体论现象”。

60年代，卢卡奇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一书中，又重申了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必然性的观点。他引述了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中关于人的存在的双重性的一段话：“在政治国家真正发达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

^① [法]列斐伏尔：《辩证唯物主义》，载《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①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这种双重性，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特性必然使市民及其理论成为资本无限统治的工具，从而导致人的全面异化。卢卡奇写道：“资本主义的这一特性必然导致人同自身的全面异化。”“资产阶级的纯经济越发展，异化就在资产阶级中不断加深，这是不言而喻的。实利主义的资产阶级越是强烈地力图在全部生活环节上得到承认，超越市民理想，异化就越深刻。”^②

根据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必然性、普遍性的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断然否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他们认为，一个合理社会的标志，不仅仅是一个物质丰裕、生活舒适的社会，更主要的应是一个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助于人的个性的全面发挥的社会。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恰恰相反，它导致人格的扭曲、人性的丧失，因而是一个畸型的、病态的社会。他们使用了许多概念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性质，如“不健全的社会”（弗洛姆）、“患了社会健忘症的社会”（拉塞尔·雅各比）、“总体异化的社会”（列斐伏尔）、“单面性的社会”、“病态社会”（马尔库塞）等。用马尔库塞的话来说：“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不能使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存在（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时，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③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是这样的一个病态社会。

“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肯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4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② [匈]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272~27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③ [德] 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与新左派》，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异化的社会，指出了异化与资本主义的内在必然联系，而且着力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所具有的新特点。

2.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新特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注意到，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也具有许多新特点。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代异化对人造成的结果，主要是一种心灵的折磨，产生精神上的痛苦。“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异化主要表现为劳动异化，异化对工人所造成的结果，主要是肉体上的痛苦（如物质生活的贫困、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等），那么，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对人所造成的结果，则主要是心灵的折磨、精神上的痛苦。马尔库塞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确是一个“富裕社会”，不仅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资本家过着奢侈的生活，而且社会各阶层的物质需求也能够得到基本满足。但是，马尔库塞认为，这种状况并没有给西方人带来真正幸福的生活，相反，这种丰裕的物质生活是与巨大的精神痛苦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其一，人们承受着“多余压抑”所带来的额外的紧张和负担。这种多余的压抑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人无时无刻不感到巨大的精神压力。其二，人与物的关系被完全颠倒，人甚至已沦为物（商品）的奴隶。在当代，由于人们把社会所强加的“虚假需求”当作自己的真正需求，拼命把追求外在的物质享受、占有更多的消费品当作自己生活的全部内容，这样，物与人的关系便被完全颠倒了，人成为商品的奴隶，因而感到精神更加痛苦。其三，人彻底丧失了自我，成了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伴随当代资本主义“一体化”过程，人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失去了自己真正的自我，成了一具只有躯壳、没有灵魂的东西，这也必然导致人的巨大的精神痛苦。这种精神痛苦，比因物质匮乏、异

化劳动所导致的肉体痛苦，更加深重，更加强烈。如果说，肉体的痛苦还有望得到解除的话，那么，这种精神痛苦则已“病入膏肓”，无法解除，这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一个本质特征。

第二，当代异化正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的控制手段。“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如果说，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控制主要地是强制的形式（如政治专制、暴力镇压以及饥饿等），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者的控制形式有了明显的变化，传统的强制形式已退为次要，异化则成为主要的、更加有效的控制手段。现在，统治者巧妙地利用、甚至制造各种异化的形式，借助科学技术，以“物”为中介，对人的心理系统进行操纵和控制。这种控制通过两个途径进行：一是由于社会生产的自动化，使每个人都屈服于技术分工，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像零件一样被结合到社会这部大机器中，任何人都无法摆脱这种“零件”的命运。而又由于资本主义一体化的作用，“零件”又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和“机器”联系在一起，产生与“机器”同甘苦、共存亡的心理意识，甘心情愿地服从于社会机器的控制。二是制造“虚假的需求”，并借助各种广告媒体、社会催眠术等手段，强迫人们去接受，“社会的需要和政治的需要必须变为个人的本能的需要”^①，而一旦人们接受了这种“虚假的需要”并改变了自己的本能结构，人们也就“不自觉地和自觉地接受和屈从于制度的控制和操纵”^②了。因此，异化成了更加有效的控制手段。

第三，当代异化具有“总体性”的特征，已发展成为一种“总体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在19世纪，异化主要存在于劳动生产领域，所以马克思对异化的分析和揭露，也主要局

①② [德]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与新左派》，5、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限在劳动生产方面。而在当代，异化已超出劳动生产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异化的受害者，也不仅仅是无产阶级，还包括资本家、官僚、经理、职员以至普通居民。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中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阶层都饱受异化之苦。例如，工人仍然是受异化之苦最深重的阶层，他的人性被严重扭曲，创造性被完全窒息，在科学管理的幌子下，工人甚至被剥夺了自由思想和活动的权利，工人在现代社会的地位不过是一个被动的零件，一个“机器原子”。作为工人之对立面的资本家，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资本家作为人，他是除了金钱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的人”。经理们的状况又如何呢？弗洛姆断言，“经理的作用也是一种异化”^①，他们是“既无爱也无恨完全无人格”^②的机器零件，“是这一非人格机器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同雇员进行个人接触的人”^③。至于行政部门，从行政官吏到普通职员，“在今天的异化程度，甚至超过熟练的手工劳动者的异化程度”。而就整个人类而言，已经成为自己创造物的囚犯了，“在今天，全人类都成了它自己创造出的核武器的囚犯，成了同样是它自己创造出的政治制度的囚犯”^④。

总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所具有的这些特点，是马克思生活时代所不具有的，因此，马克思所创立的劳动异化理论，已不足以分析和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这就为他们“修正”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提出种种异化理论，作了理论的铺垫。

3.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产生的根源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如此普遍、如此深刻，那么原因

①②③ [德]弗洛姆：《健全的社会》，125、126、111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④ [德]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载《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68~6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究竟何在？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

（1）科学技术是产生异化的万恶之源。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看来，科学技术之所以是异化之源，主要理由是：第一，科学技术的发达，提高了生产劳动中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从而也增强了工人劳动的“破碎化”，使工人服从于片面的劳动分工，这是劳动异化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使工人更依附于生产过程，从而更失去自己的独立性、自主性。第二，科学技术创造了一个富裕的社会，人们的物质匮乏消失了，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了，与此同时人也失去了反抗的权利，失去了说“不”的理由，成了现存社会制度的驯服工具，导致“没有反对派”的异化政治。第三，科学技术被利用，并已成为制造“虚假需求”的重要工具。异化作为一种新的控制手段，是通过制造“虚假需求”而实现其对人的本能和需要的操纵的，而在这过程中，科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它提供了几乎是“无限”的生产能力，以满足人们的几乎是难填的“欲壑”，也正是借助各种新奇的技术手段（电视、声色广告等），才能使人在无意识中将虚假需要变为自己的需要。第四，科学技术又使得人的异化、人的不自由成为“合理”，即将异化“合理化”。哈贝马斯就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①

（2）匮乏是产生异化的根本原因。“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萨特认为，人类社会存在所面临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匮乏，匮乏指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缺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匮乏决定了异化的不可避免性，是产生各种异化的基础。萨特多次

^① J. Habermas.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0. 80P.

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正是在人同人的、通过物的中介的，以及在人同物的、通过人的中介的具体而综合的关系中，我们能发现一切可能的异化的基础。”^①“物质匮乏是过去和现在人们之间对抗的根源。”^②萨特从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两个方面，分析了物质匮乏是如何产生异化的。从人与物（自然界）的关系来看，人为了克服匮乏，便必须劳动（实践）。这样，一方面，人通过劳动（实践）赋予物质存在以意义，使之适应人的需要，这是“外在性的内在化”。另一方面，物质存在也要求人完全适应它所指示和需要的处理办法，这是“内在性的外在化”。在这个双向过程中，人必然被染上物的惰性而失去自由的自发性，人类劳动也成为惰性的，萨特称之为“实践—惰性”。这种“实践—惰性”使人与物的关系颠倒过来，人类劳动的对象反客为主，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统治着人，这就产生了人与物关系的异化。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也正是因为匮乏，一个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其他所有人的威胁。人为了生存，就必须消费，当一个人消费掉某物，便意味着所有其他人不可能再消费该物了。这样，人的存在这一事实，对其他所有人来说便是一种“经常危险”，人对其他所有人来说都是“非人的人”。萨特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人作为非人的人，作为一个异己的类存在着，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冲突已被内在化并作为一切生存战斗而生活着，它只是意味着每个人的单纯存在是被匮乏规定为既是对于另一个人，又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的非存在的经常危险的。”^③

(3)“生存两歧”是产生异化的根本的原因。这种观点的代表是弗洛姆。弗洛姆认为，自19世纪初以来，人们已经注意到人的异化这一事实，各种学说、各派思想家已开始努力寻找产生异化

①③ [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转引自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517、51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② [法]萨特：《生活·境遇——萨特言谈随笔集》，36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

之源。在 19 世纪初，人们倾向于从政治方面去寻找，把缺乏政治自由看作异化之源；19 世纪中叶的社会主义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性，认为异化产生于人被当作剥削和利用的对象；一些人道主义者如托尔斯泰、布克哈特则把人们精神贫乏、道德低下视为异化之因；20 世纪的弗洛伊德独辟蹊径，从人的本能冲动受压抑这一事实找到了异化之因。在弗洛姆看来，这些见解均有一定合理性，但又都失于偏颇，“这种只分析一方面而又排除其他方面的解释是不可靠的，也是不足取的”^①。弗洛姆认为，上述各家所提及的，都是产生异化的原因，但还不是根本原因。那么，产生异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弗洛姆认为是人的“生存两歧”。所谓“生存两歧”，指的是人的生存所面临着深刻矛盾。弗洛姆认为，人的生存本身就包含了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其中生与死的矛盾是最基本的矛盾（即两歧），它引发了其他“两歧”，如无限思维能力与有限生命的两歧，无限发展潜能与有限的实现能力的两歧，等等。这一系列“两歧”使人总是“处在永恒的、不可避免的矛盾状况中”^②。由于这些“两歧”根植于人的生存之中，人是无法消除的，但人却试图以各种方式反抗它，这就出现了异化。弗洛姆认为，从最初形态看，异化是一种为反抗“生存两歧”而产生的一种变了样的心理体验：“异化是一种体验方式，在这种体验中，个人感到自己是陌生人，或者说，个人在这种体验中变得使自己疏远起来。他感觉不到自己就是他个人世界的中心，就是自己行动的创造者——他只觉得自己的行动及其结果成了他的主人，他只能服从甚至崇拜它们。”^③

“西方马克思主义”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必然性及其新特点的分析，确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性质，即是一个

^{①②③} [德]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274、24、120 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全面异化的社会，一个病态的、畸型的社会。应该如何评价这一论点呢？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异化特性的确定是正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加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运用国家干预手段，推行福利国家政策，这使得西方社会经济有较迅速的发展，国内阶级矛盾有所缓和，西方社会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是能够透过繁荣、丰裕、富足的表面现象，看到了它本质上的不合理性，与某些自由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他们抓住福利国家给人民带来的某些实惠而为资本主义大唱颂歌，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说成是尽善尽美的“人间天堂”，是一个“理性化的社会”、“人道化的社会”，甚至冠之以“人民资本主义”的桂冠——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无疑是合理的、进步的。尤其是马尔库塞对“病态社会”的解释，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相当深刻。某些资本主义的批判者，虽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看到其种种弊端，但往往把这些弊端归于资本主义功能不健全，纯属“异常情况”；换言之，在他们看来，只要适当调整，使资本主义机器恢复正常运转，便足以消除这些弊病。马尔库塞恰恰相反，他把资本主义产生的这些弊病，视为其社会功能正常的表现，是一种“正常情况”，并认为，资本主义机器运转越正常，其“病症”就越重。这一观点，对于对资本主义制度抱有幻想的人，确实可以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异化新特点的分析，也有一定深度。异化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必然现象，必然会伴随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异化也必然具有不同的特征，不了解这些新特征，也就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有全面的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这几个新特征，还是比较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他

们承认，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状况已大有改观，异化造成的恶果，主要地已不是肉体上的、物质上的痛苦，而主要是心灵上、精神上的痛苦。这相对于以前我们单纯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来认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显然更具说服力。尤其是他们注意到，在当代，借助科学技术的“中介”，异化已成为统治阶级的一种新的控制手段，这就不仅仅把异化看作一种自然的、自发的现象，而且把它看作是一种社会的、人为的现象了；他们认识到在当代西方社会，异化现象之所以扩大、深化，与统治阶级的肆意利用、推波助澜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批判的局限性。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论述当代异化现象时，往往把它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联系在一起，与工业社会联系在一起，甚至把它与科学技术、人的理性联系在一起，这就存在着将异化永恒化、本体化的趋势，必然得出当资本主义制度消灭以后，社会主义社会也仍然存在异化，社会主义也同样是一个畸型、病态社会的结论。东欧的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提出“社会主义异化论”的，这显然混淆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是不能同意的。

再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异化的认识，除了将之“永恒化”外，还存在着将之“泛化”的趋势，即将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病、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都归结为异化，通通贴上异化标签。最明显的是萨特，他将人类在改造物质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与客观事物所发生的关系，也看作是一种异化关系（即所谓的“实践—惰性”），至于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萨特看来，更是无时无刻不存在异化关系了（即所谓“他人目光”、“自我欺骗”）。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都有这种“泛化”异化的倾向。我们认为，这种将异化“泛化”的做法，并无助于正确认识异化，更无助于寻找正确的消除异化的途径，后面我们将会看到，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和人道主义理论的许多误区，都与这种“泛化”的做法有关。

最后，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揭露、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现象时，表现出一定的革命性的话，那么，当他们在进一步分析产生异化的根源时，却导入误区。他们脱离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抽象地谈论异化，并错误地把产生异化的原因归结为科学技术进步，物质资料匮乏，人类生存状态等，这如同医生看病时，病症说对了，病根却找错了，当然也就开不出对症的药方。这不仅把他们异化理论的革命性给抵消了，而且在客观上起到了为资本主义制度开脱的作用。因此，尽管他们提出了许多异化理论，涉及政治、经济、消费、社会关系、日常生活诸领域，但总给人以隔靴搔痒、没有击中要害之感，无法为人们指出一条正确的消除异化之途径。我们在下节的分析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三种主要异化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的全面揭露中，形成了种种异化理论。本节将择要加以评述。

1. 劳动异化论

劳动异化是马克思在手稿中着力分析的一个范畴。马克思所说的异化，主要地是指劳动异化。马克思正是根据在私有制条件下的劳动异化这一事实，来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加以发挥、“修正”，认为，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与马克思生活时代的工人劳动相比，有许多新特点，但在仍然是一种异化劳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只是其表现形式及其对工人阶级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所带来的影响有所不同而已。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劳动异

化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主要的异化形式，有些人（如马尔库塞、弗洛姆、布雷弗曼）甚至把劳动异化看作是产生其他异化形式的根源之一（如，弗洛姆就讲过：“异化劳动产生的许多紧张与敌意，导致了人们对劳动以及有关劳动的一切的反感。”^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异化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生产过程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技术分工越来越细，加剧了工人劳动的“破碎化”，从而对工人的技能、生理、心理都造成严重后果。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注意到自动化程度提高必然加剧劳动的“破碎化”，从而使工人分裂成了“孤立的、抽象的原子”这一事实。卢卡奇认为，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必然使劳动日益抽象化、合理化，其结果是使工人劳动被分割为一个个碎片。一方面工人的工作被归结为一个个专门的、固定的机械重复动作；另一方面，工人失去了同他的劳动最终产品的接触，他对这个最终产品一无所知，也就漠不关心。卢卡奇指出，劳动的这种“破碎化”无论对工人阶级整体还是对工人个人，都造成严重的恶果。对整个阶级来说，它作为一个“有机”的阶级整体也破碎了；对工人个人来说，他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而成了一种“孤立的、抽象的原子”。

“二战”以后，随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出现，劳动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更高了，从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这种劳动的破碎化程度也更严重了。在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更注重的是这种破碎化劳动对工人生理上和心理上所造成的恶果，着重从违反人性的角度去声讨、揭露破碎化劳动的危害。哈利·布雷弗曼在分析当今“技术统治的时代”工人劳动的特征时指出：由于劳动被日益分成更“小”而更例行化的各个环节，以及从上面对这种劳动进行统一协调和综合，这不仅使工人失去全

^① [德]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294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面发展的可能，成为片面的、一能的劳动工具，“使工人处于更被动的状态而没有什么技艺，从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异化”^①，而且使工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依附于生产过程。布雷弗曼指出，这种劳动根本“不考虑人的能力和需要”，是“违反人和人性的行为”^②。弗洛姆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指出破碎化劳动是导致工人心理变态，乃至神经官能症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劳动过程被分离成许多细小的部分，每个工人的工作成为机械的操作而不需要他的积极配合，所以他能够沉溺于白日梦和幻想中。”^③白日梦是工人逃避单调、无聊劳动的一种方法，白日梦“本质上是一种逃避，是同逃避相伴随的消极结果”^④。

(2) 劳动者并不是生产过程的主人，而只是被动的机器零件，在劳动中，工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已完全丧失。这是与劳动破碎化相联系的。由于劳动破碎化以及资本家对劳动过程控制的加强，工人在劳动中已成为完全被动的“劳动工具”，毫无自主性可言。卢卡奇指出，由于整个生产过程均需服从于机械化、自动化生产的规律，生产过程已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工人只需按事先规定的动作，在预先计算了的时间内进行机械操作，在这里完全不需要工人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创造性。不仅如此，在这个自满自足的自动化系统面前，甚至连工人的作为人的属性和特性，也被当作是错误的根源，卢卡奇说：“由于工作过程的合理化的原因，当主体与根据预测的正在发挥作用的那些抽象的特殊规律相比较时，工人的人的属性和特性日益表现为只是错误的源泉。人既不是在客观上也不是在他同他的工作关系上表现为劳动过程的真正主人。相反，他是被结合到机械体系中的一个机械部分，他发现

①② 转引自[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455、45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③④ [德]弗洛姆：《健全的社会》，291、292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这个机械系统已经存在并且是自给自足的，它的作用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他是否乐意，他都必须服从它的规律。”^①

弗洛姆指出，工人在劳动中已完全沦为无生命、无情感的“机器零件”了。根据“科学管理”的要求，工人的动作、动作的程序以及完成该动作所需的时间，都经精确计算而严格规定着；你的位置就在这里，你只能这样干，你的胳膊只能在以 y 为半径的范围内活动 x 寸，所需时间为千分之几分钟。弗洛姆说，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纯粹“只是机器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作为机器的积极力量”，有时甚至连机器还不如，而沦为机器的奴隶，“机器不是在代替过去由人的体力所必须完成的工作，而是成了他的主人。机器没有成为人力的代替物，人倒成了机器的代替物”^②。

在劳动中，由于自动化生产规律的制约，工人不仅丧失了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甚至连自由都没有。霍克海默将现代化生产中工人所享有的自由与手工生产中旧式工匠所享有的自由作了一个对比，认为虽然现代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大减轻了，但与此同时他们所享有的自由也大大减少了。他认为，旧式工匠尚有为制作一件精巧工件选择合适工具的自由，而现代工人则至多只能在众多的控制杆或开关按钮中选择一个他应操作的。

(3) 对工人来说，劳动是一种“外在的劳动”，是谋求生存的手段。“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本来应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是人区别于动物本能活动的重要标志，因此是一种“内在的劳动”。但在异化条件下，劳动的这种“内在性”荡然无存，劳动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行为，是谋生的手段。资本主义劳动的这一特征，马克思早予以揭露。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这一特征更明显了。马尔库塞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满足的规模和

① [匈]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99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② [德]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182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方式受制于其自己的劳动。然而他们却是在为某种设施而劳动，并对这种设施无法进行控制，这是一种个体若想生存就必须屈从于它的独立的力量。而且劳动分工越专门，他们的劳动就越异化。”因此，马尔库塞说，在劳动中“人们并不在过自己的生活，而只是在履行某种事先确立的功能。虽然他们仍在工作，却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发挥自己的作用，他们是在异化中工作”^①。

(4) 现代劳动异化还表现在劳动时间的实际延长，工人不仅在工作时间受控制，而且在闲暇时间也受到控制。“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当年在分析工人异化劳动时曾认为，工人在劳动时间是不自由的，但在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却是自由的、属于他“自己的”，因而感到“自在”。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连这点自由也被剥夺了，因为异化已侵入到工人的闲暇时间。“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虽然从形式上看，工人的“法定”工作时间比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大大减少了，但是从实际上看，工人的劳动时间却被延长了，工人的实际劳动时间已超出“上班时间”而延续到休息时间。这是因为，随着劳动的技术性的加强，劳动越来越从体力型变为脑力型，这就迫使人们不仅是在上班时间，而且在休息时间，或者为了掌握某种劳动技能而绞尽脑汁、费尽心思，或者为了与所从事的工作“身分”相符而被迫遵守规定的道德原则、参加社交活动，人们的劳动时间并不仅局限于“上班”的6或8小时之内，而是实际上延长至整个生命过程。这样，工人异化和“受管制”的时间实际上也漫及整个生命过程。马尔库塞说：“原先限于上班时间的异化和管制现在蔓入了自由时间。”^②“个体为了生活也不得不工作，这种工作不仅要求他每天耗费8或12小时，并转移了相应的能量，而且要求他在工作和业余

^{①②} [德]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28~29、3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时间内使自己的举止行为符合操作原则的标准和规定的道德。”^①这样，劳动时间实际上“占去了成熟个体的全部生存”^②。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的批判，涉及对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劳动性质的认识。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人的劳动强度减弱，劳动时间减少及劳动条件改善，繁重、粗笨的体力劳动被按电钮、抄抄写写、看管仪器的“轻松”、“安逸”劳动所取代。据此，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工人劳动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它与资本家及经理们为管理工厂、企业而付出的“劳动”并没有什么区别，本质上是一致的，马克思所描写的那种具有“非人”性质的异化劳动已不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劳动特性的考察，否定了这种看法，肯定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的结论仍然适应于当代。他们指出，尽管工人劳动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其异化的“非人”的实质并没有变。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的合理之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他们对异化劳动的揭露，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的，着重声讨、批判的是其对工人人性的摧残，对工人的“作为人”的个性的扼杀。马尔库塞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之所以是异化的、不道德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违背了生命的快乐原则，压抑了力比多，使爱欲无法得到满足，他说：“现在，工作变成了一般工作，因而导致了对力比多的约束：占据极大部分个体生活时间的劳动时间是痛苦的时间，因为异化劳动是对满足原则的反动，对快乐原则的否定。”^③这样，他们不是从经济关系、从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与工人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上，来分析异化劳动，就使得这种批判的力度大大降低了。

①②③ [德]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63、22、2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 政治异化论

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涉及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异化问题。他在谈到异化的基本标志是把“合理的机械化”和“可计算性”应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时指出，现代国家被看作“商业康采恩”，整部国家机器日趋标准化、形式化，这表明在政治领域也出现了类似于工业的合理的机械化和可计算性趋势。官僚体制下的工作人员，承担着酷似一种运转机器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千篇一律；特殊类型的官僚主义的“耿直和公正”，对行政关系的“绝对服从”，这一切都是政治生活中物化（异化）的表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以及西方各国普遍推行福利国家政策，导致国家职能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首先是国家干预能力大大加强，国家干预的范围已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国家干预能力的加强又导致政府机构庞大、政府支出剧增。其次是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蜕变，虽然“二战”的结束标志着民主制战胜了法西斯极权专制，但民主制都蜕变了，其主要标志便是议会权力被大大缩小，行政权力被大大扩大，行政权实际上已凌驾于立法权之上，“议会至上”已成昔日辉煌，取而代之的是“行政专横”局面，三权均衡的格局实际上已被打破；与此相应的是，人民的民主权利也大大被削弱。再次是官僚（文官）制度进一步成熟。文官形成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行政管理实现技术化、程序化。当代西方国家职能所发生的这些新变化，不能不引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注意。他们认为，当代国家职能出现的这些变化，表明政治领域的异化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的一种尖锐形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异化论的主要观点是：

（1）人民大众与国家、政治领导人、政府官僚关系相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异化最普遍、最经常的表现就是国家、政治领导人被当成顶礼膜拜的对象。本来，

国家是人创造的，政治领导人是由于得到人民的允诺才获得其统治权力的，国家及政治领袖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本来它（他们）应服从人民的意志，受人民的控制。但是在当代，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国家机器庞大而复杂，在它面前普通个人显得微不足道、无能为力；政治领袖大权在握、独断专行，操生杀大权，视人民为草芥；人民根本无法体验到自己对国家的主人关系，更谈不上对它进行有效的控制，政治崇拜便由此而生。弗洛姆写道：“领袖和国家实际上是由被统治者的认可而存在的。但是，当个人把他全部的力量投射到领袖和国家身上，对他们顶礼膜拜并期望通过顺从和崇拜他们来重新获得他的某些力量时，领袖和国家就成了个人所敬畏的偶像。”^①人民大众与国家、政治领导人的关系完全异化了。

同时，人民大众与政府官僚的关系也异化了。由于个人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的无能为力，所以治理国家的官僚的作用便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以至于产生这样的感觉：假如没有官僚们，什么事情都会变得支离破碎，甚至人们会挨饿。这样，官僚自然也被“给予上帝般的尊敬”，官僚与人民的真实关系被完全颠倒了，官僚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仆人，反而成为统治人民的主人。“官僚们与大众的关系就成为一种完全异化的关系。”^②弗洛姆分析了这种异化关系的两种表现形式。一方面，就官僚与人民的关系而言，他们异化成为“既无爱也无恨完全无人格”的人，他们完全把被管理者看成一种“客观物体”、一种“事实材料”，“一个活生生的人被贬低成了一个号码”^③ 另一方面，就官僚与国家机器的关系而言，“官僚由于觉得自己是官僚机器的一个部件，因而最不愿负责

^{①②} [德]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123、126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③ 《弗洛姆著作精选》，65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任”^①。互相推诿、扯皮成为异化的官僚体制下常见的现象。

(2) 政治异化的最集中体现是民主的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西方国家民主的“蜕变”，正是政治异化的最重要表现形式。对此，弗洛姆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揭露。他认为，在当代西方所谓民主制国家中，实际上已毫无民主可言，但从表面上看，却又造成了民主的幻像，使人产生民主的幻觉，这就是民主的异化。弗洛姆着重从选举过程和决策过程两方面分析了民主的异化。首先，就选举过程而言，人们通常总是认为，如果一个政府能够做到使每个成年公民都享有选举权，并能诚实地计算选票，各党派都尊重选举结果，那么就应认为是达到了选举民主。其实并非如此，弗洛姆反问道：“如果人们没有任何自己的意愿或信念，如果他们是一些被异化的自动机器，他们的情趣、意见和好恶都受制于社会这部大机器，他们怎么能够表达‘他们的’意愿呢？”^②从表面上看，选民是在“自由”地选举，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任何自由选择的余地，没有自己的意愿可言，他们的“意愿”是政治广告术造成的，如同人们“选择”某种牙膏，与其说是自己“自由”选择的结果，不如说是广告宣传“胜利”的结果。这说明“现代民主中选举人的意愿表达方式也成了一种异化的表达方式”^③。其次，就政治决策过程来看，异化表现在：普通民众对国家最高层次的政治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却造成了民众指导国家政治决策的假像，“这正是公民意愿的异化表达方式的表现，他进行投票选举，自以为他是政治方针的制定者，那些他所接受的东西都是他自己作出的，但事实上，政治的决策主要受制于他无法驾驭和认识的那些力量”^④。总之，弗洛姆认为，不论从选举过程看，还是从政治决策过程看，都没有真正民主可言，“在一个异

① 《弗洛姆著作精选》，49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②③④ [德]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186~187、185、192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化社会中是不可能民主的”^③。

(3)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反对派”的极权主义社会。“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异化造成的一个重要结果是，虽然存在许多政党，但实际上已经没有真正的反对派；虽然民主制的形式还存在着，但实际上却是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马尔库塞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高消费政策，以及人为制造的“虚假需求”，把人们投入到对物质财富、安逸生活的追求中，而社会在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的同时，也必然取消了人们提出不同意见，发出不同声音的权利了。因为正如弗洛姆所说：“如果每个人都满足于通过由管理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设施而获得的幸福的话，他们为什么还要为不同商品和服务设施的不同生产而坚持不同的制度呢？”^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里，对立面正在消失，“传统的麻烦点不是正被清除，就是正被隔离，引起动乱的因素也得到控制”；对立被削弱为在现存制度下对不同政策的讨论和促进；劳资之间的阶级对立正在淡化，劳工与资本家出现了某种“沟通与联盟”，如“工会和公司都参与了院外游说活动”；敌对政党之间的分歧正在缩小，它们的政纲相似得令人难以分辨，甚至连伪善程度和老生常谈的调子都极为相近。马尔库塞悲哀地说，两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曾经为之努力奋斗的民主、自由，现在已丧失殆尽，其代价正是这种安逸、舒适的生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沦为一个“没有反对派”的极权主义社会。

“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异化论批判的重点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民主制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对此，西方思想界作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思。一

^③ [德]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347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④ [德]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46、19、2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种是以保守主义为代表的精英主义的反思。他们认为民主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多数统治”或“人民主权”；民主只是形成政治统治集团的一种制度安排，政治统治从来就是少数对多数的统治，政治决策从来只能是自上而下地作出。据此，他们认为当代西方民主制出现的新变化，如行政集权、官僚制度化、决策权高度集中等，是符合民主原则的。因此他们认定，现行的西方民主制是合理的，如果有什么需要进一步完善的话，那就是要对民众所享有的民主权利进一步加以限制，不要让他们干扰政治精英的决策。另一种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的反思，他们对现行西方政治制度持根本否定的态度，断然否定它是一种民主制度。“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持的民主标准，是传统的民主原则，即“多数统治”、“人民主权”意义上的民主，并以此衡量西方现行政治制度。他们认为，人民与国家、与政治领导人、与政府官僚的关系已经完全异化，完全颠倒，人民大众非但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主权者”，反而成为政治领袖、官僚们任意宰割的对象。民主的外在形式虽然仍然存留着，如议会制、普选制、多党制等，但其实际内容已经被偷换了：议会虽然仍然存在并在运作，但实际权力掌握在政治领袖和官僚手中；选举仍然定期地举行，但选民已无任何选择余地；反对派的合法地位仍被法律所承认，但他们已失去“发出不同声音”的权利。由此他们断言，现行的西方政治制度，是一种极权主义制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看法，揭露了西方民主制的虚伪性，揭示其专制极权的实质，这显然有一定的合理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异化论具有明显缺陷。首先，虽然他们对西方政治制度合理性的否定是坚决的，但他们未能从经济根源上、从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上，来分析批判资本主义民主制，而只是从异化的角度，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否定其合理性，这样使得他们对西方民主制的批判显得很肤浅无力。其次，

他们是以传统资产阶级民主原则为标准，去分析现行西方民主制的，未能说明两种民主制的区别与对立，未能揭示西方民主制的阶级实质。再次，由于他们对异化的“泛化”理解，他们不是把政治异化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而是把它看作是当代社会的一种通病。这样，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异化也是不可避免的。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人在论及“极权主义”时，都毫无例外地将社会主义归入此列，甚至认为这种极权主义比资本主义的极权主义更糟糕。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也把政治异化当作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如南斯拉夫实践派的马尔科维奇断言，只要社会中仍然存在“政治主体”和“政治客体”的分工，只要还存在进行决策的人与只能服从并依据这些决策从事活动的人的区别，那么社会的政治异化就不可避免，这就把政治异化永恒化，也混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政治制度的区别。

3. 消费异化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二战”以后，西方各国普遍推行福利政策，实行高工资，提倡高消费，西方社会也成了所谓“消费社会”。与此同时，异化也侵入了消费领域，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异化形式——消费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当代，消费异化已成为当代各种异化的集合点；在经济上，它与劳动异化互相支持、互相促进，成了劳动异化得以继续存在并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政治上，它增加大众对政府合法性的认同，从而支持着资本主义制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阿格尔说：“马克思对消费领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他没有预见到对嗜好的操纵会成为维持和提高利润率以及实施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①阿格尔还进而提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不是在生产

^① [加]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18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领域，而是在消费领域发生，即通过“期望破灭的辩证法”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因为如此，6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视对消费异化的研究，提出了种种论点。

(1) 消费异化“是真正自由的苍白反映”，是对不自由的劳动的一种虚假的“自由”补偿。“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领域，由于劳动异化，人们从事着单调、乏味、无聊的工作，在劳动中，他们是不自由的，无法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自主性，于是人们便把注意力转向消费领域，试图通过消费行为来“补偿”劳动中的这一“不足”：在消费领域，只要我有钱，即可以买到我想要的任何东西，只有在这里，我是自由的，我的创造性和自主性才得以体现，也只有在这里，我才是作为一个积极的主体而不是一个被动的客体参与社会活动。所以阿格尔将消费异化定义为“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①。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企图通过消费而得到某种自由的“补偿”，只能是一种“虚假的补偿”。因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消费也是受控制、受操纵的。从表面上看，在消费领域，我只要有钱，便可随心所欲地消费，但实际上，我们是按照厂商的意图，按照广告商的旨意来消费的。因此，在消费领域，如同在生产劳动中，人们也是不自由的。马尔库塞指出，在异化的条件下，人们对消费品和服务的所谓“自由”选择，并不是真正自由的表现，“在大量的商品和服务设施中所进行的自由选择，并不意味着自由”。马尔库塞将这种不自由的消费称为“强迫性消费”。弗洛姆认为，人们不仅在购买消费品时是不自由的，而且在闲暇时间里也是被控制的。在闲暇时间，我们“消费”球赛、电

^①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49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影、报刊、书籍、演讲、自然景色等等，这同我们消费其他商品一样，我们都缺乏主动性，我们并不是主动地参与这些活动，而是被动地“吸收”一切已有的东西；我们的情趣是被安排好的，我们的要求是被煽动起来的，我们没有任何自由可言。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试图通过消费来补偿劳动中失去的自由，无异于缘木求鱼，求而不得，阿格尔将这种消费行为称为“真正自由的苍白反映”^①。

(2) 消费成为现代人逃避痛苦与不幸的避难所。“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异化的条件下，劳动成为一种难以逃脱的苦役，人们在劳动中毫无幸福、快乐可言，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自然成为人们逃避劳动痛苦和不幸的避难所。弗洛姆说：“异化的人是没有幸福可言的。娱乐的消费就是为了消除他的不幸意识”^②。马尔库塞则将消费称为“不幸之中的欣慰”^③。正因为如此，幸福被等同于消费，幸福的“大小”则取决于被消费物品的“多少”。弗洛姆说：“今天，人的幸福就是‘寻求快活’，而寻求快活就是通过消费得到满足。”^④“幸福就是消费更新和更好的商品，饮下音乐、电影、娱乐、性欲、酒和香烟。”在这种心态支配下，消费成了一种病态行为，一种对物品的无度的索取和占有。世界上的一切，自然的和人创造的，都进入了人的消费范围，成为人的消费对象。如果现代人要描述一下什么是天堂的话，弗洛姆断言，那一定是一个应有尽有的大百货商场。

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将消费视为逃避痛苦的避难所，如同饮鸩止渴，适得其反，一时消费的满足，只能带来暂时

①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49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② [德]弗洛姆：《健全的社会》，167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公司，1988。

③ [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④ [德]弗洛姆：《爱的艺术》，9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的“快乐”，接踵而来的往往是更大的痛苦。弗洛姆说：“他极力节省时间，同时又为如何消磨多余的时间而犯愁。”^① 所以现代人“永远都是失望者”^②。

(3) 消费已与人的真正需要相脱节，成为为消费而消费的变态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消费本来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它总是与人的某种具体需要相联系的，如对面包的消费是为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对书刊的消费是为满足人的精神需要。但是，由于人们将消费看作是对失去的自由的一种“补偿”，看作是躲避不幸的避难所，这样，消费便从手段而成为目的，与人的需要相脱节，成为为消费而消费的变态行为。弗洛姆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怪现象：明明一辈子也用不上一回，但却有人不惜重金购置贵重金属做的餐具，水晶玻璃做的花瓶；明明不是为了居住，却巨资购置配有汽车房和仆人的高级别墅。这说明，对这些人来说，购置这些物品并不是为了使用，而仅仅是为了占有，“我们获得物品就是为了占有它们。我们满足于无使用价值的占有”^③。这种“占有”又成了地位和身分的象征。在这种“占有”心态的支配下，一系列的怪现象发生了：尽管我没有一点艺术鉴赏力，我却可以买最珍贵的画；尽管五音不全，我却可以拥有最高级的音响设备；尽管仅仅为了卖弄才偶尔使用图书馆，我却可以买下一座图书馆；仅仅因为视文凭为一种附加的社会财富，我可以花钱受教育；……这种“消费”，与满足人的需要，已相去十万八千里。

(4) 消费异化成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手段。“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如此关注消费领域中的现象，是因为，他们认为消费异化在当代已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还起到一种重要的“政治作用”（阿格尔语），消费异化实际上已成为维护资本主义制

①②③ [德]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207、167、133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公司，1988。

度的一种特殊手段。这是因为：

其一，消费异化腐蚀人们的灵魂、毒害人们的心理。弗洛姆说，消费异化一方面加强了西方人本来固有的“接受型”心理倾向（即消极被动地接受外界所给予的一切），窒息了人仅有的一点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消费异化使人把消费当作目的，因此总是喜新厌旧，以能够购买到最新奇的物品为荣，“它使得消费者不尊重劳动和人的创造的成果；它使消费者忘记了他自己的国家和更贫困的国家中还有许多衣食不济的人”^①。这两种结果，正好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必需的，它为资本主义再生产，为维持较高的利润率，转移经济危机，创造了条件。

其二，消费异化增强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依赖性。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厂家不断制造出新奇的物品，社会不断地制造虚假需求，迫使人们不断地购买、不断地消费，从而大大增强了人们对社会制度的依赖性。弗洛姆说：“对消费不断增长的需要迫使我们不断地去购买，从而使我们依赖于这种膨胀的消费需求，依赖于那些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人和机构。”^②

其三，消费异化化解社会矛盾，瓦解人们的斗志，从而增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消费异化所造成的最严重恶果。首先是无产阶级深受其害，他们的斗志被瓦解。在消费异化浪潮冲击下，无产阶级“消失”了，被“替代”了，被“一体化”了，再也不是富有生气的掘墓人，而是普普通通的“消费者”了。列斐伏尔就曾经描述了无产阶级的这一“消失”过程。其次，消费异化还起到化解人们的不满情绪，消融社会矛盾，从而加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的作用。马尔库塞指出，消费异化造成了一种普遍的心理：人们所关心的只是消费

^{①②} [德]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340、135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欲望能否得到满足，至于以何方式，如何得到满足，人们则漠不关心，在这方面，由某种极权主义制度还是由某种非极权主义制度来满足需要，似乎是无关紧要的。阿格尔也指出，由于把人们的注意力都引到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消费品上，从而大大分散了人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注意力，转移了人们对社会制度的不满情绪。阿格尔说，“个人提高其消费水平可以赢得更高程度的社会和政治控制”，所以，资产阶级统治者总是以许诺高消费来获得民众对其合法性的支持，“合法性是以许诺高消费而获得的”。“对消费实行操纵和调节已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①

50至6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高度关注消费领域，对消费异化作了大量的分析和揭露，这既有其理论的需要，又有其现实的根据。从理论上讲，“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消费领域，是与他们战后整个批判理论的“转向”——即从宏观的制度上的批判转向微观的社会生活诸领域的批判，从抽象的（哲学的）批判转向具体的（日常生活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对消费异化的批判，正是他们这种批判“新视野”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消费异化的批判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形成一个完整体系。从现实角度看，战后，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也由于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庞大生产能力被转入和平用途，使得社会有可能向人民提供大量的消费品。而对于战时过惯紧日子的西方人来说，也普遍产生了“补偿”心理（把在战争中的损失补回来），“享乐”思想相当流行，一时间，西方进入了所谓“消费社会”。对于一贯密切注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动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一重大变化不能不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

从以上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消费异

^①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49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化的分析和揭露有些是很透彻的，他们在 50 至 60 年代对消费异化的发展趋势及严重恶果的一些预测，都为 70 至 80 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所证实，这也说明了他们所作的分析和批判是颇有力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把消费领域的异化现象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联系起来考察，分析了消费异化在当代具有维护资本主义政治、社会制度的功能，从而起到延长资本主义“寿命”的作用，这种看法是相当激进的，这对以后的“新左派”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在“五月风暴”中，“新左派”学生喊出“消费社会不得好死”的口号，明显地是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影响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费异化论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他们对消费异化的社会作用作了不切合实际的拔高，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弊端和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似乎只要消除了消费异化，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阿格尔甚至把克服消费异化，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突破口，认为“社会变革的动力就植根于人的需求与商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而这种过程是由有限的生态系统确定的”^①。这就是阿格尔所谓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根据这种观点，社会革命似乎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的发生取决于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一旦人的需要与社会生产超出其负荷，社会革命即自然到来。这样一来，革命显然无需积极主动的斗争，只要坐等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这样一种“革命”理论，无异于取消革命。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论 克服异化的途径

既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总体异化”的社会，那么，人

^① [加]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486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们是否可能克服、消除异化，建立起一个合理的、健全的社会呢？从理论上讲，“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产生根源的分析便已将自己引入了理论的死胡同，注定了他们永远无法找到克服异化的途径。但他们并不放弃这种努力，他们中的许多人真诚地相信，异化是违背人性的，是不人道的，因而是应当克服的；只有消除了异化，人才能真正过上“人”的生活，人类社会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这种主观愿望与其理论的逻辑是相矛盾的，这种矛盾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产生了理论的混乱。

先看萨特。由于萨特将匮乏看作产生异化的根本原因，所以在他看来，只有消灭了匮乏，才能克服异化。他认为，匮乏虽然是人类社会存在所面临的基本事实，但它并不是一种必然性，而仅仅是一种偶然性：“匮乏是我们历史的一个基本关系和我们同物质性的单一关系的一个偶然规定。”^① 这就是说，从理论上讲，匮乏是可以消除的，异化是可以克服的^②。但是，另一方面，萨特又认为，从人类实践角度看，异化是一种与人类实践共存亡的现象，只要人类实践还在进行着，异化便永无消除之日。也就在同一本《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向我们描绘了一幅人类在异化和反抗中苦斗，却又无法消除异化的图景。实践是人类历史的开端，但在匮乏条件下，个人实践由于外在性的内在化和内在性的外在化而必然异化为“实践—惰性”。为了反抗异化，个人便结合成群体，最初的群体称“集群”，集群并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集群中，人是孤立和隔离的，彼此之间的作用是外在的和否定性的，因而

① [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转引自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51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② 萨特的学生高兹就是这样理解萨特异化思想的。他认为，在萨特那里，“异化的必然性是某种历史的东西而不是某种本体论的或形而上学的东西，所以在原则上，必然是有可能消灭它的”（高兹：《社会主义和革命》，纽约1973年英文版，第256页）。——参见徐崇温著：《“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226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集群的力量是有限的，不足以克服异化。在“集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集团”，较之“集群”，集团有较高的组织性，集团中的人们也有某种共同目标。根据组织程度的不同，萨特又将集团分为“融合集团”、“誓愿集团”、“组织集团”、“制度集团”。随着集团的一步步发展，人类克服异化的能力也相应地提高，但事情也一步步发展到它的反面；随着集团组织程度的提高，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也越来越明确，最终在“制度集团”中，便形成了人人必须服从的主权者。本来，人们结合成为集群、组织为集团，是为弥补个体力量无力反抗异化之不足的，是为了争取个人自由的，但发展到“制度集团”，主权者的出现却引起新的异化，个体比任何时候都更软弱无力，比任何时候都更不自由。于是为了反抗新异化，人们不得不解散集团，重新回到个人实践状态，于是新一轮的奋斗又开始了。所以在萨特看来，反抗——异化——再反抗——再异化……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便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概貌。异化从没有被克服，也永远不能被克服。这是萨特异化理论的一个基本结论。

以阿格尔为代表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将“期望破灭的辩证法”看作克服异化的根本途径。如前所述，他们把消费异化看作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的最主要异化形式，看作是导致其他异化的根源。所以，在他们看来，消除异化，首先是要克服消费异化，而克服消费异化的动力不是来自社会，而是“来自生态危机的迫切性（供应和资源的短缺）”^①。阿格尔具体描述了这一从消费领域入手的消除异化过程。他认为，首先是生态系统无力承受无限增长的生产能力，导致生产萎缩，出现“无增长的经济”，人们的无限消费欲望得不到满足，于是人们的期望破灭了，这迫使人们

^① [加]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49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重新思考人的需要与消费的关系。阿格尔说:“期望破灭了辩证法会使人们重新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愿望。”人们将对自己应过什么样的生活形成新的期望,“从而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耗的观念”^①。随着消费观念的变化,人们的消费行为也将发生变革,那种依附于广告媒介的消耗和把消耗看作满足的唯一手段的消耗现象将会消失,从而克服消耗异化。消耗领域的这一变革将扩展到劳动生产领域,劳动再也不被看作是获得应用于未来消耗的财富的手段,而是实现人类自身基本愿望和价值的手段,换言之,劳动的强制性将消失,劳动成了真正的“创造性劳动”。随着劳动异化的消失,生产领域将出现非官僚化和民主化趋势,即生产的小型化、分散化,实现工人对生产过程的直接管理,而这又将引起整个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的全面改组。工业生产的非官僚化和民主化的趋势将进一步扩展到社会政治领域,整个社会的权力关系将发生改变,那种等级制的、自上而下进行统治的权力体系将被分散的、自治的管理形式所取代。阿格尔断言,发端于消耗领域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最终将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一个消除了异化的社会不仅是可望的,而且是可及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格尔称“社会变革就可能由人们为征服生态危机的真正威胁所作的努力而引起”^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首先,把克服异化的社会行为归结为一种自然行为,把社会革命看作是一个取决于生态系统承受能力的纯自然过程,从而实际上否定了革命的必要性。其次,这种观点也带有明显的乌托邦成分。事实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普遍实现国家干预政策,对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实行一定的计划和控制,已

^{①②}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497、49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有足够的力量应付可能发生于生产或消费领域的任何变异，从而阿格尔等人所设想的那种发端于消费领域的、将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社会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再次，这种论点将克服异化寄希望于生态系统的危机，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到生态问题上，从而忽视了社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领域变革的重要性，在客观上，起到了维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作用。

弗洛姆的克服异化理论最具特色，他对消除异化充满了信心。既然异化产生于由人之“生存两歧”而引起的病态心理体验，“生存两歧”虽不可克服，但这种“感觉不到自己就是他个人世界的中心”、“他只觉得自己的行动及其结果成了他的主人，只能服从甚至崇拜它们”的心理体验，则是可以消除的，消除异化的希望就在于人性的“可塑性”。在《希望的革命》一书中，他向我们指出了一个以重新塑造人性为核心的人类克服异化的计划，他称之为“工艺社会人道化”的计划。按照弗洛姆的构想，克服异化，实现社会人道化的过程，将通过几个步骤实现：第一，任何计划的制订，都应该把人当作人而不是“事实”或“材料”，“这就是说，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的最后根源；一切计划的标准不是生产的最大限度的发展，而是人的最理想的发展”^①。这样就有可能逐步消除劳动异化。第二，在企业及政府管理中，以“人道化的管理”取代现行的“异化的官僚政治”。在现行的“异化的官僚政治”中，所有的权力都是从上向下灌输下来的。而在人道化的管理体制中，社会成员被组织在一个个“面对面的小群体”中，上层决策与“属员”的意见存在一条畅通的“双行道”，“属员”的意见不仅可以到达上层决策者那里，而且可以迫使决策者作出反应。这样，尽管社会庞大，计划集中，并采用机器生产和计算机控制，但个人在管理者、环境和机器面前仍可维护自己的权利，

^① 《弗洛姆著作精选》，49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他不再是在活动中不起积极作用的无能的分子了。只有以这样的方式肯定他的意志，个人的能量才能得以释放，他的精神上的平衡才得以恢复”^①，这样便能消除劳动异化、政治异化、人际关系异化，解除人的各种心理压抑，从而最大限度地使个人得以“激活”(activation)。第三，改变目前的消费方式，提倡人道化消费。与阿格尔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弗洛姆认为这种“人道化消费”并不必使经济处于零增长状态，而是使社会生产改变方向，即从现在生产大量“不必要的”私人消费品转移到生产“人道的”社会性消费品，诸如成千上万新住宅的重建，公共教育和健康方面的大幅度扩充和改善，城市和郊区的公共交通的发展，把戏剧、音乐、舞蹈、信息、电影制作等融入到成千上万个团体和数百万人的生活中去，等等。如果私人消费受限制，那么现时的“令人窒息的非人道的”异化消费现象就将消除。第四，在弗洛姆看来也是最主要的，是使人得到“心理精神更新”。由于异化主要是一种病态心理体验方式，所以单有环境的变革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心理精神的更新”，而到目前为止，唯一能带来这种更新的力量是宗教的力量。所以弗洛姆提出应建立一种“没有类似于启示录或任何种类的神话学前提上的新宗教”^②。

较之前面几种克服异化的理论，弗洛姆的理论显得具体、丰满得多，它不仅能保持其理论的一贯性，而且还有一系列计划和实施方案。但弗洛姆的这一套理论的错误是很明显的。首先，这一“人道化计划”带有很大的空想成分，在现实社会中是行不通的。如，怎样消除异化消费，实现人道化消费呢？他提出，最有效的办法“是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消费运动，以‘罢购’威胁作为运动的武器”^③，然后由“激进的人道主义消费运动的领导人”出面，同政府及大产业老板谈判，迫使社会生产“转向”。任何一个

①②③ 《弗洛姆著作精选》，495、519、65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对这种方法究竟能产生多大实际效果是很明了的。其次，弗洛姆“工艺社会人道化”计划，是一种在现存资本主义民主制框架内，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作些调整的改良主义计划。弗洛姆一再强调，“这种改革可以通过法律来进行，而无需乎改变西方的民主制度”。“所有这些变革都只能在得到大多数人民同意的情况下逐步地进行。”^①所以他提出的一些具体措施，并没有什么新意，无非是地方分权、扩大自治团体权力、每个社会成员直接参与民主过程、使生产为消费服务、限制大公司无限扩大生产能力等老生常谈。姑且不论这些措施能否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得以推行，即使推行了，能否奏效，仍是很值得怀疑的。第三，弗洛姆整个“工艺社会人道化”计划的核心是提倡一种新的宗教，这种新的宗教可称为“爱的宗教”，因为在他看来要使人“精神心理”得到更新，最重要的就是要使人懂得爱与被爱。人之所以产生异化的病态心理体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人间失去真正的爱，所以只有爱，才能消除这种心理体验，弗洛姆说：“爱是在保持自我的分离性和完整性的情况下，与自身以外的某个人或某个物的结合。作为一种共享和参与的体验，爱使人的内心活动充分展现出来，爱的体验使人消除了幻觉，我不再把他人或自己作为偶像来崇拜，因为积极的参与和爱使我超越了个体的存在，同时也使我感到自己成了一些积极力量的承担者，正是这些积极力量构成了爱的行动。”^②很显然，弗洛姆的这一主张，与19世纪费尔巴哈所提倡的“爱的宗教”并无两样。所不同的是，弗洛姆加上了20世纪精神分析的内容。他认为，怎样才能使人懂得爱呢？这就需要借助精神分析对人们进行“灵魂的治疗”了。后来他又对禅宗佛教感兴趣，认

^① 《弗洛姆著作精选》，64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② [德]弗洛姆：《健全的社会》，29~30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为禅洞察人的存在的本质，有助于使人懂得爱。如果说，弗洛姆对资本主义异化现象所作的批判和揭露，还是有其合理性、积极性的话，而他对爱的宗教的鼓吹，则完全是消极的了。他把精神分析与禅宗佛教当作克服异化的最有效武器（其实，就其认为异化产生于人之“生存两歧”而言，异化是无法克服的），使他不像是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者，而像是一个布道的传教士了。

四、异化及人道主义理论的地位

异化及人道主义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异化和人道主义属于哲学论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将它引入社会政治学说中，作为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武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支点和构造“新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成为贯穿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一条红线。

1. 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的思想武器

20年代，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首先使用“物化”（异化）概念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思考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从此，异化便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用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的思想武器。或者借用某些国外研究者的话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描述资本主义统治下的现代生活世界现象的“概念工具”，尤其是在“批判的马克思主义”那里，更形成了一种类似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异化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状况的剖析，对社会革命主体、动力、对象的基本估计，以及对未来“新社会主义”蓝图的描绘，都是以其异化理论为出发点的。可以说，抽掉了这个“概念工具”，“西方马克思主义”便无从构造其批判理论的大厦。

把异化理论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主要思想武器，这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合理性的否定是坚决的、彻底的，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诸领域各种弊病的揭露是全面的、无情的，但这种否定、揭露又显得苍白无力，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的声讨和控诉，而不是立足于科学基础上的剖析、批判。在他们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弊病，并不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尖锐矛盾，而是其对人的摧残、对人性的压抑，他们创造的诸如“多余的压抑”、“虚假的需求”、“市场型人格”、“合理的机械性”和“可计算性”、“非人的人”等概念，都在于说明人的这种状况。正如弗洛姆所说的，当代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人死了”。这样，在这种愤怒的声讨之后，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克服资本主义异化，从而使人类得到真正解放的正确途径。

2.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阿基米德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基本原理已经“过时”，必须加以“重建”。这种“重建”的阿基米德点，正是异化及人道主义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手法。第一种手法可称为“正本清源”，第二种手法是“另起炉灶”。卢卡奇及“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多采取第一种手法。他们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立起来，认为恩格斯、列宁等人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将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单纯从经济方面、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来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否认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作用，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堕落成一种“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弗洛姆断然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同那种把“物质的”或“经济的”斗争看作人的最基本的推动力的观点，

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据此他诬蔑恩格斯是个“非人的”、“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者”。因此，在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正本清源，还马克思的历史观以本来面目。

那么，马克思历史观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就是人道主义的世界观。卢卡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提出和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只能是“完整的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高原则是“对人的完整性的关心”，而人道主义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心，成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中心。”^① 弗洛姆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历史观始终将人、现实的和完整的人、“现实地生活着的人”看作历史的主题，也是历史规律这一观念的主题。根据这一理解，弗洛姆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并不认为人的主要动机就是获得物质财富，相反，马克思的目标恰恰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脱出来，使人成为具有充分人性的人；马克思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使人作为个人得到解放，克服异化，使人恢复他自己与别人以及与自然界密切联系的能力。据此，弗洛姆甚至提出，为了区别于恩格斯等人的“经济唯物主义”，可以将马克思的历史观叫做“人类学的历史观”^②，或者也可称之为“精神的存在主义”^③。那么，马克思历史观的“源”在哪里呢？几乎所有“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作历史唯物主义之本源，而根据他们的理解，《手稿》的核心思想正是异化和人道主义理论。就在1932年即《手稿》发表的那一年，马尔库塞便在《社

① 《卢卡奇文学论文集》，第1册，30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②③ 转引自《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30、2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会研究杂志》第8期上发表题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的文章，认为《手稿》的发表“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由来、本来含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①，而这个基础正是异化和人道主义理论，因为《手稿》所描述的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的外化、生命的贬损、人的现实的歪曲和丧失的抗议。因此，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是把消灭了异化和物化的‘实证的共产主义’看作人本主义来加以叙述的，人本主义这一术语表明，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的基础就是人的本质的某种实现”^②。弗洛姆也认为《手稿》的核心问题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存在”问题，《手稿》代表着一种“抗议”，而这种抗议又充满着对人的信心，相信人能够使自己得到解放。正是这种观念，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道主义基础。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整个“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第二种手法是“另起炉灶”，即从根本上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试图提出另一种历史理论取而代之。“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这种手法的代表。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可以归结为一个令人惊异的公式，即历史是由阴暗面推动前进的。列斐伏尔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作“社会决定论”，认为这种决定论陷入了“拜物教”的客观性和社会关系的特定客观性之中，他提出应该把“总体的人”作为构造新的历史理论的出发点。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继续了列斐伏尔的这一思路，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出现了一块“人学的空场”，历史唯物主义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现象时见“物”不见“人”，所以必须以“把人的知识建立在人的存在上的思想”的存在主义“人学”去补充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空场”，使马克思主义能重新“发现人”、“探索人”，成

^{①②} 转引自《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93、10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为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①萨特从两个方面另起炉灶，一是在方法论方面以所谓“前进—逆溯”方法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和分析理论”。“前进—逆溯”方法是一种“人学”方法，“前进”就是分析历史活动中个别人的行动、实践的客观结果；“逆溯”就是追问被分析人的家庭、教育、集团对他产生的影响及他个人的各种生理、心理特质。二是在内容方面，以描绘人的异化—反抗、再异化—再反抗过程的“历史人学”，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总之，萨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实质上就是要以存在主义的“历史人学”取代历史唯物主义，使存在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块“飞地”。

不论是卢卡奇和“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正本清源”，还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另起炉灶”，都把异化和人道主义理论当作“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阿基米德点”。

3. 构造“新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样持否定态度，在他们的眼中，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为主体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简直就是极权主义的代名词。因此他们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就不像对待历史唯物主义那么“客气”了。他们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应彻底屏弃，代之以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的“新社会主义”理论。在他们看来，“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并不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共同富裕，而是人的异化的克服，人性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列斐伏尔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总体的人”的社会主义，而“总体的人”是“消除了异化”的、全面发展的人，“总体的人”的社会主义实现了自我与为我、起源和终结、变化与超越、客体和主体、本质和存在的统一，所以是使“人回复到人”的社会主义。弗洛姆明确将“新社会主义”称为“人道

① 参见[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133～1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主义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是，人高于物，生产高于财产，因而劳动也高于资本”^①。弗洛姆还认为这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正是马克思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文中，弗洛姆专门谈到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正是从人的概念中推导出来的，所以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去创造出一种生产的形式和社会的组织，在这种形式和组织中，人能从他的生产中，从他的劳动中、从他的伙伴中、从他自身和从自然中，克服异化；在这种形式和组织中，人能复归他自身，并以他自己的力量掌握世界，从而跟世界相统一”^②。弗洛姆甚至还把他所曲解的这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旧约全书》的救世主义、基督教的千年王国论、13世纪的托马斯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乌托邦主义、18世纪的启蒙主义联系起来，认为社会主义正是历史上渊源久长的人道主义思想发展的结果，是“精神上的实现阶段的先知的基督教的社会思想和个人自由的思想的综合”^③。

4. “西方马克思主义”异化及人道主义理论的非马克思主义性质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及人道主义理论，是渊源于马克思的早期的异化及人道主义思想的，在结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异化及人道主义理论的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谈一下这两种异化和人道主义理论的本质区别，以澄清在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上被“西方马克思主义”搞混的一些理论是非；进一步认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非马克思主义性质。

(1) 在马克思那里，异化只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范畴；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异化是一个核心概

① 《人的呼唤——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115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②③ 转引自《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69、7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念。异化是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特别是在《手稿》中，异化（主要是劳动异化）是个主导性概念。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说明了私有财产、商业、竞争、资本、货币等经济范畴以及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在成熟的马克思著作中（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由于他已经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和历史唯物论，因而便不再以异化概念来说明经济范畴和经济现象，而是用社会分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一系列经济范畴来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说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虽然在成熟的著作中，马克思仍然使用异化概念，但仅仅是用来表明某些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的对立性，异化已成了附属性的概念。因此，可以说，在马克思那里，异化仅仅是一个过渡性范畴，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者到唯物主义者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过渡范畴。相反，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异化始终是个核心概念，是贯穿于其社会政治理论的一条红线。由此可见，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居于完全不同的地位，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

(2) 在马克思那里，异化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异化是一个本体论范畴。在早期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马克思始终把异化和对象化严格区分开来，始终把异化看作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在《手稿》中，马克思严格区分了对象化和异化这两个不同范畴，认为对象化是人的劳动所固有的特征，即人将自己的本质力量体现在对象中。而异化则指人类劳动的对象，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与劳动者相对立，反对并压迫劳动者。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对象化只能造成异化的可能性，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象化才成为异化，只有“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

为异化、外化”^①。因此，马克思坚决反对把一切对象化都看成异化，把异化普遍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明确反对“把一切现实的关系和现实的个人都预先宣布为异化的”，反对“把这关系和个人都变成关于异化的完全抽象的词句”^②。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异化与对象化完全等同起来了，这种倾向始于卢卡奇，而萨特则将它推向极端。在萨特那里，异化被看作是一种根植于人的存在的、与人类共存亡的本体论现象，这种把异化普遍化、永恒化的做法，显然与马克思有着本质区别。

(3)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的本质区别，还表现在两者对异化产生根源的不同分析和克服异化的不同途径等问题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劳动异化论，他是从经济事实出发来展开他的论述的。这一事实就是：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困；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这就是劳动产品（劳动对象）的异化，它表明“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③。而劳动产品异化的根源是劳动异化。“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④同劳动产品的异化表明工人同物、同外部世界的敌对关系，即与自然相异化，劳动过程中的异化则表明工人的自我异化。从劳动异化中产生出了其他各种异化形式：“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⑤，“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⑥。那么，劳动为

①③④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91、91、93、98、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316~3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什么出现异化呢？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原因就在于劳动和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所有，劳动给工人带来痛苦而给不劳动的人带来享受和欢乐。这样，马克思便从异化劳动中找到了一切异化的终极根源——私有制：“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①显然，要克服异化，就要消灭私有制，实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②，这就是马克思从异化理论中得出的革命性结论。不仅如此，马克思还从无产阶级身上找到了克服异化的物质力量，论述了无产阶级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异化批判的出发点并不是“经济事实”，因而他们无法从私有制的经济关系中发现产生异化的真正原因，他们或者把异化之因归于科学技术，或者归于人的本质，这不仅在客观上掩盖了私有制是异化之源这一事实，而且永远找不到克服异化的正确途径。

(4) 马克思人道主义理论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理论的根本对立。“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把人道主义当作自己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而且还硬把它强加给马克思，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马克思就是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马尔库塞认为人道主义是贯穿于马克思所有著作的一根红线，弗洛姆否认有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分，认为马克思思想具有“连贯性”，这就是人道主义。整个马克思的哲学代表着一种“抗议”，抗议人的异化，抗议人失去他自身，抗议人变成为物。这里涉及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对此，我们有必要阐述一下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如同异化是个过渡性概念，人道主义也是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在马克思还没有完成唯物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00、1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史观的发现，还没有完全摆脱旧思想，尤其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时，他曾把自己的理论称为人道主义，这一特征在《手稿》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手稿》中，马克思多次提到他的理论是“实践的人道主义”，“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是“从自身开始的积极的人道主义”^①，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②。但这一时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仍有本质区别，已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因素。如我们前面所论及的，在《手稿》中，马克思已将劳动、实践看作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已把劳动异化和私有制联系起来，初步论述了资本和劳动对立的经济基础，指出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克服异化，实现人的复归，等等。1845—1846年，马克思完成了思想转变，与恩格斯一道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把自己的学说，包括关于人的学说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从此以后，马克思不仅再没有把自己的理论称作人道主义，反而对人道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显然，不仅把整个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是错误的，而且把《手稿》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完全等同于人道主义也是错误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篡改。当然，我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但并不否认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的价值。作为伦理原则的人道主义，要求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的地位，应给予每个人以人的待遇，把人当人看，平等待人，尊重人，等等，这些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而且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一贯主张。然而，这种人道主义与作为世界观的人道主义是两码事。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74～175、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第六章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 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是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指出，自2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主题的“创新”，即渐渐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要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而是“自始至终地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的一般趋势。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这几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从一开始就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这种传统为法兰克福学派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及代表人物进一步“发扬光大”。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理论（简称意识形态理论）。这一理论的内容十分丰富，我们选择它的一些主要方面（包括意识形态概念、工具理性批判、实证主义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等）来加以评述。

一、意识形态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是现代意识形态理论的奠基人，“意识形态”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概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如何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如何理解这一概念的含义、特征和作用？这一直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东西方学者对此展开了长期的讨论，使意识形态问题自20年代以来一直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及一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或者说成为当代的一个哲学主题。在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特别引人注目，几乎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等都对意识形态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他们的理论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和一般西方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今天，研究他们的这一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角度或方面去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或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大致可以说，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这几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在20年代前后在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时，不仅重视界定意识形态的范围与地位，而且强调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及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以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为代表的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在30年代则着重批评卡尔·曼海姆等人的意识形态理论（特别是“总体意识形态”概念），在某些方面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以赖希和弗洛姆为代表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30和40年代及其后则主张用精神分析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用性格结构和社会性格一类的东西来充当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联系的中介环节；二战以后，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等人则着重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角度去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理论。

早在 20 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在总结中西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机械主义和经济主义观点，强调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他们认定，欧洲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客观条件不成熟和没有一个成熟的党，而在于忽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因此，他们高度重视开展意识形态斗争以及掌握文化领导权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

卢卡奇在其《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将意识形态当作一个基本概念。他按照自己的见解来理解和运用这一概念，形成较系统的意识形态理论，这构成他的阶级意识理论及一般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历史和阶级意识》的一个论题，意识形态概念是他在讨论阶级意识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时使用的。在他那里，“阶级意识”、“意识形态”、“虚假意识”等概念往往同时出现，交织在一起。卢卡奇并未对“意识形态”下过明确的定义，但是从它的一系列的论述中可见他将意识形态等同于（自觉的）阶级意识，认为它是反映特定阶级的地位和利益的思想理论体系，它被当作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并列的概念。卢卡奇基本上将“意识形态”当作一个中性或描述的概念来加以使用，并未赋予它否定的内涵，或简单地等同于“虚假的意识”，他将意识形态同样运用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等同于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意识，他说：“当资本主义最终的经济危机爆发时，革命的命运特别依赖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熟，也就是依赖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①他认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是附从于斗争的旗帜，也不是对自己目的的掩饰物，

^① [匈]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 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它本身就是无产阶级的目的和武器。^①马克思主义被他称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表达”；历史唯物主义则是“战斗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②；他还经常说到“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因此，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是真实的意识，而非虚假的意识。卢卡奇同样将意识形态用到资产阶级身上。他指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意识的理论表达，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适应于经济意识，但它以虚假的形式表现出来。从意识与社会的关系上看，这种矛盾表现为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③在他看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所以是假的，并不是因为它是意识形态，而是由于资产阶级特殊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即资产阶级“将它自身的利益冒充为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欺骗其他阶级，维护少数人的统治”^④。

由此可见，卢卡奇主要将意识形态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斗争着的不同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表述，即赋予这一概念中性的含义，而不包含否定之意；他所继承的主要是列宁的传统，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传统。因此，国外有学者说，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列宁《怎么办？》中的有关论点作为基础，甚至前一本书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后一本书的杰出的哲学评论和证实。

卢卡奇强调意识形态的重大反作用。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并不是经济基础或经济关系的消极的分泌物，它不仅是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结果，而且也是它能健康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注意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着的关系；看不到这种联系，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历史事件及其进程。而

①③ [匈]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80、7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②④ 参见上书，279、74~7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必须看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成熟的至关重要性，为了取得斗争胜利，必须进行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须彻底批判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集中表现的物化意识，克服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形成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意识即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显示出与卢卡奇相似的意识形态理论倾向。该书“企图重新提出马克思主义对哲学以及一般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①。科尔施在书中着力批判第二国际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总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是一种将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在它那里，不仅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而且历史过程和有意识的社会行动，都构成了“革命的实践”的活动统一体，^②而第二国际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却把这一总体的各个部分——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以及理论与实践分开，而且他们夸大了经济要素的决定性作用，忽视了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因而也就否定了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把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结构当作一种只存在于空想家头脑里的伪现实、幻想或错位的想象，意识形态被当作非客观的和不现实的东西。^③科尔施批判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观点，认为尽管马克思早期将意识形态视为虚假的意识，但他总是将意识形态看作具体的实在而不是空洞的幻想，即它们以颠倒的方式反映社会生活。科尔施引证了恩格斯致梅林的信中提出的关于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的论述，强调意识

① [德] 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英译本导言）14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②③ 参见上书，22~23、4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形态对经济基础或经济关系的巨大反作用，强调意识形态批判的极端重要性。

科尔施将当时欧洲革命失败的原因归于主观条件，即意识形态不成熟，强调革命主观条件和意识形态批判（特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对于革命取得胜利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他也强调革命取得胜利后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他提出了所谓的“意识形态专政”的概念：他说他这个概念引起了许多误解，但实际上它在三个方面上区别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名义下的“精神压迫制度”：首先，它是一种无产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的专政；其次，它是一种阶级专政，而不是一个党或党的领袖的专政；第三，最重要的是，作为一种革命专政，不过是要为“国家消亡”和结束意识形态束缚创造先决条件的社会变革过程的一个环节。^①

葛兰西也十分重视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强调在市民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斗争的重要性，并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提出了一些新的、不同的见解。他既反对把意识形态看作经济基础的派生物，也反对将意识形态看作一堆错误的观念。葛兰西给意识形态下了这样的定义，即意识形态是“一种在艺术、法律、经济行为和所有的个体的集体的生活中含蓄地显露出来的世界观”^②。他将哲学、宗教、常识和民间传说当作意识形态的四个主要组成部分。他认为，马克思仅仅在论战的意义上把意识形态看作幻想、颠倒的或错误的观念，实际上马克思把意识形态当作一种现实的力量，是一个战斗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人们活动着斗争着，并获得关于他们自己地位的意识”^③。显然，葛兰西强

① [德] 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英译本导言）9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②③ A. Gramsci. 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328、337P.

调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在他看来，一方面，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必然会在观念上进入意识形态领域，因为人们正是在意识形态的教育中成长起来并获得一定的世界观的；另一方面，人们又是在他们获得的世界观的指导下从事行动，正是意识形态创造了主体并使之行动。他提出了所谓的“有机意识形态”（organic ideologies）概念，其主体是知识分子，物质载体是教会、学校、传播媒介、工会、党派等组织团体（即市民社会机构），这是一种颇为独特而有新意的观点。

葛兰西和科尔施等人一样，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斗争。这种斗争所以必要，是因为统治阶级的权力是靠它的凌驾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之上的意识形态优势或霸权地位来维护的。他认为，西方革命不同于俄国革命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要先夺取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然后才能获得政治权力。葛兰西的这种观点，与他关于意识形态在西方工业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的想法有关。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的观点可以概括为“社会生产——经济基础——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这样一个公式，而葛兰西的观点则是“社会生产——经济基础——市民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社会（相当于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这样一个公式。很明显，他赋予了市民社会或意识形态高于政治、法律上层建筑（政治社会）的优先的地位。在他看来，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统治主要不靠政治社会（军队和暴力）来维持，而主要靠文化意识形态来维持。因此，西方革命也必须先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进行。

以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为代表的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在 30 年代则致力于批判曼海姆等人的知识社会学及其意识形态理论，并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例如，霍克海默 1930 年在《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社会研究杂志》的前身）发表了

《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概念?》一文，集中批判曼海姆的意识形态概念，并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观点。霍克海默批评曼海姆的“个别意识形态概念”和“总体意识形态概念”，认为这两个概念特别是后者是康德唯心主义哲学的产物；批评曼海姆把意识形态变成超越党派观念体系，即把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中的心理、经验的残余消除掉，从而把意识形态变成一种超党派的、只具有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价值的东西；批评曼海姆试图在总体意识形态的历史发展中探索人的本质的形成。霍克海默进而澄清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在他看来，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9)既是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最新而又有影响的研究，又是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一种挑战，因此必须分清是非。他指出，曼海姆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贬义上的意识形态，说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作为阶级意识出现的，这从根本上误解了马克思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理论。霍克海默认为，尽管曼海姆和马克思都研究存在，但在马克思那里，存在是人的现实生活过程；而在曼海姆那里，存在则是一个空洞无物的字眼。马克思由此出发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的思辨形而上学）对真实存在状态的掩盖，用意识形态概念去推翻形而上学的权威；曼海姆则相反，把一切知识都看作意识形态。霍克海默又说，马克思主义把对现实社会状况的改变，当作科学的目标，它不但不是曼海姆的贬义或否定的意识形态，相反是它的真正的对立面和批判者；曼海姆把意识形态作为超阶级、超党派观念体系来谈论，正好表明他自己坚持的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立场。霍克海默的这篇论文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知识社会学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立场。

“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赖希和弗洛姆从30年代开始，结合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特别是其产生的社会心理根源的分析，论及意识形态问题，主张用精神分析学说来“补充”马克思

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尤其是补上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关系的错失了的中介环节。赖希是第一个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1933）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该书中，赖希运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发展出性格结构的理论，作为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心理补充。赖希批判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机械地、片面地理解意识形态和经济之间关系的观点，认为他们只看到意识形态对经济的依赖，而忽视经济发展对意识形态的依赖。在充分肯定意识形态反作用的基础上，赖希提出了意识形态反作用于经济过程而转化为物质力量的中介环节问题。他认为，尽管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和经济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但由于缺乏心理学的环节，这两者之间的真实具体的关系未得到充分的说明；只有诉诸心理分析尤其是大众心理学才能弄清这个问题，揭示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及转化途径或中介环节。依照赖希的看法，这种中介环节就是心理结构或性格结构——即个人在行动或在对外界的刺激作用作出反应时的行为模式。他认为，一定的意识形态是通过政治国家的媒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起来的，但它并不是经济基础的终极分泌物，它通过性格结构，对经济基础起着巨大的反作用。

在赖希的影响下，弗洛姆也试图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在《超越幻想的锁链》等著作中，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肯定社会经济基础决定观念的上层建筑，但并没有说明经济基础是如何转化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因此，必须从心理分析方法入手，补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环节。与赖希有所差别，弗洛姆用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来充当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联系的媒介物。所谓的社会性格是指同一文化的绝大多数成员所共有的性格结构的核心，它是社会经济结构与一个在社会中流行的观念、理想之间的媒介物；而社会

无意识是指那些对于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都一样的压抑领域，社会的过滤器使得某些经验不能进意识之中，这些经验就是社会无意识；而那些进入意识层面的经验构成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对理想的掩盖相反，在被压抑的社会无意识中，包含前人的真实本性和生存意义的答案，它们同样是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媒介物。

二战后，特别是50年代以后，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的加强，“西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加强了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特别是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关系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而又相互对立的观点：一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的观点，一是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的观点（前一种观点我们已经讨论过，这里我们介绍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的意识形态理论）。

阿尔都塞被誉为当代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他在《保卫马克思》与《列宁和哲学》等著作中都论及意识形态特别是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自己的逻辑和严格性的表象（意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①；或者说它是“一种纯粹的假象，一种纯粹的梦想，即虚无”^②。而科学则是对现实的认识，它与意识形态决裂；科学建立在另一个基础之上，即以新问题为出发点而建立起来的，它以不同于意识形态的方式提出问题并确立自己的对象。^③因此，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与科学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第

① L.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1. 150P.

②③ L. Althusser. *For Marx*. London, 1977. 231、78P.

一，科学是真理，它如实地反映客观现实和社会历史的真实过程，它是在抛弃意识形态问题框架中形成，并在与意识形态的不断斗争中形成起来的；而意识形态则属于“虚假意识”，它以神话的方式反映世界，即像神话一样以颠倒、幻想的方式反映现实世界，它歪曲现实，掩盖社会历史过程的真实本性。第二，科学主要是一种认识，它的最基本功能是理论功能；而意识形态主要是一种价值观念，它的最基本功能则是实践功能。第三，科学作为客观知识，与利益无关，没有阶级性；而意识形态则完全受利益支配，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具有实际重要性。第四，科学的认识过程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而意识形态的认识过程是从具体到抽象。阿尔都塞认为，任何科学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有一个“史前期”，意识形态就是科学的“史前期”。也就是说，任何科学都是由意识形态“脱胎”而来的，但由意识形态到科学的转变是一种根本的质变，即“认识论的断裂”；马克思主义本身也经历了一个由“意识形态”到“科学”的“认识论的断裂”过程，其分界线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

1970年，阿尔都塞发表了一篇题为《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长文，提出了“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新概念，用以补充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他认为，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交往（传媒）和文化都属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它是确保政治国家机器（军队、监狱等）存在发展的基本条件。他说，“没有一个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中并在它之上发挥作用的领导权，任何阶级都不可能在这段时间内掌握政权”^①，他特别强调说，在当代教育已取代教会而成为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① L. Althusser, *Essays on Ideolog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4. 20P.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后起之秀普朗查斯也论及意识形态问题。他不赞成葛兰西把意识形态隐喻为社会统一的“水泥”的观点，也不赞成卢卡奇有时把意识形态等同于虚假意识和异化，把它变成一种抽象阶级主体“背上挂的号码牌”。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包括一种特殊的客观方面的多种表现准则和信仰相对协调的总体”^①，这不仅是一种现实关系，而且也是一种幻想的关系，因此，不能把意识形态贬低为主体和意识问题或异化和虚假意识问题。他认为，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是从经济方面的结构控制支持社会总体结构的，所以，它“就社会结构的每个方面而言，是具有协调的特殊功能的”^②。作为特定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一个特殊环节的意识形态是在这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所规定的界限内构成的，因而它使得支配这种社会形态整体的真实矛盾的统一性具有假想的协调作用。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不同的侧面或角度讨论了意识形态问题，形成了种种的意识形态理论。他们的理论中提出了一些独特而新颖的观点，在某些方面展开或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也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用意识形态概念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阶级（主要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观念之间的斗争，用它来表达某些阶级利益和为这些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观念之间的联系；他们将“意识形态”当作有用的概念工具，使之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试图阐明意识形态概念的涵义、特征，重新界定它的范围和地位；他们猛烈抨击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的机械论和经济主义观点，强调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既指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

^{①②} [希]普朗查斯：《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225、22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又阐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危机及其实质，从而把确立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掌握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则在与知识社会学家特别是曼海姆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论战中，在某些方面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特别是批判曼海姆的意识形态超阶级性、超党性的观点，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阶级性和党性特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决非贬义或否定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革命批判武器。赖希和弗洛姆强调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联系环节或中介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这两者之间联系的心理机制，可以说拓宽了对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视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注意到了当代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密切联系，提出了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的口号，在一定程度上揭发批判了当代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特别是技术统治论来充当意识形态，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辩护的事实；阿尔都塞同样注意到了作为当代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的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强调了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质的根本区别；他关于意识形态深处的问题框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及意识形态实践功能等论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深化了对意识形态本质属性的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中也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我们认真讨论的问题。例如，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和实质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早晚期的意识形态概念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如何看待意识形态问题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它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性？应当如何看待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如此等等。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是有明显缺陷的。我们着重指出这样几点：其一，他们并没有正确、全面地揭示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与本质，例如卢卡奇、科尔施并没有对意识形

态概念的涵义、特征作出明确的表述，特别是在关于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有模糊之处，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他将一般的意识形态等同于虚假意识；阿尔都塞、弗洛姆等人则明确地将意识形态等同于虚假意识、幻想、神话，片面地从否定或贬义的方面来规定意识形态概念。其二，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将意识形态等同于（自觉的）阶级意识，尤其是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等同于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意识，但并没有分析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从外部灌输到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也低估了无产阶级自发的阶级意识的地位和作用；而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脱离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来谈论意识形态问题，使意识形态概念失去了无产阶级及其革命实践的历史依托。其三，在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关系问题上，夸大了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否定两者之间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用整体的优先性来取代经济基础的优先性，用意识或心理分析来取代经济分析，从而陷入了主观主义或唯心主义之中，这几乎是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一个通病。其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卢卡奇往往将总体性还原为一种简单的统一的本质，通过一种纯粹阶级主体的意识形态本质，而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在任何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论题解释为一种社会总体的渗透物，而阶级的主体依次被解释为生活条件的纯粹反映和这个阶级的世界观，这就模糊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反映各阶级之间政治关系的这一事实。其五，“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上各执一端，或者在两者之间划等号，或者将两者相割裂，不能正确理解他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往往用资产阶级思想（如精神分析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从而陷入他们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如科尔施还将马克思的

意识形态理论与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对立起来，批判和否定后者。

让我们回过头看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概念及其演变过程。作为现代意识形态理论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将“意识形态”概念引进社会历史领域，使之成为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范畴。他们对“意识形态”的涵义、特征作出规定，并分析它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①，表现为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一系列的意识形态。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也说，那些更高的即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作为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同样是对人们物质生活过程，对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系统、概括的反映。不过，这种反映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认为，在意识形态中，人们及其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倒现着，可以在意识形态中找到人们现实生活过程的反射和回声。恩格斯在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中说：“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地，但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②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各种意识形态总是以抽象的理论形式体现特定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它们是特定阶级从自身的地位和利益出发对特定社会关系的认识所形成的思想理论和观点的体系，在每一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也就是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5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个阶级统治的思想”^①。依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在阶级对立的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这种虚假性是阶级利益不可调和的表现；这种虚假意识形态形成的机制是，统治思想作为剥削阶级狭隘的阶级利益的表现，被说成是全社会的利益而以普遍性的形式出现。马克思恩格斯总是把虚假的意识形态同阶级统治和存在对抗联系起来，从历史上对它们进行考察，并预见它们消失的前景，认为随着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的消失，虚假的意识形态行将消失。

马克思、恩格斯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理论化、系统化了的自觉的阶级意识。在谈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时，他们指出，“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②，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是由其思想家创造的。正因为意识形态是由思想家创造出来的系统的理论体系，所以它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的独立性。恩格斯说，“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③。

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意识形态概念时，总是把它同阶级斗争、革命、国家等政治上层建筑联系在一起。例如，在谈到作为意识形态主要形式之一的宗教时，恩格斯指出，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加尔文教曾经成为一些共和党人的旗帜，并为英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他认为，国家一旦成为社会的独立力量，马上就会产生新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是国家执行其社会职能的手段或形式。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52—53、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主要是从一种否定的意义上来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他们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歪曲的意识。但他们并未将它简单地等同于一般虚假的意识，也没有简单地等同于认知错误；他们主要是从意识形态与某些社会矛盾的关联来证明这种歪曲的性质，指出它们通过掩盖社会矛盾及社会的真实基础而为统治阶级服务。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赋予意识形态概念以否定的特征。这与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密切相关，他们的着眼点是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尤其是德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而他们强调意识形态概念的否定方面，强调其歪曲的性质是可以理解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涵义发生了变化，它逐步被用作一个中性的概念。在梅林、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趋势。意识形态概念日益被用来表示观念、道德和理想，表示精神过程和时代的精神状况。普列汉诺夫区分低级和高级的意识形态，后者包括科学、哲学和艺术；伯恩斯坦则首先将马克思主义称为意识形态。然而，在这种使意识形态由否定的意义向中性意义转变的过程中，列宁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列宁在《怎么办？》中对意识形态概念作出较为系统的论述。在描述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时，列宁说，唯一的选择是——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没有中间的道路可走，因为人类没有创造出第三种意识形态，并且在一个由阶级对立所分裂的社会中，决没有一种非阶级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列宁不再谈论意识形态对现实的“颠倒”，也没有阐述其虚假的成分；政治斗争或阶级斗争成为列宁探讨意识形态问题的一个立足点。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作为阶级意识的理论表达，总是表达某个阶级的利益、情感和认识；无产阶级担负着解放全人类和最后解放自己的历史使命，它的阶级意识包含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所以，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

意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科学三者是同一的。列宁指出了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意识与它的自发意识的区别，认为自觉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社会主义学说必须从外部灌输到工人运动中；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中学识丰富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曾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由此可见，在列宁那里，意识形态概念失去了它的否定的特征，而成为一个中性的概念，它被用来表达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思想观念及政治学说。如果一个特殊的意识形态是假的，这并不是因为它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由于它服务的阶级地位和利益的特点。按照列宁的观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真的，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假的，但就这两种意识形态分别代表着斗争着的阶级利益而言，它们同样是意识形态。

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是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的。尽管他们的许多观点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理论的，但是，他们试图用当代社会现实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现实，发展、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引入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拓宽了某些新的研究领域，并提出了一些新的、有益的观点或问题，在某些方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因此，应该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视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在整个现代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中也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法国学者特拉西（Oestutt de Tracy）最早提出意识形态概念（19世纪初）；现代西方学者对意识形态的讨论最初来自于知识社会学的创立者们，如帕累托、韦伯、谢勒和曼海姆等人。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1929）、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1922）、马克思恩格斯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正式全文出版（1932）都是引发西方意识形态大讨论的因素。50年代，随着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兴起，出现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问题的激烈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都为当代西方著名学者，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特别是卢卡奇、葛兰西、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阿尔都塞等人的理论在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理论占有重要地位，产生很大影响。

总之，意识形态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课题，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对此感兴趣，它是当代的一个哲学主题。在当代，有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理论，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理论。因此，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对于我们更全面、准确地把握和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范畴，对于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工具理性批判

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而又往往被人们忽视的方面。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理论出发，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由技术和（合）理性结合而成的工具（合）理性或技术（合）理性是理性观念演变的最新产物；在当代，工具理性已变成社会的组织原则，它渗透到社会的总体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就了异化、物化或单面的社会和单面的思维方式及思想文化，成为这个社会对人进行全面统治、控制和操纵的深层基础。因此，他们致力于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实质（批判）理性的重建。他们揭示了工具理性的特征、形成和危害，并分析了资本主义、合理化和统治三者之间的关系以

及科学技术消极的社会政治效应的理性根源，并阐明了一种辩证的或批判的理性观（实质理性或批判理性）。从韦伯到卢卡奇再到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工具理性批判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因此，为了更好了解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我们有必要先从韦伯谈起。

韦伯继承和发挥了黑格尔关于理性是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律性的思想，将哲学的“理性”（reason）概念改造成为社会学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用以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按照韦伯的观点，所谓的“合理性”乃是指人们逐渐强调通过理性的计算而自由选择适当的手段去实现目的。他将合理性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工具（合）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即一种强调手段的合适性和有效性而不管目的恰当与否的合理性；另一种是实质的（合）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即一种强调目的、意识和价值的合理性。韦伯认为，近现代理性观念所经历的是一个实质理性不断萎缩，工具理性不断扩展的演变过程。这不仅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知识和经验存在着的数学化倾向有关，而且也与理性观念自身的内在倾向有关。在他看来，合理化过程的发展方向基本上是朝向工具理性的扩张，尽管这种扩张与科学技术发展密不可分，但在早期则与实质理性本身的作用有关。正因为实质理性对目的和价值作出明确界定，然后有关这些目的与价值的实践手段才有可能持续发展，但是，一旦这些手段（工具理性）发展、成熟，它自身便获得了自主性和独立性，或者取代目的本身，或者为别的目的服务。例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新教徒为荣耀上帝而主张营利，这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当资本主义成熟之后，手段变成了目的，变成为营利而营利，而原有的宗教目的被人遗忘了。

在韦伯看来，科学技术构成工具理性的基础，或者说，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工具理性。科学研究最初是针对某种实质理性而发

的，或者是为了游戏、好奇，或为了反对宗教迷信，或为了更好了解和控制自然，改善物质条件和提高生活水平；但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取得自主性，逐步将目的、价值和意识一类的东西放在一边，而单纯追求工具、控制的手段，原初追求真理、创造福祉的科学技术一再被用于邪恶的目的。它将人类社会变成铁牢笼，把人变成机器上的螺丝钉。科学技术只能保证手段的正确，却不能反省、批判其追求的目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工具理性日益扩张，实质理性日益萎缩，工具理性取得全面胜利，其结果则是一种十足的“非理性”。因此，韦伯主张限制工具理性，恢复实质理性的权威，把价值、目的、意义一类的东西重新引入科学技术，对科学技术在工业社会及其文化系统中的角色加以重新定位。

韦伯还论及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西方特有的理性观念在一个物质和精神的文化系统中实现自身，而这个文化系统在工业资本主义中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这个文化系统旨在一种特殊的统治类型，这种统治已经成了现阶段的命运，这就是总体官僚政治。因此，正如马尔库塞所说：“韦伯所设想的理性，表现为技术的理性，表现为生产和通过有计划的和科学的机构所实现的物质（物和人）的转化。这种机构是为着可计算的效率这个目的而建立起来的；这种机构的合理性组织着并控制着物和人、工厂和整个科层、工作和闲暇。”^①

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特别是其中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这篇长文中展开了对形式理性或科学理性（即工具理性）的批判。这种批判是在他的“物化”理论的框架中展开的。他吸取了韦伯、黑格尔等人的有关的思想因素，从马克思主义的

^① 《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81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商品拜物教”中推导出“物化”范畴，用以表示原初不具有物的形式的东西如意识、理性等转变成为物，表示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物化”关系中，关键或基本的东西是“建立在被计算和能被计算基础上的合理化原则”^①，即形式（合）理性或科学理性。他将形式理性或科学理性看作科学技术发展和理性观念演变的产物，看作一种思维方式或理解世界的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下，人类理性被归结为数学上的可计算性、逻辑上的形式化和机械上的可操作性。具体说，形式理性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1）它与数学和精确科学的发展同步，反过来又同越来越复杂的管理技术、同生产的发展发生相互作用；（2）它将一切东西都看作工具，将生产的各方面孤立起来，导致了各种形式规律的出现，一切都被归结为建立在同等关系基础上的可计算性和可操作性；（3）它表现为一个合理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过程，换言之，资本主义的合理化过程就是形式性的物化或异化的过程。

卢卡奇指出，现在形式理性或科学理性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到人的身体和灵魂，成了组织化的统治原则，它造成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异化现象。它用物的关系掩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工人同自己的劳动、自己的产品相异化；工人被归结为一种抽象的量，一种没有多少价值的机械化和合理化的工具；形式理性也日益深入到人的心理、意识之中，导致了人们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的丧失。因此，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思维方式，形式理性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在对形式理性批判的基础上，卢卡奇致力于批判理性或辩证理性即辩证法的重建，他主张通过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哲学的研究，来确立一种总体性及主体客观相互作用的辩证法，重振批判理性的雄风，弘扬理性的

① [匈]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98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革命批判精神，以此与形式理性相对立、抗衡。他将辩证法看作一种正确、合理的思维方式，用辩证法反对形式理性。

沿着韦伯和卢卡奇的理论传统，法兰克福学派加强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这成了法兰克福学派许多著作如《启蒙的辩证法》、《理性之蚀》、《单向度的人》、《知识与人的旨趣》等的一个主题。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及对批判理性的重建的基本论题及观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的含义、工具理性和批判理性的对立作出说明。何谓理性？马尔库塞在《哲学与批判理论》一文中作了如下的规定：“理性，是哲学思维的根本范畴，是哲学与人类命运联系的唯一方式……理性代表着人和生存的最高潜能；理性和这些潜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①他在1941年出版的《理性与革命》第二篇导言中较全面地考察了理性概念，并评估它们的构成因素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列出理性概念在哲学史上出现的五种含义：（1）理性是主体客体相互联系的中介；（2）理性是人们借以控制自然和社会从而获得满足的多样性的能力；（3）理性是一种通过抽象而得到普遍规律的能力；（4）理性是自由的思维主体借以超越现实的能力；（5）理性是人们依照自然科学模式形成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倾向。^②他强调第（4）、（5）种的含义，认为理性原是一种超越现实的批判能力，而在科学中，理性的概念已被技术的进步所支配，依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塑造人和社会生活已成为当代理性主义的趋势。但理性越是在自然科学中得势，人在社会生活中就愈不自由。这里已包含了批判理性与工具理性对立的思想了。

^① 《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175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② H.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4. 253~255P.

霍克海默在《理性之蚀》中明确区分两种类型的理性：主观理性（工具理性）和客观理性（批判理性）。他认为，主观理性强调手段及其与目的的可能的协调，“理性最终被当作一种合作协调的智慧能力，当作可以通过方法的使用和对任何非智力因素的消除来增加效率”^①。主观理性也就是工具理性，它的价值由对人和对自然界的操纵来衡量，一种活动是合理的，仅当它为一个目的（商业的、保健的、娱乐的等）服务。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最明显地反映了这种主观的或工具的理性。与主观理性相反，客观理性是实在固有的一个原则，是一种生活方式，即一种与生命、自然谋求和谐的方式，它提出一个“真理的”和谐世界的可能性；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伟大哲学体系都以这种客观理性作为基础；客观理性在实在中有自己的结构，并且对于那些努力进行辩证思维或具有爱欲能力的人是可以得到的。^②客观理性强调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它以人的自由解放作为最高的目标，因此，它又是一种批判的或解放的理性。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考察理性观念的历史演变，追溯工具理性和批判理性对立的根源，特别着重分析工具理性是如何战胜批判理性而取得支配地位的。批判理论家们认为，工具理性成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忽然发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它是理性观念演变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指出，批判理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占主导地位，这可以从柏拉图开始到黑格尔的伟大哲学体系中得到证明。批判理论家们认为，工具理性和批判理性的对立有其历史渊源，工具理性的根源远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前。韦伯在探索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时，不但追溯到基督教，而且追溯到更远的犹太教。同样，

^{①②} M.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8~9, 11P.

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的辩证法》中发现了工具理性的根源也在犹太教，而到了所谓的“启蒙时期”它已成型而清晰可辨。他们认为，那种旨在于征服自然和使人们从世界的魔境中摆脱出来的启蒙精神（解放的理性），追求一种对自然加以统治的知识形式，它抛弃了诸如实质、因果性、属性一类的形而上学范畴，而把世界仅仅归结为它的量的方面；它追求抽象的范畴体系，要求思维或理性的抽象普遍性，而由推理的逻辑发展出来的这种抽象的普遍性在现实中有其基础，是现实统治的反映，这正是启蒙精神的特别有害之处。启蒙精神像任何体系一样是极权主义的，它把思维和数学混淆起来，把数学化的程序变成思维的程序，理性或思维变成物或工具。因此，本来作为直接性东西之否定的思维或批判的理性变成了抽象性的思维或工具理性，而工业则把这种理性物化，以致拜物教到处盛行。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第二篇“单向度的思想”中详尽地考察了理性从批判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的历程。他指出，在当代，极权主义的技术理性领域是理性观念演变的最新结果，理性由批判理性变成技术理性以社会的科技进步作为前提，并有其逻辑方法论的基础。一方面，社会在一个日益增长的技术积累中再生产自身，生存斗争和对自然的开发变得更加科学和合理。科学管理和科学分工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政治和文化各部门的生产效率，其结果是更高的生活标准，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基础上，这一理性的事业产生了一种精神和行动的模式，它甚至为该事业的最具破坏性的特征辩护、开脱。科学技术理性和操纵结合成社会的控制形式。另一方面，形式逻辑和数学构成技术理性的方法论基础，借助数学和逻辑分析，自然被量化和形式化，现实与先天目的、真与善、科学与伦理等被分割开来。在这种方法论之下，科学技术理性是中立的。只有对自然规律的探索才是合理的，价值成了主观的东西，形而上学只是一个假定，人道主义、宗教道德

等不过是理想。剩下的只是一个量化的世界，其客观性越来越依赖于主体；在科学技术理性的极端形式中，一切自然科学的问题都消解于数学和逻辑中，客体的概念则被消除。

哈贝马斯以稍微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与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相同的思想。他指出，努力把人们从偏见中解放出来的理性由于其内在逻辑而走向自身的反面。在古典启蒙时期（即以霍尔巴赫等人为代表的启蒙主义时期），理性自身成为反对现存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武器，在它那里，恶与假、真理与解放是一回事，它公开对之作出评价。因此，在古典启蒙时期，理性的活动同自我解放本身的旨趣是结合着的，而对虚假意识的批判同时也是抛弃这种意识所由产生的社会条件的实际行动。但是，随着科学、工艺和组织的进步，这种联系被打破了。理性逐渐丧失了解放的功能，越来越局限于技术效能；它不再提出目的，而只是组织手段；理性具备了工具的特征，它为物质和社会的工艺效劳，于是理性变成了工具理性。

再次，法兰克福学派剖析工具理性的危害，阐明批判理性的作用。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的基本特征是：（1）它是在技术、理性和逻辑的基础上形成的；（2）它以自然科学的模式来衡量知识，尤其是以定量化、形式化作为知识标准；（3）它把世界理解为工具，关心的是实用的目的；（4）它将事实与价值严格区分。说到底，技术理性是一种单面性或肯定性的思维方式。因此，技术或工具理性先验地适用于维护社会的统治制度，它排除了思维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其本质就是统治的合理性。在当代，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总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已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在技术的起源上都是如此，自动化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

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法兰克福学派特别剖析了技术理性统治给社会的思想文化所造成的危害。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的辩证法》论“文化工业”的部分，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论“单向度的思想”部分对此都有精采的论述，可以参看。

对于批判理性的作用，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既然批判理性的本质是批判性、否定性，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就在于摆脱现实的束缚，批判和否定现实，为人类的自由解放效劳。在霍克海默看来，批判理性的责任在于无情地揭露丑恶的现实，猛烈地抨击愚蠢的和具有欺骗性的思想。它要根据真理的否定性而揭露非真实的东西，使人的存在真实化。这种“劳作”中凝结了否定的方法，即揭露有限东西中的偶像性，并把被理解为绝对的伟大思想简化为一定社会的相对真理。批判理性提出思想和现实，目的在于对两者加以比较并超越当前状况。马尔库塞则指出，批判理性从人的历史存在出发去解释人及其境界的整体，并力求去发现存在的最终极和最普遍的根基；批判理性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在于对现实的超越和对未来的展望；它关注人的存在和本质，关注人的自由、幸福及潜能的实现，并认识到这些东西的实现有其现实的条件。

最后，法兰克福学派还把所谓的传统理论（当代资产阶级的各种哲学社会思潮，特别是实证主义）和批判理论（黑格尔的辩证哲学、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社会批判理论）分别当作工具理性和批判理性的集中体现来加以评判。在霍克海默等人看来，理论乃是独特的理性，是关于世界和我们自己的一种合理的知识；而传统理论特别是实证主义是工具理性的集中体现，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一种工具理性。传统理论家将理论看作由基本命题和推出命题组成的有逻辑联系的推理系统，即看作一个封闭的科学命

题体系，将理论变成一种描述事实的工具，它片面地强调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证性，消除了理论思维的批判性和否定性，使理论失去了它的本质作用，变成屈从于现实、为现存制度辩护的工具，沦为意识形态，起着消极的社会作用；在传统理论那里，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价值与事实是分开的，理论被当作一个独立于社会实践的王国，它不关心人的苦难的现实和人的自由解放的条件。与此相反，批判理论作为批判理性或辩证思维的体现，它主要不在于理论是否成为一个科学命题体系，而旨在于现实的超越，即对现实的批判和否定；在批判理论那里，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价值与事实是关联着的。与其说理论研究是一种脑力劳动，倒不如说它是一种特殊的实践形式或是革命实践的智力部分；理论要关心人的本质、自由和幸福，关心异化和苦难根基的消除以及合理社会的建构。

显然，法兰克福学派既直接继承和发挥了韦伯和卢卡奇的观点，又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理性观。一方面，他们沿着韦伯的思路来考察理性观念的演变，把韦伯的形式理性改造为工具理性或主观理性，而将实质理性改造为客观理性或批判理性，并进一步发挥了韦伯关于理性的消极性，尤其是它与统治关系的论点。同时，他们也利用了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展开对工具理性危害的分析。另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性观直接继承和发挥了黑格尔的辩证理性观，并力图吸取当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强调人的自由的思想因素来补充或改造黑格尔的辩证理性观，以克服包括黑格尔的辩证理性观在内的理性主义中强调客观必然性而忽视人的自由这一维度的倾向。如果我们将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与黑格尔的观点加以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两者之间的师承关系：黑格尔将思维划分为知性和理性，批判形式（工具）理性而颂扬批判（辩证）理性，不满足形式逻辑而创立辩证逻辑，推崇辩证方法的批判否定精神；法兰克福学派则将理性划分为主观的

理性（工具理性）和客观的理性（批判理性），攻击工具理性而颂扬批判理性，他们同样反对形式逻辑而拥护辩证逻辑，推崇思维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如此等等。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及其批判的理性观呢？显然，他们的观点中有某些合理因素。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当代理性观念演变的特点，注意到了科技进步给人的理性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重大影响这样一个普遍的事实，尤其是注意到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进步导致工具理性横行这一点；他们力图在理论上把握科技进步与理性观念演变之间的关系，试图从理性或思想的深处揭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与人对自然的统治之间的关系，并抨击工具理性给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文化领域所造成的危害。第二，与第一点密切相联系，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力图深入到人类理性观念的深处去揭示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政治效应的根源。他们不是简单地列举当代科学技术所造成的种种消极现象（他们对此十分清楚），并进而否定科学技术的作用，而是从科学技术与人类理性关系及其演变的角度，指出科学技术的作用范围（它建立在人类技术旨趣的基础上以满足人类对自然控制的目的），指出它在当代成为统治、控制工具或工具理性帮凶的深层次原因。第三，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自觉地将工具理性与批判理性以及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处处对立起来，反对前者而颂扬后者。他们强调理性的本质在于其对现实的超越，对现实的批判和否定，强调矛盾思维在认识现实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扬了黑格尔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弘扬了理性的革命批判精神。这在工具理性和实证主义横行、泛滥，辩证法在西方受到普遍非难的时候，更是难能可贵的。法兰克福学派还指出并批评了传统理论即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理论的消极性。此外，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还提出了

某些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如关于工具理性与资本主义统治的关系以及它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问题，关于工具理性和批判理性及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对立问题，关于两种理性的不同逻辑基础，以及关于批判的理性如何将批判性或否定性与人的自由相结合的问题；如此等等。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见解。

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及其理性观是有重大缺陷的。我们指出几个主要之点：其一，在关于科学技术与理性的关系问题上，法兰克福学派和卢卡奇片面强调科学技术对理性影响的消极方面，将科学技术看作工具理性的基础，看作一种单面的或肯定的、排除批判否定精神的思维方式的帮凶。而事实上，科学技术的精神气质是求实求真，它揭示世界的矛盾运动和辩证发展，因此，它在本质上与辩证的思维方式相联系。其二，在关于科学技术消极性的根源问题上，他们把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及政治效应，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即从理性深处说明科学技术消极性的必然性，从而赋予科学技术“原罪”的性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使用方式所带来的种种恶果进行开脱；这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革命力量的观点。其三，在工具理性与批判理性对立的问题上，法兰克福学派及卢卡奇直接从技术、理性及逻辑的结合引申出“工具（技术）理性”概念，这是费解的；将形式逻辑当作工具理性的基础，把形式逻辑等同于单面的或肯定的思维方式，也是错误的。他们关于批判理性的论述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尽管他们宣称要恢复或弘扬理性的批判性和否定性，但是，在批判性与继承性、否定性与肯定性的二律背反面前却显得束手无策。他们实际上只要批判、否定，而不要继承和肯定。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性，特别是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实质上是一种虚无主义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更不待说马克

思主义的辩证法)有本质的区别。其四,在理性及理论的社会功能问题上,尽管法兰克福学派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工具理性及传统理论的危害,但是,他们似乎将资本主义社会看作工具理性的产物,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当作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并日益用对工具理性、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他们也不能真正理解辩证理性和科学理论的社会作用,不了解理性及理论除了批判否定现实之外,还可以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

三、实证主义批判

实证主义是当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的最突出的、主要的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将它看作自己理论的对立面来加以批判。因此,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构成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历史和阶级意识》尤其是《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这两篇文章中,卢卡奇围绕“所谓的事实方法论内涵”这一核心,展开对实证主义(特别是它的方法论)的批判以及对总体性辩证法的论述。他批判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原则尤其是所谓的“事实中立性”观点,揭露它的方法论的局限性。他指出,所有的认识无疑都是从事实开始的,问题是究竟哪类生活的事实与认识及其前后相连的方法相关。实证主义者或经验主义者从孤立、片面、抽象和静止的观点看待事实。在他们看来,“从经济生活中来的每件事实依据,每一统计材料,每一原始资料都已构成一个重要的事实”^①;狡猾的机会主义者则

^① [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7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进一步在自然科学方法中寻求庇护，在这种方法中，科学借助于观察、抽象和实验提取出纯粹的事实，并把它们放在相关的内容中，用这种方法对抗辩证的认识方法。卢卡奇着重从三个方面驳斥实证主义关于事实中立性的观点及其一般方法论：第一，事实只有被放到一定的概念体系的框架才能成为事实，不管怎样简单地列举“事实”，无论怎样不加解释，都已经意味着对它的一种“解释”，这时的事实已被一种理论、一种方法所领会；第二，事实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的产物，它们是不不断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实证主义对待事实的态度表明，他们没有看到，更没有去说明“事实的历史特性”；第三，实证主义对待事实的态度和方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其抽象化和孤立化的方法是与资本主义的物化结构和社会分工密切相关的，反过来，这种方法起着将资本主义现存东西当作事实来加以接受的消极社会作用。此外，卢卡奇、科尔施以及其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还特别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化的倾向，认为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力图用实证主义的方法使马克思主义“科学化”，从而掩盖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

卢卡奇对实证主义批判的有关论点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主义批判的先导，后者是沿着前者所开辟的道路前进的。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共同的永恒的理论主题。法兰克福学派是将它看作传统理论的突出表现和当作批判理论的对立面来加以批判的。从其形成的时候起，实证主义便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攻击的主要目标。

批判理论家们对实证主义流派批判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霍克海默重点攻击逻辑经验主义；阿多尔诺着重反对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方法；马尔库塞主要针对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哈贝马斯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第一、二代的实证主义。但是，他们对各种实证主义流派批判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大致相同的。法兰克福学派

对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形式主义和反科学主义展开了全面的批判。^①

四、大众文化批判

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另一个中心主题，它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批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全面、系统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理论，就不能不充分注意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从一开始便把文化批判放在其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地位，然而，强调对“肯定文化”、“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研究则始于30年代后期。这有其历史背景。在这个时期的西方社会，娱乐工业的出现，大众传播媒介的成长，纳粹及其他极权国家对文化的野蛮的操纵，批判理论家们移居美国之后对美国电影业和录音工业显赫地位的发现及震撼，所有这一切导致了法兰克福学派把眼光转向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着的文化模式的评估，即开始注重研究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问题。在这方面，法兰克福学派写下了大量的论著：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的辩证法》（其中有专论“文化工业”的部分）；阿多尔诺写了大量论“高级”或“先锋”文化和通俗文化的论著；霍克海默有《艺术和大众文化》、《作为文化批判的哲学》等论大众文化的论文；本杰明著有《机械复制时代中的艺术作品》等论著；卢旺塔尔有不少关于文学史和通俗文学方面的著述，特别是《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这部论文集；马尔库塞在《文化的肯定性质》、《单向度的

^① 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主义的批判的评述，可参见陈振明：《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三章。

人》等著作中也论及了这一主题。可以说，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批判构成法兰克福学派 30 年代末、40 年代及后来的许多著作的一个中心主题。

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三个密切联系，但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即“肯定文化”（affirmative culture）、“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和“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这三者在该学派历史上也是依次出现的。霍克海默在 1936 年所写的《利己主义和自由运动》一文中首先提出“肯定文化”的概念，马尔库塞次年写了一篇题为《文化的肯定性质》的长篇论文，展开霍克海默的这一概念；1942 年，霍克海默和卢旺塔尔在通信中提出“大众文化”概念；而在 1944 年，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则使用“文化工业”一词，以取代“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对这些概念的内涵、特征以及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危害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先简要论及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的一般概念。法兰克福学派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来分析文化现象，也反对传统的文化主义把文化看作一种脱离社会总体性的孤立形式。他们宣称，任何把文化看作一个独立王国的观点都必须加以反对。正如阿多尔诺所说，文化不能由它自身而得到理解。按霍克海默等人的观点，文化作为大量的观念、道德、规范和艺术的表达，是在社会的组织基础上出现的，是智力和艺术的遗产和实践。马尔库塞则区别两种文化，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前者是由谋生中的实际行为模式、操作价值系统所构成，并包括家庭生活、闲暇时间、教育和劳动的社会、心理和道德的诸方面；后者则是指“高等的价值”、科学和人性、艺术和宗教^①。显然，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完整、明确的“文化”

① H. Marcuse.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Boston: Beacon Press, 1972. 83P.

定义，但是他们一般认为，心智和艺术文化的产品既不能简单地当作特殊阶级利益的反映，也不能当作一种完全自主领域的输出。他们力求探讨文化现象与社会的其他维度（方面）的互动的模式，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模式的特点，这就是肯定文化、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问题。

什么是肯定文化？按马尔库塞的观点：“所谓的肯定文化，是指资产阶级时代按其本身的历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文化。在这个阶段，把作为独立价值王国的心理和精神世界这个优于文明的东西，与文明分隔开来。这种文化的根本特性就是认可普遍性的义务，认可必须无条件肯定的永恒美好和更有价值的世界。”^① 换言之，作为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肯定文化，它给人们提供一个不同于实然世界的幻想世界，它可以在不改变任何实际情形的条件下，通过个体的内心活动而得到实现。在他看来，“肯定文化是一种社会秩序的反映”^②，它的基本社会功能是为现存的东西辩护，充当现实的装饰品，引导人们同现存的秩序相协调，并使人们在幻想中得到欢快和幸福的满足，平息人们的反叛意识。在这种文化中，幸福成为现实的奴婢，反抗的观念成为为现实辩护的帮凶；它掩盖了这样的真理即人们可能创造出一种更美好的物质生存世界（在其中，幸福可以真正实现）；在这种文化中，“即使不幸福也成为屈从和默许的方式”^③。马尔库塞指出，“肯定文化在根本上是理想主义的。对孤立的个体要求来说，它反映了普遍的人性；对肉体的痛苦来说，它反映着灵魂的美；对外在的束缚来说，它反映着内在的自由；对于赤裸裸的唯我论来说，它反映着美德王国的义务。在新社会蓬勃兴起的时代，由于这些观念指示超出生存既有的组织方向，它们是革命的；但它们在资产阶级统治

^{①②③} 《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120、167、156~157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开始稳固之后,就愈发效力于压抑不满的大众,愈发效力于自我安慰式的满足,它们隐藏着对个体的身心残害”^①。又说“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与自身的文化发展冲突,肯定文化的自我消亡便开始了”^②。也就是说,如果肯定文化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还有其积极一面的话,那么到后来,它则完全起着消极作用;而在垄断资本主义或发达工业社会,肯定文化则蜕变为单面文化。

可见,马尔库塞对早期资产阶级文化和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作出完全不同的评价。他将早期资产阶级文化界定为一种在功能意义和年代顺序上的前技术文化,认为这种文化用对普遍人性的欢呼来与孤立的资产阶级个人相对立,用对美好灵魂的颂扬来对肉体作出反应。因此,尽管它使人们满足于内心的自由,沉溺于幻想中的幸福,安于现实的苦难,对现实发挥着肯定的功能,但它毕竟使理想超越于现实,保留了人的内心自由,因而也保留着批判性和否定性的向度。例如,在早期的资产阶级文学中,典型的人物不是宗教精神和道德上的英雄,而是那些破坏性的丑角,如艺术家、娼妓、姘妇、主犯、大流氓、斗士、反抗诗人、恶棍和小丑。^③

然而,在发达工业社会,科技进步使高层文化与现实同一起来,使现实超越了理想。高层文化原本与现实相疏远或脱离,这正是高层文化保持批判性和否定性的根本原因;而现在,工业社会使高层文化失效,使它失去了批判性和否定性的向度,现实超越并否定了高层文化,使它成为物质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中心成了商业中心或市政中心的合适场所。在艺术领域,社会的同化力消除了对立的内容而掏空了艺术,最矛盾的作品与真理绝对和平

^{①②} 《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123~124、161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③ 参见[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5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共处，艺术因而失去了它的传统功能。在文学方面，某些典型的文学观念和形象及其命运，充分显示了技术理性是如何消除高层文化中的对立因素的。尽管早期资产阶级文学中某些形象或角色并未消失，但他们是经过改头换面之后才幸存下来的。荡妇、民族英雄、垮掉的一代、神经质的家庭妇女、歹徒、明星、超凡的实业界巨子，都起着一种与其文化前身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作用。他们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而只是想象同一生活方式的不同类型或畸型，他们是对已确立制度的肯定，而非否定。^① 总之，在发达工业社会，文化的成就本应是人们获得自由的前提，现在却异化为意识形态，成为统治和奴役的工具。

40年代初，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主要成员移居美国之后，则把注意力从肯定文化的研究转移到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批判，这后面两个概念意义相近。霍克海默等人最初用“大众文化”一词，甚至在《启蒙的辩证法》的草稿中也使用这一概念；到该书定稿时才用“文化工业”来取代。为什么要用后者来取代前者？阿多尔诺在后来的《文化工业再考察》（1967）一文中作了说明。他说，文化工业一词也许是第一次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使用的。在该书的草稿中，我们使用的是“大众文化”，后来我们用“文化工业”这一表达来取代它，以便从一开始就排除这样一种在其拥护者中一致的看法，即一种从群众自身中自发产生的文化，通俗艺术的一种当代形式。^② 尽管后来霍克海默也偶而用“大众文化”一词，但总赋予它“文化工业”的内涵。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如果说“肯定文化”主要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模式的话，那么“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则

① 参见[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54～5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② 参见 T. W. Adorno, *Culture Industry Reconsidered*, in Larry Ray (ed.), *Critical Sociology*, England: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0. 131P.

主要是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模式。何谓“大众文化”？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大众文化是指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而流行于大众之中的通俗文化，包括通俗小说、流行音乐、艺术广告等。它融合了艺术、音乐、政治、宗教和哲学等各方面，在闲暇时间内操纵广大群众思想和心理，培植支持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卢旺塔尔有一句格言：“大众文化反过来是一种心理分析”。何谓“文化工业”？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并没有给它下明确的定义，大概是指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阿多尔诺在《文化工业再考察》中才对这一概念加以澄清。他强调说，文化工业中的“工业”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它表示事物本身的标准化和分配技术的合理化，而不是指严格的生产过程，除了文化工业的某些主要部分（如电影工业）之外，个别的生产形式（即构思及创作）仍被保持。因此，文化工业一词并不表示生产，而是表示文化产品的“标准化”和“伪个别性”。^①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它使文化、艺术产品商品化。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文化、艺术的各个主要部分的商品化创造了条件，即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和行政管理的集中化使这种商品化成为可能。他们达成如下的共识：当代资本主义所遇到的再生产越困难，它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维持现状的一般趋势就会越强大；现有的权力和财产分配的主导者使用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手段来维持现状。结果，大部分文化生活领域被吸收并转变成控制个人意识的方面；同时，文化变成一种工业，利润动机转变成文化形式，越来越多的艺术产品变成商品，它们像工业产

^① 参见 T. W. Adorno, *Culture Industry Reconsidered*. In Larry Ray (ed.), *Critical Sociology*. England: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0. 133P.

品一样可以销售和交换。既然艺术家以出卖自己的劳动谋生，那么艺术家也就拥有这种形式的各个方面。但是艺术的交易并不防止追求每件作品的内在逻辑，现在“文化产品是彻头彻尾的商品”（阿多尔诺语）。这种过程由不同的经济领域之间加强了相互依赖及“文化垄断”所加剧、恶化。广告确立了新的美学标准，即使在那些文化工业不直接地为利润而生产的地方，它的产品也是由这种新美学所决定的。快速、高比率的投资回收的经济必然性，要求有吸引力的包装物的生产——或者为直接的销售设计，或者为创造一种销售的气氛。文化工业必须出卖特殊的产品，或转变成公共关系。法兰克福学派将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视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的一个方面或维度，断言“在垄断下的大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①，“文化工业的每个产品都是经济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②。

法兰克福学派着重剖析了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危害。首先，他们指出，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把文化变成商品，排除或否定了文化、艺术的独立自主性。由于文化变成商品，它的生产和消费服从于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被纳入市场交换的轨道，文化艺术便失去了它的独立自主性。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说：“由于出现了大量的廉价产品，再加上普遍地进行欺诈，所以艺术本身就更加具有商品的性质，艺术今天明确地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是，艺术发誓否认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反以自己变为消费品而自豪，这却是令人惊奇的现象。”^③这种情况的结果是：文化艺术的工作者主要关心的是票房价值、经济效益，而不是关注艺术完善和审美价值，文化艺术作品的好坏不是取决于它自身的内在价值，而是取决于它的可销售和可交换的程度，价值的实

^{①②③} [德]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启蒙的辩证法》，113、118、148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现则以投资的效果为尺度。这势必导致文化艺术的堕落或退化。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指出，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标准化、划一性扼杀了个性和创造性。所谓的标准化乃是一种影响作品的一般特征和细节的过程，文化工业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度，大规模生产各种复制品，如电影拷贝、唱片、照片、录音带等；而结构的类似性作为文化工业技术的结果产生于文化的形式，通俗作品或一个成功的新作品是在大商业机构急于赚钱的命令下生产的，文化工业所崇尚的是模仿，内容的风格被堵塞或冻结，然而，对旧风格更新的作品，或以旧风格为基础的新形式必须维持创新性和独创性的外表。因此，伪个性或伪个别性在标准化自身的基础上赋予大众文化的生产以一种自由选择或开放市场的光环，每个产品影响一种个别的气氛，这与其他产品的实际差别却是微乎其微的。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根据文化工业产品对风格的否定来分析这些产品，认为它们很少显示出不同于传统形式的新形式，文化艺术的生产脱离现实，文化工业的风格扼杀了风格自身。它的产品并不反映实在的本质，并没有真正的内容，它们从本质上说只是一种模仿。尽管在电影、无线电广播、流行音乐和杂志中有某种激情存在，但这仅是关于整体与部分、形式与内容、主体与客体同一的激情。因此，文化工业的产品以标准化和伪个别性作为特征，这种特征使它们有别于自主艺术。文化工业产品的模仿、标准化、伪个别性扼杀了艺术的生命以及艺术的创造性、独创性和个性。

再次，法兰克福学派指出，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已经消除了文化原有的批判和否定的向度，堕落成为为现实和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看来，文化工业及其娱乐的真正意义是“为社会进行辩护”^①；“在文化工业中，批判与敬畏都

^① [德]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启蒙的辩证法》，13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消失了，机械的鉴定取代了批判的职能”^①；“文化工业的每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社会需要塑造的那种样子”^②；“现在的艺术拒绝反映下层人民的事业，反映真正的普遍性，轻视认真地反映存在的苦难和压迫”^③；“工业化文化所描述的，是人们只能忍受的残酷生活熬煎的条件”^④。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作为一种为现存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是通过对大众心理意识进行操纵来实现的。为了说明这种操纵性，阿多尔诺搬用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概念。马克思曾从拜物教来说明生产者对自己所生产的产品的崇拜。而阿多尔诺则把这一概念引入文化领域，说明交换价值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渗透进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它一方面使文化成果变成文化商品，另一方面使艺术作品的成功不是依赖于自身的艺术性，而是依赖于票房价值。在批判理论家们眼里，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对人的心理意识的操纵具有强制性，它通过“不断重复”、“整齐划一”使所有的人从一开始，在工作 and 休闲时都受之影响，只要他还在呼吸，就片刻也离不开它们；文化工业所生产出的产品已经剥夺了大众对艺术的超越性价值的追求，剥夺了大众自主的、个人的感性能力和主动性，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而只能作机械的反应。大众意识由于受到这种丧失了否定性、超越性文化商品的催眠和灌输，也就逐步习惯于对现实采取顺从和非批判的态度。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正是这样履行意识形态的控制职能。一方面，文化活动失去了为人们提供娱乐和消遣、给人们以精神享受的作用，变成外部世界的扩展、劳作的延伸，旨在于恢复精力以应付下一次的的工作，阿多尔诺在《论流行音乐》中对流行音乐的这种作用作了这样的说明：“音乐节目的消费者自身就是决定了流行音乐生产的同一机构的产品，他们

①②③④ [德]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启蒙的辩证法》，151、118、126~127、14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的闲暇时间只是用来再生产他们的工作能力。欣赏音乐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①另一方面，文化工业决定娱乐商品的生产，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要，成为一种支配人的闲暇时间与幸福的力量，从而成为极权主义及法西斯主义控制大众舆论、操纵人们的心理意识的强有力的手段。

显然，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批判导源于他们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法西斯主义国家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操纵大众心理和意识的痛切的感受，是他们对当代科技发展对文化手段尤其是大众传媒影响的评估，以及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变迁着的文化模式的反思。法兰克福学派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力图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或发达工业社会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文化模式；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日益商品化的一般趋势，以及这种趋势所带来的对文化事业的危害。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局限性，揭露批判垄断资产阶级把文化变成为现实和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指出了由此产生的种种消极异化现象。的确，随着技术手段的完善，当代西方社会的大众传播媒介迅速发展，使文化工业迅速成长为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生产部门，文化艺术的商品化趋势不断加强。在该社会中，文化的标准化、模式化、商业化、单面化、操纵性和强制性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明显特征，从而使之具有压抑主体意识、个性、创造性、独创性、想象力和压抑自由创新、自由选择的消极功能，成为垄断资产阶级为统治辩护、压抑或平息人民大众反抗的意识形态工具。应该说，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批判，对它的涵义、特征和危害的分析是有一定深度的，并包含有合理的理论成分。法

^① 参见 Phil Slater, *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7. 124P.

克福学派的这种批判在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有相当的影响，60年代西方青年学生掀起的“反文化”运动，对流行的资产阶级社会准则和价值观的反叛，或多或少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这方面思想的影响。

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批判是有片面性和缺陷的。我们着重指出几点：其一，法兰克福学派没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采取辩证的态度，有全盘否定这种文化的明显倾向，没有看到这种文化所取得的成就的一面。的确，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有种种弊端，甚至可以说是腐败、堕落的，但并不能由此全盘否定它所取得的成就方面。毕竟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也产生了大量的优秀文化艺术作品，特别是对现实进行无情揭露和批判的作品；出现一批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在艺术形式和创作手法上也是有所创新的；这为全人类的文化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批判中，显然是很少注意到这一点的。其二，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真正处理好观念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不能辩证地说明它们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他们反对用经济基础来说明观念的上层建筑或文化意识形态现象，片面强调文化、艺术的独立自主性。他们错误地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夸大当代资本主义文化中出现的新变化，鼓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时或不充分性，用文化批判来取代政治经济学批判。其三，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批判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可以说是近代西方浪漫主义在当代的回音。他们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马尔库塞关于“肯定文化”的观念明显地体现出这种浪漫主义的怀乡病。在他看来，尽管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肯定文化具有使人逃避现实、安于现状和内心自由的肯定性质，但毕竟保留了人们内心的自由，保留了文化的批判向度；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则彻底摧毁了这种向度，造就了单面、封

闭的文化。可见，马尔库塞等人对自由资产阶级文化抱有特殊的感情。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批判及其理论具有现实的启发、借鉴意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文化事业逐步被推向市场，文化、艺术的商品化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这既给我国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生机与活力，又产生了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应如何看待文化事业的商品化趋势，如何看待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关系？文化事业如何为经济建设服务？如何处理好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以及社会需要与市场导向之间的关系？如何一般地处理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这都是我们必须加以探讨和解决的问题。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批判，对文化商品化趋势特别是对西方社会所走过的道路及其弊端的分析给我们提供了某些有意义的借鉴。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艺术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不能不服从市场经济法则，注意市场导向，但是文化艺术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又不同于一般的商品生产，它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具有自己特殊的过程、规律、方式和目标；文化艺术产品要考虑经济效益，但更重要的是要注重其社会效益，不能以票房价值作为它的唯一尺度；文化艺术产品应给人以娱乐消遣，但更重要的是它要给人以真善美的教育，陶冶人的灵魂，提高人的精神素质，如此等等。如果我们不能处理好这些关系，那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事业就难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并可能引发文化或价值危机。

第七章 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心理根源分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心理理论

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法西斯主义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千百年来压抑性的社会文化心理环境的必然产物。因此，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特别是对它产生的社会心理根源的分析，便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和“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重要课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对法西斯主义现象作了深入的心理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社会心理以及社会无意识的理论，并试图以此去“补充”、“发展”历史唯物主义。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心理理论的兴起

重视主观意识及社会心理问题，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传统。从一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就强调主观意识及意识形态问题对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他们看来，主观意识具有能动的

创造作用，甚至决定历史及革命的进程。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还不足于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貌，不足以解释社会革命发生的原因。因此，必须用关于主观意识的理论去弥补历史唯物主义的“不足”。

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便试图用“阶级意识”理论，去解释 20 年代初西欧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是马克思没有完成的理论课题，在《神圣家族》中，当马克思正要给阶级及阶级意识下定义时，却突然中断了。所以在马克思著作中，缺少关于阶级意识的理论。在卢卡奇看来，阶级意识既不是某个阶级的单个人所思考或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这些东西的平均数，也就是说，“阶级意识”不同于马克思的“社会意识”或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概念。另一方面，它也不同于个人凭经验作出的判断，它同心理学上的“个人意识”又是区别的。所以卢卡奇强调，只有把“阶级意识”同“意识形态”、同“个人意识”区别开来，才能解释为什么在不同阶级身上会存在相同的阶级意识，在同一阶级中存在着不同的阶级意识，这样才能发现“阶级意识实际的、历史的职能”^①。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尽管往往以“虚假”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们却是客观经济结构在思想上的反映。葛兰西也提出了“主观革命”的问题。所谓主观革命，也就是意识形态方面，包括信仰、价值、文化传统等方面的革命。葛兰西强调，这种主观革命在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卢卡奇等人所说的“阶级意识”、“主观革命”，实际上就是社会心理，他们把它看作是介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并试图以此来说明社会意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对社会

^① [匈]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58 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存在和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卢卡奇等人的观点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及“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心理理论研究的先导。

30年代以后，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及其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批判法西斯主义、剖析它产生的各种根源，就成为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和“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中心论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单纯从政治制度、经济结构、阶级关系角度已无法解释法西斯主义现象。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无法解释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原因，尤其无法说明法西斯主义政权何以能得到包括众多工人阶级成员在内的中下层劳动群众的支持。他们沿着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重视主观意识的传统，借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从各个不同角度对法西斯主义现象作了深入的剖析，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心理及社会意识理论。

从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的不长时间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发表了许多研究专著，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赖希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1933年）。该书提出下中层阶级中普遍存在权威主义性格结构，是法西斯主义产生并得逞的心理根源，而这种权威主义性格结构是千百年来对妇女、儿童、青少年实行性压抑的结果。（2）布洛赫的《这个时代的遗产》（1935年）。该书分析了法西斯主义的阶级基础——中产阶级的社会心理，认为，中产阶级的心理特征是，他们在资本主义的物化世界中，变成了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但在他们的意识深层仍然保留着某些被称为“过去的残余”的东西，如教养、社会地位、责任心、荣誉感、浪漫主义等，而一旦这些东西不为社会所接受，他们便会因失望而产生愤懑，布洛赫称之为“被压抑的盛怒”，法西斯主义正是利用了中产阶级的这种心理，使之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工具的。（3）弗洛姆的《对自由的恐惧》（1941年）。书中提出法西斯主义的心理

基础是现代人普遍存在的“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并从分析现代人逃避自由的三种方式入手，提出了“社会个性”的理论。(4)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1947年)。该书从启蒙的二律背反分析法西斯现象，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正是“启蒙精神的自我摧残”的必然结果。(5) 阿多尔诺等人主编的《专横的个性》(1950年)，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法西斯主义现象。(6) 阿多尔诺的《弗洛伊德理论和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程式》(1951年)，分析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特点及其得逞的原因，剖析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法西斯的阵营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赖希和弗洛姆，他们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理论“结合”起来，去分析、研究法西斯现象，试图用弗洛伊德主义去“补充”、“发展”历史唯物主义。

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此重视对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心理根源的分析，它们的依据和目的何在？对此，我们有必要做一些分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法西斯是一种奇特的历史现象，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怪胎，但它又得到下中层劳动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因此对于法西斯主义现象，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经济根源上或政治制度上是难以解释的。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有其合理性，它注意到人的无意识（本能冲动）的巨大历史作用，但弗洛伊德的理论基本上属于个体心理学，而不是一种社会心理学。因此他们主张，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才能对法西斯主义现象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赖希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提出批评，他在《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一书中，力图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分析方法无法解释法西斯主义现象的原因。他认为，按照马克思的社会革命

理论，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欧洲，社会革命的经济前提已经具备：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民族经济向世界经济的成长同各民族国家的关税制度是完全不一致的；资本经济萎缩，达不到其生产能力的一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显而易见的；工人的“贫困化”也相当严重，整个欧洲约有5 000万人失业，上亿的工人只能勉强糊口。但是，社会革命并没有根据马克思的预言而发生，“剥夺剥夺者的目标未能实现，与所期望的恰恰相反，在‘社会主义和野蛮状态’的十字路上，它走向的是社会最初经历的野蛮状态”^①。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赖希进而认为，根据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法西斯主义政权代表着大工业资本家和容克地主的利益，工人阶级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支持法西斯主义政权的。而30年代德、意等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在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中，居然大部分是中下层劳动群众，其中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是最具“革命性”的、是社会革命“领导阶级”的产业工人。例如，在1930年德国大选中，纳粹党所得640万张选票中，工人、雇员、职员投的票为300万张，而在这300万张选票中，30%~40%是产业工人投的；在1933年年初的大选中，这一比例又提高了，在纳粹党所得的1 200万张选票中，工人、雇员及职员投的票超过600万张。这一现象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理论，关于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的理论，无法解释法西斯主义现象。

问题出在哪里呢？赖希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的东西”决定“意识的东西”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没能解决两个问题，即“物质的东西”转化为“意识的东西”：（1）是如何发生的，这一转化过程在人的头脑中是如何发生的？（2）所形成的“意识的东西”又是如何反作用于经济过程的？

^① [奥] 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6~7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这一“缺陷”，必须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弥补。赖希提出，在物质的东西与意识的东西的转换过程中，人的心理结构是一个重要中介，意识形态不仅反映着社会的经济过程，而且还具有把这个经济过程深植于作为社会之基础的人民的心理结构中的功能，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就是通过人的心理结构而实现的。赖希写道：“只要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改变了人的心理结构，那么，它就不仅在人身上再生自身，而且更主要地，还会成为人身上的一种积极力量、一种物质力量，而人则发生具体的变化，并因而以一种不同的矛盾的方式来行动。这样而且只有这样，社会意识形态对它由之而来的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才是可能的。”^① 赖希认为，在对待法西斯政权问题上，工人群众的经济地位与其政治态度的这种不一致性，显然无法用经济原因来解释，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人的心理结构，所以赖希对法西斯主义现象的分析、批判，重点便放在对下中层阶级及普通群众的心理结构的剖析上。

弗洛姆也认为，对于法西斯主义现象，不能单纯从社会政治、经济去分析，不能归结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缺乏民主训练，也不能归结于希特勒之流的狡诈和欺骗手段。弗洛姆认为，研究法西斯现象，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把法西斯主义看作一种垄断经济力量的产物，看作是一种受工业资本家和容克地主支持的政党取得政权的产物，法西斯主义的得逞是一小撮人对多数人进行欺骗与胁迫的结果。弗洛姆认为，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从纯粹经济和政治角度解释法西斯现象，而否认法西斯主义同时又有其社会心理根源，这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另一种是认为只有用心理学、甚至只有用心理病理学，才能对法西斯主义作出正确的解释。这种观点把希特勒看作是一个“精神病人”，他的追随者也

^① [奥] 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1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被看成疯狂的、精神失常的人，持这种观点的人断言，法西斯主义的真正根源“在于人的心灵，不在于经济”^①。弗洛姆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无法正确说明法西斯主义现象。在他看来，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一个心理学问题，而心理因素又受到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所以法西斯主义既是一个经济学、政治学的问题，又有其心理学方面的根据。因此，不仅要对法西斯主义作政治、经济分析，而且还必须探讨法西斯主义的“人性基础”，研究法西斯主义分子的“社会个性”。

显而易见，“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对主观意识和社会心理问题的研究，是有其历史依据的。20世纪初，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了一股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机械主义化、经济主义化的思潮。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科学原理作庸俗化理解，把它歪曲为一种机械经济决定论，否认社会意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巨大的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卢卡奇等人重视对意识形态、阶级意识问题的研究，阐述了无产阶级意识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正是为了反击机会主义者的挑战，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卢卡奇正是借助阶级意识这一范畴，来具体阐述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思想、观念、理论是怎样通过社会心理而反作用于经济过程的。

30年代初，一些马克思主义政治家（赖希称之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称之为“伪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坚持这种机械经济决定论，认为诸如宗教、政治观念这类意识形态是唯一地由经济存在决定的，看不到经济发展对于意识形态的依赖性，他们还把心理学当作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加以排斥，看不到社会心理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忽略了对群众心理的研究。按照他

^① [德] 弗洛姆：《对自由的恐惧》，144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们的看法，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将促使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成熟，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将会被激发出来。结果事与愿违，社会主义革命并未如期到来，反而是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广大群众的意识形态不是向左转而是向右转，群众正是在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投票支持了法西斯主义政党。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法解释、说明法西斯主义现象，这一方面是因为当代这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伪马克思主义者”曲解了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失去生命力的空洞的公式、僵化的教条。另一方面，也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也有缺陷，正如赖希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存在一个“空白点”，正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理论中缺少社会心理这个中间环节，才导致了“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将意识形态看作是“唯一直接”受人的经济利益（经济动机）决定的错误。所以赖希等人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思路，注重对主观意识、社会心理的研究，运用精神分析方法，对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社会心理根源，进行多方面的剖析，并用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心理理论（如赖希的“性格结构”论、弗洛姆的“社会个性”论）去填补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空白”。

重视对社会心理问题的研究，这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否真的像“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存在一个社会心理理论“空白点”？需要他们去“填补”？以及能否把“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或“伪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算在马克思主义的账上？

首先，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并没有否认社会心理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就曾对农民的怀旧心理、农民对拿破仑的崇

拜心理以及“拿破仑观念”在波拿巴政变中所起的作用，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心理因素的作用，波拿巴这个历史小丑是不会登上法兰西帝国皇帝的宝座的。另外，在19世纪末，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就已系统论述了社会心理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普列汉诺夫认为，社会心理是一种较低水平的社会意识，它同较高水平的社会意识、思想体系、社会意识形态诸形式，是有区别的。作为一种低级的社会意识，各种社会心理都是受着社会存在决定的，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普列汉诺夫还根据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确定了社会心理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 (1) 生产力的状况；
- (2) 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
- (3) 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
- (4) 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
- (5) 反映这种心理特征的各种思想体系。^①

在这个结构中，社会存在和社会政治制度通过社会心理对社会意识起作用，社会意识又通过社会心理对社会存在起重大反作用。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观点，比较准确地表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心理的理论。显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存在着关于社会心理理论的“空白点”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其次，我们认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与后来的某些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或理论宣传家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准确的乃至错误的理解严格区分开来，绝不能将后人的不正确的理解的责任归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本身。

^①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195页，北京，三联书店，1959。

二、对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心理分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社会心理分析，就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对法西斯主义何以产生，何以会得到众多普通劳动群众支持进行心理分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对法西斯主义进行心理分析时，要严格将两部分人区分开来，一部分是法西斯主义的倡导者及他们的积极追随者，这部分人可称为法西斯主义的“狂徒”。另一部分是普通劳动群众，他们的思想观念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但他们对法西斯主义政权却采取了容忍、默认、屈从的态度，而不是积极地投入反法西斯主义斗争，这部分人可称为法西斯主义的“顺民”。

1. 法西斯主义“狂徒”心理分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下层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包括希特勒在内的法西斯主义头子，都来自下层中产阶级，法西斯主义狂徒也大多出自下层中产阶级家庭。“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下层中产阶级（赖希称作“下中层阶级”）主要指小业主、小商人、小私有者、手工业者、下层知识分子、农民等，他们社会地位低下，在经济上受到上层大资产阶级的挤压，深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这部分人是有可能向左转而成为革命的参加者的，但是，恰恰相反，正是从这个社会阶层中产生了最反动的法西斯主义分子。“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这不能单纯从下层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来解释，而只能从这一阶级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心理来解释。在对下层中产阶级所作的心理分析中，赖希的性格结构分析和弗洛伊德的社会个性分析最具代表性。

(1) 赖希对下中层阶级性格结构及其形成机制的分析。什么

是性格结构呢？性格结构又称心理结构。赖希认为，性格结构是指每个人把其有组织的习惯带到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去的行为的内在化范型，这种内在化范型代表着一个人存在的特殊方式。赖希认为，每个人的性格结构包含着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是性格表层，表现为含蓄、彬彬有礼、有同情心、负责任、讲道德，但却是虚伪的；第二层次是性格中层，表现为残忍、虐待狂、好色、贪婪、妒忌，是人的行为的“第二动力”，是对原始生物欲望压抑的副产品；第三层次是性格深层，也称“生物核心”，表现为诚实、勤奋、合作、与人为善。赖希认为，表层结构是呈现于外的，所以人总是以虚伪的形式出现，深层结构是人的自然的健康的基础，它产生着自然的利比多冲动，但利比多冲动在经过第二层次时被扭曲了，成为一种反常的冲动。

赖希认为，人的性格的这三个层次都是社会发展的“沉淀物”，并且可以在社会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集团中找到各自的对应物。比如，自由主义的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想，就是人的表层性格结构的体现；真正的革命、科学和艺术则源于人的深层性格结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所体现的则是人的中层性格结构。由此赖希得出两条重要结论：一是“任何一个人在其性格结构上都具有法西斯主义的情感和思想因素”^①。换言之，法西斯主义有着深刻的心理或“人性”根源。二是法西斯主义现象并不仅限于德国、意大利等少数几个国家，而且包括像苏联、美国这样的“反法西斯主义”国家都有，所以它又是一种普遍的国际现象。他断言：“‘法西斯主义’仅仅是普通人的性格结构的有组织的政治表现，这种性格结构既不限于某些种族或民族，也不限于某些政党，而是普遍的和国际性的。从人的性格的角度来看，‘法西斯主义’是

^① [奥]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第三修订增补版序言）4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具有我们权威主义机器文明及其机械主义神秘生活观的被压抑的人的基本情感态度。”^①

既然每个普通人的性格结构中都有着法西斯主义因素，但为什么法西斯主义精神、法西斯主义的狂徒正好出自下中层阶级而不是其他阶层呢？赖希认为，这是因为，虽然每个人都具备三个性格层次，但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环境下、在不同人身上，这三个层次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其中总有一个层次的性格结构成为某个人的主导性格。如果中层结构占主导地位，某人的性格便是神秘主义或权威主义性格，如果是深层结构占主导地位，则形成民主主义性格。赖希认为，下中层阶级性格正是以被扭曲的、反常的中层结构为主导的权威主义性格。这种性格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一种“小人精神”：自卑又自傲，被人奴役又想奴役他人，仇视权威又渴望权威。下中层阶级的社会地位正好处于上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对比上层资产阶级，他们感到自卑，对比无产阶级又感到自傲；他们受上层资产阶级的奴役，故敌视权威，具有“造反精神”，但他们又奴役无产阶级，所以又渴望权威；他们在经济上并不富裕，但又比无产阶级强，所以表面上总是装出一副绅士派头，不屑与无产阶级为伍。赖希说，这些人吃的食物既低劣又不足，但却非常看重“一套体面的服装”，这正是这种“小人精神”的生动体现。下中层阶级的这种“小人精神”正是法西斯主义精神：“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是‘小人’的精神，小人被奴役，渴望权威，同时又喜欢造反。”^②

那么，下中层阶级的以中层结构为主导的权威主义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呢？赖希认为，形成下中层阶级权威主义性格的社会环境主要是家庭，而手段是性压抑。赖希认为，考察下中层阶级的

^{①②} [奥] 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第三修订增补版序言）3、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家庭，可以发现其家庭结构与其生产方式是一致的，家庭既是生活单位又是生产单位。这种一致性的特征要求家庭生活服从于生产秩序，父亲握有家庭经济大权，享有绝对的权威，并对子女实行严格的控制，从而形成赖希所说的“父权制权威主义家庭”。赖希认为，这种父权制权威主义家庭正是下中层阶级家庭的“特色”。相比之下，无产阶级家庭的这种权威主义色彩就淡多了，因为无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可以逃进工厂做工以避免父亲的控制，而他们的职业性质决定了他们只能与家庭保持一种松散的关系，而下中层阶级家庭的孩子则别无选择。赖希认为，下中层阶级家庭中父亲的权威地位的维持，光靠妻子、儿女对丈夫、父亲的经济依附是不够的，更主要的是通过对妻子、儿子的性压抑，即不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性存在物”。赖希说：“为维护父亲的这种地位实际上必需的东西，是对妇女和儿童最严格的性压抑。”^①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下中层阶级的青年一代，其原始生物欲望遭到严重扭曲，所以反常的第二层次便成为他们的主导性格了。

赖希进一步分析了性压抑所形成的恶果及其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

第一，性压抑造成了普遍的性禁锢和性衰弱，借助于宗教畏惧，性禁锢和性衰弱又注入了性犯罪感，并深深地根植于下中层人士的性格之中。赖希指出，性衰弱必然导致人的自信心低落，这样，一方面导致性生活的残酷化，性由于得不到自然的满足，被压抑了的性能量便以其他反常的形式爆发出来，“与性生活联系在一起犯罪感，分裂了自然的、性高潮的性结合过程，造成了对性能量的压抑，使得性能量后来以各种方式爆发出来”^②。于是自然攻击性就成了野蛮的虐待狂，这是导致法西斯主义分子种种残

^{①②} [奥]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48、8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暴行为的心理根源。另一方面是产生僵化的性格及各种病态观念，“强制性地控制一个人的性活动，坚持性压抑，导致了病态的、有情感色彩的荣誉和义务、勇敢和自制的观念”^①。这种病态的性格和观念正是我们在许多法西斯主义分子身上所经常看到的。

第二，性压抑在儿子身上所产生的后果，除了对父亲的权威的服从之外，还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同父亲的自居作用。赖希认为，当儿子在父亲强大的权威面前无能为力，便会产生对父亲的崇拜感及模仿父亲、想当父亲，即同父亲“自居”的心理，儿子越是无能为力这种自居感也就越是强烈。下中层阶级家庭儿子的这种自居心理便成了同政治权威的自居作用的基础，从同父亲的自居作用自然演变为同元首、同“伟大民族”的自居作用。赖希说：“‘群众个体’由于自己的教养而越是变得无能，他同元首的自居作用也就越明显，儿童对保护的需要也就越是伪装上同元首保持一致的感情形式。这种自居倾向是民族自我陶醉的心理学基础，即个人从‘民族的伟大’中获得的自信心的心理学基础。反动的下中层阶级人士在元首身上，在权威主义国家中领悟到自身。”^②赖希认为，这种自居心理也是法西斯主义“元首主义”、“民族主义”、“大家庭”等意识形态的心理基础。

第三，性压抑所形成的妇女“贞洁”观念，是法西斯主义“种族纯洁”理论的心理学依据。赖希认为，性压抑首先是对妇女的性压抑，即“不应把妻子当作一个性存在物”^③，对妇女性自由的剥夺便产生了“贞洁”观念，即要求妇女“贞洁”，不许与丈夫以外的男子性交。与此同时，又形成了把性行为当作不体面

^{①②③} [奥] 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48~49、56、9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事情的观念，性活动被当作是“肮脏的”、“庸俗的”、“堕落的”行为。这样，判断一个妇女是否“道德高尚”的主要依据是看其是否“贞洁”的观念，便被法西斯主义演变为另一种观念，即，判断一个种族是否“高贵”的主要依据也就是看其血统是否“纯洁”了。按此逻辑，凡是由“杂交”而生的种族，便是低劣种族了，黑人、犹太人即属此列，雅利安人则是“高贵种族”。那么，“高贵种族”如何保持其血统的“纯洁”呢？这自然是要求“高贵种族”的妇女保持“贞洁”了。所以在赖希看来，法西斯主义的种族主义产生于“贞洁”观念，而种族主义又反过来加强了对妇女的性压抑。赖希指出：“把自然的性活动误解为某种‘肮脏和淫荡’的东西，这才是种族理论的非理性内容。”^① 赖希认为，由于下中层阶级家庭的性压抑尤为严重，他们对妇女的“贞洁”要求也特别高，所以法西斯主义的种族理论对他们也就特别有“吸引力”。

综上所述，赖希认为，家庭是形成适用于某种社会政治制度的人的性格结构的主要机制，这就是赖希所说的家庭的“政治职能”。家庭的这种作用，不仅存在于下中层阶级中（当然下中层阶级家庭的这种特征特别明显），也存在于所有家庭之中，“父权制权威主义”实际上已是现代家庭的特征了。赖希强调，不能仅仅把家庭当作是产生权威主义国家的“基础”，而必须把它“当作一种支持权威主义国家的最重要的制度”，“必须把它视为政治反动势力的细胞，即产生反动的男男女女的最重要的核心”^②。

(2) 弗洛姆对下层中产阶级社会个性及其形成的分析。弗洛姆认为，社会个性是指某一社会阶层大部分成员所共同具有的个性结构，它是某一社会“团体大部分成员个性结构的基本核心，这

^{①②} 「奥」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90、9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种个性结构乃是团体共同的基本生活经验与共同的基本生活方式的产物”^①。特定的社会个性是由特定的社会存在方式塑造的，但一经形成，它便作为一种人性的“原动力”反过来对社会过程产生积极作用，所以弗洛姆认为“社会个性是理解社会过程的关键概念”^②。要了解下层中产阶级之所以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积极拥护者的阶级基础，关键在于要了解这一阶层的独特的社会个性。

下层中产阶级的社会个性是什么呢？弗洛姆认为，从外部特征来看，下层中产阶级的性格特征是：好强、恨弱、肚量小、易记仇，从不滥用感情和金钱，本质上是禁欲主义者。他们的人生观十分狭隘，好猜疑，仇恨强者，又生性好奇，容易妒忌他人。这些性格特征可以归纳为贪求权力与渴望屈从，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也就是施虐狂与受虐狂心理倾向。下中层阶级的社会个性正是这种施虐—受虐的权威主义社会个性。

这种施虐—受虐的权威主义社会个性是怎样形成的呢？弗洛姆以现代人普遍存在的“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作了解答。弗洛姆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追求自由的历史，人类追求自由的过程，也就是人类不断地实现“个体化”的过程，不断地摆脱“原始脐带”、实现自身“内在成长潜能”的过程。又由于人类历史是一部冲突与竞争的历史，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并没有为个人实现“个体化”提供合适的、和谐的基础，这样，“个体化”便意味着孤独与不安全。自由出现了“异化”，自由本来是对奴役的摆脱，现在却成了新的奴役。于是对人来说，“自由成为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③。摆脱自由、逃避自由自然也就成了人们的一种共同心理要求了。弗洛姆认为，在文艺复兴以前的社会中，人们显然缺乏

^{①②③} [德]弗洛姆：《对自由的恐惧》，197、197、25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自由，但却处在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社会严格地规定了每个人的身分和地位，给人以保障和安全感，人不必为自己的前途、命运操心。文艺复兴以后，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在政治、经济、思想、宗教信仰等方面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此同时也陷入了空前的孤立无援境地，自由给人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孤独、焦虑、恐惧，现代人逃避自由的渴望更热切了。

弗洛姆认为，现代人逃避自由的各种方式中，最典型、最普遍的就是“权威主义”方式，即“个体放弃自身独立性，希望把自己与某个人或某个外物结合以获取自己所缺乏的力量”^①，它表现为两种极端的行为方式：或渴望屈从他人，或努力去控制他人，前者即受虐狂，后者即施虐狂。具有受虐心理的人力图显示自己的卑微、无能为力和无足轻重的感受，“他们经常表现出一种依赖特征：依赖外力、依赖他人，或者依赖某个组织机构，或者依赖大自然”^②，具有施虐心理的人的特征正好相反，他们或者想拥有绝对的无限的权力去控制别人，使别人依赖自己，或者想掠夺别人的一切——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也包括如情感、智力这种非物质的东西，或者想去折磨别人，希望看到别人遭受痛苦。弗洛姆认为，这两种心理倾向虽然其表现特征正相反对，但本质上都是一致的，“都是由于无力承受自己的孤单和懦弱而造成的”^③。这两种倾向往往交织在一起，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弗洛姆称此为施虐—受虐“共生关系”，这种性格也就称为“施虐—受虐”性格。由于具有这种性格的人一方面崇拜权威，渴望屈从权威，另一方面又努力想使自己成为权威，使他人屈从自己，所以弗洛姆又将这种性格称作“权威主义性格”：“所谓权威主义性格就是一

①②③ [德] 弗洛姆：《对自由的恐惧》，98～99、99、109～110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个人同时表现出虐待狂和受虐狂的冲动。”^①

弗洛姆认为，这种施虐—受虐的权威主义性格，就是下层中产阶级的社会个性，“纳粹运动的中坚力量——下层中产阶级最富于权威心理结构的特征”^②。而希特勒则是这种社会个性的典型代表，在他身上，受虐狂和施虐狂两种倾向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弗洛姆根据《我的奋斗》中所表露出来的思想，对希特勒的权威主义性格特征进行了分析。弗洛姆认为，希特勒的施虐倾向表现在他“对权力的虐待狂式的渴望”^③，他“对德国群众的关系的特征是，以一种典型的虐待狂的方式鄙视他们和‘爱’他们，他对自己的政治敌人的关系的特征则是向他们显示这些破坏因素，这些因素是他们虐待狂性格的重要成分”^④。希特勒多次谈起如何控制群众、支配群众，以及由此产生的满足感。希特勒毫无顾忌地表示，实现统治世界的愿望是纳粹党的目的，希特勒及其同党享受对德国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而德国群众则被诱导去享受对其他民族发号施令的权力，去发泄支配世界的情欲。

希特勒的受虐狂倾向表现在他的服从压倒优势的强大权力及消灭自身的愿望。希特勒不厌其烦地向群众宣传：个人是虚无，算不了什么，个人应当承认自己的这种无意义性，应当在更高的权力中消解自己，并且由于分享这一更高权力的强大与光荣而感到自豪。简言之，就是要求群众服从自己，而希特勒本人则服从于上帝、命运、必然性、历史和自然。

弗洛姆认为，施虐—受虐个性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爱强权、恨无权，这在希特勒身上表现为，他仇恨魏玛共和国，因为它是软弱的；他羡慕工业领袖和军界领袖，因为他们有权力；他从不反对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权，总是反对他认为本质上是无权力的那些

^{①②③④} [德]弗洛姆：《对自由的恐惧》，154、143、143、154~155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集团。由于下层中产阶级与希特勒有着共同的社会个性，所以他们很容易被希特勒所俘虏，容易接受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而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狂徒。弗洛姆认为，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适合了下层中产阶级的心理状况，它的政治实践也实现了其意识形态的许诺。法西斯主义国家形成了一个等级制度：每个人之上都有一个他要服从的人（满足受虐欲），每个人之下都有一个他可以对之行使权力的人（满足虐待欲），而领袖——元首则服从在他之上的命运、历史和自然。这样，“纳粹意识和政治实践满足了从一部分人个性结构中生发出来的欲望，也给那些放弃了和被剥夺了对生活的自我决定和一切信仰的人指出了前途和方向，虽然这些人并没有享受到统治和服从的快乐”^①。于是，下层中产阶级，尤其是他们的年轻一代的心理力量，便成了一小撮法西斯主义党魁手中的“烈性炸弹”。弗洛姆认为，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狂徒大多出自下层中产阶级的最主要原因。

2. 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分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法西斯主义的社会阶级基础中，除了以下层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狂徒外，还有大批的普通群众。他们虽然在思想上不能接受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在行动上却采取了容忍、屈从法西斯主义政权的态度，在关键时刻（如1933年初的德国大选中）投了法西斯政党的票，在战争中，又充当了法西斯主义的炮灰，这部分人包括相信民主主义的自由资产阶级人士、工人、雇员、职员和其他劳动群众。怎样解释这些普通群众的这种行为呢？

赖希认为，普通群众之所以接受并屈服于法西斯主义政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首先是在普通劳动群众中也存在着权威主义家庭结构。赖希认为，权威主义的家庭结构并非下中层阶级所

① [德]弗洛姆：《对自由的恐惧》，166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独有”，在相当一部分工人家庭也存在。根据当时有人所作的实验表明，在德国约有10%的工人和雇员的家庭属于权威主义家庭，这就使得这部分工人容易相信法西斯主义宣传，屈从法西斯主义统治。

其次，可以从普通群众中存在的“非政治”倾向得到解释。所谓“非政治”，赖希认为并不是指一种消极的心理状态，相反，它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即“抵制对社会的责任”的心理状态。赖希认为，在当时的德国，这种“非政治的人”约有500万，他们大多是普通劳动群众。那么，作为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广大劳动群众，为什么不是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产生强烈的社会革命要求，而是产生这种抵制社会责任的“非政治”倾向呢？赖希认为，这同样不能从他们的经济地位来说明，而只能归诸他们的“不幸的性生活”：“那种在社会上不承担责任的人，是深陷入性冲突之中的人。”^①“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是基于个人冲突和焦虑之上的，其中性焦虑占主导地位。”^②赖希认为，普通劳动群众同样蒙受性压抑、性禁锢之苦，但他们不像中产阶级分子那样讲“教养”、爱“面子”，于是便常常陷入深深的性冲突之中，而长期的性冲突必然禁锢着一个人合理思维和社会责任心的发展，它使人感到害怕，迫使他们沉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碰到了—一个靠性的、利比多的方法来工作的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就会把注意力完全转向这个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赞同法西斯主义纲领，接受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因为他们可以从对元首和元首意识形态的忠诚中，使那种持久的、因性冲突而导致的内在紧张心理得到暂时的缓解，在不知不觉中，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解决”了性冲突。赖希认为，法西斯主义势力正是利用了劳动群众的不幸的性后果，而把他们置于自己的反动势力范围内。他说：

①② [奥]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186、18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一个作为广大劳动群众之一员的人越是非政治的，他也就越容易受政治反动意识形态的影响。”^① 在赖希看来，纳粹党的党徽卐就是一种性象征、一种性暗示，它以抽象图象的形式表现了性行为。这种象征符号，无疑对于处于性焦虑状态的普通群众的无意识深层，会产生一种巨大的诱惑。

那么，被马克思称为最具有革命性、是社会革命“领导阶级”的产业工人，为什么也会投票支持法西斯主义政党呢？赖希认为，这同样要从无产阶级的心理结构来分析。显然，产业工人的家庭结构有别于下中层阶级，虽然在产业工人家庭也存在着性压抑，但由于产业工人有自己的性观念，这种性观点同道德主义意识形态是直接对立的，所以产业工人的孩子所受性压抑程度远低于下中层阶级的孩子，在他们身上，权威主义性格特征也不那么明显。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一部分产业工人成为法西斯政权的支持者呢？赖希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解释，第一，在现代，产业工人是由农村破落农民转过来的，因此，“只要农民依然移向城市而成为工人，他们也就带来了一种新的农村家庭的意识形态，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那样，这种意识形态是滋生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最好土壤”^②。第二，从产业工人的心理结构看，现代产业工人的心理结构与早期工人阶级的心理结构有很大的不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社会政策贫乏，劳动强度大，生活水平低下，所以“19世纪无产阶级的心理结构是以逆来顺受地服从命运为特征的”，如果革命条件成熟，“这种麻木不仁阻挡不了革命情感的突然爆发，阻挡不了这些情感发展到出乎意料地强烈和坚决的程度”^③。到20世纪就不同了，工人运动成功地争得了许多政治、经济权利，如缩短工时，取得公民权，有一定社会

^{①②③} [奥] 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184、163、64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保障等，这些固然具有加强工人阶级力量的效果，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相反的过程：“随着生活标准的提高，在心理结构上开始被中产阶级同化。随着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他的眼睛开始向上看’。”^① 赖希断言，正是由于产业工人身上近几十年来形成的这种“保守的心理结构”，所以当革命受到挫折（如 10 年代末 20 年代初的欧洲工人运动的失败）时，便阻挡了他们的革命情感的发展，并急剧向右转，成了法西斯主义的附庸：“对社会民主党的失望，再加上悲惨地位和保守思想之间的矛盾，必定导致法西斯主义。”^②

弗洛姆也从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来解释这种“顺民”现象。弗洛姆认为，在大多数德国工人身上，也存在着权威主义性格因素（虽然不构成主导性格），这表现在他们对已建立起来的权威往往怀有根深蒂固的敬仰与羡慕，这是他们“顺从”法西斯主义权威的心理根源之一。造成众多普通劳动群众成为法西斯主义政权“顺民”的另一重要心理根源是现代人逃避自由的另一方式——“自动适应”的心理机制。所谓“自动适应”，也就是个体的自我放弃：“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完全承袭了文化模式所赋予他的那种人格。”^③ 别人是什么，他便是什么，别人期待他成为什么，他便成为什么。这样，“我”与世界之间的矛盾消逝了，从而对孤独和无能为力的恐惧也消失了。弗洛姆写道：“一个人若放弃他独特的自我，成为一个自动装置，变得同周围其他也是自动装置的芸芸众生没什么两样，那么他还会感到孤单和焦虑吗？然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他丧失了他的自我。”^④ 弗洛姆认为，这种丧失自我而由“伪自我”取而代之的逃避方法，使个人陷入了极端的不安全状态中。他本质上不过是别人对他的期望的应声虫，在

①② [奥]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64、65 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③④ [德]弗洛姆：《对自由的恐惧》，129、129 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某种意义上他已失去他的“正身”，失去他的个性，成为“伪自我”，于是他无法摆脱怀疑和困惑。为了克服这种由失去正身或个性而产生的恐慌，他被迫仿效别人，迎合别人，想通过别人持续的赞许和承认来探究自己的身分、个性和归属，相信别人的看法，按别人的意愿去做是他的人生准则。弗洛姆说，这种人是很容易为“权威”所煽动的，因为“只要新的权威能给他安全感，能使他解除怀疑，他便准备服从新的权威”^[1]。他们之所以能顺从法西斯主义政权，就是因为法西斯主义以“新权威”面目出现，利用了他们的这种“自动适应”心理。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对法西斯主义狂徒及普通群众所作的心理分析，在法西斯主义研究中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在当时的法西斯主义研究中，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集中于政治、经济和阶级关系方面的研究，这些当然是正确的，但还不够，不足以了解法西斯主义的全貌，尤其是当某些社会阶层的经济地位、阶级属性与其政治态度相悖时，传统的研究方法的弱点就显得很突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研究，从一个新的角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这对于推动国际社会的法西斯主义研究，从而使人们能从多角度、多侧面认清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实质，起了积极作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心理分析，在社会心理学研究方面，也产生重要影响。赖希是第一个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入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他创造性地将弗洛伊德原来适用于对个体进行精神分析的术语、范式、方法，应用于对社会群体的分析，创立了“群众心理学”，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赖希提出的关于法西斯主义的心理根源是“权威主义性格”的观点，也为研究界所普遍接受，弗洛姆《对自由的恐惧》就是在赖

[1] [德]弗洛姆：《对自由的恐惧》，143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希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弗洛姆力图克服赖希过分强调性压抑、性禁锢作用的片面性，试图从更深的层次上——人类追求自由又企图逃避自由的矛盾心理，揭示这种权威主义性格的形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关于“社会个性”的理论，这些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上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尽管赖希、弗洛姆一再声称，法西斯主义的产生还有其政治、经济根源，法西斯主义现象不仅是一种心理学现象，也是一种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现象。但由于他们没有分清主次根源的区别，本末倒置，将心理根源当作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根源，过分强调心理因素的作用，这就导致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在赖希、弗洛姆对法西斯主义根源的分析中，政治的、经济的作用完全被抛在一边，而心理结构、社会个性的作用则被片面夸大了。赖希反复强调，是现代人的神秘主义的权威主义性格产生了法西斯主义政党，而不是相反；“没有群众的这种心理结构，就不可能有战争”^①。甚至，群众的性格结构还决定着国家形式：“不管人民群众的性格结构是消极地还是积极地表现出来，这种性格结构的影响都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采取的形式。”^②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它把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法西斯主义的暴行以及法西斯主义战争的责任，统统推到群众身上，就把群众推到了历史的审判台上，这使得他的法西斯主义批判的革命性被大大削弱了。

甚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些人也无法接受赖希、弗洛姆这种片面强调心理因素作用，而把政治、经济因素抛在一边的做法。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尔诺就认为，赖希、弗洛姆实际上是将“法西斯主义宣传何以得逞”和“法西斯主义何以产生”这两个本质上不同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了。阿多尔诺指出，“法

①② [奥]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19、256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西斯主义宣传何以得逞”的问题主要是个心理学问题，用弗洛伊德的“性压抑”、“自居作用”、“利比多情结”、“施虐—受虐狂”等理论即可予以说明。而“法西斯主义何以产生”的问题则主要是个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不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答。赖希、弗洛姆正是把这两个问题混在一起，才导致将法西斯主义现象主要看作一种心理现象的错误。阿多尔诺认为，不可否认，法西斯主义宣传之所以是成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其符合了弗洛伊德所描写的那些心理机制，但不能由此得出法西斯主义制度是建立在人民群众心理基础之上的结论。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为什么法西斯主义宣传能符合弗洛伊德所描写的那些心理机制，而其他政治力量的宣传则不能？为什么“集体心理学”唯独适用于法西斯主义，而不适用于其他运动？一旦探究了这些问题，我们即可发现这是心理学所无法回答的。法西斯主义宣传之所以能符合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心理机制，主要是由法西斯主义分子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弗洛伊德所描述的这些心理机制，都是非理性的、无意识的，只有那些敌视理性、与绝大多数人为敌的人才能利用它们，而法西斯主义分子恰恰是这样的人。阿多尔诺说：“由于法西斯主义多半不可能通过理性的论据赢得群众，其宣传当然必定偏离推理的思想，必定从心理学上去激发非理性的、无意识的心理机制。”“法西斯主义宣传不得不为了自己的种种目的只管复制现存的心理状态”，“在普遍流行的情况下，法西斯主义宣传的不合理在本能结构的感覺上变得合理了”^①。所以，阿多尔诺断言，产生法西斯主义的真正根源不在于人的心理之中，而在于现实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之中，阿多尔诺非常赞同波洛克在40年代初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根源所得出的“法西斯主义国家是当时的经济危机的最

^① [德]阿多尔诺：《弗洛伊德理论和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程式》，转引自俞吾金、陈学明著：《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15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后解决所必不可少的，是稳定的垄断资本主义在逻辑上必然的政治形式”的结论。较之赖希、弗洛姆的理论，阿多尔诺、波洛克的观点显然更切合实际。

赖希、弗洛姆的法西斯主义心理分析的这种片面性错误，使他们在探索消灭法西斯主义途径时步入了迷途。

三、对消灭法西斯主义的途径的探索

“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分析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而且进一步探索消灭法西斯主义、铲除滋生法西斯主义土壤的途径。既然他们认为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最主要的是社会心理因素，因此，在他们看来，要消灭法西斯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要铲除产生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心理根源。

1. 赖希：重新构造人类性格

赖希认为，既然法西斯主义的人性基础是权威主义性格，因此要消灭法西斯主义，铲除滋生法西斯主义的土壤，就要彻底改造人的性格，重新塑造人类性格。又由于人的权威主义性格，是千百年来通过家庭，以“性压抑”为手段而形成的，所以要重新构造人类性格，就必须实行一场彻底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既不同以往欧洲历史所发生的、旨在推翻某种政府制度的革命，也不同于列宁所领导的旨在改变经济所有制关系的俄国十月革命，而是旨在消除性压抑、旨在摧毁权威主义家庭的“性—政治运动”。

所谓“性—政治运动”，就是要把性当作一个政治问题，当作社会革命的核心问题。赖希认为以往一切革命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总把性当作“私事”而不予重视：“革命运动总是犯把性活动当作一件‘私事’的重大错误。”^①“性—政治运动”的主

^① [奥] 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17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要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性革命，二是家庭革命。

根据赖希的性格结构理论，人的性格结构的最深层，即“生物核心”，主要是性冲动，所以性革命的实质，就是要让这些性冲动以自然的、健康的形式直接地表现出来，而不致受到第二性格层次的扭曲。性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它不仅能铲除一切独裁专制制度，而且还能“成为新社会的助产婆”。赖希认为，既然一切“政治反动势力的文化政治的核心是性问题。相应地，革命的文化政治的核心也应当是性问题”^①。包括法西斯主义在内的所有专制独裁制度，都是通过对人们实行残酷的性压抑而实现其统治的，性压抑已成为千百年来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统治的主要支柱，所以在赖希看来，一旦推翻了这根支柱，整个统治机构便会土崩瓦解。

赖希还进一步认为，“性革命”不仅能破坏旧制度，而且还会建设新制度。赖希不同意弗洛伊德笼统地把性本能说成是“反社会的”、“破坏性的”，他认为，只有当性本能面对压抑性的专制制度时，它才是一种破坏力量，而对美好的人道主义社会来说，它将是主要的建设者。通过“性革命”被释放出来的性能量，完全可以用于建设一个新社会。因此，赖希主张“把性革命看作是建设一个自由社会的必由之路”^②。

既然法西斯主义和一切专制独裁制度所需要的权威主义性格结构是通过权威主义家庭而形成的，那么，在赖希看来，“性—政治”运动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进行“家庭革命”，并“消灭家庭”。如前所述，赖希认为现代家庭实际上已执行着“政治职能”，已成为反动政治制度的“细胞”。那么家庭是怎样完成这种“政治职能”的呢？赖希认为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家庭教育，即用社会意识形态影响家庭成员，特别是儿童。这种社会意识的主要

^① [奥] 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10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② [奥] 赖希：《性革命》，转引自陈学明著：《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99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内容当然是对性的否定，是关于性的“犯罪感”观念。由于这种影响是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进行的，所以具有巨大效果，在这种气氛中成长的儿童，自然地把性压抑视为理所当然。赖希认为，外部世界的意识形态正是以这种方式植入个人的性格结构中去的。二是通过家庭结构，即“父—母—子”的三角体制影响家庭成员。赖希说：“家庭不但给儿童灌输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且又为儿童安排了能使他们适应这种保守倾向的三角结构。”^①这种结构决定了儿童永远处于受教育的、从属的地位，儿童的性冲动必然被父母所扼杀。由于家庭的这种三角关系，又是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再加上儿童对父母的经济依赖，所以要想摆脱它是非常困难的。在赖希看来，无产阶级家庭的这种三角结构不像下中层阶级那样严谨，因为儿童有离家做工的可能性，这就是下层中产阶级家庭成员的性压抑要比无产阶级家庭成员更强烈，从而其权威主义性格特征更明显的原因。

根据对家庭履行政治职能的途径的分析，赖希提出，家庭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解除家庭的政治功能，其途径，一是堵塞反动的意识形态进入家庭的道路，二是解除家庭的三角结构。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消灭家庭”。当然他所说的消灭家庭，并不是指不要家庭，而“主要指的是取消家长制的独裁的家庭形式，而代之以自然的家庭关系”^②。他心目中的这种新家庭也就是摩尔根、恩格斯和马林诺夫斯基曾经论述过的母权制家庭。在赖希看来，在原始社会，既没有经济剥削，又没有政治压迫，也就没有必要创造一种旨在支撑这些制度的性格结构。所以母权制家庭不存在性压抑，儿童的性欲可以随意满足，它是儿童性冲动、性心理健康发展的合适场所。赖希指出，他所倡导的家庭革命也就是要“用

^{①②} [奥]赖希：《性革命》，转引自陈学明著：《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114~115、116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母权制家庭代替父权制家庭”，当然这并不是对原始社会母权制的简单恢复，而是在 20 世纪高度物质文明基础上高水平的恢复。

赖希认为，通过性革命和家庭革命，消除了性压抑及由之产生的权威主义性格，人的整个性格结构就会发生根本变化，原来处于性格表层的、与深层“生物核心”相矛盾的那些虚伪的东西消失了，反社会的中层结构也被淘汰了，处于深层的性冲动再也不会被中层所扭曲，而以自然的方式得以解放。在赖希看来，当绝大多数人的性格结构都出现这样的变化时，就标志着人类已脱胎换骨，变成了新人，而新人同法西斯主义等形形色色的专制独裁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当人类的绝大多数都成为这样的新人时，法西斯主义在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找不到立足之地了。

2. 弗洛姆：从消极的自由走向积极的自由

在弗洛姆看来，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基础是现代人的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逃避自由导致个人的无意义和无能为力，这是滋生法西斯主义的“温床”，所以在弗洛姆看来，要消灭法西斯主义势力，就要清除这一温床，改变人的无意义和无能为力状况。改变这一状况的途径是：从消极的自由进入积极的自由，通过自发性的爱与生产性（创造性）的工作将自己与自然、社会并和他自己在更高层次上重新联结起来。

弗洛姆认为，人之所以要逃避自由，是为了摆脱孤独，弗洛姆将这种给人带来孤独的异化的自由称作“消极的自由”。除消极自由外，还存在着另一种“积极的自由”，处在这种状态下的个人既可以独立生存，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又同世界、他人以及自然合为一体，在这种状态下，“人可以同时做到自由而不孤独，批判而不多疑，独立而又不失其为人类整体的一员”^①。这才是人类所追求的真正自由。

^① [德] 弗洛姆：《对自由的恐惧》，182 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怎样才能获得积极的自由呢？弗洛姆认为，获得积极自由的途径是“自我的实现和个性的发扬”。人的自我的实现，也就是人的自发性活动，使人在理智与情感两方面的潜能都得到充分实现，从而使人成为完整的、总体的人。弗洛姆说：“自发活动作为一种方式可以使人克服孤独的恐怖感，同时又不至于牺牲自我的完整与尊严，因为在自发的自我实现过程中，人将再度使自己与世界——他人、自然、自我——统一起来。”^①爱是这种自发活动的首要因素，爱不是使自己被另一个人消解，也不是占有另一个人，而是对他人的自发性的肯定，是以自我保留为基础，而使自己与他人合为一体。除了爱之外，工作也是自发活动的一个因素，工作不是为了逃避孤独的强迫性行为，而是一种创造，人借助这种创造活动实现自己与自然的统一。

弗洛姆认为，如果个体通过自发活动而达到自我实现，从而使自己与世界发生联系，他便不再是一孤独的原子了，他已与世界合为一体，成为一个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也使他获得了新的力量与安全。“人的自发活动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这种安全感，唯有自由才能给予人这种安全感。”^②这种新的安全使个人再也不必像现在那样，为了获得安全感而屈从强大外力的保护，也不必放弃自己的“正身”而变成“伪自我”。法西斯主义正是一种利用人的不安全感，迫使个人屈从外在的权威，削弱真正个体性的制度。所以一旦人获得了真正的自由，有了可靠的安全保证，法西斯主义赖以产生、得以广为传播的心理机制也就不存在了。这就是弗洛姆为我们所指出的，从消极自由进入积极自由状态的铲除滋生法西斯主义“温床”的途径。当然，除了心理学方面的途径外，弗洛姆也承认这一过程亦受到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制约，而

^{①②} [德] 弗洛姆：《对自由的恐惧》，185、187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的方向就是实现“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这方面的观点，将在后面有关章节论及，这里不再赘述。

作为勇敢的反法西斯主义战士，赖希、弗洛姆不仅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本质，分析了产生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心理根源，而且还在法西斯主义势力猖獗时期，相当一部分人（甚至包括苏联一些领导人）还对法西斯主义抱有幻想的情况下，就认真地探索如何消灭法西斯主义、铲除滋生法西斯主义土壤的问题，虽然他们所指出的途径未必是正确的，但这种精神和勇气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赖希、弗洛姆在探索消灭法西斯主义的途径时，还把这个问题同铲除滋生一切专制独裁制度的“温床”联系起来，这也不无合理之处。在他们看来，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固然有其社会政治、经济根源，但更重要的是数千年来形成的，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得到迅速发展的压抑人、使人性受到扭曲的文化心理环境，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心理环境，即使消灭了今天的法西斯主义，明天还会出现黑色的、红色的法西斯主义，甚至不打着法西斯主义旗号的法西斯主义。联系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整整半个世纪的今天，法西斯的阴魂仍然不散，法西斯主义势力在某些国家甚至还有死灰复燃的趋势，赖希、弗洛姆等人的理论，就不仅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而且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赖希、弗洛姆等人在分析法西斯主义现象时，往往是把心理因素放在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因素的位置上，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将心理革命、人性改造、改变文化心理环境当作消灭法西斯主义的首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尽管弗洛姆也曾提到积极的自由要受到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制约（他所说的经济变革主要是实行计划经济，社会变革则主要是巩固、完善现代民主制度），但他又强调，如果人类的社会个性没有改变，人的孤独感、焦虑感、不安全感、无能为力

感不消除，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制度，而只能导致民主的异化（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计划经济也是如此，“唯有下面的社会生命之流源源不断地涌至上面，计划经济才不会重新导致对人民的奴役”^①。而所谓的“社会生命之流”也就是指消除了孤独感、获得了积极自由的人。可见，弗洛姆实际上是把心理革命、人性改造当作消灭法西斯主义、铲除滋生法西斯主义“温床”的唯一有效途径的，这就不能不使他的理论陷入片面性，并且带有空想的、说教的性质。赖希理论也同样存在着这种局限性，他把“性革命”看作比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更根本、更重要的革命，他甚至认为，经济上的变革是无关紧要的：“生产的国有化或社会化本身不能使人类奴役起哪怕最微小的变化。”^②“性革命”不仅被看作消灭法西斯主义制度，摧毁旧世界的根本途径，而且还是拯救人类、创造新世界的主要途径。他曾经这样评价这场所谓的“性革命”的意义：“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我们文化存在的真正的革命变革，在这场斗争中，没有游行，没有军人，没有奖章，不敲锣打鼓，不鸣放礼炮。但充当这场战争牺牲品的人却不会比1848年或1917年的变革少。人类对它的自然生命功能的发展正使它从千年沉睡中苏醒过来。我们生存中的这场革命触及了我们情感、社会和经济的存在的根本。”^③赖希实际上是以“性革命”取代了一切革命，正如有人所挖苦的，这种“革命”同堂吉诃德的荒唐行为没有两样。

总之，由于赖希、弗洛姆等人不是把注意力重点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上，不能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上，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去分析产生

^① [德] 弗洛姆：《对自由的恐惧》，195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② [奥] 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20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③ [奥] 赖希：《性革命》，转引自陈学明著：《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99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法西斯主义的根源，而是主从颠倒、本末倒置，将诸如性压抑、性格结构、家庭体制当作分析的重点，这就使他们始终无法找到从根本上消除法西斯主义现象、铲除滋生法西斯主义土壤的正确途径，因而大大削弱了他们的法西斯主义批判理论的可信度和战斗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通过对法西斯主义现象的社会心理根源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心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理论，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不仅在现代西方心理学、社会学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我们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也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思想材料。这正是我们必须重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心理理论研究的原因所在。

第八章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与 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模式的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作为共产国际内部的一股左倾思潮而出现的，它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批评苏联模式及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并探索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途径。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继承了卢卡奇等人奠定的这一社会政治理论传统，展开了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和对“第三条道路”及“新”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框架中，对苏联社会的批判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一起构成他们重建马克思主义及“新”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也可以说，对苏联模式的批判本身便构成其社会主义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全面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就必须先了解它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及其提出的主要论点。

所谓的“苏联模式”，一般是指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尤其是指由列宁所开创的和由斯大林等人所继续的以暴力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道路和在夺取政权之后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模式的批判主要围绕如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即对十月革命途径的评价，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或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批判，以及对作为苏联意识

形态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下面的第二、三节，我们将分别评述他们的这些基本观点，而在第一节，我们将提供一个背景说明，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苏联模式的几个发展阶段。

一、对苏联模式批判的三个阶段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大多是欧洲革命的参加者、支持者，与工人阶级政党保持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有的正式参加工人政党（如卢卡奇、葛兰西、德拉·沃尔佩、阿尔都塞），有的退出或被开除出工人政党（如科尔施、列斐伏尔、科莱蒂），有的与工人政党进行友好对话（如萨特），有的明确断绝与工人政党的任何联系（如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并不是一开始就攻击苏联社会或苏联模式的，他们的态度或立场经历了从同情、支持到批判、严厉批判的转变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模式批判的重点、深度和广度有所不同。可以粗略地分成如下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20年代到30年代末以前

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时期。以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这一时期对苏联模式批判所涉及的问题包括对苏联及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和内外政策的批评，对列宁主义尤其是它的哲学基础的批评，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是否适应于西方社会提出质疑，重点是革命的途径及策略问题。

卢卡奇热情欢呼十月革命，把它看作是能够把罪恶的资本主义世界扫荡干净的强大力量；当匈牙利共产党成立时（1918年11月），卢卡奇立即加入它的行列，并很快成为中央委员，而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他当上了教育人民委员。但是，在20年代欧洲革命前后，他确信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很快取得胜利，因而

采取左倾激进立场，拒绝一切不能立即取得胜利的策略。他批评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以及苏联的某些内外政策，批评列宁主义尤其是它的哲学基础，这些观点集中体现在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在该书1967年的新版序言中，他说：“作为《共产主义》杂志的核心成员，我积极参与制定了一条‘左的’政治和理论路线。它基于一种当时普遍流行的信念，即伟大的革命依然将推动整个世界，至少是欧洲一直到社会主义，它决没有因为芬兰、匈牙利和慕尼黑起义的失败而中断。像卡普暴动、意大利占领工厂，波苏战争，甚至三月行动这样的事件，都加强了我的关于世界革命即将到来，整个文明世界必将被彻底改造的信念。”^①又说，他和《共产主义》杂志“竭力通过在一切问题上都提出最激进的方法，在任何领域都宣布同属于资产阶级世界的任何机构和生活方式等实行彻底决裂，来宣传以救世主自居的宗派主义”^②。这种宗派主义后来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这成为卢卡奇摆脱宗派主义的契机。

科尔施与卢卡奇具有相似的政治和理论立场。他192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KPD)，并成为该党的主要理论家。1926年在《共产主义政治》杂志周围形成了一个以“坚定的左派”著称的科尔施—卡茨集团，这是德国共产党内的第一个宗派组织。也就在同一年，科尔施被开除出党。科尔施批评苏联及其共产国际的路线及策略，批评列宁主义，他认为列宁主义只是资本主义边缘国家中反帝斗争的恰当理论，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则需要新的理论基础，他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集中批判列宁主义哲学。他还认为，1918年德国11月革命的失败原因，并不是一般所说的缺乏一个领导夺权的成熟的政党，而是由于缺乏夺权的理论与文化上的准备前提，缺乏意识形态的准备和政治领导。这与当时共产国

①②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6、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际的流行看法——客观条件成熟，主观上缺乏一个成熟的政党——不同。

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他也对苏联模式提出批评。他着重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并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革命，它不适应于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设想以工厂委员会作为无产阶级国家的模型，以克服苏联过分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他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列宁主义的“实践哲学”。

2. 第二阶段：30年代末期到40年代末、50年代初

在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模式批判的特点是，结合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对法西斯主义的起源、本质、危害以及如何有效防止法西斯主义的东山再起等问题的分析、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将苏联与法西斯主义国家并列为极权主义国家，将苏联与西方社会视为同一个工业社会的两个变种而加以同等的批判，他们集中批判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指责苏联社会的种种弊端，并抨击苏联的意识形态（“苏联马克思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并不是从一开始便对苏联社会或苏联模式采取公开批判态度的。在30年代末期以前，批判理论家们一般对苏联采取一种同情、支持的立场。尽管他们对苏联的某些现实和政策有所保留，但并未加以公开批评。例如，霍克海默和波洛克在这一时期采取的就是这种立场。霍克海默在就任社会研究所所长和《社会研究杂志》主编的期间，尽管承认苏联社会实际发展的某些不确定性，并指出人类的普遍苦难，但是他对那些无视苏联是克服邪恶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一次痛苦尝试的人表示轻蔑，并在谈到苏俄时说这是一种启蒙的、革命的专制主义。波洛克在《1929年苏联的经济计划实验》这一论著中，虽然对像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度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但他主

要是从正面来讨论苏联及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他反驳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对苏联社会及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批评。

30年代后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开始批评苏联，但态度并不明朗。这一时期的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都强调劳动过程的有计划调节、私有财产的废除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并不等于社会主义，除非大众实现“自由和幸福”（马尔库塞语）和用“真正的民主和联合”（霍克海默语）的本质因素的发展补充上述这几个因素。根据霍克海默在《传统的和批判的理论》这一论著中的观点，法兰克福学派关于苏联社会的三个基本论题是：第一，计划、社会化的财产和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社会主义的否定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已经在苏联得以实现；第二，因为苏联还没有实现自由幸福、民主联合等肯定的先决条件，所以它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第三，只要形成特殊的统治阶级利益和不能避免巨大的社会不平等，那么，苏联就仍然是一个过渡社会。尽管这个时期的批判理论家认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但仍然将苏联看作一个进步的社会，这表明他们并未同早期的为苏联辩护的立场决裂。

只有到了30年代末40年代初，特别是苏德签订联盟条约之后，法兰克福学派才对苏联采取否定和公开批判的立场，将苏联与法西斯国家相提并论，将苏联与西方社会并列而加以批判。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霍克海默1940年所写的《极权主义国家》和1941年波洛克写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两篇论文。他们把苏联与纳粹德国视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样板来加以批判，指出苏联的极权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特征及其危害，说明苏联不是一个“真正解放的社会”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

在30—40年代，另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批判苏联模式。例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列斐伏尔，他1928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但他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与苏联及共产国际不同，他反对斯大林主义化和教条主义化，同法共政治路线也有分

歧。他在 30—40 年代的著作中，一方面反对希特勒的现代独裁的非理性主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反对一些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缩小成为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实证主义世界观，以后又致力于批判斯大林主义。又如，“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赖希，他欢呼十月革命，但一开始就认为苏联是狭义的革命设计，忽视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他致力于对极权主义产生的心理根源的分析，并揭露苏联的种种异化现象。

3. 第三阶段：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开始，尤其是斯大林逝世（1953）及苏共 20 大（1956）之后

1948 年南斯拉夫共产党同共产党情报局的冲突以及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对斯大林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批判，预示了斯大林主义时代行将结束；1953 年斯大林逝世；在 1956 年苏共 20 大上，赫鲁晓夫作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个人迷信进行批判；1956 年以后，东欧和共产主义内部向心力减弱，陶里亚蒂提出多中心论，赫鲁晓夫在纲领性文件中说尊重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这加速了非斯大林主义化和对苏联模式的全面评价分析。在这种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从不同的角度或方面对苏联模式进行了较全面和系统的批判，并致力于探讨适应于西方社会的革命发展道路和策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阶段对苏联模式的批判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前两个阶段所不能比拟的。

首先，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在这一阶段继续批判苏联模式。卢卡奇在苏共 20 大以后，一改 30—40 年代对苏联模式保持沉默的姿态，猛烈抨击苏联模式特别是斯大林主义。在《民主化的现在和未来》等论著中，他批判斯大林滥用专政、压制民主、个人独裁和对外搞霸权主义以及违背马列主义路线，并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根源归因于苏联的社会制度。马尔库塞在 1958 年出版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一书，这是法兰克福学

派论及苏联模式的最系统详尽的著作。该书将对苏联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两方面的批判结合起来。列斐伏尔在苏共 20 大之后则致力于批判苏联的国家制度，尤其是揭发批判它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抨击苏联的政治异化。“乌托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布洛赫在 1956 年以后积极批判斯大林主义，揭露斯大林主义的实质及其危害，并认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应允许各国搞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

其次，许多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也激烈批判苏联模式，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和梅洛-庞蒂，“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普兰查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著名人物哈贝马斯，“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莱易斯和阿格尔等等。萨特在 1956 年匈牙利事件之前，以“共产党的同路人”自居，并在 1954 年、1955 年访问苏联和中国。他在这一时期把苏联与和平事业、美国与战争事业等同起来。匈牙利事件之后，他断绝了与苏联和法国共产党的来往，发表了《斯大林的幽灵》等论著，批评苏联模式尤其是斯大林主义，对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历程进行广泛的社会历史分析。1968 年苏联入侵捷克，萨特认为这是十足的侵略行为，标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破产。早期的梅洛-庞蒂的立场与萨特类似，他和萨特在 1950 年第 51 期的《现代》杂志上撰文讨论苏联社会，尽管他们相信西方报刊所说的苏联有超过 1 000 万人的劳改营，但认为不能谴责共产主义，因为苏联站在反对剥削制度的一边。与萨特不同，在 50 年代初，梅洛-庞蒂更接近共产党人，而萨特则主张在苏联和英美集团之间保持中立，标榜既反对斯大林主义，又反对殖民主义，提倡保持中立的“革命民主联盟”立场。朝鲜战争爆发后，梅洛-庞蒂开始尖锐抨击苏联模式，认为这标志着苏联要战争，历史过程已经倒转，无产阶级在历史的现阶段已经消失。从此之后，他与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日益疏远。普兰查斯致力于对苏联的政治现实尤其是国家

政权和阶级关系的分析，并批评夺取政权的“列宁主义模式”，探索适应西方社会的革命途径；哈贝马斯剖析苏联社会的非社会主义性质，并力求确定苏联社会的历史地位；莱易斯和阿格尔则抨击苏联的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指出它的高度集权的特征及其危害，并设想一种分散的、工人自治的和非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即“生态社会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模式的批评。一般认为这一思潮包括南斯拉夫“实践派”，波兰“哲学人文学派”，捷克“存在人类学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以及有时被人们直接归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东德布洛赫的“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尽管严格说这些流派并不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但其政治立场和理论倾向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如出一辙。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对苏东模式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管理体制、国家及意识形态等作了全面的剖析，揭露这一模式所造成的极权主义、官僚主义、忽视民主、缺乏人权、阶级斗争至上以及意识形态严密控制等弊端及其根源，提出一种既不同于旧的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模式的“新”社会主义模式，即所谓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二、对俄国十月革命途径的评价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模式尤其是以暴力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道路加以评价，认为十月革命道路是俄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产物，它不具有普适性，不适应于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必须探索适应于西方社会的革命新途径。下面，我们来看看葛兰西、普兰查斯等人的观点。

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者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较多

研究的人。俄国十月革命刚刚结束，葛兰西就在1917年11月2日的《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反〈资本论〉的革命》的文章，评论十月革命。在这篇文章中，葛兰西称十月革命为“反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的革命”^①，这是因为按照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逻辑，在像俄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是不可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的。在这样的国家里，似乎必须先创造条件发展资本主义，至少达到类似于西方的文明，同时使无产阶级的力量不断扩大，使阶级冲突尖锐化，最后才能谈得上革命。但是已发生的事件战胜了意识形态，“布尔什维克否定了卡尔·马克思，并用毫不含糊的和所取得的胜利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不像人们可能认为和一直被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②。葛兰西提出，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比较有利于把革命力量组织起来，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俄国工人阶级和人民在社会主义的宣传下，主动、自觉地行动起来，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讨论了十月革命模式在西方的适应性问题，说明十月革命模式主要是俄国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它不适应于西方社会。他认为，在俄国，社会经济落后，市民社会不发达。在那里，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是初生的和凝结的；而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有一个适当的关系，当国家不稳定的时候，市民社会的坚固结构立即就会显露出来，国家仅仅是一条外部的壕沟，在它后面耸立着一个强有力的堡垒和土木工程系统。^③在葛兰西看来，这些差别使得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途径不同：在俄国，掌握政治领导权比掌握文化领导权更重要，因而革命者可以采用运动战——即面对面，直接向敌人发

^{①②} 《葛兰西文选》，10、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③ 参见 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238P.

动进攻，直接发动革命，夺取国家的领导权；而在西方复杂的市民结构、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化机构的庞杂、群众思想受到资产阶级的蒙蔽、工人贵族的产生等环境，使得对国家正面攻击的“运动战”已经不适应了。因此，在西方，关键是掌握文化领导权，这是掌握政治领导权的先决条件，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目标并不是夺取国家的领导权，而是在市民社会的各个领域逐步破坏资产阶级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由无产阶级取而代之，先进行预演，然后在有可能、适当的时候顺利掌握国家权力，而无产阶级在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也要重视对市民社会或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在葛兰西看来，西方革命要达到这一目标，不能采用“运动战”，而必须采取“阵地战”——坚守自己的阵地，并逐步扩大，以逐渐夺取敌人的阵地，即在资产阶级政权未陷入危机的稳定时期，无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不断渗透，颠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庞大机构，攻克一个个市民社会机构（新闻出版机构、学校、工会、教会等），然后才能夺取政权。总之，葛兰西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市民社会成了资产阶级防御系统中最坚固的同盟，在这种情况下，运动战显然不适应了，因为革命者无法用闪电般的出击破坏统治阶级对整个市民社会的领导权；相反，只能通过阵地战的方法，先在市民社会中夺取新阵地，在掌握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上，最后夺取政治领导权。简言之，十月革命模式是俄国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不适应于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尼科斯·普朗查斯在《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等论著中也对十月革命模式或夺取政权的“列宁主义模式”加以批评，认为这一模式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不相符合；如果采取这一模式必将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陷入绝境。普朗查斯指出，十月革命的经验是由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组成的，因为列宁当时必须同沙皇专制的俄国国家进行

搏斗，因而不得不采用双重政权和使用暴力从外部正面夺取政权的形式。第三国际留下的、受斯大林主义影响的所谓适应于西方革命的“列宁主义模式”是对十月革命经验的滥用，它无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企图把列宁用于俄国具体历史环境的十月革命经验加以推广；同时，它把当时卢森堡已经指出的列宁仅仅依靠工人委员会民主和完全取消议会民主的一些问题推向极端，甚至加以歪曲和发挥。这种革命模式的特征是怀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的扩大和群众在国家内部中进行干预的可能性，认为人民群众夺取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正面的进攻或包围，在资产阶级国家这个要害的外围进攻；主要目的是造成一种双重政权形式，夺取资产阶级政权就意味着在双重政权期间占领资产阶级国家的一切组成部分，以使用第二种即苏维埃政权取而代之。这种模式否认了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漫长的时期，认为群众起来夺取和改造政权只有在双重政权的形式下才能进行，即只有在国家（资产阶级）和苏维埃（无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非常不平衡，革命形势本身则被归结为一种资产阶级国家危机，而这种危机必然引起资产阶级国家的崩溃的情况下，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普朗查斯认为，“列宁主义模式”的程序是：革命前的危机，国家机器的腐败和瘫痪，群众的普遍和集中的自发组织，双重政权，革命赢得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各种工人自发组织的多数，起义性的总罢工，工人委员会的国家政权的建立。在普朗查斯看来，这一模式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性。这是由当代西方社会现实所决定的，即当代西方社会现实有着根本的不同：第一，当代西方已排除了列宁所说的革命危机的可能性，即排除了资产阶级政权或快或慢的解体过程和产生群众自发性组织的革命运动的可能性，这是由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它同整个社会的关系所决定的；第二，现代西方发达资产阶

级国家政权是在经受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形成的，因而能够从根本上克服以往社会发展阶段所遗留下来的各种弊端，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缓和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第三，由于当代西方国家的重大危机都是可以预见的，所以，不会导致变成使国家政权崩溃的形式；第四，广大群众的政治活动的恢复不是采取工人委员会的形式，而是采取把工人运动的传统机构集中的形式——各种工会、党派及由它们推动和检查的统一的委员会形式。^①

显然，如何评价十月革命模式及其在西方社会的适应性，历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而又激烈争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反对把十月革命模式照搬硬套，而不顾各国的实际，如在第三国际和斯大林主义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倾向那样。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西方社会与俄国社会的差别，提出各国社会主义革命途径的多样化问题，并试图探索一条适应于当代西方社会的革命途径。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如葛兰西所强调的夺取文化领导权，重视文化革命，关于西方革命不同于俄国革命的特点以及西方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等观点，是包含有合理成分的。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卢卡奇、葛兰西等人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往往有全盘否定十月革命模式的倾向。他们借口西方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而否认十月革命所得出的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即否认由列宁所提出的，并为十月革命的实践所证明了的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则；他们往往鼓吹一种改良主义的、不流血的、基本不触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第三条道路”，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① 参见李青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202～208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途径、手段或形式决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应根据各国具体的情况以及革命的实际情况来确定。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① 列宁也说：“至于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进程中情况会怎样频繁而激烈地变化。”^② 列宁认为，革命者对待革命的途径、形式或道路应采取的态度是：“第一，马克思主义同一切原始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同，它不把运动限于某一种固定的斗争形式。它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决不拒绝任何斗争形式。”“第二，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在经济演进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首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③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社会主义革命的途径或夺取政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采取何种途径或形式，要历史地、具体地加以分析。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基本途径无非是两个：即暴力革命途径与和平途径。前者采取武装夺取政权的形式，包括武装起义、游击战争、国内战争等；后者是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8卷，1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②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4卷，2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③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4卷，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人阶级采用包括议会斗争在内的政治斗争方法，即非暴力革命的方法来夺取政权。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眼里，和平道路夺取政权是最受欢迎的，它符合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的愿望和理想。马克思说：“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夺取政权——引者注）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① 列宁也说：“当然，工人阶级但愿和平地取得政权”^②。不过，按照经典作家的指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是最有把握和最有可能的，因为资产阶级总是不会自动地交出政权，总是要进行激烈的反抗，除非某个国家的资产阶级知道自己的反抗没有用处，而为了保存自己的脑袋，它才可能和平地交出政权。

其实，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的过程本身也并非单纯地靠暴力革命，而且也尽可能利用和平手段，即使在最后不得不靠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之前，列宁也极力利用和平手段来夺取政权。从1917年3月到9月的这一段时间，在俄国先后出现两次可能和平夺取政权的形势。第一次是1917年4月至7月。在这段时间里，经过二月革命，获得了广泛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工农群众掌握了武器，旧国家机器因受到震撼而不敢公开镇压革命，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资产阶级比较软弱，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得不依靠工农的信任来维持，国际帝国主义分裂成几个相互敌对的集团，并在战争中受到削弱。因此，出现了和平夺取政权的机会，在此时反革命还没有力量纠集起力量对人民诉诸武力，因而共产党人就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和平斗争。第二次是1917年9月，在粉碎了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列宁也还认为政权仍然可能和平地转到工人阶级手里，并强调尽一切可能保证不放过革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7卷，6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②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卷，2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和平发展的最后机会。然而，和平夺取政权并没有成功，最后不得不在10月举行武装起义来夺取政权。

俄国十月革命开创了武装起义、暴力夺取政权的一个成功范例，它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例如，它证实了列宁所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必须具有一系列的主客观条件的论断。这些客观条件包括：“（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①按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说法，主观的条件则包括如下三个主要因素，即大多数工人充分地认识到有进行革命的必要，并且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必须有广大劳动群众即工人阶级同盟者的支持，以及要有一个战斗的革命政党。又如它有力地证明，无产阶级不能利用现成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必须打碎它或取缔它，并在取得政权后，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以防止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扑和国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势力对新生政权的颠覆。

的确，由于西方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西方革命不能简单地照搬十月革命模式，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及共产国际曾一度有将十月革命的经验绝对化，强制推行一种革命模式的倾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集中统一领导，再加上

①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6卷，2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理论上的教条主义，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危害，尤其是使西方革命陷入困境。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寻求适合西方社会的革命道路而批评十月革命模式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却往往从一个极端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否认十月革命所取得的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否认当代西方走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可能性，而过分强调思想文化革命的重要性，忽视夺取国家政权的首要性，这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而且也不符合当代西方社会的实际。60年代末西方“新左派”及学生造反运动尤其是法国的“五月风暴”表明，暴力革命或武装夺取政权仍然是当代西方革命的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在当代西方，武装夺取政权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三、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批判

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书中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的研究包括两个不同的问题：一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二是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发展问题，或更确切地说，革命的武装阶段结束后的社会主义发展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模式的批判不仅包括对苏联十月革命模式的批判，而且更重要地集中在对十月革命后苏联的现实，即社会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特别是它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批判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苏联社会称为“国家社会主义”，“极权社会主义”、“官僚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等等。他们将苏联社会现实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加以比较，将苏联社会与西方社会特别是法西斯主义国家加以对照分析，批判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体制，揭露这种体制下的官僚主义、政治异化、缺乏民主、没有人权等种种弊端，由此断言，苏联的社会现实并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实现，苏联不是一个真正解

放的社会。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在这一方面的观点。

让我们先来看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波洛克、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人的观点。霍克海默的《极权主义国家》(1940)和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1941)这两篇论文是法兰克福学派40年代对苏联模式批判的代表作。这两篇论文所采用的途径或角度不同，霍克海默着重于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对极权主义国家的起源与意义的历史追溯，而波洛克则侧重于经济体制分析尤其是抽象的、理想型的经济职能及局限性的分析。但是，这两篇论文却是互相补充、互相呼应的，它们都将苏联和纳粹德国当作极权主义国家或国家资本主义的两个样板来加以批判，提供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苏联模式的第一个较系统的理论。

霍克海默将法西斯德国、苏联和美国并称“极权主义国家”。他认为，“极权主义国家的主要特征是抛弃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变成了总体资本家，而剥削仍在继续，这就是极权主义国家的社会”；在这种国家中，国家统治者“使自身摆脱了对私人资本的依赖”，“剩余价值也是在国家的控制下获得并加以分配”；在政治上，“完整的中央集权并不是权力的倒退，而是权力的发展”，“在完整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下，警察将极端官僚主义的权威几乎强加到生活的所有领域”。霍克海默指出，所有形式的极权主义国家都是压抑性的，巨大的浪费不是由经济机制引起的，而是由对权力机构的过度需求和对劳动者创造力的压抑所造成的。在这种社会中，人民的物质生活虽然提高了，但精神上的自由都丧失了，“人性被彻底肢解了”^①。他认为，极权主义国家或国家资本主义并不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是“垂死的”，相反，它有“巨大

① J. M. Horkheimer, *Authoritarian State*, in Arato and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New York, Urizen Press, 1978, 103P.

的生命力”，它通过控制市场经济、防止由于危机而造成的崩溃，通过生产的有效管理、城乡之间的交流等使生产不断发展。因此，他预言，国家资本主义比自由资本主义会更加持久。霍克海默还追溯了极权主义国家的根源以及消灭极权主义国家的途径。他将极权主义国家的根源追溯到法国大革命，说“极权主义也是法国大革命的最终目的”；认为东西方社会同时出现极权主义，乃是由于东西方都爆发了激烈革命的缘故，是由于苏维埃国家和法西斯主义国家都是激烈的社会动荡的产物。他还设想通过渐进的革命（而不是急风暴雨式的自上而下的革命），特别是一种工人委员会的民主运动来消灭极权主义国家。

尽管霍克海默把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纳粹德国，但也指向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他将苏联称为“国家社会主义”、“总体国家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在他那里，“国家资本主义”=“总体国家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认为苏联与纳粹德国一样，具有极权主义的共同特征，甚至将它描述为比纳粹德国更为彻底的极权主义国家形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苏维埃国家是“摆脱了对私人资本的任何依赖的极权主义国家的最顺理成章的形式”^①。

波洛克在《国家资本主义》一文中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历史时代，“一种主要是经济的时代向本质上是政治的时代的转变”^②。他区分了国家资本主义的两种理想类型：极权主义型和民主型，将纳粹德国和苏联一同称为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并认为苏联的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波洛克指出，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新制度包含了一系列表面上是经济的，但实质上是政治上被决定了的新规则。在国家

① M. Horkheimer, *Authoritarian State*, in Arato and Gebhardt (eds),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New York: Urizen Press, 1978. 102P.

② F. Pollock, *State Capitalism*,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Vol. 9, no. 2, 1941. 207P.

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作为一种间接的需求控制手段已被直接的国家计划所取代；价格作为稀缺性管理的中介已失去了作用，变成了一种被严密控制了了的工具；利润仍作为一种诱因，并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工具而起作用；在这种社会中，存在着一种个人利益服从一般利益的趋势；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由一个强有力的官僚机构所支配、控制。在波洛克看来，这样一种新制度扩展了科学管理和工业合理性，它是一种现代公司结构向全社会结构的推广，在这种社会里，商品生产被产品生产所取代，生产的每个方面都受到严格的控制，既没有过分的积累，也没有过分的投资，因而它似乎没有内在的经济上的局限性，能够包容各种矛盾和冲突，在经济上是稳定的。但是，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政治的、官僚主义的统治阶级构成的框架，国家是新的统治集团的权力工具，每个不属于集团的人不过是统治的对象而已；^①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恐怖、操纵、群体和个人的原子化、人们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获得的权利的丧失、日益增加的战争危险等等。不过，对于当时苏联是否已经形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问题，波洛克的答案并不是肯定的。他说，在德国和意大利，这样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已经形成，而在苏联则不能肯定，因为苏联的统治者并不拥有生产资料。^②

马尔库塞对苏联模式的批判集中地体现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该书写于1952—1955年，并于1958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发行。马尔库塞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与苏联的政治分析结合起来，既对苏联的共产主义政治现象，又对它的意识形态及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背离作出分析批判，以便揭露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它在实践上没有实现社会

^{①②} 参见 F. Pollock, *State Capitalism,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Vol. 9, no. 2, 1941, 201, 221~222P.

主义的理想，并根据苏联与西方社会的相互作用来把握苏联的发展趋势，说明国际地理政治和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是如何影响苏联发展的。

马尔库塞将苏联的社会主义称为“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他对苏联现实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苏联政治制度的批判上，而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批判则集中在对列宁及其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上。关于第一方面的批判，马尔库塞论及苏联的政治统治、新的合理性、官僚主义及新阶级等问题。在他看来，在苏联社会中，统治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即由所谓的“新的合理性”和官僚制度构成的。马尔库塞认为，苏联社会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作为社会的组织原则的，或者说，新的合理性将技术理性应用到工业社会的组织之中。现代机器工业的合理性要求“对机器标准化的一致和准确的服从，这要求调整和反应，而不是自主性和自发性”^①。新的合理性要求对机器过程的服从，个人的创造力让位给效率和绩效；苏联的劳动和社会组织旨在于统治和劳动者的服从，而不在于他们的解放和潜能的发挥。因此，“将苏维埃国家等同于一个自由和理性的社会是不可接受的”^②。

马尔库塞指出，西方社会与苏联社会之间的基本差别被一种走向趋同的强有力的趋势平行拉平，两种制度显示出共同的后工业文明的特征——集中和管理取代私人事务和自由，竞争是组织化和合理化的，各种规章制度体现着经济与政治的结合，大众传媒、娱乐工业和教育协调着人们的行动等。他认为，只要生产是中央化和自上而下控制的，那么，国有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废除并不造成本质上的差别；没有首创性和由“直接生产者”的来自下面的控制，那么国有化只不过是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只是有助于自上而下控制的一种技术—政治手段，是统治流水线或

^{①②} H. Marcuse, *Soviet Marxism*. New York: Vintage, 1961. 69, 70P.

统治方式的变化，而不是废除统治的先决条件。^① 马尔库塞认为，在苏联，统治和管理的权力以及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官僚手里；与资本主义社会相似，国家承担了对人民的管理功能，使直接生产者与对生产过程的集体控制永久地分离。他说：“苏维埃国家确切地采取了那种被恩格斯描述为阶级社会特征的结构：‘共同的社会功能’变成‘一种劳动分工的新分支’，并因此形成了一种与大众利益相分离的特殊利益，国家变成了一种物化的、人格化的权力。”^② 他批评苏联没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没有让工人参加决策与管理。关于苏联官僚是不是一个阶级的问题，马尔库塞认为，这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注解问题”。他说，如果将阶级定义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话，那么苏联的官僚并不是一个阶级；然而，如果将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控制作为标准，并且这种控制纯粹掌握在官僚手中而排斥直接的生产者的话，那么这些官僚显然又具备了作为一个新阶级的特征了。

作为法兰克福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理论与实践》、《交往与社会进化》、《合法化危机》等著作中论及苏联模式，尤其是苏联的社会性质、历史地位以及它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等问题。他在1960年发表的“哲学与科学之间：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一文（后来收入《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讨论了当代反对马克思的“四个基本事实”，其中的第四个“事实”就是关于苏联社会或苏联模式问题。他说，俄国革命和苏维埃制度的建立是历史的事实，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讨论和马克思主义一起被最大限度地僵化了。十月革命是由力量薄弱的无产阶级所发动的，由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所支持的和在列宁主义训练下的职业革命家指导下进行的，它的目的是消除国会和苏维埃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并没有直接的社会主义目标，但是它建立了官

^{①②} 参见 H. Marcuse, *Soviet Marxism*, New York: Vintage, 1961, 66, 89P.

僚和党的干部的统治。10年后，在这一基础上，斯大林依靠农业集体化，自上而下官僚主义地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苏联马克思主义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显示出它是一股世界性的力量，并在二战后建立起世界霸权，它迫使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西方世界的领导人为巩固它的制度而实行最严密的防卫。既然如此，苏联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只能是一种缩短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途径，这条道路还远远没有实现真正的社会解放，而且实际上往往将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取得的公民权利倒退到党的专政的合法的恐怖之中。当然，苏联在赶超资本主义世界的口号下，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取得了成功，它的发展速度使它能够参加为达到最高生活水平的和平竞赛中去。在长期的竞赛中，社会结构和统治结构也因此受到影响，在福利国家受到控制的群众民主的中间地带，不能排除两种制度的趋同……^①显然，在这里，哈贝马斯认为苏联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不是一个真正的解放的社会。

哈贝马斯多次论及苏联社会的历史地位问题。他在《合法化危机》中区分四种社会形态：原始的、传统的、资本主义的和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他说：“除了原始社会之外，其余都是阶级社会（我将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根据对生产工具的政治精英的支配——作为后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在危机趋势检验之后的对晚期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兴趣在于探讨后现代社会的可能性——即一种历史上的新组织原则。”^②在这里，哈贝马斯似乎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方面，他将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刻画为过渡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但还不是后现代社会；另一方面，他似乎

^① 参见 J. Habermas, *Theory and Practice*, Boston: Beacon Press, 1973. 197~198P.

^② J.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5. 17P.

将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仅仅看作阶级社会的两种现代形式。在他看来，如果我们要评估它们不仅在同一方面上趋同，而且走向后现代社会即真正的解放社会的话，那么，其内在的动力就必须加以分析。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1975）及“历史唯物主义和规范结构的发展”（1976）两篇论文（均收入《交往与社会进化》一书）中，他又讲到这个问题。他摆出两种方案：“一种意见认为，官僚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较，已经达到一个更高的进化阶段。而在另一种意见看来，问题则在于有两种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变体，即同一个组织原则有不同的历史表述。第二种意见不仅通过大量的论文以平常的形式提出，而且得到理论家们的论证。”^①又说：“所谓的社会主义过渡性社会的分类也是一个特殊问题，官僚化的社会主义与发达的资本主义相比较，是否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某种进化方面更高级的社会形式？或者它们仅仅是同一个发展阶段的两种变体。”^②在这里，尽管哈贝马斯只提出两种方案，也未讨论两种社会的趋同问题，但是，他倾向于将官僚社会主义社会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看作同一个社会进化阶段的两种变体或两种形式。在他看来，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关系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现代社会形式，因此，在现代性的讨论中，可设想其他可能备选方案。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展开激烈批判。他们从存在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揭露苏联社会的种种异化现象。列斐伏尔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只注重宏观革命，即只注重政治经济问题，重视社会解放，忽视微观世界革命（忽视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忽视人的解放。这种模式有严重的缺陷，不能唤起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他批评苏联的国家政权，说苏联模式把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由国

^{①②} [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131、156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家主宰社会。他把国家看作从事欺骗活动的场所，坚持反对那种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为使国家消亡而首先加强了国家权力”的说法，认为加强国家权力乃是政治异化的极端表现。他认为斯大林逝世后尤其是苏共 20 大之后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批判也不过是一种闹剧，关键是国家本身的问题，即问题不在于是否批判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在制度上确保国家机器消亡；社会主义阶段只能是国家机器的逐步消亡；社会主义阶段只能是国家机器的逐步削弱阶段，而不是不断强化阶段。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认为，只能把社会主义社会视为过渡阶段，即国家消亡阶段。列斐伏尔还批评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认为苏联的政治体制与社会主义的自治原则根本对立，其经济体制则否认市场及价值规律的作用。在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批判的基础上，他提出一种“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主张实行工人自治，发挥工人委员会的作用，调动工人阶级的积极性，以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

梅洛-庞蒂在《人道主义与恐怖》(1947)一书中认为，苏联模式是打破了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之间平衡的理论，它忽视了工人的主观性，过分地估计经济基础这一因素，降低了无产阶级意识的主观因素的作用，从而危及了主观性与客观性统一的论点。他说，“且不论在理论上，至少在实践上”，从苏联“目前的阶段打破了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之间的平衡”这一比较经典的提法，可以看出，现阶段过高估计了经济基础这一客观因素，而降低了无产阶级意识的主观因素。“迄今为止，革命注重的是中央的英明，计划的有效和劳动者的纪律性，而不是国际和自由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中央已不再去发掘世界和苏联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不再随着历史的发展阐述历史的方向，不再领导历史的自发过程。”^① 他批评苏联的内外政策，说在对外政策方面“遏制各国

^① M. Merleau-Ponty, *Humanism and Terror*, Connecticut, 1980, 137P.

无产阶级的力量，接受阶级合作”；在对内政策方面“强制推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政策”。这就是斯大林主义只注重革命的客观条件，忽视主观因素的最好例证。他说，苏联目前政策的革命意义已被埋葬在“经济基础”之中了：“在注重客观关系的基点上，人们没有强调要获得意识”；“现阶段的理论是一种客观性的理论，而历史的主观性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则被抛到一边去了”^①。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梅洛-庞蒂还抨击苏联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说在这种政权里，不允许有反对派存在。他认为革命是一种创造性的不平衡的统治制度，其中总有种种对立要扬弃，所以革命内部总需要有反对派；没有反对派，没有自由，一切已知的革命都将蜕化、堕落。即使无产阶级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也不能避免这种堕落。在他看来，对敌人实行专政的政权，不可能对人民实行完全的民主，首先关于人民的“内部”和“外部”的界限就难以界定。^②他设想通过“非共产主义的左派”来克服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局限性，说只有出现这种“非共产主义的左派”，才能结束无产阶级专政的目前局面。

萨特认为，苏联在消灭经济剥削之后，又产生了新的经济异化、新的独裁，群众受到新的压抑，主张通过政治民主化的途径来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他还特别批判苏联的霸权主义。

“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赖希批评苏联模式的设计过于狭隘。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用对生产的合理计划和经济活动的集体化去代替资本主义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和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忽视了人的需要的复杂多样性，也忽视了阶级社会的群众除了遭受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之外，还是特种形式的心理压迫的牺牲者。结果是，在对经济生活和社会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

^① M. Merleau-Ponty. *Humanism and Terror*. Connecticut, 1980. 136~137P.

^② 参见 M. Merleau-Ponty. *Adventure of the Dialectics*. London, 1974. 217P.

造意义上的革命时，却并不在现实的人身上自动产生变化，同样的异化还存在，同样残忍的官僚政治还在继续。他认为，尽管在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但从来没有发生过文化上层建筑的革命，人类心灵的结构没有改变，俄国的非政治化和原子化导致了无产阶级民主被官僚政治所取代的倒退和堕落。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批判苏联的“官僚社会主义”。莱易斯认为，苏联和西方同属当代工业社会，具有技术规模庞大、能源要求高、生产和人口集中、职能日益专业化和供人消费的商品的花色品种越来越多等共同的特征，它不仅是一个异化劳动的社会，也是一个异化消费的社会。^①阿格尔认为，苏联是一个官僚主义社会，“苏联的制度崇拜韦伯的官僚化组织概念”，“在苏联，工人阶级在法律上是工厂的主人，但依然是异化生产制度的被控制而无独立性的受害者（在那里，真正支配工厂的是共产党的先锋队及其任命的官僚）”^②。在阿格尔看来，苏联制度是一种“官僚社会主义”制度，它植根于国家控制，在苏联，国家拥有生产资料，它是一种国家控制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苏维埃国家对生产过程实行政治控制，它是一种高度集权、极权的制度。他还设想一种把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与分工的非官僚化结合起来的“非极权的社会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特征是依赖工人委员会、自治和分散化。

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例如，南斯拉夫“实践派”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论作为批判苏联模式（斯大林主义）的哲学依据，把斯大林主义看作对人道主义理论的歪曲和修正。彼得洛维奇认为，在

^① 参见〔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47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② 同上书，50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苏联模式（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创造性潜力受到压抑，这种社会主义因为否认基本人权和创造自由而阻挠了人的实现。弗兰尼茨基在《社会主义异化问题》（1965）中揭露苏联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异化。他认为苏联的政治异化的主要表现是：其一，国家机器不断强化，斯大林主义不是给人以信赖，而是给国家以信赖，给各种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以信赖；而政治国家机器的绝对权力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个人和个性的全面软弱无能；其二，个人崇拜是政治异化的突出表现，即个人崇拜乃是国家强化的产物。又如，波兰的人文学派批判苏联模式、斯大林主义或“现实的社会主义”。沙夫在《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这一论著中批评“现实的社会主义”，认为现实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的一切形式都受到官僚机构的控制，其官僚化程度远远超出资本主义；党的各级机构渗透到社会的全部官僚机构之中，它在现实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中，起着特殊的决定作用，现实社会主义非但没有把人的自由提高到更高的水平，相反，却在许多情况下，较之于资产阶级民主还更加恶化。他把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的问题，归因于“在还不具备社会主义建设条件的社会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沙夫等人还认为，社会主义只有从官僚主义的矛盾、异化世界和斯大林主义的体制中解放出来，才能重新获得其信誉；他们主张实现真正的工人民主，建立符合人性的社会主义。又如，捷克的“存在人类学派”的柯西亚和李希塔等人则“从人的角度批判国家社会主义”，对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模式提出两点重要批评：一是这种模式否认基本人权；二是没有充分地把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模式批判的要点是：第一，认为苏联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极权主义社会或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将苏联的社会现实与马克思“原来的理论”加以比较，断言苏

联的现实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理想不相符合，苏联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一个真正解放的社会；认为苏联的现实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后果，也不是这一理论的实现。

第二，批判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设计太狭隘，认为在苏联模式中，只要在政治上夺取政权，经济上改变所有制，实现国有化，社会主义革命就算完成了；似乎只要迅速提高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主义的目的就达到了。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使人获得自由解放，使人的本质和潜能得以充分的体现和发挥。苏联模式片面强调政治上夺权，经济上改变所有制，忽视思想文化革命；强调纪律和服从，忽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因而是一种狭隘的设计。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着力抨击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认为它与法西斯德国一样，是一个“极权国家”（“独裁国家”）或官僚主义制度。在苏联，国家成为绝对权力，它控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管理国家、享有权力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形成官僚特权阶层或新阶级，他们获得特殊的地位和利益，并通过对国有经济的控制来巩固其权力基础；而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仍然只是名义上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实际上是工资劳动者、生产者，被排除于管理、决策之外，仍然是被统治和控制的对象。

第四，“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苏联和西方社会是发达工业社会的两种形式或变体，是一个压抑、异化的社会。他们说把握苏联社会的发展趋势不能单从这个社会自身的结构出发，必须注意它与西方社会的相互作用；苏联政策的每一个转折都可以在西方找到相应的变化，反之亦然。在他们看来，苏联社会和西方社会的共同基础都是工业—技术结构，都以技术合理性作为社会组织原则。因此，这种基础相同的社会，其性质不会有本质的差别，其发展趋势也必然日趋同化，人的遭遇和境况也不可能有根本差

别，都是异化、压抑型的社会。

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呢？

显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尤其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模式的批判并不是纯粹恶意的攻击，相反，他们的一些批判是有根据的、击中要害的；他们的批判包含了不少合理之处，必须加以充分的肯定。其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高度集权的体制的批判是有相当力度的。尽管他们有全盘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倾向，但他们正确地指出了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高度集权的本质特征。80年代以后，我国一些学者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进行分析，认为其政治体制的特征是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个人迷信和独断专行；经济体制的特征是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实行彻底的行政干预和自觉的不平衡发展战略；文化体制的特征是绝对的统一意志和情报封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早已看到了苏联体制的集权特征，揭露其弊端及危害，这是颇有见地的。

其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官僚主义的批判也是持之有据的。在斯大林时期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党内外缺乏正常的民主程序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实际实行的干部委派制滋养了官僚主义，干部向上级而不是向人民负责，搞特殊化，产生特殊利益和以权谋私；这种高度集权体制也造成了机构臃肿、层次过多、部门林立、人浮于事、文山会海、互相扯皮、行政效率低下的官僚主义顽疾。列宁在逝世前，已看到苏维埃国家中官僚主义的严重性，警告说苏维埃国家正在变成旧式官僚机器，并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的任务。斯大林上任之后，并未进行坚决有力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导致官僚主义在苏联越演越烈。

其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苏联模式过于狭隘有一定的道理。片面强调改变所有制、发展生产力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和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确是斯大林时期苏联模式的一个特点。斯大林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没有把民主政治建设作为其中的内容。例如，1934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认为剩下的任务是建立它的上层建筑，而这后一个任务比前一个任务要容易得多。显然，他把经济基础（物质文明）建设与上层建筑（精神文明）建设这两重任务分开，看不到后者的建设也是一个长期艰巨、必须同步进行的任务。这种指导思想造成精神文明尤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严重滞后，导致苏联社会缺乏民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疑看到了苏联模式的这个弊端。诚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所言，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人的自由解放，发展生产力、创造物质基础仅仅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本身或目的全部。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提出许多值得我们认真讨论的问题，包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处理好公有制（国有化）与人民当家作主、专政与民主、计划与市场、集权与分权、党与政、领袖与群众、社会解放与人的解放等方面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探索各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问题。例如，在关于公有制或国有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苏联模式过分依赖于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似乎实现了公有制就可以产生某种“生产者的自由联合”，要不就以为只要管理了物就没有对人的统治问题；他们认为，在苏联模式中，以国家所有制形式出现的公有制并不是一种解放的手段，不过是另一种统治的工具而已；在这种所有制条件下，少数人往往以“社会利益或国家利益”为名，支配甚至占有社会财富，谋取私利。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只要在需求和用来满足需求的物品和服务之间还存在着差距，“对物的管理”就意味着对人的统治；只有在生产者自己进行管理，即通过民主的方式制定其

生产计划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才可以导致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国家所有制既可以与独裁结合，也可以与民主结合，前一种结合是极权主义，后一种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这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该如何处理国家所有制或公有制与让广大人民群众切实行使管理权利的问题。又如，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苏联模式片面强调计划，排斥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这导致了整个苏联经济缺乏活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方面的批评的合理之处已被后来尤其是当代各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所证明。再如，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处理集权与分权的关系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苏联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地方和下级缺乏自主性，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认为必须加以适当的分权，尤其是必须实行自治制度，因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生产和社会中的自治关系不仅是社会主义新的民主政权的基础，也是国家消亡的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就是自治，自治是共产主义的萌芽。应该说，这是一个各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处理好的问题。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模式的批判是有重大错误的。我们着重指出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否定列宁、斯大林等人建立和领导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制度。十月革命及其后建立起来的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它在许多具体细节上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不完全吻合，但它毕竟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列宁所提出并加以实践的政治原则如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发动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和监督国家；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掌握全国领导权；实行民主集中制，不

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等，是符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精神的，以这样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苏联是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尽管后来斯大林改变了列宁的许多设想和做法，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一方面以苏联社会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理想不符为借口，否认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另一方面脱离生产关系，单纯从生产力的角度，将苏联和西方社会看作是建立在工具理性和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发达工业社会的两个样板或变种加以同等的批判，鼓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趋同论。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彻底否定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将它与法西斯主义国家一起作为极权主义国家来加以批判。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首先用暴力手段砸烂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并且在过渡时期，面对激烈的阶级斗争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国内敌人的反抗和防止外来的颠覆与侵略，并组织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因此，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必要前提。同时，就其本质而言，无产阶级专政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专政及法西斯专政，它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对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进行专政，而对人民实行民主的政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夸大了斯大林时期极权政治的某些特征，不顾苏联特定的历史条件，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与法西斯专政相提并论，企图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再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正确看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取得的成就及经验。尽管苏联模式尤其是高度集权的体制有许多弊端，给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但是，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毕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迅速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物质基础。到30年代末，工业总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30—40年代，苏联工业每年以

16.5%的比率高速增长；苏联作为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一支主要力量，最终打败了纳粹德国。同时，苏联模式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个模式，毕竟创造了许多可供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借鉴的宝贵经验，它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客观地评价苏联模式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有否定或贬低这种成就和经验的倾向。

如何看待苏联社会的性质以及如何评价苏联模式，这一直是一个存在激烈争论的问题。大致可归纳为如下的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苏联社会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十足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原苏联官方和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官方的观点。依原苏联官方的说法，苏联不再存在着敌对阶级或社会矛盾，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融合相处，他们都在“全民国家”的统治下，阶级斗争不再是历史的动力，新的社会生产方式或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走向共产主义目标。第二种观点认为，苏联社会从基本结构来说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但官僚政治的出现使走向共产主义的进程被打断，由于革命时期生产力处于不发达状况因而官僚政客得以夺权，把大量的、从份额来说很不相称的社会产品划归自己使用。这些官僚主义者不是一个统治阶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地位将被削弱，最后将被第二次单纯的政治革命所推翻。在此后，才将重新在走向社会主义方面取得进展。第三种观点认为，苏联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但关于复辟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是说苏联在20、30年代就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这是C. 贝特海姆等人的观点；另一是说，复辟出现在斯大林逝世之后，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相当长时间内的看法。第四种观点认为，苏联是一个新型的阶级剥削社会，这本身并不是复辟不复辟的问题，而是从一开始苏联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早在20、30年代就形成了新的统治阶级，这种社会的结构的明显特点就是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并通过由

共产党控制的高度发达的安全机构来垄断政治权力。因此，苏联模式的社会显然没有向共产主义过渡，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上说，就不能将它列为社会主义。显而易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基本上属于最后一种观点。

在对苏联模式的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批判苏联的社会现实和制度，而且也批判苏联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批判作为这种意识形态核心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眼里，“苏联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及其后的苏联官方哲学，其源头则是恩格斯的思想。他们认为，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已经丧失了它的革命批判精神，变成了苏联官方为现实和政策辩护的工具。因此，要彻底批判苏联模式，必须揭露苏联模式的理论基础，指出“苏联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背叛马克思主义而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的，并恢复或重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由于这个问题更多地属于哲学问题，在这里我们不打算展开。

第九章 人类解放之路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 社会主义变革的理论

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迅速从思想传播转变为现实社会主义运动；20世纪初，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将社会主义由科学的理论变成了伟大的现实；二次大战后又由一国的现实变成了多国的现实。在科学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1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遭受了不少挫折，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在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令人眼花缭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就是其中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面研究和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这一流派的社会主义观，对当代社会主义变革的动因、主体、道路和战略的新探索，是这一理论的重要内容。

一、社会主义变革的动因与主体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按照唯物史观，社会变革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社会革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对社会基本矛

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① 当旧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旧的上层建筑竭力维护旧的经济基础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就极其尖锐化,于是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阶级,就必然起来革命,摧毁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建立和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基本矛盾是任何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因。“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般认为,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已经过时,不适用了,应该进行修正或“重建”。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就持这种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持批判、否定的态度,主张社会变革,但是他们往往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动因归结为异化,归结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全面的压抑,并在此基础上去寻求人的解放道路。

1. 社会主义变革的动因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否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否定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建立在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分析的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变革理论,只是把社会变革放在“外部发展”的基础上,是一种“经济主义”的分析,是不完善的。于是,他们认为应当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内部发展”，亦即从人的心理、本能结构的基础上来分析社会变革的动因，弗洛姆、马尔库塞就是持这种观点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正是力图从人的心理、本能方面去寻求社会主义变革的动因，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全面压抑、人性的异化来探讨社会主义变革的必要性。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中，弗洛姆试图将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分析学说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结合起来，从人的本能中寻找社会主义变革的动因，因此他也是“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

弗洛姆认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是从人出发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弗洛伊德是从个人的心理方面、个人的本能欲望来探讨人的问题，他的“力比多”理论是对人的科学的卓越贡献；但是，弗洛伊德过于强调人的心理、人的本能欲望而忽视了人的理性，忽视了社会对个人的影响。马克思则主要是从人的社会方面来探讨人的问题，强调了社会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对人的决定作用；但是马克思却过分强调了人的理性方面，过分强调社会对个人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人的心理、本能，忽视了人的非理性的方面。因此，弗洛姆主张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弥补马克思主义忽视人的心理、本能的缺陷。

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提出社会文明是社会病害的根源的观点，是巨大的历史功绩。他沿着弗洛伊德这种观点的思路，进一步提出，人类文明愈发展，科学技术愈进步，对人的本能的压制和摧残也就愈严重。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这种对人的本能的压制更为突出。在现代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不能为人类造福，而且使人的本性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使人变成了一架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机器。

弗洛姆认为，人的本能也就是人的本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如人的性欲、爱的能力，人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就是人性的

表现。从人的本性来说，人生来具有欲望、要求，并且渴求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实现它。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却失去了作为主体的主动性，人不再感到自己是自己的行动的主宰，而是受自己以外的力量所支配，这就是人性的异化。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人性的异化比以前的社会更为严重，人创造了社会这部大机器，人却感觉不到自己是这部机器的主人，反而成为自己所创造的这部机器的奴隶。在生产过程中，人变成了按管理者的调子来行动的“经济原子”，丧失了属于人的本能的好奇心、创造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在消费过程中，人又成为商品的奴隶，人们购买商品的消费，并不是真正出自自己的需要，而是受各种广告宣传的驱使，被财富与荣耀所引诱，在一种受控制、受支配的情趣下去消费。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个人的行为不是为爱的本能所驱使，而是由利己主义的利益所驱使，人与人的关系是出于各自的利益和相互利用的必要性，而不是出于人的爱的本能。这样人与人的关系是疏远、冷漠。

为此，弗洛姆认为，现代工业社会的迫切问题是人的本能受到压制摧残，是人的本性的异化，这样的社会是不合理的。弗洛姆也把未来理想社会称为“社会主义”，甚至号召人人为“社会主义”奋斗，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心理健全、消除人性异化、解放人的本能的“社会主义”。这样，弗洛姆实际上就把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动因，归结为对本能解放的追求，归结为对爱的追求。因此，他主张通过“心理革命”、“本能革命”净化人的心理，纠正现代工业社会对人的本性的扭曲，解放现代工业社会对人的本能的压制。

马尔库塞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社会的经济、政治层次上解释社会问题，忽略了人的心理研究，而弗洛伊德则能够从个体心理上解释社会问题。因此，必须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弥补马克思主义的缺陷。正是从弗洛伊德

的心理学理论出发，他重新探讨了社会主义变革的动因问题。

依照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马尔库塞认为人类是遵从着“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冲突的历史，正是这两种原则之间的冲突支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所谓“快乐原则”是人的一种无意识的心理过程，是一种追求快乐、拒绝痛苦的本能。如果每个人的“快乐原则”不加以限制，只是一味地追求快乐的话，就会与外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冲突，从而危及自己的生存。所谓“现实原则”是指一种理性的有意识的心理过程，一个人必须考虑现实世界的需要而不能完全满足“快乐原则”所支配的本能需要。按照马尔库塞的看法，如果人类完全受追求快乐的本能所支配的话，就会有各种矛盾和冲突，所以需要遵从“现实原则”对人类的“快乐原则”进行限制，限制人的本能的泛滥，否则无法正常地维持人类生活，现实原则所体现的就是对人的快乐本能的一种压抑。因此，“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存在，还压制了人的生物存在；不仅压制了人的一般方面，还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但这样的压制恰恰是进步的前提”^①。正是“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的冲突成了社会进步的动力，正是现实原则对人的本能的压制成了社会进步的前提。当马尔库塞根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得出这种结论时，他就不仅仅用弗洛伊德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而是用弗洛伊德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人类的历史发展动因不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是“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的矛盾发展的结果。

马尔库塞认为，“现实原则”要求对“快乐原则”亦即对人的快乐本能的压抑，这种基本压抑是不可避免的，是人类文明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社会进步的前提和条件。问题在于“现实

① [德]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原则的特定历史机构和统治的特定利益，除了造成那些为文明人类的联合所必不可少的控制以外，还引进了一些附加的控制。我们把这种产生于特定统治机构的附加控制称为额外压抑”^①。并非所有对人的本能的压抑都是必需的，对人的本能的压抑可以区分为基本压抑和额外压抑，基本压抑是建立和维持人类文明所必需的，而额外压抑是为了维持某种特定的社会统治形式，为了维持特定团体的特殊地位和利益而对人的本能的压抑。比如，劳动过程中的合理管理就是一种人类所必需的基本压抑，而统治则是一种额外压抑。“统治不同于合理行使职权。后者为劳动的任何合理分工所固有，它源于认识，并限于管理为整体进步所必要的机能和工作。统治则相反。实行这种统治的，是为了维持和扩大自己的特权地位的特殊团体和个体。这样的统治并不排斥技术上、物质上和思想上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只是在保存非理性的缺乏、贫困和压制时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副产品。”^②在马尔库塞看来，随着文明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对人类的本性的压抑，大部分属于外加的、不合理的额外压抑。这种额外压抑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范围更大、程度更高、后果更为严重，人的本能受到了全面的压抑，甚至人的本性已完全扭曲，这种充满着人的压抑的社会需要变革，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必要性，来自于这个社会对人的全面的压抑。社会主义变革的动因，就在于要将人类从这种全面的压抑中解放出来，使人类获得完全的自由。

马尔库塞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一样，也强烈地要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但是他们的这种要求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马尔库塞否认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动力，而是从人的心理、本能的压抑中寻求社会主义变革的动因。他甚至还完全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

^{①②} [德]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23、2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义革命的理论,认为这种理论已经过时、不适用了,而试图用自己那一套所谓的社会主义变革理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在《反革命与造反》一书中,马尔库塞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因归结为贫困。他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来认为贫困意味着痛苦,意味着没有得到满足的生活需要,主要是物质需要。当这一概念不能反映先进工业国工人阶级状况时,又用相对贫困对它作了新的解释。”^①似乎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革命看做解决贫困问题,由于工人阶级生活的悲惨状况和难以忍受的剥削,所以要求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而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富裕社会,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已大大提高,他们已经同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了,因此根本不会产生革命的要求,“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革命潜力的低水平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相一致的”^②。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已成了富裕社会,不再贫困,因此建立在贫困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就不能适用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把社会革命的最终根源归结为贫困问题,无产阶级之所以要起来革命,决不仅仅是因为生活上的贫困,而是由于受到剥削和压迫,要求改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受剥削和压迫的地位。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尽管比过去提高了,但是工人阶级的受剥削和压迫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的理论并没有过时。

马尔库塞提出一套富裕社会的社会主义变革的理论,来取代他认为是与贫困社会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马尔库塞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一样,认为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富裕社会,但是他并没有认为这个富裕社会就是合理的,相反他透过工业社会表面的繁荣和富裕,看到它对人性的全面压抑的非人道的性质,提出了社会主

①② [德]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与新左派》,92、8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义变革的必要性。

马尔库塞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富裕社会”有四个典型标志：其一，工业技术力量高度发达，但大部分是用来生产和分配奢侈品，用来玩乐、挥霍；其二，生活水平的提高，甚至连非特权阶级也分享到一部分好处；其三，经济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政府不断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组织干预；其四，科学和伪科学的研究，对个人和集团的行为的控制和操纵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果被用于商业和政治目的。“所有这些都是互相联系着的：它们造成了由‘富裕社会’正常功能所表现出来的综合病症。”^①发达的工业社会是一个病态社会，因为它的正常功能的发挥，却压抑了人的本性和本能需要，扭曲了人性。悲剧在于人生活在这种人性受到压抑的社会却感觉舒适、正常。当人生活在病态的社会中却依然觉得舒服、正常时，这正说明这个人是有病的，是不正常的，正说明这个社会是处于病态之中的，是需要变革的。

马尔库塞承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物质生活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在马尔库塞的批判性的眼光中，这个物质生活富裕的社会恰恰就是一种病态的社会，在科学技术发达，社会经济繁荣，人们物质生活富裕的现象背后，是对人的全面压抑，是人的本能、心理遭受压抑所造成的人性的扭曲。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所满足的是虚假需求，而不是真实需求，通过这种虚假需求的满足，压抑了人的真正的本能，这就意味着人性的扭曲。

马尔库塞还从其他各个方面揭露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全面压抑，对人的本性的摧残。例如，他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变成了商品的奴隶，变成机器。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把人变为奴隶、变为机器的社会是不合理的，需要加以变革，要创造一个“非压抑性”的、合乎人性的自由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

^① [德] 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与新左派》，1页，北京，商务印馆，1982。

义变革的动因就在于人们对压抑性的社会的不满，对没有压抑性的理想社会的追求。

弗洛姆、马尔库塞在寻求社会主义变革的动因时，看到了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揭露了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表面的繁荣富裕背后，对人的本能的压抑，对人性的扭曲，这些揭露无疑具有积极价值。比起那些满足于资本主义的表面繁荣，千方百计地为现代资本主义辩护的资产阶级学者，弗洛姆、马尔库塞的批判性观点无疑是深刻的，是令人深思的。但是，由于他们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就无法真正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贯彻到底，当然也就无法找到社会主义变革的真正动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才是社会变革的真正动因。即使当代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依然是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矛盾，同样也是这个社会必将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的根本动因。弗洛姆、马尔库塞却错误地搬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并立足于此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压抑，寻求“非压抑”的自由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回到了人道主义的立场，是回到了费尔巴哈、青年黑格尔派的抽象的人性论的立场，用人的本能、人的心理、人的主观意识来解释社会历史，从而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

除了法兰克福学派外，“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力求从人的“心理”、“意识”等主观的方面去寻找社会变革的动因。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结合起来，来说明社会历史问题，改变原来纯粹的存在主义的立场，承认个人和社会是合为一体的，承认社会对个人的影响作用。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个人“存在”是第一位的，社会是第二位的，认为对于个人的心理、本能的分析对个人和社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甚至主张用“精神病心理分析”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社

会分析。萨特认为，人类生活在一个有限世界上，但他们的需要却是无限的，所以匮乏是人类全部活动的根源，匮乏造成了生存斗争中的对立和对抗，是阶级产生的根源，是异化的基础，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到了1969年，萨特也承认西方发达社会已是丰裕社会，这个“后匮乏”社会能使人类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因此克服异化的需要就成为了一场新的革命斗争的基础。因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异化是比经济关系更基本的现象，克服异化就成了新的社会变革的动因。他提出：革命是一件很广泛的事情。革命须以思想的改变为前提，甚至以感觉的改变为前提，同时还要以生产形式和所有制的变革为前提。革命不仅意味着社会和经济的改变，而且也意味着人的改变。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列斐伏尔，实际上也是把社会变革的动因归于人的主观意识。他之所以主张通过日常生活批判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就是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仅涉及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变革，而且更重要的是涉及文化的变革、人的主观方面的变革。社会主义不只是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及其政治制度，而是一种文化变革，这就要求从日常生活批判着手，将群众从现代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的异化中唤醒，把人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彻底解放。

“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从主观的方面，甚至从人的心理、本能去寻找社会主义变革的动因，但是，马克思主义恰恰认为，人的主观因素只有从社会的各种客观因素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因归根到底只能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背离了这一点，只能导致历史唯心主义。

2. 社会主义变革的主体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同时，造就了一支强大的工人队伍，他们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由无产阶级来完

成的，无产阶级将把自己组织成革命阶级，按照历史所赋予的使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却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变革的主体的理论已经过时，而试图去寻求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新的主体，特别是把“新左派”或“新工人阶级”（“新无产阶级”）看作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最主要的力量。

“西方马克思主义”否认工人阶级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变革的主体的主要理由是：第一，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传统工人阶级的数量越来越少，地位越来越低，在社会和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不重要。提出“新工人阶级”理论的马勒认为，工人阶级在今天不是同质的，只有“蓝领工人”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这一部分的工人阶级的数量在减少，作用在缩小。而被他称为“新工人阶级”的“白领工人”的队伍却在壮大，地位在提高。马尔库塞也指出：“马克思的理论认为，工人阶级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工人阶级本身就能使生产过程停顿下来，二是它占人民的大多数，三是就其整个存在而言，它是现存物的否定者。这三个特点使工人阶级成了潜在的革命主体，但在今天只有第一个特点还适用于美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们当然可以把这一部分工人阶级看作是无产阶级在今天的后继人，这一部分人就是蓝领工人。”^①按照马尔库塞的分析，在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工业社会当中，传统的工人阶级已不占人口的大多数，马克思分析的工人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特点已经不存在了，而说工人阶级具有能使生产过程停顿下来的作用，也只适宜于今天的“蓝领”工人，并不

^① [德] 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和新左派》，1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适用于整个美国工人阶级。

第二，由于工业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结构和功能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已丧失了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力量”的地位。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都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自动化生产水平的提高，今天发达工业社会的剩余价值主要是由科学技术以及机器本身创造的，而不是由工人的活劳动创造的，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就消解了，从而造成了这两大阶级的阶级对立的潜伏状态。既然资产阶级不再依靠占有工人的无偿劳动来剥削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也就不再因为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被剥夺而去反对资产阶级了。马尔库塞通过“单向度社会”的理论，说明工人阶级是如何同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同化、所融合，而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肯定力量，丧失其革命的否定性的。“无产阶级不再作为代表着对业已建立了的秩序的‘绝对否定’的革命阶级而行动”^①，“如果工人阶级不再是现有社会的‘绝对否定者’，如果它成了这一社会内部的一个阶级（它也有着这一社会的需要和追求），那么仅仅依靠把权力转交给工人阶级（不论用什么形式），就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另一种质的社会的过渡”^②。由于工人阶级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肯定性力量，而不再具有否定性的历史地位，因而它就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变革的主体。

第三，由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变化，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经济生活条件的改善，当今的工人阶级已经丧失了阶级意识、革命意识。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在反思欧洲工人运动失败的原因时，系统地考察了工人阶级的阶级

① H. Marcuse, *Soviet Marxism, A Critical Analysis*. New York: Vintage, 1961. 125P.

② [德]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与新左派》，1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意识问题,把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的失败归结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缺乏,承认缺乏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难以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他们的这种观点对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因为当时的工人阶级缺乏阶级意识而否认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他们仍然把工人阶级当作人类历史上最彻底革命的阶级,可以通过向工人阶级灌输阶级意识,使工人阶级成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最主要的力量。而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流派,却以工人阶级缺乏阶级意识为理由,否定了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变革的主体。马尔库塞认为,在稳定和繁荣的工业发达社会,工人阶级在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与资产阶级趋同,无产阶级被融进资本主义的制度及生产方式中,丧失了阶级意识,丧失了批判和否定的意识。“在大多数工人阶级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意识占着统治地位。”^①哈贝马斯也认为,在当今的工人阶级中,阶级意识或革命的阶级意识已经看不见了。因此,在工人阶级已经丧失了阶级意识、革命意识的今天,它当然就不可能承担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任务,不可能成为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变革的主体。法国的列斐伏尔也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用生产手段的现代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质利益的趋同化,模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使得工人阶级不再有革命目标,不再在任何意义上是直接革命的,而是逐渐地非政治化了。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结构,工人阶级的生产条件、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工人阶级不同的一些新的情况和特点,比如工人阶级队伍中的“白领工人”迅速增加,工人群众在自动化生产中的劳动条件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等。“西

^① [德] 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与新左派》,8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方马克思主义”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并对其作出了某些值得注意的分析。但是，他们由此而否定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否定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却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是变革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的观点，以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为基础，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客观分析的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客观矛盾运动，要求以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要求社会主义的变革。只有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的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才是社会主义变革的主体。诚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有了改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但是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的生产关系并没有质的变化，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也没有改变，工人阶级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这一属性依然存在，这个阶级仍然是革命的阶级，是社会主义变革的主体。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进行分析时，不仅注意到而且强调了当前工人阶级缺乏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现实，是值得重视的。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各种改良措施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矛盾，缓和了工人阶级的不满和反抗，造成了工人阶级的一时“沉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会永远“沉默”，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已经完全丧失了阶级意识，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完全丧失了它的革命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片面夸大了阶级意识的作用，将工人阶级的一时“沉默”当做是永久“沉默”，从而否认了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既然工人阶级已失去了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主体的历史地位，那么，当代西方社会主义变革的主体在哪里呢？“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此作了分析研究。列斐伏尔认为，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物质丰富，产生了新的匮乏，产生了带有新的异化形式的新集团，如白领工人、女人、青年人，他们正在变成一股新的激进力量。马尔库塞对社会主义变革的新主体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同资本主义已经一体化了的工人阶级，当然无法成为新的社会主义变革的主体。新的社会变革的主体，应该是尚未被这个社会所同化的人，是厌恶现存的生存方式的人。他认为这个新的主体，目前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指少数民族和少数种族的被压迫者，还有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被遗弃者、失业者、流浪者、嬉皮士等。这些人是为现代社会所抛弃的贱民，他们厌恶现存的社会生活方式，心中充满对现存社会的不满和抗议。对于当前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来说，他们是异在的，他们的谈吐、行为和外表与众不同，他们喜欢骚扰，所做的一切是那些承认现在的社会秩序的人所不能容忍的，正是他们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是现存社会的否定力量。第二部分是指各种技师、工程师、专家、科学家。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领域的广泛运用，他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满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具有拒绝资本主义的意识，对现存社会的生存方式深感不满。马尔库塞把这两部分人称为“新左派”，把社会主义变革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正是这些人的意识形态中存在着与现存社会对立的形象和价值，蕴藏着向新社会转变的萌芽，他们用新的感性和意识来批判资本主义世界的形象。“宣布行动不是为了竞争，反对野蛮的‘屠杀’，揭露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肯定身体的敏感性和官感，生态抗议，蔑视征服世界和殖民战争的错误的英雄行为，妇女解放运动，反对对缺乏独创性的美和慎言微行的反性感的、清教徒式的崇拜——所有这一切倾向都有助于行

为原则的废除。”^①“新左派”怀疑、不满现存的一切，预示着一种人类的新的需求、新的解放。“新左派提出‘断然否定’最先进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全部文化。……恰恰是在其特殊的思想、道德和‘心理’的要求中，革命的可能性——不，是革命的必然性——得到了它的最完整、最激进的表现。”^②

马尔库塞还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在“新左派”中的重要作用。“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占主要地位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人们可以看到，这一运动使用了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被用于经济和政治过程的基础和思想领域之中。”^③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可以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将革命的意识带给工人阶级，起到一种启蒙的作用，最终激发起传统的工人阶级的觉悟。“他们承担政治教育的全面任务，改变人们错误的畸形知识，以使他们能真正体验到他们的状况，明白克服这种状况的绝对必要性，并把握他们解放的手段和道路。”^④

马尔库塞否定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变革的主体，把“新左派”抬高到社会主义变革的主体的地位上，他被 60 年代欧美的“新左派”奉为精神导师。但是，1968 年法国的“五月风暴”、美国的反战运动、西德的学生运动的实践表明，“新左派”难以成为推翻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新左派”运动尽管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却无法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新左派”运动昙花一现，“新左派”很快就从街头销声匿迹了。马尔库塞关于“新左派”是社会变革的主体的观点，不但受到了实践的冲击，也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与指责。于是，他对自己原先的观点进行了一些修正。他表白自己并没有把学生、嬉皮士、知识分子看做是可以完全取代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的作用，而只是说“新左派”是革命

^{①②③④} [德] 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与新左派》，104、105、105、102 页，北京，商务印馆，1982。

运动的先进者,可以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启蒙、催化、唤醒同资本主义一体化了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是一个“潜在的主体”。这些表白反映了马尔库塞思想上的自相矛盾。马克思主义是按照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确定其为革命的主体,因为无产阶级是先进的生产方式的代表,它必然成为推翻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主体力量。而马尔库塞则依据“新左派”对现存社会的内心的厌恶、不满,将其确立为社会主义变革的主体,这种观点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缺乏科学性,60年代末的“新左派”运动的实践也已经证明了它是不科学的。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还有一种关于社会主义变革的新主体的理论,这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马勒、高兹所主张的“新工人阶级”的理论。马勒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迅速运用,使科学技术成为具有决定性的生产力,与科学技术、自动化生产相联系的白领阶层,包括高技术工人、工程师等,成为与传统工人阶级不同的“新工人阶级”,他们摆脱了传统工人阶级的贫困状态,过上丰裕的生活,但却在现代生产中处于非自主的地位,要求自我管理。由于“新工人阶级”同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自动化生产相联系,他们必然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变革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占据核心地位,“新工人阶级”不仅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而且由于其活动和工作的客观条件,因此是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卓越的先锋队。高兹也认为,由于发达资本主义的高度复杂的科学技术的生产过程,提高了脑力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降低了蓝领工人的地位,“新工人阶级”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70年代高兹放弃了“新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变革主体的主张,认为由那些失业者,包括各种杂工、临时工、试用工的潜在失业者所组成的“非工人的非阶级”才是后工业社会革命的主体和动力。

将“新工人阶级”看作是工业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主体的

观点,反映了当代西方工人阶级队伍结构的变化,这就是体力劳动者减少,而各种技术人员、科研人员、管理人员等脑力劳动者的迅速增加,将脑力劳动者看作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将其视为社会主义变革的主体,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提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①。他提出的“总体工人”的概念不但包括体力劳动者,也包括工程师、技术人员等脑力劳动者。但是,“新工人阶级”的理论,却以“新工人阶级”取代传统的工人阶级,仅仅把“新工人阶级”视为社会主义变革的主体,否定了传统的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这就带有片面性了。

二、社会主义变革的途径或道路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活方式的“反对派”,他们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弊病,强烈谴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主张对现代社会的变革,寻求人类解放的变革之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变革的道路和途径进行了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探索。在这种新的探索中,他们各自提出了社会主义变革道路的不同主张,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的思想轨迹,就是强调主观革命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应当通过主观革命(包括思想革命、文化革命、意识革命、甚至心理革命)的道路,改变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说与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社会主义的新纪元。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引发了后来东方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在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没有爆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5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类似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暴力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道路并没有在欧美国家取得成功。因此，从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变革道路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探讨，寻找社会主义变革的新的道路和途径。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否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归结为对人的主观意识、心理本能的压抑，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的主观意识、心理本能的解放，为此提出了一条侧重主观革命的社会主义变革之路。其中，葛兰西的“主观革命”的理论，赖希的“性·政治运动”的理论、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及马尔库塞的“乌托邦革命”的理论有较大的影响。

1. 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变革之路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从一开始就将社会主义变革之路的探索，从暴力革命、政治经济革命转向主观革命、思想文化革命，而最有代表性的则是葛兰西。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导应该是取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而取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过程实质上是一场主观革命。

葛兰西认为，国家是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是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结合。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就不仅是武装夺取政权、控制政治社会的问题，同时还要取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控制市民社会。夺取了国家政权机构，并不意味着同时就取得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并不意味着革命的胜利。他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并不只是一个夺取政权的单纯技术问题，也不只是一个社会危机所造成的政治机会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文化条件的问题，一个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问题。

在葛兰西看来，革命的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就应当取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社会集团可以而且甚至应该在夺取到国家政权之先就以领导者的身分出现（这就是夺取政权本身的最重要的条件

之一)”。^①这样,葛兰西实际上把取得领导权看做是革命成功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无产阶级的革命同样也必须取得这种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关键还在于,取得无产阶级对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并不仅仅是在外部夺取旧的国家所控制的教会、工会、学校这样的组织机构,不仅仅是取得了报刊杂志广播等各种的宣传媒介和工具,而是要真正地摧毁维护旧制度的种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确立起社会主义新秩序所要求的新的思想观念。换句话说,取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实质上是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是一场主观革命。通过主观革命改变人们的世界观,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道德信仰和价值观念。在资产阶级领导权居于支配地位的市民社会,人们接受了资产阶级的那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但以某种思想体系支配着市民社会,而且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习惯中去了。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不可能真正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因此,同意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无产阶级革命,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这种状态,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所以必须建立起一种无产阶级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一种反文化,要把这种新文化传播到市民社会中去,把新文化“社会化”,“从而把它们变成实践活动的基础,变成人们协调一致的活动的要素,变成人们精神的和道德的结构要素”^②。

早在1919—1920年,葛兰西在领导意大利的工厂委员会的运动的时候,他就认为不能把革命看做是把现存的国家政权夺取过来加以改造就可以了,而是主张通过工厂委员会这种形式,去建立一种“新秩序”,使工人获得一种主体意识,获得一种为掌握国家政权所需要的责任意识,摆脱资产阶级工会所培养的狭隘的利己精神和劳动商品化的观念。所以,葛兰西当时不仅把工厂委员会看做是无产阶级的权力机构,而且把它看做是工人阶级的训练

^{①②}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31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学校。在他看来，工人阶级的权力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接管资产阶级的权力，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从资产阶级的旧的国家体制中产生出来，而是一种全新的创造。这种全新创造的关键在于，工人阶级成为生产过程的主体，成为历史的主体，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为资本家利润而劳动的消极的客体。工厂委员会通过生产者本身对生产过程的控制、管理，给予工人以生产中的直接责任，形成一种自觉自愿的纪律，一种历史创造者的心理，获得一种责任意识、主体意识，使工人意识到自己是工厂的主人、国家的主人、历史的主人。葛兰西还把工厂委员会称为“无产阶级生活的中心”，它在日常生活中，在日常的生产过程中，将工人训练为主人。总之，在意大利的工厂委员会运动的时期，葛兰西就要求努力去创造一种无产阶级的新生活、新文化，创造无产阶级的新人。为此，他还曾热心地倡议，在意大利各地建立“道德生活的俱乐部”，通过主观革命去形成新的社会所需要的新人。在《狱中札记》中，他早年的这种思想进一步演化为领导权的理论，并据此提出了“阵地战”的重要理论。

葛兰西认为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是一种运动战，以直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标。在葛兰西看来，东方国家的市民社会是不成熟的，国家的稳定主要依靠国家政权来维持，国家政权本身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政权本身就是一切，市民社会的因素相对而言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在东方的落后国家的革命中，国家政权本身就成为了无产阶级正面攻击的目标，夺取了国家的政权就能有效地控制整个社会。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的革命便可以采取运动战的方式，集中力量在刹那间打开统治集团的防御缺口，然后又迅速把革命力量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打开另一个缺口，最后夺取全部政权。葛兰西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统治阶级不仅拥有政治机器，而且牢固地掌握着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由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所支配的市

民社会的阵地十分坚固，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重要基础。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就难以通过运动战的方式取得胜利。这是因为：第一，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支配下，市民社会中活动的人们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自发同意国家的统治，还没有取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无产阶级，难以迅速地组织起自己的进攻力量，企图以运动战的方式取得革命的迅速胜利是不可能的。第二，即使假设无产阶级在某些条件下也能够以迅速的运动战打开敌人营垒的缺口，夺取一部分国家政权，但是发达国家中国家政权自身只是一条外围的堑壕。堑壕背后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支配地位的市民社会的坚固阵地，夺取了国家的一部分政权不过是跨越了一条堑壕，作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的市民社会的阵地依然存在，还谈不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所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市民社会，取得市民社会的领导权是长久的阵地战，它实质上就是粉碎资产阶级在市民社会所建立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从而逐步占领这个阵地，取得无产阶级在市民社会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这种阵地战是一场争夺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战争”，是一场文化的攻坚战。葛兰西认为，法国的资产阶级在1789年的大革命之前就已经进行了这种阵地战，对封建的意识形态采取了长期的进攻，然后才有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的革命也必须经历这样的阵地战，取得市民社会的领导权，才能最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葛兰西的阵地战的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强调意识形态的革命、主观的革命，通过主观革命的道路，取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占领市民社会的阵地，才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

葛兰西在探索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时，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新模式，它不是强调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而是突出了通过主观革命取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这表明葛兰西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主义地照

搬十月革命的经验，而是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进行新的探索。不管葛兰西提出的理论是否完全正确，他的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葛兰西强烈反对教条主义，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后不久，他在欢呼十月革命胜利的文章中，就把十月革命称为“反对《资本论》的革命”，按照《资本论》的逻辑，社会主义只有在工业发达社会才能实现，而十月革命却在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列宁恢复了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却没有教条地对待马克思的理论，因此才能领导十月革命的胜利。而葛兰西本人也没有教条主义地对待十月革命，没有机械地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他看到了西方发达国家与东方落后国家的不同结构，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同于十月革命的运动战模式的阵地战模式，更进一步突出了主观革命的意义。葛兰西对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崭新探索，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一探索对后来的“欧洲共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探求非“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了很大影响，他也被称为近50年来西方最具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

葛兰西是在反对第二国际的机械论、宿命论的倾向中，提出主观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他强调了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以主观革命为先导，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占领市民社会的阵地，才能最终取得胜利。这一理论无疑具有其合理的因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具有主观的条件，它依赖于无产阶级及其劳动人民的觉悟程度，只有无产阶级确立了自己的阶级意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和胜利才是可能。当时的第二国际的机械论者却不懂得这一点，仅仅把革命寄希望于客观的必然进程，不懂得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是在人的自觉行为中实现的，割裂了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因此只把社会主

义革命看作是自然进化的结果。葛兰西，也包括卢卡奇、科尔施，恰恰把第二国际的机械论者所忽略的革命的主观因素突出出来了。当然，应该指出的是，葛兰西在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新的探索时，注意到了主观革命的重要性，突出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问题，却忽略了对社会的政治、经济革命的分析，忽略了对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关键问题的分析。尽管葛兰西也主张总体革命，也并不排斥社会的政治、经济革命，并不反对暴力革命，但是，他在强调领导权、强调主观革命时，毕竟忽略了政治、经济革命，忽略了暴力革命的问题，这就难怪西方有些学者认为他的理论是排斥了暴力革命的理论。显然，葛兰西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存在着强调主观革命的片面性，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些人正是从它的这一片面性走向极端，把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寄希望于主观革命甚至是心理的本能的革命。

2. 日常生活批判的变革之路

卢卡奇将“物化”变成了哲学的一个主要范畴，并借助“物化”范畴来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批判。而葛兰西也将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转向市民社会中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等文化层面。这里已预示着一种重大的转变，即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社会的经济、政治问题转向关注社会的日常生活问题，或者说从关注宏观的社会问题转向关注微观的社会问题。卢卡奇、葛兰西的这种思想倾向，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特别是对“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尤为突出。萨特对“社会集团”的分析、赖希对“家庭”、“婚姻制度”的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实际上都致力于日常生活的批判，而法国的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最为著名。列斐伏尔在1946年就写了《日常生活批判》一书，系统阐述了从日常生活批判开始实行社会变革的问题，60年代关于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成为他的研究的中心主题，并在1968

年完成了《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一书。他把日常生活批判看成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主张通过日常生活批判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列斐伏尔力图从哲学的高度去理解、把握社会的日常生活。他指出，哲学家们总是认为日常生活是平庸的、没有意义的、非哲学的琐事，以为只有摆脱了日常生活才能更好地进行哲学思维。而他要使日常生活成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把日常生活纳入哲学范畴，从哲学的角度把握日常生活，用一种非平庸的哲学观点来看待平庸的日常生活。

在列斐伏尔看来，日常生活的平凡事件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人的偶然的小事；一方面是比起这件小事所具有的许多‘本质’来无限复杂而且更为丰富的社会事件。社会现象就是被这两方面的统一所规定的”^①。以一个女人购买半斤砂糖为例，它一方面是个人的偶然小事，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另一方面通过深入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个女人的生活，她的生平，她的职业，她的家庭，她的阶级，她的预算，她的饮食习惯，她的钱财的用途，她的意向和观念，市场情况等等，……最后就可以抓住资本主义，抓住国家的历史。

这样，日常生活就不仅仅是简单的日常生活琐事，而且包含着社会的实质。日常生活不仅恒常存在，而且充满着价值、礼仪习俗和传说，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的进程受市场、销售学和广告的控制。日常生活和社会过程是统一的，日常生活能够把社会的经济现实、现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和革命的政治意识包罗起来，社会也总是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着，不断地再生产起来。所以理解社会过程及其本质，了解国家、历史，就要求理解、把握日

^① [法]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转引自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401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常生活；变革社会就要求变革日常生活。

列斐伏尔把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亦即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称为“消费支配的官僚社会”，是一种“消费主义世界”。这种日常生活越来越使男男女女成为被动的存在，成为原子化的消费者。在这种日常生活中，人们是作为孤立的消费者，对消费的对象（消费品）作出消极的自动的反应，在这种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作为客体的消费品成为能动的，而作为主体的消费者反而成为消极的了。人们通过电视广告知道了怎样生活，怎样穿戴，怎样微笑，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和判断力。于是工人阶级就在这种日常生活中丧失其历史方向。在消费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工人阶级丧失了它的目的、目标、意义。正是在日常生活的领域中，新商品和大众传播工具维持着群众的消极性，使他们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现代化的日常生活，用其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利益的趋同化，模糊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实现了一体化的功能，以至无产阶级被异化到不相信自己被异化的程度。

列斐伏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能够非常有效地维持自己的地方，正是在日常生活的领域内，而不是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是在生产关系本身。正是在日常生活的领域内一定会发生争取崭新意识的彻底变革的先决条件的斗争。为此他主张必须从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批判入手，将群众从日常生活的异化中唤醒，重新具有革命性，重新具有创造性。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涉及经济与政治方面，而且也涉及文化方面，涉及“日常生活”方面。“我们来问问自己，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它要改变什么？我们依然不清楚。要消灭资产阶级和阶级对抗吗？要消灭所有制和生产的资本主义关系吗？这些都是消极的定义。”^①在列斐伏尔看来，只有通过日常

^① [法]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转引自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400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生活批判的变革,才是积极的。但是,列斐伏尔认为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却没有能看到一点,只把社会主义革命理解为经济、政治方面的革命,而不懂得文化革命,不懂得需要通过日常生活批判走向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现实问题》中,他一再指出,从资产阶级政权过渡到无产阶级政权,就其事实而言,并不涉及具体生活中的改革,那样是难以完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的。列斐伏尔主张将政治、经济变革同日常生活批判亦即文化变革结合起来,把日常生活批判放到社会主义变革的极其重要的位置上。

日常生活批判并不是要把生活问题简单化,而是要生成新的生活方式,它不只是变革状态和财产的分配,而是变革存在,“把日常生活变成一件艺术品!”这意味着,日常生活是一种创造性的生活,是充满着人的主动性的生活,人们集体承担起他们对自己的责任和管理他们自己生活的责任,而不是像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那样,人成为被消费所控制的消极的人。通过日常生活批判,把人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克服人性的内部分裂和矛盾,以便使人真正成为人,成为一个“全面的人”、“完整的人”,成为一个完全摆脱了异化的人,实现人的解放。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就其实质而言,也是主张通过主观革命的道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变革。所谓日常生活批判,就是要变革现存的生活方式,变革现存的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习俗、价值观念,变革日常生活中的人的思想意识。列斐伏尔的这种主张,是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革命、意识革命的观点相一致的,表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思想倾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理论家赖希,试图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引入对革命的分析。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庭、学校、教会也起到了压制人的本能、个性的作用。人们是在日常生活中,即在劳动、闲暇、居住、家庭、性生活以及邻里关系中遭遇到资本

主义社会关系的现实的，日常生活是群众直接经验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压抑性的真正领域，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也是在这个领域遭到压抑的。因此也需要在日常生活的领域进行反压抑的斗争，使无产阶级从日常生活中解放出来，把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到日常生活中去。列斐伏尔、赖希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把日常生活批判看作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主要途径，是因为他们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只重视社会的政治、经济方面的革命，即只重视宏观上的革命，而忽略了日常生活方面的变革，亦即忽略了微观革命。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只讲宏观革命，结果是改变了国家政权和所有制，人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变，人们的意识、心理没有变。这样的宏观革命是不完全的。因此，他们极力主张把宏观革命和微观革命结合起来，把对社会的政治、经济革命和日常生活的批判与主观心理的革命结合起来，甚至把日常生活批判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中心，通过日常生活批判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为人们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确实，这一领域是过去人们较少涉及的，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那样，过去的哲学家将日常生活视为平常琐事、不值一谈的东西。但是，客观地说，日常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才能从事其他活动。所以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应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内容。“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其独特的眼光，开拓了对日常生活的研究，这无疑是值得重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对人的压抑，并对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强调社会主义变革中必须重视日常生活中的微观革命、人的思想意识的革命，这些思想是有其合理之处的。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在研究日常生活时，却忘掉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日常生活首先是受生产方式制约的，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根本观点，就不可能对日常生活作出科学的分析，而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批判，实际上成为一种文化批判、思想批判，这样他们就难以找到通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②

3. 从科学到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之路

马尔库塞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极不合理的极权主义社会，在其表面繁荣背后是对人的本性的极端压抑。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他也强烈要求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并积极探索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变革之路。1967年他在柏林大学的演讲中提出：“走向社会主义之路是从科学到乌托邦，而不是从乌托邦到科学。”1969年他在《论解放》的论文中又重申：“发达工业社会的社会主义运动需要一个从马克思到傅立叶……从现实主义到超现实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运动。”

众所周知，从早期的莫尔、康帕内拉到19世纪初期的傅立叶、圣西门和欧文，人们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追求一直处于空想的阶段，亦即乌托邦的阶段。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将社会主义从空想的乌托邦变成了科学。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7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0多年之后，在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存在于世的时候，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代表人物的马尔库塞，为什么会提出从科学到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之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之路是什么样的社会变革之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之路走得通吗？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乌托邦的原意是乌有之乡，后来人们几乎把它变成空想的同义词，按照马尔库塞的理解，乌托邦尽管是一种幻想，却并非只具有纯粹的空想性。乌托邦实际上是以现实为基础的想象的产物，这种想象是对现存社会状况的否定，因此它就不是纯粹的空想，而是具有其现实性，有其实现的可能性。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对幻想和乌托邦做出了独特的解释。他指出：“把幻想（想象）看作是一种具有自己的规律和真理价值的思想过程，这在心理学和哲学中已是屡见不鲜了。”^①“幻想，……有它自己的、符合它自己的经验的真理价值，这就是超越对抗性的人类实在。在想象中，个体与整体、欲望与实现、幸福与理性得到了调合。虽然现存的现实原则使这种和谐成为乌托邦，但是幻想坚持认为，这种和谐必须而且可以成为现实，幻觉的基础是知识。”^②乌托邦虽然是幻想、想象，具有空想性，但它并非完全是虚无飘渺的东西，它具有现实的基础，是对现实的否定，具有实现的可能性。

马尔库塞认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变成了没有否定性、没有批判性的“单向度社会”，从现存的秩序中无法现实地产生出真正的社会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按照科学必然性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理想不可能在现存的社会秩序中科学地产生和实现，当一种美好的理想不可能在现存的社会

^{①②} [德]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102、103～10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秩序中实现的时候，“它对这种社会秩序来说就总像一纯粹的乌托邦……它表现在对最好的国家和最大的快乐的构想中，表现在充满幸福的永久和平的构想中”^①。换句话说，今天只有在幻想中、在超越现实主义的乌托邦中，才会产生社会主义。正是依照这样的思想，马尔库塞断言：社会主义之路是从科学到乌托邦，是从现实主义到超现实主义的运动。

马尔库塞的超现实的乌托邦理想国是一种“自由的社会主义”。马尔库塞把现代资本主义看作是极权主义社会，是对人的全面奴役和控制的不合理社会，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他也视为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同样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是个人自由的完全丧失。因此，马尔库塞追求第三条道路，既批判现代资本主义，也反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而主张自由的社会主义。首先自由的社会主义是一个自由的王国，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在其中自由地生活，没有奴役，没有压抑，自己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劳动和生活。在这种联合体中，个人与他人及其社会是完全和谐一致的。每个人都在与他人的自由联合中自由地发展。其次，自由的社会主义也是一个道德的天地，是一个伦理王国，个人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中的不自由的个人，而成为自律性的个人，个人是目的，但这是一种新形式的道德的个人。最后，自由的社会主义，又是一个美学的天地，是一个美的王国，人们按照美的法则来组织世界，生活变成娱乐，劳动变成消遣，生产变为游戏。总之，自由的社会主义是真善美的统一体，一切都是秩序、美妙、豪华，一切都是自由、幸福，没有统治、没有压抑、没有异化。

马尔库塞的乌托邦式的自由社会主义，从根本上不同于以往的任何社会，他所主张的达到这种理想社会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从

^① 《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185～186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根本上不同于以往的任何革命，这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艺术直至个人的生活方式（劳动、娱乐、休息、性关系等等）都需要有质的变化。总体性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求同时改变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方面，它并非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简单地取得权力和统治，而是要消灭所有形式的统治，消灭统治本身，真正实现人的彻底解放，摆脱一切形式的压抑。

如果说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首先获得经济权力，而后夺取政治权力，实行资产阶级的统治的话，那么这种模式并不能简单地运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并非是无产阶级简单地夺取政权，取得统治地位，而是要消灭一切形式的统治。马尔库塞认为，社会主义当然应该是一个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全面发展的社会，能够提供丰裕的物质产品，满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需要，彻底消灭贫困。但是他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并不在此，社会主义不仅是要消灭贫困，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需要的质的改变。“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既不是单纯地扩大满足现有范围内的需要，也不是把这种需要从一个较低的水平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而是同这种范围决裂，是质的飞跃，革命就是文化的和物质的需要和追求的剧烈改变；意识和感性的、劳动过程的业余时间的需要和追求的剧烈改变。”^①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是因为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生活的各种需要得不到满足，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让无产阶级占有财富，使他们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相反，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物质产品相当丰裕，人们有了丰富的物质生活、文化娱乐生活。但是，丰裕的物质、文化生活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受资本主义社会所同化的虚假需求，人们的虚假需求得到了满足，而根

^① [德] 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与新左派》，9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源于人的爱欲、人的本能的真实需求却被压抑了，人的生活方式异化了，人的自由意识丧失了，人的心理扭曲了。所以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改变需要的性质，使产生这种需要的意识、心理发生质的变化。因此，最重要的是意识、心理的革命，改造现存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改变现有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改变心理和欲望。这样才能实现自由的社会主义的乌托邦。

马尔库塞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单向度的社会里，工人阶级已经被一体化，被资本主义制度所融合，他们沉溺在丰裕的物质生活中，满足于虚假需求，缺乏革命意识和愿望。所以马尔库塞把革命希望寄托在那些他认为未被同化的“新左派”的身上，主张采取“大拒绝”的乌托邦革命战略。主张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大拒绝，拒绝现存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拒绝发达工业社会的物品、语言、教育、娱乐，拒绝与统治者的合作，与现存的一切彻底决裂。厌恶现存的一切，憎恨现存的一切，从憎恨中产生革命。50年代末席卷欧洲的学生造反运动、美国的“嬉皮士”运动；长发披肩、奇装异服、拒绝工作、聚众闹事直至性解放，这些社会现象的出现，无疑同马尔库塞的思想的影响有关，这也说明了马尔库塞的思想是与那种“时代潮流”相适应的。

科学社会主义是确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客观分析中，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科学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愤世嫉俗的批判理论家，马尔库塞的著作洋溢着一种革命的批判精神；作为一个浪漫主义的思想家，马尔库塞执著地追求着美好的未来社会。但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最终还是扭曲了他的革命批判精神，窒息了他那执著的追求热情，使他找不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只好把社会主义寄托在乌托邦式的主观幻想之中。

马尔库塞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求改变人的意识、心理，但是在他看来，现阶段的人的意识和心理的性质又是由单向度社会造成的，不改变单向度的社会性质就无法改变人的意识和心理。马尔库塞的这种革命观就不能不陷入两难的境地，要改变社会，必须首先改变人的意识和心理，而要改变人的意识和心理，又得以改变社会为前提。这样，马尔库塞就遇到了一个无法摆脱的难题：怎样才能从高度一体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打开一个缺口，找到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于是他提出了“大拒绝”的战略：拒绝现存社会的一切。这与其说是一种激进主义的战略，倒不如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发泄，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冲动。60年代欧美学生造反运动的失败，从实践上证明了马尔库塞式的乌托邦革命道路是行不通的。

三、社会主义变革的战略及策略

“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探讨了社会主义变革的动因和主体、道路和途径的问题，而且也探讨了社会主义变革的战略与策略的问题。针对当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思想意识出现的新情况，应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和策略实现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变革？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由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所限，不可能为当代的社会主义变革规定具体的战略和策略，在实践上也未有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变革战略的成功经验。然而，无产阶级要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目标，又必须首先解决战略问题。为此，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高兹、普朗查斯、米利班德等在这方面也作了有益的探索。

1. 高兹的争取社会主义的劳工战略

法国的高兹在“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争取社会主义的新战略——劳工战略。这种战略不以夺取国

家政权为直接目标，而主张从工人的劳动场所开始斗争，工人通过合法的斗争，逐步参与对生产过程的管理和控制，逐步达到工人的自我管理，达到自治的社会主义。

高兹在《劳工战略》中指出：“资本的专政不仅在对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上面实行，而且以同等的力量在对生产的方式、消费的模式，以及消费的方式，劳动、思维、生活的方式上面实行。”^①资产阶级的专政是总体性的专政，它既是经济的，同时也是政治的、文化的和心理的。因此，社会主义变革的目标，就不是单纯地改变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方式，而是要从总体上进行变革，要用一个全面的替代物来代替资本主义的整体，包括替代现有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进而形成一种关于人、生活、教育、工作、文化的新的概念，形成一种新的需要、新的能力，形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这种新方式把人从资本主义的异化中解放出来，这才是社会主义的真正目标。

高兹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的匮乏已经不再是一个主要的严重的问题了，工人阶级的生活不再处于糊口的水平上，不再被饥饿逼迫去造反，工人阶级不再会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摆脱资本的统治。因为随着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人阶级不再感受到非常难以忍受的悲惨生活。因此，工人阶级激烈反抗的自然基础已经遭到破坏，不可能围绕着贫困和经济剥削的问题组织起工人的革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高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合理的，他只是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的主要罪恶不是经济剥削，当今工人阶级的主要问题不是贫困，而是异化。不仅是经济异化，而且是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文化、性生活等等在资本总体性专政下的全面异化。因此今天能够激励人们为剧变而奋斗的动力，不是来自物质的匮乏，而是来自异化，

^① 转引自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35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来自人们对现存的生活方式、劳动方式、思维方式的厌恶。今天的斗争，不是为了提高工资解决贫困问题的斗争，而是为了摆脱异化，为了一种具有创造性、有意义的高质量的劳动、生活而斗争。

正是鉴于这种分析，高兹支持马勒提出的新工人阶级的理论，把新工人阶级看作是现代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主体。由各种专家、技术人员、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新工人阶级，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广泛运用，他们的人数日益增长，其影响和社会作用也日益扩大。正是新工人阶级受过高等教育、享有丰厚薪俸，但是却仍然是被异化的劳动者，受生产过程的控制，工作缺乏创造性。因此会产生出对现存的劳动、生活的厌恶，会提出与劳动的创造性和意义有关的高质量的要求。高兹把新工人阶级看作是争取社会主义的劳工战略的先锋队，甚至是主要的力量。

高兹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战略，旨在建立起一个自我管理的新社会。通过工人阶级的自我管理，逐步取得控制劳动过程的权力，改造资本主义，开创一种有创造性的、有意义的新的劳动方式，消除异化。因此，在他看来，今天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制订出新战略和新目标，在这种新战略和新目标中把工资要求、控制要求和工人对劳动条件的自我决定的要求统一起来，而关键是要从雇主和国家那里抢回决定和控制的权力。工人阶级要取得控制劳动场所和生产过程的权力，而不是仅仅改变工人在既定的生产过程中的条件，要使生产过程的要求服从和适应工人的需要，使工人能够对企业（并扩展到对社会）作出决定。一句话，就是要由工人自我管理企业的生产过程，直到管理社会，而不是仅仅去改变工人的劳动生产条件，提高工人的工资。

高兹主张这种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要从劳动场所开始。因为，正是在劳动场所中，工人们最直接经受资本的专制主义，并具有感到自己在社会上的从属地位的直接经验；正是在劳动场所中，资

本通过劳动分工生产出分解了的、分子化的和蒙受耻辱的人；正是在劳动场所中，工人是作为一个集团、一个真正的集体力量存在，能够采取直接的和日常的集体活动，去改变自己所无法容忍的方面的状况。在高兹看来，群众的政治化并非从政治中开始，政治上的选择是意识发展的最终结果，意识的发展并非从政治开始，而是从直接经验开始的。劳动场所是工人直接经验到资本专制的地方，直接经验到自己所处的从属地位，自己成为分子化了的人；也可以直接经验到作为一个集体的存在。通过劳动场所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工人可以直接经验到社会主义的内容和意义，形成社会主义的意识，以后才能在政治上选择社会主义。

在劳动场所开始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就是要使工人群众参与对生产过程的管理和控制，建立起工人群众对劳动的自我管理，改造资本主义的管理和控制，用社会主义成分代替资本主义成分，用社会主义的自我管理代替资本主义的等级控制。高兹设想的争取社会主义战略是通过工会的斗争来实现的。作为工人群众组织的工会要取得控制生产过程和劳动场所的权力。高兹认为，工会要能控制对劳动工人的训练，将工人训练为具有各方面的才能和自主的人，而不是资本家所需要的那种无知、偏狭的机器人；工会要能控制工厂的组织制度、劳动分工、生产条件，具有生产管理的权力，使各项组织制度、生产条件有利于工人的官能和自主性，有利于工人的发展，能够使技术的进步同作为人的工人的发展相统一；工会还应控制对工人的奖励权，通过与雇主谈判工人的奖金，掌握生产率、利润状况，能够有效地反对剥削程度的加强，达到对企业的经营管理的政策的控制。总之，工会将通过对劳动的训练、劳动的组织分工、劳动的条件、劳动的收入分配的控制，向资本家的权力挑战，改变原有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秩序，逐步建立起工人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新秩序。这种新的劳动组织、劳动分工、劳动条件、劳动收入的分配，将有助于发挥

工人的自主性、创造性，有利于工人的发展，而使工人从异化中解放出来。

高兹提出的争取社会主义的劳工战略，主张在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合法斗争，逐步取得对工厂的控制权力。虽然工人斗争的最终目标是完全取得对工厂的控制权力，直至控制国家的政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工人应当一下子全部掌握资本家的所有权力，直接废除资本主义的制度，直接废除资本家的权力，代之以工人的权力。工会是在接受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承认资本家雇主的现有权力的前提下，参与管理，在经营管理的每一步上都提出替代性的办法，使其朝着有利于工人的方向发展。当然接受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承认资本家雇主的权力，并不是说永恒地接受、承认它们，而是在现行的基础上一点一点地、一步一步地改造它们。通过斗争，在每一阶段上取得有利于工人的控制的结果，当然在每一阶段的战斗也是以与资本家雇主的妥协而告终，这种妥协意味着还承认现行的制度和资本家雇主的权力，但在这种妥协中工人并非一无所得，而是使资本家雇主作出某些让步，朝着有利于工人的方向发展。工会没有必要全盘拒绝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政策，也不是全盘接受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政策，而是积极参与经营管理，在经营管理上、劳动组织上，力求通过局部的胜利，使工人的控制权力得到加强，而资本家雇主的权力则被缩减。

高兹提出的争取社会主义的劳工战略也被称为结构改革战略，它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企业的经营管理的逐步改革，来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这种结构改革，不是直接推翻资本主义企业的制度，不是直接剥夺资本家雇主的一切权力，而使工人掌握全部的权力，但是它能够限制、缩减资本家雇主的权力，使工人的控制权力在结构改革中逐步发展，从而最终达到超越资本主义的结构，代之以社会主义的工人自我管理的新结构。与这种新结构联系的是一种有创造性的有意义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思

维方式，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的克服。

高兹的争取社会主义的劳工战略，是根据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状况，对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斗争战略的积极探索，其中不乏合理和积极的因素。比如，他指出并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的总体性专政，揭露并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现象，主张以更为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并为此提出了争取社会主义的劳工战略，对资本主义的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最终使工人阶级能掌握、控制权力。但是，高兹的劳工战略明显地具有片面性和缺陷。首先，劳工战略具有改良主义的性质，它在工厂的结构改革中，并不触及私有财产，而是在承认资本家雇主的权力的前提下，力争有利于工人的控制权的改革，问题在于雇主能否接受工人的改革，能否接受工人对其权力的限制和缩减，这是要打一个大问号的。其次，高兹的劳工战略局限于劳动场所，而忽视了国家政权问题，忽视了政治问题，把国家政权和政治问题撇开，这样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战略是难以获得成功的。第三，高兹的劳工战略，主张通过工会的自我管理，实现自治的社会主义，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自发主义的倾向。历史经验证明，无政府主义是无法引导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高兹本人在法国的“五月风暴”后也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对他的争取社会主义的劳工战略进行了修正，对革命政党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进行了再思考，强调了革命政党在夺取政权中的必要性。

2. 普朗查斯的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

如果说高兹的争取社会主义的劳工战略是从劳动场所、从工厂企业展开的，那么法国的另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理论家普朗查斯争取社会主义的战略则是从国家政权、从政治上展开的。普朗查斯提出了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他既反对通过完全的议会民主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战略，也反对列宁完全以苏维埃的直接民主取代议会民主的革命战略，主张将代

议制民主和苏维埃的直接民主结合起来，通过二者的结合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普朗查斯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欧洲共产主义都是主张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扩大议会民主的战略，向社会主义过渡。即依靠合法选举的手段，逐步扩大议会和政府中社会主义的成分，最终使得社会主义的统治占支配地位。普朗查斯指出，这种战略实际上是一种合法主义、渐进主义的观点，这种战略过高地估计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性、合法性，过分依赖于统治阶级的和解精神。但是，由于经济和政治的控制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它们最终是不能容忍社会主义的，如果真的出现了社会主义通过议会民主而获得支配地位的危险的时候，就会触发其疯狂性和报复性，来阻止社会主义的实现，因此完全通过议会民主的道路是难以实现社会主义的。

普朗查斯反对完全依靠议会民主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战略，但是他并不完全否定议会民主制，他也反对列宁完全将议会民主制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以苏维埃的直接民主制取代代议制民主的社会主义战略。

在普朗查斯看来，列宁的社会主义战略是一种双重政权的战略，在存在着旧的国家政权的情况下，建立起苏维埃国家政权，通过无产阶级的正面进攻摧毁旧的国家政权，代之以苏维埃的国家。苏维埃是一种普通老百姓的直接民主，列宁就是要用群众的直接民主制来完全取代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议制民主或议会民主，像卢森堡所说的列宁“把苏维埃规定为劳动阶级的唯一真正的代表、来代替由人民普选产生的代议团体”^①。

普朗查斯认为，列宁主张苏维埃的直接民主，这是对的，是

^① N. Poulantzas.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253P.

其战略主张中的积极的一面，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列宁却完全以直接民主来代替代议制民主、完全否认代议制民主，却是不正确的，这是其战略主张中消极的一面。普朗查斯指出：“和马克思不同，他（指列宁）经常把代议制民主和政治自由简单归结为资产阶级的东西；代议制民主=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专政，必须连根铲除并代之以直接的基层民主和接受委任并可以撤换的代表，换言之，代之以真正的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民主。”^① 普朗查斯引用了被列宁称为“革命之鹰”的卢森堡对列宁的这一观点的批评，指出，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意见的自由交锋，无论哪一种公共制度中的生命都会熄灭，变成一种仅仅好像是有生命的东西，其中只有官僚才依然是活跃的因素。所以简单地把代议制民主说成只是资产阶级民主，完全将其取消，并代之以直接民主是不对的。

普朗查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及其形式上的自由，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而不是资产阶级所恩赐的。这种民主和自由，既不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也并非完全是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作为统治人民的手段，无产阶级也可以将其作为反对统治阶级的手段，不能将其完全取消。

普朗查斯指出，虽然列宁提出用苏维埃的直接民主制代替代议制民主，并不想走向国家主义，而将苏维埃的建立看作是国家消亡的开始。但是，由于取消了代议制民主，最后还是导致了国家主义，导致了斯大林主义式的国家。

普朗查斯一方面批评了企图完全依靠议会民主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战略，另一方面也批评了列宁完全以直接民主的苏维埃去取代代议制民主的主张。他认为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

① N. Poulantzas,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252P.

应该“把政治上的自由和代议制民主的机构（这些也是人民群众争取到的东西）同增加直接民主的形式和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自治团体结合起来”^①。就是把代议制民主和直接民主结合起来，把为改变代议制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内部斗争，与建立群众直接民主的群众自治团体的国家外部斗争结合起来，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普朗查斯认为，通过民主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承认普选制的作用，承认政治自由，也承认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多元论，反对彻底砸碎或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将砸碎国家机器的理论视为一种文字游戏。但是，普朗查斯又认为，不能完全依靠代议制民主，走合法主义的道路，仅仅通过议会选举去争取社会主义。一句话，在普朗查斯看来，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既要利用代议制民主作为斗争的手段，又不能完全依靠代议制民主，不能完全依靠选举道路、议会道路，而是利用代议制民主在国家内部开展斗争，加剧国家内部的矛盾，改变国家内部力量的对比，使这种力量的对比有利于人民群众。改变国家力量的对比并不是局限在议会，简单地取得议会多数，而且应扩大到整个国家机器，包括军队、警察等等。改变国家力量的对比也不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掌握国家机器，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改良，一部分一部分地取得权力，而是改变国家内部力量对比的关系，影响国家内部的矛盾，使其朝有利于人民群众，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普朗查斯通过国家内部的斗争，改变国家内部力量对比的设想，是建立在对国家权力的结构主义分析的基础上的。在他看来，国家本身是一种关系，是阶级矛盾的集中点，是阶级斗争的场所，而不是一种可以简单地摘取的权力，所以取得国家政权就不是一

① N. Poulantzas,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256P.

部分一部分地掌握政府的权力的问题，而是要改变国家内部的力量对比的关系，一旦通过国家内部的斗争，这种力量对比的关系有利于人民群众，就能制定出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政策。

普朗查斯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除了主张国家内部的斗争外，还主张在国家机构外的另一种斗争，必须是二者的结合。国家机构外的人民群众的斗争，会促使国家机器内部力量的对比发生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变化，外部的群众运动与国家内部民主变革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利于国家机器的质变。在国家外部的斗争中会产生各种新形式的直接民主，形成各种自治网络，出现直接的人民权力，这种直接的基层民主、国家外部的斗争可以推动国家内部的斗争，是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战略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普朗查斯一再提出，这并不是形成一种与资产阶级国家相平行的“双重政权”，不是要建立反国家的第二种权力，以使用直接民主的政权去取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制民主的政权，不是像列宁所主张的那样以直接民主的苏维埃政权代替旧的国家政权。国家外部斗争的直接民主的群众运动与国家内部斗争的代议制民主的改革活动是齐头并进、相互衔接、相互作用的过程，把国家内部斗争和国家外部斗争结合起来，把内部改造代议制民主和外部群众的直接民主结合起来，才是通过民主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有效战略。普朗查斯认为，如果只有直接的基层民主，而没有保持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民主，没有政治上的自由的话，那种直接民主最终会导致专制的国家主义，就不会有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有一点是确定的，社会主义应该是民主的，否则就根本不是社会主义。”^①

普朗查斯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努力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

① N. Poulantzas.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266P.

理论和国家理论，并提出了通过民主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著名战略，从而被看作70年代西方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家。他是站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根据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其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的。他一方面批评了社会民主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的议会道路的模式，也批评了列宁的苏维埃革命的模式，并在对这两种模式的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战略模式。这种战略一方面试图克服上述两种模式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力图把上述两种模式的某些方面结合起来。不管普朗查斯提出的战略是否正确、可行，它毕竟是一种认真严肃的探索，具有强烈的反教条主义的倾向。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条件下，如何去实现社会主义变革，是需要认真地加以探索的，僵化地、教条地照搬过去的模式，是无法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因此，普朗查斯对社会主义战略的探索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普朗查斯的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战略的中心问题，是主张把对代议制民主的改造同外部的群众运动的直接民主结合起来，反对用人民的直接权力代替国家政权的权力，反对砸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主张改造代议制民主的国家机器，使其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掌握着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能否愿意接受这种改造，能否允许自己的国家政权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如果资产阶级不接受、不允许的话，而他们实际上又控制着国家机器，控制着军队、监狱、法庭，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民主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仍然是难以成功的。

3. 米利班德的改良主义战略

米利班德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理论家，“工具主

义”国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但否认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必要性，主张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国家，采取改良主义的战略，改造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变革。

米利班德认为，马克思主义内部对如何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历来存在着两种战略的争论，一种主张革命的战略，一种主张改良主义的战略。在这种争论中，改良主义往往被曲解，被看做是与革命相对立的，把改良主义同社会改良相混淆。为此，他提出要澄清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的真实含义，将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与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区别开来。所谓社会改良，是资本主义政治的内在组成部分，它不想对资本主义社会实行全面改革，使之成为不同的社会制度，反而把社会改良作为反对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措施。这种改良也想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弊病，但是其目的恰恰是要保障、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继续存在。

按照米利班德的看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战略，同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是完全不同的。改良主义战略尽管也是寻求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范围内的各种各样的改良，似乎同上述的社会改良有相似之处，但是它同社会改良却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战略，是把改良看做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达到社会主义的一种步骤和手段；而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是要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防止社会主义的出现。

米利班德指出，马克思主义内部主张革命战略的人，往往错误地把改良主义战略同革命战略对立起来，同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混淆起来。在他看来，改良主义战略同推进革命目标并非是不相容的，相反，它是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工人阶级推进革命目标进程中的一个合理战略，这种改良主义战略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它与革命的目标联系在一起。因此，改良主义战略并不反对革命，是革命进程中的合理战略，应该摒弃改良主义战略同革命

战略的对立。传统上，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许多人认为，主张改良主义就是反对革命，米利班德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改良主义战略也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它与革命并不冲突。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战略不是同革命战略相对立，而是同武装起义的战略，亦即暴力夺取国家政权的战略相区别。实现社会主义，可以像俄国的十月革命，实行武装起义夺取国家政权，但是也可以采取改良主义的战略。米利班德认为，在现代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具备资本主义民主制传统的国家，通过改良主义的战略走向社会主义是合理的、可行的。

米利班德所主张的改良主义战略，首先强调这种改良主义必须是在资产阶级民主所规定的宪政范围内进行，是以合法的形式出现的，是在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基础上的政治斗争。当然这种合法性本身并不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目标，恰恰相反，它是要利用资本主义民主制所提供的合法形式，争取社会主义。这种改良主义战略的重点是放在选举上，争取社会主义的政党能够在各地方和全国的议会中取得多数，甚至能够在总统的竞选中获胜。也就是说，要争取在资本主义民主制的选举中得到最大程度的支持，参加从地方到中央的议会，参加政府，彻底进入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并将其转变为社会主义。米利班德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尚无通过改良主义战略实现社会主义的成功先例，但这却是可能的，他论证了改良主义战略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可行性，并提出了自己的某些构想。

首先，作为改良主义战略的第一步，就是要使共产党能够通过选举上台，取得国家的权力。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共产党可以通过选举取得议会多数，组成一个左翼联合政府，并在这个联合政府中起重要作用甚至是支配的作用。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内部对议会选举存在着这样的看法：如果共产党在选举中可能获胜的话，那么统治阶级就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就可能发生

右翼独裁力量的政变，使选举无法进行，甚至导致宪政被废除。米利班德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极大，但是把这种可能性当作必然性是没有道理的。他指出，在许多情况下，右翼独裁力量的政变并非一定要发生，特别是在那些有强大的选举传统，又有基础牢固的工人运动的国家，并非会发生右翼政变，选举有可能使共产党的左翼政府上台，造成共产党的掌权。

其次，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的共产党，要进行巨大的社会经济改革，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使其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转变和发展。新的左翼政府要贯彻广泛的反资本主义的措施，推行国有化，强制经济协调和计划，推进有利于低收入者的立法、社会福利、教育、住房、运输和环境保护的政策，这些都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具体措施。当然，推行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政策和措施，会引起旧的保守势力的猛烈反抗。选举中失败的保守势力，还存在于国家机器内部和社会的各个部门，甚至还控制着工业、商业、金融业等经济要害部门，控制着报刊和通讯手段，因此左翼政府仍然将面临激烈的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推进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政策和措施。

第三，改良主义政府要努力把阶级斗争保持在宪法的范围内，并努力扩大人民的民主，巩固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虽然选举中获胜的左翼政府会面临严重的阶级斗争，面临着旧的势力的挑战，但是选举中能够胜利，说明左派势力有相当的力量，他们会支持新政府所推行的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转变的政策和措施。左翼政府要利用自己在选举中所取得的权力和合法性的地位，加强自己的力量，防止阶级斗争演化为阶级战争，把阶级斗争保持在宪法的范围内。左翼政府要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实现社会主义的转变，关键是要人民的支持，这就要求扩大人民的民主，米利班德认为应当建立起一个人民参与的机构网，这个机构网不取代原来的国家机构，却是新的国家的有力补充，形成既有国家机构，又有人民参

与的机构网的“双重政权”。这样，可以极大地扩展人民的民主，也有助于改变原来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超越资产阶级的民主。

米利班德主张通过改良主义战略走向社会主义，否认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必要性。他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国家，不应该打碎原有的国家机器去建立新的国家机器，而应该是通过改良主义改造原有的国家机器，从而达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米利班德承认这个命题是正确的，但并不认为从这个命题可以推论出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在他看来，改良主义战略同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国家机器的命题并非不相容。因为改良主义战略也不是主张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器，而是主张改造现成的国家机器，根本改变现存的国家结构、运转方式和工作人员。但是，并不需要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然后重建一个全新的国家机器，而是在现有的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基础上，实施改良主义的战略来重建、改造原有的国家机器。在实施改良主义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是被打碎，而是被改造，许多民主制度仍然保留着。多党制的局面仍然保持，甚至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党也可以继续存在；公民的言论、结社等自由权利不但得到维护，而且还得到加强；代议制机构不仅要继续发挥作用，而且要加以改善，使其能更民主地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米利班德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尽管是不充分的和不可靠的，但是它毕竟是数百年来人民坚持不懈斗争的产物，毕竟要比现有的其他国家形式好得多，社会主义应当屏弃这种民主的阶级局限性，将其进一步地扩大和发展。如果完全抛弃资本主义民主制的那些成果，镇压一切反对派，窒息一切公民自由，那么不管是出自必需还是选择，也不管这会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带来什么成就，从政治上来说，必须被看作是一种灾难性的倒退，即从资

产阶级民主制往后退。米利班德的改良主义战略，反对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就是主张在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基础上前进，建立起一套能够克服资本主义民主制的阶级局限性，能够比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更为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制度。

在米利班德看来，俄国革命在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之后，建立起新的国家政权，由于新的政权面临着国内外敌人的敌视和反对，要保卫和巩固革命成果的话，仍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它不是列宁所设想的走向权力消亡的“半国家”，它无法扩展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却导致了权力的高度集中，导致了斯大林主义。所以，他认为苏联的事实表明，打碎旧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的新政权，并没有能够解决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因此，他希望通过同苏联模式不同的改良主义战略，实现一种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这种战略既能够去掉资本主义民主的阶级局限性，又继续扩展了原有的民主形式。

米利班德承认，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能够通过改良主义的战略去实现社会主义，在那些缺乏民主制度的基础的国家里，激烈的社会变革最终必须依靠武力。但是他相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国家，通过改良主义战略走向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尽管这种战略的实施会充满着危险和困境。

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情况下，如何推进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样的战略与策略，这本身是值得探索的。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根据当时的情况，对此进行了科学的探索。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其政治制度发生了新的变化，实现社会主义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米利班德与其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不管其提出的改良主义战略是否完全可行，但是这种探索本身就具有积极的意义，应该得到肯定。尽管通过改良主义的战略走向社会主义，还没有成功的先例，但是米利班德还

是提出了自己的实际构想，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争取社会主义战略的选择具有启发的作用。

米利班德提出了改良主义战略与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的区别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过去人们确实存在着将改良主义混淆为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的倾向，米利班德的观点有助于从理论上澄清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但是，米利班德的改良主义战略，否定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著名结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后得出的，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而米利班德却认为这个命题并不包含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意思，这就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精髓，而米利班德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这当然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米利班德主张在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基础上，实施改良主义战略，走向社会主义。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民主制存在阶级局限性，主张去掉其阶级局限性，保留其民主自由的形式。这说明他不懂得专政和民主的辩证统一关系，把专政和民主割裂开来，这样他关于去掉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内容而保留其形式的那一套设想，也只能是一种空想。

第十章 未来社会构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未来社会主义的特征和模式

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他们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逻辑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是一个全面异化的、压抑性的、畸型的社会，必须用一种新的、健全的社会来取代；而现存社会主义，特别是苏联模式不过是发达工业社会的变种，同样是一个不自由、异化、压抑性的社会。因此，未来社会主义又必须与现存的社会主义有本质的区别。这种既不同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又不同于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三条道路或第三种选择，就是所谓的“新社会主义”或“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异化和人道主义理论出发，不仅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提出了“新社会主义”的几种模式及蓝图，而且还设计了“新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基本框架。

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向往、所憧憬的“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或者说，它的本质特征是

什么呢？

1.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人道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他们所构想的这种“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吻合的，他们是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论述，来构想“新社会主义”蓝图的。那么，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思想是什么呢？“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是克服、扬弃了资本主义各种弊端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而资本主义的最根本弊病在于它把人当作手段，敌视人、摧残人、压迫人，使人性受压抑、人格遭扭曲，是一个畸型的、病态的社会。相反，社会主义应是一个以人为目的，关心人、尊重人，使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使人得到全面发展的健全的社会。“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马克思构筑社会主义理想大厦的基点，人的解放始终是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因此，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不是别的，正是人道主义，或者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就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解为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根据又是什么呢？他们有的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寻找根据，认为《手稿》中所表述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才是马克思的真实思想，而后来著作中所表述的社会主义思想，则是蜕变了的，不符合马克思的真实思想。有的则认为，不仅仅是在《手稿》中，而且在马克思一生的全部著作中，马克思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人道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人的解放。

马尔库塞是前一种观点的代表。他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清楚地表述了这样一种思想，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本身与经济上的激变无关，它意味着人的全部历史的革命，人这一存

在物的定义的革命”^①。《手稿》表述了“最激进的和整体社会主义思想”，在《手稿》中，“马克思把‘一切属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②。但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便发生了变化，而在以后的著作中，马克思为了斗争的需要，为了“制订革命理论”的需要，便离他自己的真实思想越来越远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发生了蜕变。

弗洛姆是后一种观点的代表。弗洛姆认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人道主义的思想，是贯穿于马克思全部著作的一根红线。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消除人的自我异化，就是复归作为真正的人的人”。“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它允许人复归到人自身，……它意味着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人不再是许多陌生人中的一个陌生人，而是在他自己的世界上；在那里，他是自由自在的，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③而在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仍然是很明确的，例如，在被公认为“成熟的”马克思的代表作《资本论》中，马克思就讲过这样的话：“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④这段话清楚地表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现实的“受官僚操纵的社会主义”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所向往的社

① [德] 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载《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9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② [德] 马尔库塞：《自然和革命》，载《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4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③ [德] 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载《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77～7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926～9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会主义，是一种以人为目的的消除了异化的社会，“马克思期望通过这样一种新的非异化的社会形式，人将成为独立自主的，而不再被生产和消费的异化的模式弄得残缺不全；在这种社会里，人将真正成为他的生活的主人和创造者，因而他能开始使得生活本身成为他的主要活动，而不是以生产谋生手段为主要活动”^①。总之，弗洛姆断言：“马克思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道主义社会，一个以全面发展的个性为宗旨的社会。”^②

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持与弗洛姆相同的观点。捷克的科拉西甚至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并不是目的，而仅仅是建立一个“有人性的社会”的手段，他说：“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最终目标，而是接近最终目标的一个阶段。他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有人性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不再存在非人化的状态，人类劳动得到真正的解放，同时人拥有其发展和自我确证的全部必要条件。”^③波兰的沙夫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彻底的”、“战斗的”、“完整的”人道主义，而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建立在这种人道主义基础上的，所以，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热爱人”：“社会主义——以任何一种形式——把人和反对使生活丧失人性作为其出发点，因而它将从热爱人和对人的非人化、贬低、不幸的忧伤的意识开始。”^④

2. 现实社会主义背离了马克思的思想轨迹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按照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完

① [德] 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载《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7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② [加] 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49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③ 转引自[加]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31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④ [波] 沙夫：《马克思主义和个人》，转引自[加]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32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全背离了马克思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轨迹。马尔库塞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往往是从经济方面而不是从人的方面来理解社会主义。在那里，经济的增长（而不是人的解放）仍然被当作首要目的，技术的进步仍被作为支配的工具持续着，对自然的毁灭性掠夺仍然在发展生产力的旗号下继续进行着，人仍然不仅与社会、与自身相异化，而且与自然相异化。他断言，现实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工业文明体系罢了。弗洛姆认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包括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都对社会主义作了“资本主义”的解释，也就是说，他们都将社会主义理解为“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改善经济和社会政治状况的一场运动；他们认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化，加之福利国家的原则，乃是衡量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充足的准则”。所以，弗洛姆断言，现实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无本质区别：“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的原则基本上与资本主义的原则是相同的：最大的经济效益，规模巨大的官僚工业机构以及在这个既官僚又具有经济收效大的体系中个人的绝对服从。”^①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将现实的社会主义称作“国家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有两大弊病：一是否认基本人权，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侵犯，国家所关心的是工业效益和有效的社会控制而不是人的解放；二是人并未从多重异化中解脱出来，异化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中心论题”，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均存在异化，其严重程度并不亚于资本主义社会。几乎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把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提并论，斥之为“极权主义”、“独裁专制”国家。

^① [德] 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49～150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总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所谓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主义正是一种遵循马克思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轨迹,与现实社会主义迥然不同的“新社会主义”。按照他们的构想,这种新社会主义,应包括如下内容:在那里,人摆脱了官僚主义的集中化统治,真正成为社会和自己生活的主人,为此,必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社会生产到政治管理,全面实现工人自治(或社会自治);在那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经济的增长并不是主要的目的,人的自由、人的解放才是唯一的目的,为此,必须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人道主义化;在那里,人不仅从社会压迫中解放出来,而且也从自然压迫中解放出来,人与自然形成一种和谐的、统一的关系,为此,必须制止经济的无限增长,实现稳态经济。“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根据这一思路,来设计未来理想社会模式,提出“工人自治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模式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理论,包含着某种合理因素。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确实是实现人的自由、人的解放,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就是要将人类从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多次用“完整的人”、“人的自由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来描述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将人的解放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以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追求利润、增加财富,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是考虑到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在某些时期(如苏联30年代的肃反,中国的“十年内乱”)确实也出现过一些不尊重人、不关心人的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主义应把人放在中心位置上,这一思想更有现实意义了。它提醒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这既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所规定的,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最终过渡到人类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

但是，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理解是错误的。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断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是错误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歪曲。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区别，我们已在第五章论及。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没有把社会主义等同于人道主义，即使在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推崇为代表“真正的”马克思思想的《手稿》中，马克思也是从劳动异化的克服、私有财产的废除的角度，将“人性的复归”、人“占有自己的本质”当作共产主义的特征，是在特定意义上说共产主义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显然，在这里马克思思想的侧重点是非常清楚的。而当马克思完成了思想转变，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科学理论后，马克思再也不从人的本质、人性的复归来论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反，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及晚年的通信中，多次反复批判了以人道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指出“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种思想是一贯的、明确的，而且与恩格斯也是一致的。即使是弗洛姆所引的《资本论》第3卷中的那段话，也不能用以证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因为就在弗洛姆所引的那段话之前，马克思还有这么一段话：“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一般物质劳动所占用的时间的较显著的缩短结合在一起。”^①在弗洛姆所引的话之后,马克思紧接着就指出,为了将自然的“盲目的力量”置于人类的“控制”之下,使必然王国变为自由王国,必须发展人类本能的能力,而“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②。将前后文联系起来看,马克思所强调的是,要使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首先要消灭“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的现象,其次要通过各种物质手段(主要是发展生产力)“缩短工作日”,而这两个条件,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自身所造就的。显然,马克思这里所讲的,是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现实道路。弗洛姆断章取义,将马克思这段话歪曲为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毫无根据的。

那么,马克思后来是不是放弃了人的解放的主张呢?当然不是。的确,成熟的马克思再也没有围绕“人性的复归”、“人的本质的占有”等命题来论述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因为他和恩格斯一道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之后,找到了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途径。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解放包括从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压迫中解放出来。因此,马克思主义便沿着两条思路来论述实现人的解放的途径。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首先要把人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中,从雇佣劳动中解放出来,只有实现经济上的自由才能进一步谈得上人的政治自由、社会自由,才谈得上人的解放。这样,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任务便被提了出来,而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又受着资产阶级国家等上层建筑的保护,因此要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要实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夺取政权。社会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926、9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主义革命是实现人的解放的社会前提，而无产阶级则是人类解放的“心脏”。另一方面，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是使人摆脱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最终实现人的解放的必经之路。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只有当“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人类才能进入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围绕着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这一核心，沿上述两条思路展开其理论体系的，这就找到了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的、切实可行的道路，并从工业无产阶级身上找到了人类解放的真正动力。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毕生主要精力放在研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上，并投身于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这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高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形形色色人道主义社会主义者之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指责马克思后来的社会主义思想“蜕变”了，或者坚持认为人道主义是贯穿于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始终的一条红线，这两种观点都是毫无根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法超越人道主义的藩篱，无法从现实社会生产关系中，从无产阶级身上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因而，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模式的设计、蓝图的描绘，也只能陷于空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指责现实社会主义将发展经济放在首要位置上，而把人的解放这一根本目的丢在一边，也是毫无道理的。社会主义要最终实现人的解放，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生产力和生产资料无限增长，列宁也指出，要实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①。从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来看，社会主义革命大多发生在经济落后国家，所以，当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首要任务必然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既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现实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选择。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一思想，把发展生产力而达到共同富裕，规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正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②。这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贯思想是相吻合的。当然，社会主义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要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充分满足人的各种需要，创造条件使人得到全面发展。但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空喊“热爱人”、“以人为目的”，是有本质区别的。

二、“新社会主义”的模式及蓝图

“西方马克思主义”根据自己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理解，针对当代资本主义及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的各种弊病，对未来理想社会进行了构想，设计了种种“新社会主义”的模式、蓝图。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流派繁多，所以他们所设计的模式、蓝图也各各相异，本节介绍其中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1. 工人自治社会主义

工人自治社会主义思想起源于本世纪20年代前后，是葛兰西等人在总结当时出现的工人（厂）委员会这一新事物的基础上提

① 《列宁选集》，中文3版，第4卷，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出的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将工人自治社会主义当作苏联模式的对立面，形成较完整的工人自治社会主义模式。70年代以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又将工人自治看作是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这种模式强调，只有通过工人自治这种形式，才能实现人的自由、人的解放。

1918年前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西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在革命中，德国的柏林、意大利的都灵、米兰等地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工人组织——工人(厂)委员会，这是一种既不同于布尔什维克党、又区别于工会的工人组织。工人(厂)委员会由每个工厂的每个作业组选出的委员组成，这些委员像巴黎公社的代表一样，随时可以由工人投票撤换，它既是工人实行工厂自治的组织，又是领导工人进行斗争的机构，在当时的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人，不仅领导了工人(厂)委员会运动，而且及时对这一新型的工人组织进行了理论总结，阐述了工人(厂)委员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和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了以工人(厂)委员会为基础的、实行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思想。

葛兰西认为，工厂委员会的实质就是实行工人自治，它标志着工人本身对劳动及其产品的占有，工厂委员会既实现工人对生产的控制和管理，又体现了工人的自我管理，正是通过工厂委员会，工人真正成为生产过程和自己生活的主人。他认为，工厂委员会在未来社会主义中，将不仅是一种经济(生产)管理机构，更重要的将是政治管理机构。因此，葛兰西将工厂委员会看作新社会主义国家的雏型，是“一种工人政府的雏型、一种苏维埃的雏型”^①。他认为未来新社会主义国家已蕴藏在这种以工人自治为特

^① 转引自《陶里亚蒂论葛兰西》，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色的工厂委员会的机构中：“今天，内部委员会在工厂里限制了资本家的权力，并且起到调解和惩戒的作用。明天，它们发展和充实起来了，这些委员会必须成为无产阶级权力的机构，取代资本家行使有效的管理和行政等方面的一切有用的职能。”^①

科尔施将工人委员会制度看作是未来社会主义的基础，是“新世界之光”。为了区别费边社和考茨基的社会主义，科尔施将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目标称作“社会化”，所谓社会化就是对生产进行新的调节，以达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目的。“社会化”的核心就是实现“工业自治”。所谓工业自治指的是，“在任何工业（这里的工业是英文 industry 的意思，所以是任何有计划的经济活动，包括农业在内）中，一切从事劳动的生产参加者的代表，取代迄今的私有主或由私有主指定的生产领导者，成为生产过程进行统治的执行人”^②，可见，科尔施所说的“工业自治”即是劳动者（工人）自治。而工人实现自治的基本形式就是各级工人委员会。科尔施说：“世界无产阶级必须建立工人委员会，地方的委员会、省和地区的委员会，作为革命的手段和社会的新形式。”^③ 这就是科尔施所构想的以工人自治为核心的“实践社会主义”的大体轮廓。

工人（厂）委员会的实践随着 20 年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而破产了，但工人自治社会主义的构想并没有随之而消失。二次大战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人自治社会主义的探索，认为工人自治可以消除现实社会主义尤其是苏联斯大林时代的经济集中主义和政治专制主义的弊端，是实现“人的解放”这一社会主义最高目的的最合适的模式。

① [意] 葛兰西：《工人的民主》，转引自麦克莱编：《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239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②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1983（3），234 页。

③ 转引自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154 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在 60 年代发表了《工人自治的理论问题》一书，通过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批判，系统地阐述了工人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工人自治的性质、作用、原则等问题。列斐伏尔认为，工人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是经济社会（亦称社会经济形态）与政治社会的关系理论。经济社会的主体是生产者及其劳动场所，政治社会的主体是国家。本来，经济社会是社会的基础，它支撑着政治社会（国家）。但在资本主义政治异化的条件下，两者的关系被颠倒了，国家成了凌驾于经济社会之上的力量。列斐伏尔断言，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消除政治异化，把经济社会和政治社会被颠倒了的关系再颠倒过来，使政治社会居于从属地位并最终为经济社会所吞没，即最终消灭国家。而要实现这一切，就必须实行生产者（工人）自治，通过工人自治不断地壮大经济社会的力量，使之最终超越政治社会。据此，列斐伏尔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由国家来主宰和支配整个社会，是与这一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相背离的，它的要害是不仅强化了政治异化，而且贬低了作为社会主义的工人的能动创造性。列斐伏尔还阐述了自治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和经济原则。在政治上，自治社会主义坚持分权制，反对中央集权制，因此它同现存的一切国家（包括资本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是相对立的。列斐伏尔说：“国家不论其是否是资产阶级的，按照其本质都要用一个集中的原则来同自治的原则相对立，而自治则是分权的，从上到下，从要素到总体地活动的。中央集权原则按其本质来说就倾向于限制自治原则，缩减对它的应用。”^①在经济上，自治社会主义并不排斥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作用，也不是像苏联那样搞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又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它不

^① [法] 列斐伏尔：《工人自治的理论问题》，转引自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411 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是把剩余价值的生产放在首位，而是首先考虑使用价值和社会需要。自治社会主义也不否认计划经济，而且要把市场和计划结合起来，使计划经济民主化。

东欧的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也赞同这种以工人自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模式。他们通过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及对本国社会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认为工人自治（或“社会自治”）是克服社会主义异化（尤其是政治异化）的最有效途径，甚至是“共产主义的萌芽”，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特征，社会主义只有真正实行“自治”，“才有权被称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①。例如，波兰的沙夫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国家作为强制机关的职能将逐渐消失，但作为社会管理机关的职能将继续存在，而只要这种管理职能存在，就必定会有（少数）管理者与（多数）被管理者的区分，而这种区分便“可能产生对象化蜕变为异化的情境”^②，这就是沙夫所说的“国家异化”。那么，怎样才能克服“国家异化”呢？沙夫认为，从各方面发展生产者的自治制度，是克服国家异化的唯一有效办法。沙夫认为，自治制度的作用在于：一是现在许多由国家承担的管理事务，可以由众多的自治机关去承担，这样便可大大限制国家权力。二是自治以一种特殊形式把代表性与执行性两种功能结合在一起了，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所指出的两条原则即官吏轮换制及限制薪金，只有在自治制度下才能得到切实执行。所以沙夫称自治制度是一种特殊的、更高级的民主形式。

又如，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弗兰尼茨基将“社会自治”社会主义看作理想的社会主义。所谓“社会自治”，是更高形式的工

① [南]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1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② [波]沙夫：《社会主义与异化》，载《异化问题》（上），532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

人自治，它是指“联合的生产者支配自己的社会再生产、自己的生产和生产计划，自己的文化政策和其他社会政策”^①。弗兰尼茨基认为，“社会自治”作为一种新事物，尽管还不够完善，但它与马克思关于“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体”的理想是一致的，而且“早已在自己不发达的雏型中就已包含着未来的、发达的和人道的人与人关系的丰富内容”^②。它的主要形式有：工人委员会、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等。弗兰尼茨基着重论述了“社会自治”对于废除社会主义异化的作用。他呼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问题，‘委员会’的问题，‘自治’的问题，应该提到真正历史议程上来！”^③他对自治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唯有这些自治进程能够不但导致实现所有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的基本理想，而且导致当代历史基本问题的解决。”^④

60年代末、70年代初，莱易斯、阿格尔和高兹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构造他们的生态社会主义理想社会时，也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工人自治的思想。如高兹在《劳工战略》（1967）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争取社会主义的“激进纲领”，这个纲领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罪恶是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被“异化”了，所以为了克服异化，就应把工人自治规定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这种工人自治的实质，就是工人通过企业的结构改革，把生产过程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把生产大权从资本家手中转到工人手中，这样就可以消除因劳动任务的执行与对劳动任务的管理的分离所造成的异化。

工人自治社会主义产生于20年代初，是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产物。20年代初，西欧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开始总结无产

①②③④ [南] 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载《国外学者论人性和人道主义》（第三辑），108、110、109、10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阶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开始探索不同于十月革命模式的、适合于西欧具体情况的革命道路和新的社会主义模式。鉴于革命失败后，大批共产党员退党（光在德国就有将近一半党员退党）的事实，科尔施等人对党的作用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像俄国那样，由一个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革命胜利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不适合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他们对在革命斗争中出现的以工人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工人（厂）委员会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它不仅可以成为取代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且可以成为替代无产阶级专政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政权形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工人自治社会主义的构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人自治社会主义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是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社会主义的一种尝试。其次，工人自治社会主义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批判反思的产物。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也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但不可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尤其是30年代以后）也有明显的失误。突出表现在，经济上过分集中，把计划与市场绝对对立起来，完全排斥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作用，形成一种缺少活力的、僵化的经济体制；政治上权力过分集中，无论社会生活还是党内生活均缺乏民主。几乎所有的工人自治社会主义的鼓吹者，都将工人自治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试图通过这种社会主义，克服现实社会主义的弊病。在经济方面，他们反对将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解为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主张由生产者（工人）而不是由国家控制社会生产过程，他们有的人还提出社会主义应将计划与市场作用结合起来。在政治方面，他们强调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提倡直接民主制，主张由工人直接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的管理，主张限制国家权力，将现行由国家掌握的一部分权力交给各种自治

组织，以消除权力集中导致的政治异化。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

工人自治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弊端在于：其一，带有明显的工团主义自发论倾向，即高估了工人自治组织的作用，否认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作用。这种倾向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即已暴露出来，他们在论述工人（厂）委员会作用时，闭口不谈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把工人（厂）委员会置于无产阶级政党之上。科尔施曾明确宣称：“不管政党多大，它是无法取得国家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委员会才是唯一可以接受的能保证经济和政治统一的革命的活动方式。葛兰西也否认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进程不可能与具有自愿性和强制性的革命组织如政党和工会的发展和活动相同。”^①但工厂委员会运动失败后，葛兰西便开始意识到这种否认无产阶级政党作用的自发论的错误，认识到没有“一个思想一致的紧密团结的政党”，工厂委员会运动是注定要失败的，从而投身到创建意大利共产党的活动中去。但是，他们思想中的这种自发论错误却被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并发挥了，他们不仅否认、抹杀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甚至还把党与自治组织、党的领导与工人自治完全对立起来。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把党当作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旧形式，认为党的存在必定导致异化，所以他们都把发展工人自治（社会自治）看作消除异化、反对苏联一党专制极权主义的有效手段，把工团主义自发论的错误推向极端。

其二，这一模式带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这表现在它的

^① [意]葛兰西：《工厂委员会》，转引自《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24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鼓吹者不仅要以工人自治组织代替无产阶级政党，而且要以此代替国家，从而把工人自治组织与国家权威绝对对立起来。这在列斐伏尔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他认为国家统治者作用的加强必然导致生产者作用的削弱，并认为当自治高度发展时，就可以使一切矛盾在国家的内部爆发出来，导致国家的灭亡。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将工人自治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对立物，企图以工人自治取代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已走向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道路上了。

2. 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弗洛姆，存在主义的萨特及某些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则提出所谓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他们对这种“新社会主义”的叫法也不尽一致，马尔库塞称之为“自由的社会主义”，萨特称之为“有人性的社会主义”，弗洛姆及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直接称之为“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他们共同的思想是，从所谓“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最高原则出发，以“人”为核心，去构想未来社会的蓝图。在他们看来“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

(1)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要实现人的自由。人道主义和自由是萨特社会政治学说的两个主题，在他看来，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承认人的自由。只有承认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亦即承认人是自由的，才能真正把人与物区别开来，才能真正做到尊重人、关心人，把人当人看。他说：“社会主义是不确定的，它是一种价值，把自由选择作为自身的目标”^①，“人在将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同时完成他自身”^②。他称他所追求的这种以

①② [法]萨特：《七十自画像》，载《生活·境遇》，136、13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

人的自由为目的的社会主义为“非独裁型社会主义”或“有人性的社会主义”。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也把实现人的自由看作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他们认为，不应把社会主义仅仅理解为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而是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扩大人的自由。弗兰尼茨基认为，社会主义的两大任务是：“实现进一步的自由和使人摆脱各种形式的依附，首先是经济和政治依附。”^①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主要是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

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弗洛姆则更强调人的精神自由。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这种人的自由或人的解放，当然包括使人从诸如物质匮乏、政治专制这类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但仅有这种自由还不够，还不足以区分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对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来说，更重要的是要使人从精神的、性的压抑中解放出来，获得精神自由。马尔库塞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非压抑性社会关系取代了现存的压抑性社会关系，人的性欲也自我升华为“爱欲”，“工作与消遣，即人与机能的自由消遣同化了”^②，人的性本能得到完全的满足，人性得到完全的恢复，人不仅与自然界、与社会、与他人，也与自己的本质处于一种统一的、和谐的关系之中。弗洛姆也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不仅要使人从各种宗教的和世俗的束缚中获得自由，更要使人获得精神的自由，使人成为“精神健康的”、“没有异化的人”；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既能体会到他与万物一体的关系，同时又能保持他们自己的个性、人格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2) 社会主义的中心是人，社会的一切政治和经济制度均应符合人性，应服从于人的发展这一目标。弗洛姆认为，在社会主

① [南]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1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② [德]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15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义社会中，人始终是社会的中心，是最高的价值，所以，一切社会活动均应以人的需要为转移，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要服从于人的发展这一目标，为人的潜能、人的理性、人的爱情、人的创造力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体制“不仅仅是物与各种制度之间的特殊关系体系，而是一种人的关系系统。任何社会主义的概念和实践都必须依据它们是否有益于人们之间的关系这个标准来加以检验”^①。

(3) 社会主义应该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人道化。与当代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把人当作手段，使人在各个方面异化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社会主义必须以人为目的，实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全面人道化。弗洛姆在《希望的革命》、《占有还是存在》、《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等著作中，详细论述了这一全面实现社会生活人道化的纲领。它包含人道化的计划、人道化的管理、人道化的生产、人道化的消费及人道化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4) 社会主义应是一个充满了人类之爱的社会。萨特在勾画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时，把“博爱关系”放在重要位置上，强调未来社会应是一个人类成员之间充满着博爱关系即兄弟关系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是道德关系的社会”^②。尽管社会主义社会仍以物质匮乏为基础，但人与人之间的“非人的人”的关系已消失，人类之爱使得人们在物质匮乏面前能做到“我的就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如果我没有，你就给我，如果你没有，我就给你”^③。有“当代费尔巴哈”之称的弗洛姆，憧憬未来社会是一个充满了人类之爱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都懂得爱——爱自

① [德]弗洛姆：《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载《人的呼唤——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11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②③ [法]萨特：《希望、现在……——萨特关于哲学问题的最后一次谈话》，载《现代外国哲学论集》，282、271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1。

己的孩子，爱他的邻居，爱所有的人，爱他自己及自然界所有的一切，爱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结的唯一纽带：“在这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人植根于友爱和团结的联结而不是血缘和土地的束缚之中。”^①

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的错误，除了前面已提及的外，这里补充两点。第一，将所谓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强加给马克思，是毫无根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篡改。第二，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未能超越人道主义的藩篱，未能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之路，所以尽管他们对未来人道主义社会的构思很详细、很具体，但只能陷于空想。正如当年恩格斯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者时所说的，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蓝图描绘得越详细，其科学成分也就越少。

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核心命题是“人是目的”，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构想“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他们关于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全部议论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对此，我们有必要作一番历史考察，并阐述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人是目的”命题的是康德，他认为人与物的最本质的区别就是人本身就是目的的存在物，具有绝对价值和尊严。所以，“人，总之一切理性的动物，是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的，并不是仅仅作为手段给某个意志任意使用的，我们必须……永远把他当作目的看待”^②。康德提出这一命题，在当时，具有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进步意义，但这命题是以抽象人性论为其理论基础的，并不是一个科学的命题，它既未能说明人是目的的真正含义，也未能揭示在阶级社会中绝大部分人沦

^① [德]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372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②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316～3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为手段的社会物质根源。所以康德的“人是目的”的道德戒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对解决现实问题都是软弱无力、无济于事的。

把“人是目的”命题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并把它作为“伦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是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海尔曼·柯亨（Hermann Cohen, 1842—1918）认为，康德所提出的原则“你应当这样行动，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对你自己或别人，都要把‘人’当作目的，而决不把它看作手段”，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伦理的社会主义”。后来，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斯坦等人，又将这种“伦理社会主义”引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们断言社会主义不属于经济领域而属于“意志”领域或“伦理”领域，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主张向工人阶级灌输模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幻想、“永恒超阶级的社会主义正义”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道德原则，妄图以此把工人运动引向改良主义的道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极大的危害。

从以上我们对“人是目的”这一命题的简要的历史考察中，可以看出，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将“人是目的”作为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命题，并不是什么创造发明，而不过是拾新康德主义、伯恩斯坦主义之牙慧，而新康德主义、伯恩斯坦主义早就遭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其次，“人是目的”并不是一个科学命题。如果说，在康德那里，这个命题还有其进步性的话，那么在新康德主义和伯恩斯坦主义那里，这个命题就完全失去了合理性，成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社会主义的命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人是目的”当作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不正表明了他们的非马克思主义性质吗？第三，新康德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带有明显的空想性质，柯亨就曾宣布，社会主义是“永远

不可能成为事实”的，是一种“永远不能完成的任务”。伯恩斯坦主义更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描绘成康德彼岸世界的物自体——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空想”。这种空想的性质也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性质，马尔库塞多次宣称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幻想（想象）”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并针对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运动是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命题，提出一个反命题，即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可能是从科学到乌托邦，而不是从乌托邦到科学。所以，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一再声称他们的社会主义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伯恩斯坦主义）是不同的，但实质上，它们两者之间并没有原则的区别。

那么，马克思主义反对将“人是目的”当作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应把人当作手段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作为目的和手段是辩证的统一。一方面，社会主义是对人类历史上一切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合理制度的彻底否定，它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结合起来，消除了生产资料与生产者之间的分离以及由此产生的少数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与多数劳动者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因而，社会主义为在根本上改变和结束那种只把劳动人民当作手段的不合理状况提供了现实条件。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人是目的”这句话，才具有现实的意义，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社会，无论人可以怎样广泛地利用机器和其他工具，但仍然离不开人本身的劳动。换言之，为了达到人是目的这个目的，人还免不了充当手段，所以社会主义的原则应该是：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是目的和手段的辩证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排除人是手段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的本质区别。

当年伯恩斯坦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曾对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危害。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极大破坏。前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正是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幌子下推行和平演变的策略。戈尔巴乔夫多次说，“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是“人的权利”、“人的需要”、“人的利益”、“人的个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社会发展的目标”，甚至，社会主义就是“实实在在的、切切实实的人道主义”，等等。尽管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理论联系，但这两种“社会主义”的思想实质是一致的。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所造成的恶果，我们不正可以看到这种以“人是目的”为核心、以人性解放为目的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上的极大的危害性吗？

3. 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另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模式。他们从生态环境出发，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来描述未来理想社会蓝图。他们认为，目前工业社会的生态危机将成为触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导火线，换言之，社会主义革命将产生于生态环境的有限承受能力与人类社会无限的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因此，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消除了生态危机，人与自然处于和谐、统一关系的社会。“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各自有其不同的背景，他们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解也不尽一致，莱易斯主要是从与现代工业社会的对立中来构想社会主义模式，所以他关注的主要是经济方面，他将未来社会主义称为“稳态社会主义”；阿格尔主要是从与苏联模式的对立中来描绘社会主义蓝图的，所以他更关注“新社会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他的社会主义是“非极权”或“非官僚”的社会主义；“存在主义的马

克思主义”的后起之秀 A. 高兹更关心的是未来社会主义中的个人自由，他的社会主义带有乌托邦性质，故又称为“后工业社会的乌托邦共产主义”。那么，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态社会主义”具有哪些特征呢？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 稳态经济或经济的零增长。这是“生态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特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包括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在内的现代工业化社会，都把经济的无限增长当作主要目标，这是导致当代能源危机、环境污染、人口爆炸等生态问题及对人的集中化、官僚化控制的最主要原因。因此，为了消除这些弊端，未来社会应抑制无限增长的生产能力，实现稳态经济，即经济的零增长。阿格尔指出：“今天的生态危机需要有计划地缩减工业生产。我们把这称为‘生态命令’。”^① 实行稳态经济，将导致人们消费方式、居住状态及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即，使他们的消费从现在的异化的、旨在补偿其他领域（如劳动生产领域）损失的行为，变为人道的、旨在满足人们的生活必需的行为；使人们的居住状况从现在的以大城市高层建筑为主，变为分散的、以小村庄为主；使人们的生活中心从现在的主要集中于物质（商品）方面，转向并分散于其他方面，如精神领域、文化领域、宗教领域等。总之，将使人们的生活从现在追求纯粹量的增加，转向追求质的提高。

(2) 分散化、非官僚化。如何实现稳态经济？以海尔布伦纳为代表的一些生态学者提出，只有把政治和经济的权威进一步集中起来，在国际上建立一个独裁的世界政府，在国内建立一个几乎能行使全部权力的超级政府，对自然资源和社会生产实行全面干预，才能实现稳态经济。换言之，只有政治极权主义才能实现

^① [加]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49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经济零增长，从而拯救地球生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极权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他们提出另一种途径，即通过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生产，来达到稳态经济的目标。所谓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生产，是指“通过非等级的比如以群体为基础的联合体的结构来组织劳动”^①。这种群体不存在严格的等级关系，也不存在从上到下的集中控制，生产者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关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实质是生产的民主化，即“工人对生产过程的直接管理（即生产过程的非官僚化和自我管理）”^②。高兹认为，利用何种能源，不仅涉及生态问题，也涉及社会政治问题，比如核能的控制权只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所以它代表着一种独裁主义的政治选择。而在后工业社会，由于科学技术发展，人们将主要利用日光、潮汐、风力等能源。由于这些能源具有分散性和可再生性特点，所以它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又能促使社会生产朝民主化、非极权化方向发展。所以他认为这些新能源和技术中包含着“选择我们所要的社会和文明的种类”。阿格尔认为，生产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不仅可以实现经济的零增长，保护生态环境，而且还可以引起对现有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全面变革，他说：“我们的两个主要概念即‘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既适用于技术（生产）过程，又适用于社会和政治过程。我们认为通过使用现代生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我们就可以保护环境的不受破坏的完整性（限制工业增长），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从性质上改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经济、政治制度。”^③

(3)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散化与非官僚化还不足以表明一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因为在

① 转引自〔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47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②③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503、499～50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某种特定条件下(如为解决能源危机),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实现某种程度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生产。因此,他们认为,还必须实行“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阿格尔认为,这种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既区别于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又区别于苏联的国家所有制。他认为,前者是高度分散的,投资之类的决定权都掌握在每一个工业企业的工人委员会手中;后者是高度集中的,所有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都集中在克里姆林宫。社会主义所有制应是两者的折衷,“社会主义所有制本身可以理解为集中化与分散化这两极之间的连续统一体”^①。阿格尔认为,这种所有制观点才是符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设想的,“通过提出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概念,我们就可以使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观点不受那些把社会主义所有制解释为国家控制的集权制拥护者们的影响了”^②。

(4) 人的自由的全面实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态社会主义下,将全面消除人的异化,使人得到全面发展,从而使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这一问题。莱易斯着重从人与市场关系的角度来论证,他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是人们满足需要的唯一方式,离开市场人们即无法生存。因此,人们的自由是受着市场制约的。而在“生态社会主义”中,虽然商品交换和市场仍然存在,但它已不是人们满足需要的唯一方式,人们将广泛参加各种可提供满足各种需要(如恢复健康、安抚自己、运动、学习、建筑房屋等需求)手段的活动,每个人都尽可能多地直接参与生产活动。这样,一方面,人们对市场的依赖性大大降低,人的自由度也就大大提高了。另一方面,人也朝着多兴趣、多艺、多能的方向发展,成为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人。

①②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503、50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高兹认为，在未来社会主义中，人们的劳动时间将大大减少，将大大低于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劳动时间，比如每周将至多工作 24 小时，甚至将降低为每天工作 2 小时，这样，个人的自由时间就大大增加了，个人可按自己的意愿自主活动，把文化重新融合到日常生活中去。比如，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学习工匠技能，自己动手生产一些必需品之外的物品。这样，个人将不再是社会的消极的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个人在实现自己创造性欲望的同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是，尽管未来社会劳动时间大大减少了，但人们仍然需要劳动，而劳动又需要某种协调与管理，而这种协调与管理，在存在主义者看来，又是与“个人主权”相矛盾的，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高兹设想，未来社会可按双元结构来组织，人类生活领域将被分为两个部分：受外界支配的领域和个人自主的领域，前者保证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必需品的生产，其原则是花费最少的人力与资源去达成最大的经济效益。后者保证个人能在市场之外，自主地或与他人自由合作地生产非必需品，其原则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在这两个领域中，个人自主的领域应居优先地位，以保证“个人主权的首要性”。高兹称这种社会为“双元社会”。

(5) “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形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对于达成以上诸目标是非常重要的，当代左翼自由生态运动几年来之所以成效不大，原因就在于未能形成一种新的、生态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阿格尔认为，这种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应是美国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他说：“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嫁接到美国的民粹主义上去，以提供将导致成熟的激进生态批判和社会主义变革的这一缺少的环节。”^①阿

^① [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511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格尔认为，一方面，美国民粹主义起源于杰克逊的政治意识形态，根植于美国人的精神世界，它包含着“民主气质”和“对中央集权的庞大体系的怀疑”。因此，这种民粹主义非常有助于以分散化、非官僚化和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三项基本要求为基础的生态激进主义。但美国民粹主义所缺少的恰恰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另一方面，阿格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实质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马克思主义缺少民主意识，它包含着德国理性传统的集权因素。所以阿格尔提出将美国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就可形成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他说：“我们认为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可以在这一新的世界相汇合，把基层群众的民主素质（特别是美国人的民主素质）与源于欧洲社会主义传统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在一起。”^①而这种结合的基础正是现代工业社会造成的生态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六七十年代兴起的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其理论先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马尔库塞从60年代末起即敏感地意识到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压抑人的同时也在压抑着自然，资本主义在造成人的异化的同时也造成了自然的异化，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就是自然异化的信号和警告。生态危机并不是一个纯自然、纯科学的问题，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政治危机、制度危机和本能结构危机的集中表现。马尔库塞根据这种认识提出了“自然的解放”的理论，认为人的解放、社会的解放离不开自然的解放，人的解放最终可以归结为自然的解放。马尔库塞还从马克思《手稿》中寻找“自然解放论”的依据，他认为马克思把“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① [加]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51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认为马克思把“**感觉的解放**”看作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人与人关系、人与物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①从而开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理论先河。马尔库塞虽然没有具体探讨生态社会主义模式，但他的思想对莱易斯、阿格尔等人产生重大影响，他们正是沿着马尔库塞自然解放论思路来构想未来社会主义模式的。

“生态社会主义”模式的提出也是对70年代兴起的绿色政治运动（或生态政治运动）的一种反应。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生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使人们开始重视人类生活的生态环境问题，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一方面，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确实使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它使资本主义社会在短短的几百年时间里，使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创造的财富超过了以往数千年以来所创造的财富总和的百倍以上；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又是以征服、掠夺自然为基础的，它的扩张动力驱使资本家盲目地、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利润、极度地增产。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使人类产生了恐惧感和危机感。绿色政治运动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兴起的，他们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展开了批判。一些激进的绿色运动人士进一步将批判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认为现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土地沙化、气候干旱、物种灭绝、资源匮乏、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等等，无一不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绿色政治运动导致两个主要结果，一是导致当代无政府主义的重新崛起，无政府主义将对工业文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进一步发展为国家权威、官僚机构、父权家庭、市场制度、都市化的否定，认为这些都是导致对自然破坏性掠夺的主要因素。因此，他们主张以无政府的新社会取代现有的工业社会。新的无政府社会将充分利用人类长期积累的知识，发展生态

^① 参见[德]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与新左派》，1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完好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大都市将被分割为乡村和城镇，这将有利于保护和回收资源。总之，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只有在一个无政府的社会里，才能消除现在的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另一个结果即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兴起，他们主张以一种稳态经济（或经济零增长）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取代现在以经济无限增长为特征的工业文明社会，来达到人与自然的相和谐、相一致。无疑，较之无政府主义的主张，“生态社会主义”的主张所包含的合理因素要多些。

“生态社会主义”的意义还在于，它提醒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始终必须注意生态环境平衡，防止重蹈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覆辙。的确，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曾经忽视了生态问题，导致了一系列严重恶果。所幸者，我们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中国政府最近制定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将生态问题提到了主要的日程上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主张是有一定价值的。

生态社会主义模式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正如我们前面所谈到的，阿格尔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明显错误，就是片面拔高了生态环境的作用，把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看作是有决定意义的东西，这个错误也表现在他们的“生态社会主义”模式中，他们把人与自然的矛盾看作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的主要的、甚至根本的目标，不是提高生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而是满足自然的要求，保持生态平衡，甚至为了维持生态平衡，还主张经济的零增长，提倡稳态经济，把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建设这一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对立起来了，这就本末倒置，甚至因噎废食了。诚然，正如我们前面所讲过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注意生态问题，但决不能因噎废食，用限制经济发展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成功经验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

下，我们完全可以在维持经济一定增长速度的同时，又保护生态环境，使两者得以协调发展。其次，“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仅是把“生态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且也看成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对立物，他们实际上是把工业文明看作是万恶之源，把官僚化、集中化、劳动破碎化、技术统治等都归于工业文明的结果，所以他们都主张用分散化、小型化的手工劳动去取代现代化大生产，这是种典型的倒退主义，它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批判的那种主张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致的。

三、“新社会主义”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制度

“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从宏观方面描绘了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提出了各种新社会主义的模式，而且还从微观方面，对新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进行了具体的设计。

1. “新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新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的设计主要涉及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和政党的地位及作用等方面的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构思“新社会主义”的政治框架时，把民主放在首位，认为“新社会主义”政治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人民群众应享有真正的民主。这种民主不是像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所实行的那种间接的代议制民主，而是一种直接的、面对面的民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葛兰西等人认为，工人（厂）委员会之所以既可以成为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机构，又可以成为未来社会主义新国家的雏型，就在于它是一种与实行官僚制的工会、民主集中制的（无产阶级）政党、代议制的资产阶级议

会有本质区别的直接民主制。尽管后来葛兰西放弃了工厂委员会的主张，但他并未放弃直接民主的思想。

法兰克福学派承袭了葛兰西等人的观点，始终把社会主义民主等同于直接民主。例如马尔库塞明确指出：“对建设社会主义来说，大多数人的‘直接民主’是最适当的管理形式，这一点过去是正确的，将来也是正确的。”^①“工人自治社会主义”论者所主张的“工人自治”、“社会自治”都是直接民主的形式，都是指工人以直接民主的方式，不仅控制社会生产，而且也控制国家权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也是一种直接民主的管理方式，它与韦伯的那种以等级制为基础的官僚制是相对立的。

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向往的这种直接民主的具体形态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弗洛姆所设计的“面对面的小群体”（或“参与者分享”）的民主模式中，窥一斑而见全豹。弗洛姆认为，真正的民主应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真正民主的决策是不可能通过大众投票的方式实现的，而只能在人与人之间能够广泛接触、进行彻底讨论、每个人都充分发表意见的情况下实现；第二，每个人都能掌握必要的信息，以便能对有关问题发表意见；第三，每个公民都能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显然，只有直接民主制才能满足这些要求。

为达此目的，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提出一个把古代“市民议会”的原则重新引进现代工业化社会的方案。这一方案包括如下几个实施步骤。^②首先，根据公民的居住或工作状况，在全国组建成千上万个“面对面小群体”。其次，社会一视同仁地向这些小群体及时提供有关信息，为此，可以考虑成立一个专门的“文化机构”。第三，“面对面小群体”的主要活动方式是辩论，

^① [德]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与新左派》，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② 参见[德]弗洛姆：《健全的社会》，350～352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这种辩论将不同于现在各国议会中故意攻击和标语口号式的辩论，而是一种完全平等的对话。第四，各个小群体所作出的决策能及时送达中央政府，并对政府决策发生作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而将反对官僚主义当作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他们认为虽然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所有常规的业务管理将日益信息化，并由计算机来完成，降低了官僚的作用，但这也带来国家的政治管理和行政管理的日益专门化、技术化，这又使官僚有存在的必要，社会主义仍然要实行官僚制度。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如何防止官僚制度重新异化，如何克服官僚主义的问题。东欧有些“新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有“国家”的官僚机构，而且存在着“党”的官僚机构，而且这两种官僚制度又是在党的庇护下联合为一体的，所以“社会主义制度或官僚制度及其异化问题，比其他制度的这种问题更加危险”^①。

“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如何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以防止新官僚主义者产生的问题。例如，弗洛姆主张通过广泛地实行参与者分享民主制来克服官僚主义。在他看来，“新老官僚主义者不能共存于一种参与者分享的民主制度中，那是因为官僚主义精神与个人主动参与的精神完全不相容”。与参与者分享民主制相适应的，将是一种“非官僚主义”的管理，即人道化的管理。“这种管理的原则是审时度势，对人民负责（‘责任心’的体现），而不是仅仅依靠规章制度。只要我们重视管理人员潜在的、自发的责任心，不迷信经济原则，非官僚主义的管理是可能的。”^②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则主要根据本国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具体探

① [波]沙夫：《社会主义与异化》，载《异化问题》（上），539～540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

② [德]弗洛姆：《占有还是存在》，载《弗洛姆著作精选》，65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讨防止官僚制度重新异化的措施。如南斯拉夫实践派的马尔科维奇主张通过下列措施来控制、约束“职业政治家”，从而克服官僚主义：其一，职业政治家应完全服从自治机构，他们的权力是自治机构授予的，自治机构随时可以收回权力；其二，不允许职业政治家形成一个政治集团或控制任何政治组织；其三，政治家们的工作应由独立的政治科学家加以评判；最后，重要的政治职能民主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还讨论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他们在这方面的主张深受卢森堡及葛兰西、科尔施等人“自发论”的影响，他们反对列宁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应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先锋队组织的建党思想，主张建立一种民主的、群众性的政党。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卢森堡就对列宁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政党应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思想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提出了批评，阐述了革命活动自发性的必要性，把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的“自觉”斗争对立起来。卢森堡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党的作用仅仅是提出“政治口号”，亦即“关于政治问题和战时无产阶级利益的明确态度”^①。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卢森堡也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统一”、“集中”的领导，“社会主义就其本性而言不可能由上面的布告来颁布实行或推广”^②。她认为，按照列宁的主张，社会主义事业应在一个“全知全能的中央委员会”的监护下进行，这是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愚弄，这种脱离群众的党的领导再加上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导致“令人沮丧的恐怖统治”，它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不相容的。

卢森堡的思想对葛兰西、科尔施等人产生重要影响，葛兰西在20年代初工厂委员会失败后，虽然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的不可

①② [德] 卢森堡：《尤尼乌斯的小册子》，转引自[加]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160、16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或缺的作用，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组建意共的活动中，但他对党的性质、作用等的认识，明显地不同于列宁的“先锋队”思想。这表现在：第一，他强调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政党中的核心作用，认为党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组织，“政党不过是不但在生产技术的领域中，而且直接地在政治和哲学的领域中，精心地培育他们自己那种类型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特殊方法”^①。他甚至提出“没有知识分子，即没有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没有组织”的观点。第二，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党应该是一个教育机构而不是政治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训练工人学习控制自己的生产，从而为适应以后的革命形势做好准备。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党仍应将掌握对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第三，他虽然抛弃了自发论，但也反对把党建成一个高度集中化的党，认为党应是一个群众性的党，政党与阶级领袖和群众之间应形成一种密切的血肉联系。据此，他反对那种单方面强调群众是由党领导，党又是由领袖领导的观点，强调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应当成为真正的工人运动，而不是从工人阶级那里寻求支持的职业政治家的运动。第四，他强调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主张实行“运动中的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集中制”，并把是否存在党内民主看作衡量一个党是“进步”或是“退步”的标准。

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政党理论，大体上是循着卢森堡、葛兰西等人的思想发展起来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高兹的“群众性革命政党”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关于“社会主义党—社会民主联盟”的构想。

高兹曾经崇尚“自发论”、“自治论”，他在60年代提出的争取社会主义的劳工战略中曾提出，社会主义只能来自基层，是群

^① [意]葛兰西，《狱中笔记选》，转引自《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24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众自发斗争实践的结果，而不是由领导或政党所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不是政党，而是工人委员会。“五月风暴”后，他通过对“五月风暴”失败教训的总结，改变了这一立场，认为“五月风暴”的失败证明了“没有一个革命运动，就不可能有任何革命党；而没有一个革命党，就不可能有任何持久的革命运动”^①，从此以后他便非常强调革命政党的作用，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政党学说。首先，高兹认为这种革命政党是一种“群众性”政党，而不是列宁所倡导的那种“先锋队”政党。他认为像列宁所建立的那种布尔什维克党的模式，是一种同群众分开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党，不论其领袖的意向如何，都包含了以后苏维埃政权堕落的可能性，而他所主张的群众性革命政党，则是在从事群众斗争的人切实体验到有组织起来的需要时建立起来的，是产生于基层劳动场所的群众性政党。其次，他提出，革命政党应当具有四个方面的功能，其一是理论的功能，即不断分析资本主义的变化，对这个制度内产生的矛盾进行具体的经验研究，并提出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其二是意识形态的综合功能，其作用是提供一种思想武器，使党能用它去反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创造一个反资本主义的集团；其三是教育和政治领导的功能，党的纲领不仅要反映现阶段的斗争要求，而且要预见革命发展的趋势，教育群众把当前的斗争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四是夺取政权和改造国家的功能，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就不仅仅在于夺取政权，而且还要“摧毁作为统治人民的分离的权力中心的国家”。

弗洛姆在《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中，提出未来社会主义的政党是“社会主义党—社会民主联盟”（SP—SDF），这是一个既

^① [法]高兹：《改良和革命》，引自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56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又不同于社会民主党的新型政党。弗洛姆详细地论述了这个党的性质、任务、目标等问题。关于党的性质，弗洛姆认为，“社会主义党—社会民主联盟”是一个人道主义政党。它根植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传统，它用以团结群众及其成员的是“人道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理性精神”，是“对人和人类未来的共同关心和共同信念”。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弗洛姆认为，“社会主义党—社会民主联盟”与共产党的最主要区别就是它坚决放弃通过武力或通过建立任何形式的专政来达到社会主义目标的企图，“党的唯一武器是它的诉诸人的真正需要的现实主义思想，是那些对更丰富、更完善的生活抱着信心的公民们对社会主义的强烈忠诚”^①。关于党的目标，弗洛姆认为，“社会主义党—社会民主联盟”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要使大多数美国人都坚定地信仰社会主义，为此，党的主要工作是指导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目标进行讨论。党不能诉诸非理性的情感、催眠似的暗示或政治家的“富于魅力的人格”，来使人们相信它的计划，而要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的正确性以及党对经济、社会政治和人类境遇所做的透彻的分析。关于党的组织原则，弗洛姆提出：“必须以这种方式来组织党的生活，即它为每一个成员提供足够的、多样化的可能性，以便把他对社会的关心转化为有意义的、直接的行动。”^②它的成员能积极负责地参与制定决策，同时必须给少数人的意见提供充分表达和展示的机会。总之，党应该“成为它全体成员的精神社会家庭”。关于党的任务，弗洛姆认为，“社会主义党—社会民主联盟”的“首要任务就是研究适用于他们自己活动领域的社会主义问题，并探讨他们的经验，为社会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党—社会民主联盟的工作机构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③。为此，

^{①②③} [德] 弗洛姆：《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载《人的呼唤——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128、128、129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党不仅要研究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国际政治等领域的问题，而且还要通过它的成员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表现出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来扩大党的影响，完成党的任务。

“西方马克思主义”将民主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上，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核心问题，这是有其历史根据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贯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将无产阶级“争取民主”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列宁甚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确实发生了一些偏差，忽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这一方面是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总是在一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取得成功，因此经济建设便具有了更为直接、更为迫切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片面理解有关系。斯大林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应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这本身并没有错），而民主政治建设则可以缓一步，他认为前者难而后者易，所以应先难后易，可以等到经济发展了以后，再来进行民主政治建设，这就把经济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对立起来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忽略民主政治与法制建设，以致形成高度集权体制，党政不分，官僚主义盛行，不论社会生活或党内均缺乏民主，这与斯大林的这一指导思想是有关系的。在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也不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正如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初所指出的，由于我们长期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致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方面存在许多弊端，“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①。正是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②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到了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关系到社会主义

①②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27、1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现代化建设胜败存亡的高度。“西方马克思主义”把民主放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核心地位，正是对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忽视民主政治建设做法的一种反思。围绕民主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还论及社会主义如何反对官僚主义，如何防止党的异化等问题，这些议论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现实根据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现实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一种总结，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有的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并引起了重视，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反对官僚主义等；有的问题虽然我们已意识到，但还未予以充分重视，或在实践中还未有效加以解决，如如何正确处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党政关系，亦即党与国家机构、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原因之一。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是有严重错误的，以这种民主理论为基础所设计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模式，在总体上也是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方面强调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强调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民主并不是一种“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依存于一定经济基础，为一定经济基础服务的。列宁就曾明确指出，“任何单独存在的民主制度都不会产生社会主义，但在实际生活中民主制度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总是‘共同存在’的”^①。既存在着社会主义民主，也存在着资本主义民主，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民主。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错误，正在于抛掉了民主的阶级性，混淆、抹杀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区别。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完全可以在“不破坏现存民主制”（弗洛姆语）的前提下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这里所谓的“现存民主制”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其实，“西方马

^① 《列宁选集》，中文3版，第3卷，1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克思主义”所向往的“面对面式”的直接民主制，实质上就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框架内，进行局部的改良，给人民一些权利，从而缓和资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他们的这种主张，虽然从形式上看颇有新意，但从内容上看却是陈旧的，它与费边社所提倡的“市区社会主义”（市政社会主义）的地方自治民主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所鼓吹的“基尔特”民主制以及当代社会民主党人所主张的福利社会主义、社会生活民主化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其要害正如当年列宁在批判费边社“市区社会主义”的地方自治时所说的，“他们幻想社会和平，幻想阶级调和，企图把公众的注意力从整个经济制度和整个国家制度的根本问题转移到地方自治这些细小问题上去。……把注意力转移到细小的地方性问题上面，这里问题并不关系到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并不关系到这一统治的基本工具，而只是关系到怎样利用富有的资产阶级丢下来供‘人民需要’的那点残羹冷炙”^①。

从这种错误的民主理论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他们中的有些人以及东欧的某些“新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将党看作是一种“祸害”，是产生社会主义政治异化的根源；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弗洛姆）则主张以一种联盟式的资产阶级政党来取代无产阶级政党，这些都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在设计社会主义的蓝图了，而是在否定、取消社会主义了。

2. “新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的观点是，他们都反对将经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应从属于人道主义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他们大多不重视所有制问题，而重视对经济的实际“控制权”；大

^①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6卷，323～3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多主张将市场与计划结合起来；主张实行一种使每个人生活都得到保障的“有保障的收入制度”。

(1) 关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问题。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应该采取何种所有制形式？换言之，社会主义要不要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对于这个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完全可以不必废除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原则与私有制完全可以相容并存。弗洛姆所持的是这种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可以建立在私有制、“自由企业制度”基础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莱易斯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稳态社会主义”未必非废除私有制不可，废除了私有制的苏联等国家，同样是典型的工业社会，“稳态社会主义”有可能在保存现有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分散政治组织和经济系统，通过改变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来实现。另一种观点是主张废除私有制，“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大多持这种观点。如科尔施就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的私有经济当作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化”的主要内容。他说：“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公有经济，也就是说，实行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它把生产的社会进程看作是进行生产和消费的全体人员的公共事务。”^①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其所处的国家都是已实行了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他们大多对把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要素之一并无异议。“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阿格尔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在“非极权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实行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又区别于现实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在是否废除私有制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在所有制问题上，他们又有如下一些共同观点：第一，

① [德]科尔施，《什么是社会化》，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3)，219页。

他们都认为所有制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反对“过分关注”所有制问题，反对将生产资料所有制当作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标志。弗洛姆说，“社会主义的实际不是法律上的所有权问题而是社会的控制问题”^①；柯尔施认为，生产资料社会化只是达到“工业自治”这一目标的一种手段，“工业自治”比所有制问题更重要更根本。“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制问题并不重要的主要根据是：从理论上讲，将生产资料公有制当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必然导致经济集中主义，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种“纯粹的经济运动”，将经济问题（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放在首位，从而把社会主义的最重要、最本质的原则——把人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自由、人的解放丢掉了。从现实情况看，在那些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国家中，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理想，它们与今天的资本主义并没有什么原则区别，苏联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第二，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是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控制权、管理权。弗洛姆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实质不是所有权而是社会主义控制权的原则，提出了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的“第一目标”，这就是：“企业的管理人员由所有参与者——工人、职员、工程师——贸易联合体和消费者代表，来委派和完全控制。”^②阿格尔所说的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所强调的实际上也是工人对生产过程的直接管理，在他那里，所有权与管理权是同一回事。马尔库塞也认为，使性欲向爱欲转变，向持久的力比多工作关系扩展的重要前程，并不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是“对巨大工业设施的高度专门化的社会劳动分工的合理组织，对其有巨大破坏作用的能力的充分利用以及广大民众的通力合作”^③。

①② [德] 弗洛姆：《人道主义的社会》，载《人的呼唤——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120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③ [德]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15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第三，主张实行公有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讲的公有制也不是现实社会主义（如苏联）所实行的那种国家所有制。科尔施讲得很明确，“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与国家所有制并不是一码事”，因为这种“国家化一般都会导致官僚主义、公式化，从而扼杀个人的积极性和导致僵化”^①。弗洛姆也指出：“企业国有化本身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实现，由官方委派的官僚来管理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是不同于不受官僚管理的工人来管理的社会主义的。”^②

(2) 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应采取什么样的经济运行机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基本上没有超出传统社会主义观点，即将计划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反对采用市场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鉴于苏联高度计划经济模式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体制有了新的认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应绝对排斥市场作用，而应把市场与计划结合起来。60年代中后期，列斐伏尔在论述他的“工人自治社会主义”模式时即已涉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他认为未来社会主义不应像苏联那样搞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不应完全排斥商品交换、价值规律，而应把计划和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在实现工人自治中的积极作用。东欧的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也从对苏联的完全否认市场作用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中，把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70年代中后期，莱易斯在构思他的“稳态经济社会主义”蓝图时，也提到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的关系，他认为商品交换和市场本身并不存在固有的邪恶，所以没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非把它们完全消灭掉不可。在他设想的稳态经济社会

①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3），236～237页。

② [德]弗洛姆：《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载《人的呼唤——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96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主义中，商品和市场仍将存在并发挥作用，但其作用受到限制。在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仍将计划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机制，而市场只是辅助机制。

80年代以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那种完全排斥市场的、僵化缺少活力的计划体制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重新探讨社会主义经济与市场的关系，确认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商品生产社会的基本性质，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作用，强调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市场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占主导地位的运行机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约翰·罗默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认为，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失败的原因在于未能在计划制定者、企业家和劳动者之间建立起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所以他提出一种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其特征是：第一，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前提下保留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第二，建立证券经济——某种形式的公有制，即将全国所有企业的资产以证券形式平等地分配给所有的成年居民；第三，平等地分配企业利润，劳动者凭证券获得自己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利润；第四，计划体制通过差别利率对投资进行社会管理。^①罗默的观点可以说是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理论的最新成果。

(3) 关于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未来社会主义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分配制度？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也作了探讨。他们对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分配制度都予以否定。他们认为，现存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不劳者不得食”的

^① 参见颜鹏飞：《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关于资源配置机制的新探索——论市场社会主义》，载《安徽大学学报》，1995（1）。

“按劳分配”原则，违反了人是目的的原则，因为这种分配原则实际上是剥夺了一部分人（不劳者）作为人的基本的生存权利。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按资分配”也不可取，因为它使人们收入上的差距过于悬殊，它不但造成了悬殊的生活方式，而且造成了悬殊的生活感受：“即一部分人无法领略另一部分人的生活经验，从而对这另一部分人的生活经验有隔世之感。”^①至于福利国家政策，虽然使每一个人“从娘胎到坟墓”都有生活的保障，但这却是一种使人“生活富裕、精神贫困”，使人在安逸舒适中受奴役的制度，也不可取。他们也反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认为平均主义既不合理，也不切实际，所以它决不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要求。

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是怎样一种理想的分配制度呢？弗洛姆所提出的“有保障的收入”制度有一定的代表性。按弗洛姆的设想，这种“有保障的收入”制度（也叫“基本生活费用的保障制度”）的要点是：“所有人，不论有无工作，都有吃饱穿暖、有房可住的绝对的权利”，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不管他对‘社会是否尽到了责任’，都拥有无条件的生存权利”^②。具体来说，人们衣、食、住、行方面的生活必需品均由政府免费提供，人们随时可以到政府设立的供应点取食面包、牛奶、蔬菜、水果；每人每年可得到一套衣服、三件衬衣、六双袜子；此外，政府为人们提供免费交通，住房也以同样方式给以解决。这部分生活必需品均采用实物供给。在这个基础上，再根据每个人的劳动贡献给予不同的报酬，这部分收入则以现金发付，以鼓励人们对社会尽可能多作贡献。弗洛姆认为，这种新的分配制度有许多优点，足以克服现存各国分配制度的弊端。首先，它使每一个人都有生活

① [德]弗洛姆：《占有还是存在》，载《弗洛姆著作精选》，66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② [德]弗洛姆：《健全的社会》，345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保障，免除匮乏之虞，使不劳者也得食，可以克服“不劳者不得食”而使一部分人生活无保障的弊端。其次，由于生活必需品均以实物形式免费供给，随时领取，没有必要建立一个官僚机构来统一分配，这又将克服福利国家政策既浪费又使人有失尊严的弊端，而且所花费的钱也比现在五花八门的福利开支少得多。再次，由于在免费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基础上，又根据人们劳动贡献给予不同报酬，这样既能避免悬殊的收入差距，又不会导致平均主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种分配制度还为人的真正的独立与自由提供最有力的保障。这种基本生活费用的保障制度不仅标志着劳资契约双方的真正自由的开端；它还扩大了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关系的自由范围。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的最有特色之处，是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体制的理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计划机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体现。而在强调计划的同时，又往往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把市场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根据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这种认识，在斯大林时代，苏联形成了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其特征是排斥商品经济，否认价值规律的作用，拒斥市场机制。在苏联影响下，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也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有积极的作用，尤其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它能保证国家利用强制力量集中资源从事大型项目建设，超前达到部分工业化目标，并提供了广泛的社会保障，有利于社会的平等分配等。但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其弊端越来越明显，“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比较早发现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的。从五六十年代起，他们就通过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批判，探讨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是相容的，不应排斥市场

的作用，必须把市场和计划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的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我们一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和计划的关系有较正确的认识，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思想。由此观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颇有远见的。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作用的理论，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有本质区别的，后者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公有制，二是共同富裕，而前者所讲的市场机制，不讲这两个前提，他们所讲的市场，主要是指“自由企业制度”。

在所有制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把所有制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都反对将社会主义公有制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些思想向我们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对我们今天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有一定参考价值。长期以来，由于囿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个别结论和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上，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是国家所有制；进而认为，在所有制方面，国有化程度越高，就越是社会主义。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所有制观点，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完全等同于国家所有制。马克思曾设想过“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是一种“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①，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利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奴役他人劳动；二是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显然，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本质区别仅仅归结为所有制的不同，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把生产资料公有制进一步归结为国家所有制，而否认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也不符合马克思的所有制思想。所以，近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上，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想法，这正是对马克思所有制思想的恢复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理论，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是有重大缺陷的，突出的一点是，不重视所有制问题，只强调生产者对生产的实际控制权，只强调生产者对生产过程的“直接参与管理”。一方面，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劳资双方的对立关系，更不可能使资本主义剥削演变为工人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在不触动所有制的情况下，适度的工人参与管理，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符合资本家需要的，因为它既能缓解劳资矛盾，又可利用这种形式削弱工会的作用。

至于弗洛姆所提出的“有保障的收入制度”虽然也一再强调与现存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制度是不同的，但这种旨在使“不劳者也得食”的制度，与“养懒汉”的福利国家制度，实际上没有太大区别。这种“不劳者也得食”的制度，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

3. “新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西方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意识形态问题，历来重视思想文化建设，在他们设计“新社会主义”蓝图时，思想文化建设占有重要位置。他们往往把思想文化建设摆在比经济建设更重要的位置上，这与他们对社会主义作人道主义的理解是分不开的。

(1)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多对当今世界各国的教育制度极为不满，认为这是一种加重人的异化，人的“单面性”，使人“愚化”，从而使人更依赖于现有制度的手段。现在教育的目标在于塑造社会所需要的性格模式：野心和竞争，在于造就符合社会机器需要的公民。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目标，应是帮助发展个人的批评权，帮助提供创造性地表现个

性的基础。简言之，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自由的人。

在这方面，弗洛姆的观点颇有代表性，他对未来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提出如下要求：首先，知识不应当仅仅是信息的堆积，而更应当成为认识那种决定物质和人类发展进程的根本力量的理性手段。因此社会主义教育不仅要对受教育者传授知识，而且要进行“理性教育”，使人成为一个有知识的观察者和一个理性的积极的参与者。其次，资本主义教育的异化，已经分离并贬低了人的科学认识 and 人的审美意识；与此相反社会主义教育还应包括艺术、审美教育，应当通过体力劳动和创造性艺术活动的训练，通过两种活动在技艺（有用的艺术品的生产）上的连结，来抵消异化的理智化教育所带来的危害，从而使每一个受教育者都重新成为“完整的人”，即能自由地发挥他的认识能力和审美能力的人。再次，现在教育的一大弊病是理论知识与实际知识之间的有害的脱节，社会主义教育应使理论指导与实际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青少年必须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学某种技艺，否则就不能毕业，小学生必须弄清工业生产的基本技术过程，中学教育则应把手工艺和现代工业技术的实际运用同理论的指导结合起来。最后，社会主义应实行终生教育制，尤其是要重视对成年人的教育，这对于成年人自由地改变自己的职业，使自己成为多艺多能的、全面发展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2）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研究事业。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那么，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又如何呢？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科学技术看作是社会解放的积极动力，是使人摆脱异化的革命力量。因此，他们主张，社会主义应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科学技术异化的可能性，因此，要注意防止科学技术重新成为奴役人、压迫人的工具。弗洛姆提出的对策是：使科学研究工作保

持一定的独立性，不要让它成为工业和国际服务的工具。“必须终止让利润和军事上的权宜之计来左右科研应用的情况。这就需要成立一个管理局，任何一项新的理论发明要投入实际应用必须得到该局的许可。不用说，这个管理局必须在法律上和心理上完全独立于工业界、政府和军方。”^①

(3) 关于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葛兰西在其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中，就已经强调了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占领社会思想文化阵地的重要性。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求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取政权、在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且还要创造出一种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并用这种新文化去造就社会主义的“新人”。马尔库塞多次提到，必须创造一种新的文化才能治愈现代人的创伤，才能把人从非人的生存状态中解放出来，这种新的文化是一种“非压抑性文化”，其目的是在人的本能和理性之间建立起联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阿格尔也提出把美国民粹主义“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上，从而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新意识形态，这是使“生态社会主义”得以成功的重要的思想保证。

弗洛姆的关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设想比葛兰西、马尔库塞等人要具体得多。在他看来，这种新文化至少应包括如下两方面内容：第一，社会主义的“集体艺术”。弗洛姆认为，现代社会的文化是一种“消费者的文化”。人们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分消极被动地“喝下”电影、犯罪报道、饮料和娱乐的。相反，社会主义应该创造出一种新的“集体艺术”，“集体艺术”区别于现在消费者文化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共享”性文化，它可以使人以一种富于意义和建设性的情形中感到与他人的一体，所以它不是附加给生活的一种个人“闲暇时间”的消遣，而是生活的有机组成

^① [德] 弗洛姆：《占有还是存在》，载《弗洛姆著作精选》，66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部分。这种“集体艺术”应是自下而上地、自发地而非“灌输”地形成的。为了促使这种“集体艺术”的形成，弗洛姆提出在工厂、学校、乡村及各种面对面式的群体中，都应创造出各种形式的共同艺术活动。与此同时，现代的广播和电视技术，应把最佳的音乐和文学传送给广大听众。第二，社会主义的新宗教。弗洛姆断言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宗教，并且坚信，在未来的几百年间，将会出现一种新的宗教。当然这种宗教不同于现在的一神教，这种宗教与人类的发展是相一致的，它将包容东方和西方所有重要宗教思想所共有的人道主义精神，它的原则并不会同今天人类的理性洞察相矛盾，它的原则是生活的实践而非教条的信仰。“这样一种宗教将会产生新的仪式和艺术的表现形式，将会造就崇敬生命的精神和人的团结。”^① 弗洛姆还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有必要建立一个“最高文化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就社会主义科技文化教育事业为政府、政治家和公民出谋献策。

(4) 关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异化、身心不健全的人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应是一种消除了异化的、全面发展的健全的人，即社会主义“新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主要功能，就是要造就社会主义的新人。葛兰西早就提出造就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他认为，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就必须在发生革命的过程中，甚至在此之前，就应该在文化上、在人们的社会关系方面改变人，“重新创造”人。因此，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来说，文化领域的革命是必不可少的，“每一场革命，都由一种紧张的批判劳动所先行，由文化的扩散和思想的传播所先行”^②。马尔库塞则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谈

① [德]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362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② 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1920)*.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77. 10P.

到“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时，便已包含着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了，“它意味着一种新型的人的诞生，这种人直至他的本性，直至他的精神都不同于阶级社会的人的主体”^①。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沙夫认为，所谓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要消除社会主义社会成员的人格的各种异化表现，而这要通过“采取铲除这种异化根源的社会行动以促进在这些社会中生活的人们之新型人格的形成”^②。他强调必须通过培养，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性格”。他说：“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要想使人的思想‘接受’它的口号和新型的个人模式，除去创造社会生活新秩序以外，必须也形成适应这个社会需要的社会性格。”^③

“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建设，这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历来注重意识形态问题，注重思想文化“领导权”的理论传统的逻辑结果，也是它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精神文化危机，世风日下的现实的一种反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主张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的确，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大力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必须一起抓，两手都要硬。“西方马克思主义”还就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提出了一些具体设想，如关于教育制度改革，关于造就社会主义“新人”的社会文化氛围，关于如何防止“闲暇时间的污染”等，这些都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应注意、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就解决这些问题所提出的思路，对我们也有某些启发作用。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思想同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① [德]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与新左派》，1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②③ [波]沙夫：《社会主义与异化》，载《异化问题》（上），547、551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

有着本质区别。首先，我们认为，任何社会的精神文明都是由物质文明所决定，是根据物质文明提供的条件，为适应物质文明发展而建立起来的，所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从属于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是把思想文化建设摆在比经济建设更重要的位置上，这就主次颠倒了。其次，我们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建设，则是以人道主义为指导，以“人是目的”为核心的。再次，“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主义“新人”与我们所讲的“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也是根本不同的。

结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性质及研究意义

在前面各章，我们已经讨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各个基本论题。在结论中，我们将简要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性质以及研究这一理论的现实意义，以此作为本书的结束语。

一、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性质问题

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关系？或者说，能否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本书的各章都已经或多或少地涉及这一问题。在这里，我们结合国内外学者的有关争论来加以概括说明。

国内外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政治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归属问题有很不相同的看法或评价，有下列三种主要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定性为“在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的反马克思主义”，这主要是一些前苏联学者的看法；第二种观点正好相反，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推崇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式”，这主要是

一些西方学者的看法：第三种观点介于前两种观点之间，认为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流派，不要简单地斥之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应该看到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不妨称之为“当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我国的一些学者的看法。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评判一种思潮、学派或理论学说是否属于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标准问题。

南斯拉夫学者彼得洛维奇在其著作《现代哲学》中论及“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状况和发展前景”时指出，鉴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极其多种多样化、有时截然相反的解释，这就提出了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第一，是否把现有的解释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二，评判的标准是什么？他认为，不能把现有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一些理论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幌子提出与马克思主义截然相反的立场；而另一些人则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下，以折衷主义的手法把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哲学概念结合起来，或者干脆伪造马克思主义。^①

汉斯·海因茨·霍尔茨在《欧洲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倾向》（1975年）一书也提出划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界限的方法论问题。他说：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渗入马克思主义体系……这种混和什么时候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提被抛弃，又什么时候会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结构吸收新的因素。也就是说，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素“渗入”马克思主义之中，或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可以导致两种结果：一是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被抛弃，二是马克思主义体系吸收外来的新因素，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导致哪一种结果，取决于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待这种“混和”或“渗入”。

美国学者海尔布伦纳(Robert L. Heilbroner)在《马克思主

① 参见《哲学译丛》，1987（3）。

义：赞成与反对》(1980年)一书的导言中,较详细地论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标准问题。他指出,当代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其中有的把马克思的著作原封不动地加以捍卫,有的要把马克思的著作几乎全部加以改变;有的认为资本主义的情况基本上如马克思所云,有的认为《资本论》的分析已不再适应;有的想突破禁区,涉足宗教和精神分析领域,有的认为这些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歪门邪道;有的骄傲地自诩正统派,另有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已蜕变为意识形态,已成为到达人道社会主义的主要障碍。海尔布伦纳认为,判断一种思想学说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其标准,即存在着整套能规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前提(或一些可以得到公认的共同点),所以凡是包含有这类前提的分析都可以正当地将其归类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即使作者本人并不如此认定。在他看来,这一套前提包括四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对认识本身的辩证态度——即辩证法,其核心是认为事物最内在的本性是能动和斗争的,而不是呆滞和静止的,因此,要在事物内部寻找其“矛盾的”属性;第二个因素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强调人类生产活动在历史上所起的中心作用,并因而认定社会各阶级在生产成果分配方面的斗争是历史变化的主要动力;第三个因素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而得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的总看法——凡是接受马克思传统的作家,都接受以马克思原来看法为根据的“资本主义是什么”的观念,并以这种观念作为出发点(即使也作了某些改变);第四个因素是以某种形式规定的对社会主义的信奉——确定“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信念,相信运用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不仅可以说明过去,而且可以作为行动的指南,指引人们去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个为求得自身的完全实现而由人类自觉建造的未来。^① 海尔布伦

^① 参见[美]海尔布伦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5~7页,台北,台湾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90。

纳也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或分析方法的重要性，认为马克思之所以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生命力，正是因为马克思创立了一种研究方法，即“一种能理解那被埋藏的现实的研究方式，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社会分析的一种方式”^①。显然，海尔布伦纳注意到了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前提，说要成为“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承认或遵守这些前提，但他所列出的前提因素却未必是全面的。

其实，青年卢卡奇早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就已提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标准问题。按照他的看法，“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的一些成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命题的“信奉”，也不是对“圣书”的解释；与此相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指的只是方法。他认为，即使马克思主义的每个个别命题都被证伪了，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现代的结论，但这并不迫使我们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②显然，卢卡奇在这里强调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即辩证法的重要性，以此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检验标准，这有其合理性，但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卢卡奇的这种看法是有片面性的，即他把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割裂开来，把“正统马克思主义”仅仅理解为研究方法，而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无关。

我们认为，判断一种理论学说尤其是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标榜“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主要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运用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解决出现的新

① 参见〔美〕海尔布伦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2~3页，台北，台湾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90。

② 参见〔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情况、新问题。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或者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基本因素呢？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则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史观、阶级斗争、价值与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等。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基本因素主要有：（1）哲学唯物主义——承认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或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这一唯物主义基本原则；（2）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世界的可知性，认识是对客观事物及过程的反映，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科学的实践观尤其是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动力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等；（3）唯物辩证法——承认客观世界的矛盾运动和不断发展，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用矛盾、运动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等；（4）唯物史观——如历史决定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阶级理论、国家学说、科学技术观等；（5）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如剩余价值学说、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观点等；（6）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包括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动因、途径和策略等方面的观点；（7）社会主义理论——如关于社会主义的特征、蓝图，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过程与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等；（8）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及分析方法——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以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一致等的思维或分析方法；……如此等等。

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基本原理或基本因素之间，它的理论成果与研究方法之间并不是彼此分离、互不联系的，相反，它

们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它们构成一个有机的理论系统。同时，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方法是经受了实践检验、被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次要的、具体的或细节性的观点可能被时代的发展所证伪和被修正，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和方法是不会因历史的发展而被推翻的，它们构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核，或用科学哲学的术语来说，它们构成马克思主义的“范式”或“研究纲领”。你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或一种学说、理论要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就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承认并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范式”或“研究纲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算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者。

根据上述标准，我们可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做出一个总的评价。我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从总体上看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因为纵观本书各章的分析，我们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及方法的。我们上面所列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基本要素尤其是唯物史观、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社会主义理论及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并没有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遵循。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几乎都将这些基本理论宣布为“过时”、“失效”、“错误”或“不充分”，断言需要用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素（主要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来加以“补充”、“修正”或“重建”，代之以“全新”的学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的“重建”特别是用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补充”，所导致的基本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提的被抛弃。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命题、概念往往被作出非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被赋予非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这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许

多基本原理面目全非。因此，我们有理由断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在总体上看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毕竟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素。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都自我标榜“马克思主义者”，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为己任。他们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包含着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分（尽管这些成分往往被歪曲了），如辩证法、历史分析、异化和人道主义理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自然与历史相统一的观点等。其次，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尝试是失败的，但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个开放的体系，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根据当代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发展，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吸取当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成果包括对立的思想流派的因素来丰富自己，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态度是有可取之处的；与那种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个封闭和僵化体系的教条主义态度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立场无疑要正确得多。再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包含着一些合理的见解或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指出了该社会的新发展及危机趋势，它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特点，揭露了这个社会的种种矛盾、异化现象，并探索这个社会变革的途径、动因和策略；又如，“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某些新的角度或新的方面展开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研究，可以说在某些方面充实或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研究（如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危机和生态危机，对社会心理和个人意识的研究）；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包括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西方社会主义变革的途径和策略、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等展开了较为深入的

探讨，尽管得出的结论未必正确，却也不乏可供借鉴之处。

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既要看到它在总体上的非马克思主义性质，又要看到它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注意它提出的某些有益的论点及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某些方面的发展所做出的局部贡献。因此，不应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它的社会政治理论抬高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的不应有的高度，也不要简单地斥之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从不同的角度或方面深入地研究它所涉及的问题，合理地评价其成败得失，尤其是分析它是如何违背马克思主义，从哪里失足的。

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现实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有着丰富的内容，在其中精华和糟粕并存，新见和谬误杂陈。在今天，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研究，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了解和把握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某些发展趋势，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 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再认识

如前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批判考察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认真研究分析他们这一理论的成败得失及失足的原因，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更全面、客观地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为合理利用资本主义提供某些理论依据，并

揭示资本主义最终灭亡的必然性，从而增强社会主义必定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念。

应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有其现实基础。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直接生活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中，他们这方面的理论是以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体验作为立足点的。他们力求把握时代的脉搏，揭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特征。诚然，与马克思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及阶级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二战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给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和新特征。面对这种新形势，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深入的分析，揭示它的新情况、新趋势和新特点，暴露其新矛盾，乃是摆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形成了较系统的理论，提出了一些可供借鉴的见解或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有助于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例如，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危机趋势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较全面、有根据地概括了二战以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趋势，特别是将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和国家日益干预经济生活看作当代资本主义的两大历史趋势，较全面地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及其表现形式，不仅肯定当代资本主义中经济危机仍然存在，而且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和生态系统方面的危机形式，他们正确地断言，当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陷入全面危机的社会、单面或畸型的社会。又如，在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及政治效应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注意到了科技革命的巨大社会功能及政治效应，看到当代科学、技术及应用日益相互渗透、联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异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消

极现象，特别是指出在该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为新的控制形式、意识形态和统治工具这一点，并揭示出晚期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特点。再如，在国家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新特征和新变化，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职能、结构和类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形成了较系统的国家理论。他们的某些看法，如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职能尤其是经济职能大大加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国家的起源与实质、福利国家批判等等是有可供借鉴之处的；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如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日益干预以及这种干预所引起的意识形态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国家为什么会偏袒资产阶级利益以及国家的自主性等，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的。在阶级问题上，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关系、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和新特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如注意到了白领阶层的迅速扩大、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对工人阶级革命意志的影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的新形式等。这对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及结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有致命的弱点，分析这些缺陷及失足的原因，也可以为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提供有益的教训。例如，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及60年代末以后的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但是，总的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并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途径，他们对这一社会批判的重点并不是它的政治经济制度，而是该社会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及社会心理的方面。从这些方面的分析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独特性和力量之所在，又是这一批判的失足和虚弱之处。这

种虚弱性就在于，他们在总体上并未能正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本质，他们因这个社会出现的新发展、新变化和新特点而断定其社会性质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趋同了；他们不把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放在首位，反而用对这一社会的思想文化及科学技术批判来取代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对时代所提出的某些重大的且往往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带有挑战性的政治、经济问题并未加以认真研究，反而借口当代资本主义性质的改变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失足之处，我们可以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陷入资本主义认识的误区。

2.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又批判苏联模式（即前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并在这两种批判的基础上探索西方社会主义变革及“新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问题，形成较系统的社会主义观。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在总体上是不正确的，但他们确实看到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提出了在西方实现社会主义的某些合理设想。因此，联系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沉痛教训，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性，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对苏联模式的批判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十月革命道路加以评价，认为它是俄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不适应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往往将前苏联的现实与马克思的原来的理论加以比较，“发现”前苏联的现实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不相符合，前苏联社会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实现；他们批评苏联模式的设计过于狭隘，认为在这种模式中，只强调政治上的夺权，经济上改变所有制的性质，片面强调经济方面的革命，忽视

思想领域和心理领域的革命；强调人消极服从纪律，忽视人的创造性以及人的自由解放；他们抨击前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认为它是一种极权主义、官僚主义的制度，而且在前苏联出现一个官僚主义者阶层或阶级。他们还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为现实辩护的、丧失了革命批判性的意识形态。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前苏联和西方社会当作发达工业社会的两个变种来加以批判，甚至将苏维埃国家与法西斯主义国家相提并论。显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模式的批判是有重大失误的，他们贬低或否认十月革命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及这些经验在西方革命中的普遍性；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否定列宁、斯大林等人建立和领导的前苏联是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否定了前苏联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将它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没有正确看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取得的成就及经验等等。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包含了一些合理的、值得借鉴的因素，如揭露批判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及共产国际将十月革命的经验绝对化，强制推行一种革命模式的做法及其危害；指出了列宁之后的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高度集中、集权、党政不分的本质特征以及片面强调计划、忽视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后果；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苏联的官僚主义以及片面强调改变所有制、发展生产力而忽视精神文明和民主政治建设，片面强调纪律、集中而忽视自由和民主等方面的弊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处理好公有制（国有化）与人民当家做主、专政与民主、计划与市场、集权与分权、党与政、领袖与群众、社会解放与个人解放等方面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探索各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问题。所有这些，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对于

我们总结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吸取苏联东欧演变的深刻教训，理解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深入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步伐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在“新社会主义”或第三条道路的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途径、道路和策略、西方革命的主体与动力，“新社会主义”的特征与蓝图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当代的适应性问题等方面进行探索，形成了所谓的“新社会主义”或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这是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三种选择，要点是选择适应于当代西方社会的变革途径和革命新策略，依靠革命的新主体，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或“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显然，在“第三条道路”理论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错误地估计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及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近乎于乌托邦的理论，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但是，他们的理论中也有某些合理因素，如提出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点而制定革命的新策略，关于西方革命的主体及革命斗争的方式变化问题，关于思想文化革命、意识革命及掌握这方面领导权的重要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是人的全面解放和全面发展问题，关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问题等等都有可供参考之处。这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及其规律性，了解西方社会主义变革的长期性、曲折性，坚定社会主义最终必定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念，从世界视野中看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3.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政治理论的归宿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他们的一个共同口号是“‘重建’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因此，他们常常自我标榜“马克思主义者”。

宣称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作出贡献；他们的理论也往往被贴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如前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如何，它的各种流派及代表人物的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成分的比重有多大，这是一个复杂的、难以用三言两语说清楚的问题。但是，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是存在着很大距离的，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倒不如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的对立以及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对立，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将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一种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排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基础，进而将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学说，而不是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的学说。他们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如劳动价值论、经济危机理论、历史决定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理论、阶级及阶级斗争理论、国家学说、科学技术社会功能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理论等都“过时”或“失效”了，必须加以“重建”，用他们的“新”理论来取而代之。很显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总体上是错误的、不可取的。但是，尽管如此，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特别是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其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社会政治理论特别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所提出和研究的许多问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枝节问题，而是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或基础的问题。例如，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种世界观、本体论，抑或仅仅是一种

历史观？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与自然、自然观与历史观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关系？马克思本人思想发展的过程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他的早期思想与后期思想的关系如何？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及其后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什么样的区别与联系？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理论，还是一种批判方法？应当如何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如此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并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这些问题。尽管他们给出的未必是正确答案，但毕竟是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尝试；他们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他们的解答也具有参考价值。

其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及其理论中也不乏合理的因素。尽管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是从共产党内的左倾激进派的政治立场或资产阶级左倾激进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出发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以及所提出的理论中有合理之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当作社会发展研究的基本理论，当作一种分析现实社会生活的理论框架，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要求用当代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成果和当代西方各种社会政治学说的理论因素来丰富和充实历史唯物主义，并展开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多视角的研究，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某些新课题（如对社会文化、社会心理、个人意识、交往行为与理解行为等的研究）；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往往能够采取比较严肃认真的科学研究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这种态度使得他们往往能得出一些符合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合理或可取的见解。例如，卢卡奇关于物化和阶级意识的分析、关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相统一的观点；科

尔施、葛兰西及卢卡奇等人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及其机械论的批判，强调意识能动性的观点；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及意识形态批判尤其是对工具理性和实证主义的批判；萨特等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批判；阿尔都塞的科学意识形态关系理论、普兰查斯的国家和阶级学说等等都包含有某些正确的理论成分。对这些合理因素的提炼，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应做的一件工作。

其三，“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尝试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往往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愿望出发，最终得出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他们失足在哪里以及如何失足的？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可以使我们吸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教训，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少走弯路，避免在理论上重蹈覆辙。在这一点上，可以将卢卡奇作为一个典型来加以解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青年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写作愿望是为了将当时的革命实践经验提升为理论，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他的确在某些方面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的，他用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命题，然而却赋予这些马克思主义命题以非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黑格尔主义的内容，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非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最终在客观上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卢卡奇后来对《历史和阶级意识》错误的认识和自我批评以及某些方面的克服乃至向马克思主义的回归也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4. 把握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某些发展趋势

马克思主义在过去 100 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一方面与各国革命实践、历史条件及文化传统相结合，产生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用以指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它与各种西方社会思潮及其主要流派相结合，产生出种种的马克思

主义研究的学术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大体上可以看作当代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社会思潮的一种“对话”。“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主要流派相结合，从而形成种种形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构成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不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全面把握当代西方社会思潮。

西方有人用“马克思（主义）和……”的结合来描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这有一定道理。马克思与黑格尔和韦伯等人的结合，产生了青年卢卡奇的学说；马克思与韦伯、弗洛伊德等人的结合产生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不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中坚力量，而且也是一种极有影响的人本主义哲学；马克思与海德格尔、胡塞尔和萨特的结合或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的结合产生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特别是结构语言学的结合产生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为代表，后结构主义者M. 傅科、J. 德里达、J. 拉克康等人有时也名列其中）；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特别是新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结合产生了“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除了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之外，科拉科夫斯基的“实证社会主义”有时也被当作新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一种新类型；马克思主义和分析哲学的结合产生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学派从G. A. 柯恩1978年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书开始发端，试图用分析哲学的方法使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精确化。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尤其是历史主义学派发生了某种联系（据说库恩的历史主义观点吸收了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因素）；它通过哈贝马斯而与解释学发生了关系；通过莱易斯和阿格尔等人而与生态主义发生联系……如此等等。

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主要社会思潮发生着一定的知识关系，与之相互作用的既有当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主要流派，也有科学主义思潮的各种主要流派。在与当代西方各种思潮的结合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的各种思想流派的基本观点加以比较，试图找出这些流派思想观点中“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将“好的方面”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往往能看到当代西方思想流派的某些合理之处和荒谬之处，结合某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素而提出力图超越这些流派的理论。因此，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研究，尤其是通过剖析它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比较和融合，可以加深我们对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本质的认识。

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哲学社会思潮，它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中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当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学艺术等都或多或少地渗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因素。美国学者奥尔曼（B. Ollman）和维诺夫（E. Vernoff）80年代主编了三卷本的《左派学院：美国校园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由各学科学者分别介绍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学、史学、人类学、文学、艺术史、古典主义、教育学、地理学、生物学和法学等14个学科以及女权运动、种族问题、社会犯罪等方面中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情况。因此，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代社会科学的某些发展趋势、困难和前景。

例如，在社会学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影响。卢卡奇的物化—异化理论是社会学中人所共知的论题；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当代西方社会学的一大流派，它对实证科学、社会科学的片面专门化和社会学经验研究加以批判，主张从

各个学科的角度综合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把握这一社会的“总体性”；霍克海默批判实证科学和工具理性；马尔库塞分析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哈贝马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及危机形式；奥菲研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权力与干预性的国家机构；由此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宏观社会学理论，又称社会学中的辩证学派或批判学派。“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在当代西方社会学也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阿尔都塞试图解释人际关系背后的逻辑，他将社会形态看作一个由三个层级结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所组成的结构复杂的整体，这三个层级结构彼此相互发生作用，它们各自拥有独立发展的韵律和持续性。阿尔都塞的目的是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结合的观点。北美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社会学（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等）在当代社会学中也颇有影响。

又如，在政治学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巨大。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和组织方法论，科尔施关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观点，葛兰西的“领导权”、知识分子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理论，马尔库塞的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战略——总体革命论等在当代政治理论的发展中都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 60 年代末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加强了对阶级和国家问题的研究，出现了种种理论。例如在国家研究方面，有米利班德的“工具主义”国家论，普兰查斯的“结构主义”国家论，奥菲的“矛盾的国家职能”论，奥康纳的“财政危机”国家论等等。这些学说加深了对国家内部结构和职能的认识，在国家理论问题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在当代政治学发展中产生了较大影响。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是广泛的。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成就、局限性及发展趋势，不能不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

附录

世纪之交的国外马克思主义 和社会主义研究

——苏东剧变之后的研究现状与前景

苏东剧变是 20 世纪后半期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如果说俄国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纪元的话，那么，苏东剧变则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这一事变究竟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状况如何？应该怎样看待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和社会主义的未来以及相应学科的发展前景？这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将依据有关的资料，对苏东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现状、趋势及前景作简要的综述及分析。

一、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现状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出现了分化，呈现一源多流的情况。可以粗略地将本世纪国外马

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划分为三大派或三大思潮：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苏联马克思主义”）、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或“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理论或思潮，又是一种实践（运动）和制度。理论来源于实践，是对实践的反思，因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往往受现实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实践运动的制约或影响。1989—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对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产生较大影响。苏东剧变之后，世界上的共产党数量由180多个减少到130多个，党员人数减少3000万，社会主义国家由十几个减少为几个；它使西方国家中共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急剧下降，英国、丹麦、芬兰、意大利、瑞典等国的共产党放弃了共产党的名称，荷兰共产党宣布自行解散；仍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西方国家共产党（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美国共产党等）或者党员人数锐减，或者由于思想混乱而出现组织危机；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妇女、和平等社会主义运动或者宣布脱离共产党，或者同共产党拉开距离，如拥有350万会员的意大利总工会，宣布要由以左翼政党为中心，变成民主的、以改良主义为基础的工会。第三世界标榜社会主义的国家（即按苏联模式搞建设的民族独立国家）如刚果、安哥拉、莫桑比克、贝宁、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几内亚比绍、佛得角等国公开宣布改搞私有化、多党制和议会制。^①

苏东剧变给各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带来不同冲击和影响。在一些坚持马克思主义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如越南和古巴），共产党人及学者结合本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国家大多向中国学习，实行改革开

放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例如，越共七大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项原则（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方向、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无产阶级专政、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深化改革开放，建设有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并按照社会主义方向建设起配套的国家管理下的市场经济。在原苏东地区（现称中欧）以及西方国家，共产党纷纷改名为社会党、民主党或工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从科学社会主义转向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俄共三大虽然表示坚持社会主义，但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观点）。在这些国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尤其是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需要的研究）可以说陷入困境。而在第三世界原标榜社会主义的国家除了少数认为苏共已背叛社会主义，准备重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外，大部分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苏东剧变后，国外尤其是西方和原苏东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出现了如下的一些新情况及新特点：其一，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大大削弱了，而从学术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并未受太大影响。苏东剧变以前，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党内的研究，特别是由各国共产党所支持的研究，苏东剧变后，这种情况出现了很大的改变，许多学者脱离了党组织或政治团体，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大学或研究所进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他们参与政治生活和对社会进行干预的方式发生变化，他们不再以政治家或党的理论家的身分干预政治生活，而是以学者的身分介入政治生活，对现实问题和社会变革的关注仍然是他们研究的焦点。

其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者更加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研究，研究领域在扩展，问题的研究在深化。如前所述，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一直没有中断，并保持着

它的影响，在学术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例如，美国学者奥尔曼（B. Ollman）写过一本名为《左派学院》的三卷本的书，专门介绍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领域中的影响。二战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研究逐步摆脱以往的学究气，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西方社会变革前景的研究。苏东剧变后，这种趋向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者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宽，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有所深化，特别是加强对西方大众所共同关注的生态及社会问题的研究，出现与西方新社会运动结合的趋向；重视对苏东剧变原因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主义的其他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

其三，出现跨学科、整体研究的趋向。现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者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跨学科、整体的研究，尤其是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学科角度进行的跨学科研究。他们发表在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如英国的《新左派评论》、德国的《论据》、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等）上的论著也表明他们以整体研究为特征。^②

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角度看，目前在国外尤其是西方有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流派，其中相当的部分是在70、80年代形成并在90年代之后进一步发展的。上面提及的奥尔曼教授1994年11月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作学术报告，介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和趋势，他认为目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流派或修正学派有十个，即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解构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社会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市场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和管理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他还介绍情况说，西方现有20—30个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出版物约200种，发行量最大的是《新左派》，约15 000册；社会主义的杂志和马克思主义的杂志有区别。社会主义杂志发行量更大，如《民主》发

行 11 万份。^③

可以说，目前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研究中较有影响和潜力的流派有四个：一是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学派 80 年代起源于英国，流行于英美，目前已扩展到欧洲大陆。法国的《当代马克思》杂志 1990 年第一期专门介绍这个学派，在欧洲大陆现在已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出现（如比利时卢汶大学的蓬·帕里斯自称欧洲最大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流派的最显著特征是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尤其是语言分析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主张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原著，使马克思主义更加准确、科学，自称“没有垃圾的马克思主义”，涉及的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的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经验理论以及正义、异化、剥削一类的规范理论问题。据说，经他们修改后的马克思主义读起来非常清晰，但已看不到多少马克思主义了。

二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及生态社会主义。这个流派在 70 年代由北美形成后影响迅速扩大，80 年代以后在德国和西欧出现了类似倾向的生态社会主义，现在已风靡欧洲。德国绿党公开打出“生态社会主义”的旗号，澳大利亚共产党也提出“红绿联盟”的纲领；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从最初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拒斥，转向谋求联盟，绿党中的左派基本上由那些脱离各种共产主义团体后进入绿党的人所组成，“从红到绿”反映了欧洲部分人从传统社会主义转向生态社会主义的过程。生态社会主义主张一种以人为尺度，以人为中心的新价值观，反对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并在关于民族国家、裁军、妇女、南北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等问题上形成自己的理论。由于当代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全球生态问题日趋严重，新技术革命的纵深发展展示了全球化图景，人类不得不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所以这个流派还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

三是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独立学派）。按照奥尔曼的说法，解构的马克思主义

(其代表人物是雅克·德里昂和米切尔·富科)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相反,目的是要使马克思主义更加可疑和模糊,该学派主要研究社会生活中潜在的权力结构并揭示这种权力关系,它在文学作品、女权运动、社会学、文学等领域有一定影响。马克思主义独立学派(又称批评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乔治·拉比卡教授,它是在巴黎第十大学围绕研究中心和《当代马克思》杂志而形成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该学派主张用开放和批判的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宣称这种方法来自于马克思的革命方法即辩证法,既不同于结构主义的方法和精神分析方法,也不同于分析哲学的方法。其影响正在扩大。

四是市场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或模式的理论,形成于60、70年代的前苏联东欧国家和西方的英、美、法等国。80年代出现了一些颇有影响的分支如英国的市场社会主义学派、前苏联的西伯利亚学派、美国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以罗默为代表)。随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破产以及各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的展开,市场社会主义日益引起人们的兴趣,苏东剧变后欧洲左翼理论家更热衷于这种理论的研究。如果说80年代以前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焦点是在公有制条件下如何利用市场来合理配置资源的话,那么,它现在则致力于证明公有制和市场的有机结合能同时达到公平与效率。

二、苏东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若干热点问题及观点

苏东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尤其是后者)的研究中出现了若干热点问题,并形成各种观点。现择要综述如下:

1. 对苏联蜕变原因的分析及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

为什么苏东共产党政权会垮台？为什么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经历了 70 余年的风风雨雨后还会迅速瓦解？应该如何看待苏联模式？这是苏东剧变后人们自然会提出和要加以研究的问题。

在关于苏联蜕变的分析中形成了各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苏东剧变是戈尔巴乔夫等人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果，昂纳克（原德国统一社会领导人）、利加乔夫（原苏共著名政治家）、安德烈耶娃（全联盟布尔维克共产党领导人）、恩格尔（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人）、金日成、金正日、卡斯特罗以及巴西共产党、印共（马列）和俄共都持这种观点。另一种观点是将苏东剧变的责任归咎于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认为苏东垮台是斯大林主义酿下的苦酒，斯大林主义早就种下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灭亡的祸根，持这种观点的是前苏东地区的改革派以及西方共产党中对苏东改革的同情者。第三种观点把苏东垮台的原因归咎于列宁，认为正是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先天不足，才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失败，持这种观点的是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一些具有社会民主党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还有人把苏东剧变的根源追溯到马克思，说是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这种永远实现不了的“乌托邦”，才有苏联的这种失败的共产主义实践。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评价问题，对此有三种观点：基本肯定、全面否定和中间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苏联模式是基本正确的，它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做出榜样并提供经验，前述将苏东蜕变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等人的背叛者一般持这种观点，他们并不把苏联模式归结为斯大林主义。第二种观点全面否定苏联模式，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称为斯大林主义、极权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认为它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因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而是一种建立在军事官僚和警察恐怖活动基础上的极权主义国家。社会民主党人、具

有社会民主党倾向的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般持这种观点。第三种观点可以看作中间观点，认为苏联模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曾经取得成功，但是由于未能根据情况的变化自我调整，已不适应于当代发展需要，因而必须加以改革，科济列夫（前苏联学者）、维尔德茨（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劳动党主席），久加诺夫（俄共领导人）就持这种观点。

2. 对十月革命道路的评价及对实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

这个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争论的问题，苏东剧变后，它再度成为热点。十月革命期间，列宁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就围绕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批驳了相反的意见，但社会民主主义者并没有放弃其立场观点；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批评十月革命道路（葛兰西和普兰查斯认为它不适应于西方社会主义变革）。苏东剧变后，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苏东剧变已证明十月革命道路的破产，而最终证明了他们的改良主义道路——通过和平的、改良的、民主的或议会的、渐进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性。一些西方学者以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者如英国学者莱克拉奥、法国学者埃伦斯坦也认为十月革命道路已被证明是失败的。当然，在国外，仍然有一部分共产党人或社会主义者坚持认为十月革命道路的正确性，例如，安德烈耶娃称自己的党为布尔什维克党，目标是重新进行十月革命，恢复苏联。希腊共产党、美国共产党也是肯定十月革命道路的。在新的形势下究竟应当通过何种道路或途径实现社会主义（包括在原苏东地区重建社会主义以及在西方实现社会主义变革），这乃是许多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正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3. 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基本原则问题

苏东社会主义制度崩溃之后，国外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基本原则的讨论再度成为热门，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坚

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坚持公有制和消灭剥削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越南、古巴、朝鲜的共产党人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共产党的领导、公有制、按劳分配，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新党章中明文规定反对私有制，要在消灭剥削的基础上达到平等，实现公正和自由。一些西方学者也持这种观点，奥尔曼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公有制、政治民主、社会平等和消除异化；沙夫认为，公有制和消灭剥削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自由、平等、博爱、互助等只是从属的内容。鉴于计划经济的失败，许多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者主张放弃计划体制，实行市场经济，建立以公有制为主的混合经济。另一种是放弃或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把所谓的全人类价值（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互助等）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有民主党人和转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共产党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少数共产党人。例如，社会民主党人宣称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或本质规定是自由、公正和互助；戈尔巴乔夫说社会主义就是自由、民主和人权。持这种观点者把社会主义的宗旨与实现这些宗旨的社会形式或制度分离，淡化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质，把抽象的伦理原则和价值目标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些人一般都主张以私有制为基础，建立各种市场经济（如“民主市场经济”、“福利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等）。

4. 关于社会主义的“新模式”问题

实行指令式计划经济被认为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基本原因。因此，苏东剧变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新模式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的关系作了较多的思考。法国的《当代马克思》杂志1993年第14期以“社会主义新模式”为总题发表了英、美、法等国学者的五篇论文，这可以看作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者对这个问题观点的缩影。这五篇论文提出五种社会主义的“新”模式：（1）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这是约翰·

罗默提出的一种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模式，其要点是建立某种形式的公有制（即“证券经济”），将全国所有国有企业的资产以证券形式平等地分配给所有成年居民；企业利润平等分配，即劳动者凭证券可以获得自己企业和其他企业的红利；计划体制通过差别利率对投资进行社会管理。（2）资本监督模式，这是美国社会学家弗雷德·布洛克提出的建立剥夺金融资本权力的社会主义模式。其要点是对资本主义金融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通过立法来监督资本的不合理流动，削弱资本对劳动的剥削，通过银行的国有化或准国有化，建立彼此独立、互相竞争的关系；企业则由政治权力来协调股东、企业人员、用户三方的共同管理；以此促进向民主和集体方面转变。（3）经济民主模式。这是美国哲学家戴维·施韦卡特提出的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其要点是政治上实行代议制，经济上实行全面的社会监督。这种模式的三个基本特征是企业自治（企业由劳动者自己管理）、市场经济（市场是达到某种社会目的的工具）、对新投资的民主的、社会的监督。（4）市场社会化模式。这是英国经济学家迪安·艾尔逊提出的社会主义模式，要点是通过建立公共信息渠道，打破资本对信息的垄断，实现市场（首先是信息）的社会化，削弱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最终导致资本市场的取消，从而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5）企业自治模式。这是法国学者托尼·安德列与马克·费雷提出的社会主义模式，其要点是取消资本市场，自治企业通过自治银行向公共投资基金借贷资本，而公共投资基金以企业利息为基础，这种模式或通过要求保留产品市场和使用间接计划，目的是兼顾民主、平等和效率。^④显然，这些社会主义“新模式”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古典学派理论加以结合，寻求一种既不同于“现实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社会主义模式，它们自认为既符合当代实际，又符合社会主义目标。

此外，苏东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者还十分重视对 21 世纪社会主义前景问题的研究。我们放在下面第三部分与 21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展望一起来谈。

三、21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前景

21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科的前景如何？这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 21 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前途和命运。那么，人们现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苏东剧变之后，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和思潮都在预测 21 世纪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将苏东剧变看作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失败、资本主义胜利的标志，断言 21 世纪将是一个由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新世界，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将不再与人类社会有任何关系。如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人类》，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20 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以及《失去控制：21 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就宣传这种观点。前苏联东欧的共产党人则相信 21 世纪社会主义将复兴，苏共第 29 大（1993 年 3 月）宣称重新夺取政权，在俄罗斯恢复苏维埃政权，期盼“隧道的尽头是社会主义的复兴”。1993 年 10 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国际学者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协会会议，俄罗斯学者布兹加林教授所做的报告题目就是《21 世纪：社会主义的复兴》。“欧洲左翼”尤其是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和前苏东国家的一些由共产党转变而成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都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21 世纪社会主义将再度复兴。他们在 1990 年创办《未来的社会主义》国际论坛，发表《纲领性声明》宣称“欧洲左翼”尽管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观点，“但是有一个基本的要求促使我们联合起来。按社会主义塑造社会是我们努力的目标”^⑥。西方

的传统左派和新左派也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充满期望和信心。例如，美国纽约的《每月评论》1990年出版了《从左派的观点看社会主义的未来》文集，认为不能将苏联模式的失败看作是社会主义难以实行的证据，只要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就不会消失；英国《新左派评论》1991年出版了《倒塌之后——共产主义的失败和社会主义的未来》文集，认为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者在把国家和集权化的官僚政治当作进步的关键性杠杆方面投入过多，未来的社会主义必须更深地打破地方根源并具有更广阔的国际地平线见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展望21世纪的社会主义未来，如前面提及的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在《当代马克思》1993年第14期专论社会主义的新模式：“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罗默1994年出版专著《社会主义的未来》，认为社会主义不是死了，而是需要现代化，而市场社会主义是这种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说，对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未来展望成为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一个最热门的问题，它成为许多国际研讨会以及许多论著的主题。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如此感兴趣这件事本身就表明，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并不像一些资产阶级政客和学者所鼓吹的那样已经终结了，相反，它仍然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⑥

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仍将保持它的强大生命力，社会主义将得到复兴和发展，因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前景仍然是光明的。这种判断的依据是多方面的：其一，苏东剧变只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长河中的一个曲折，它只是一种变了味的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失败，而不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和马克思主义的“死亡”。资产阶级政客及其代言人鼓吹苏东剧变证明资本主义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失败，证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不符合实际及“临床死亡”。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一些国外的马克

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苏东剧变及随之而来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是实行变了种的社会主义的结果（布兹加林的说法），社会主义的危机根源不在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什么重大缺憾，而在于社会主义者的实践脱离了社会主义理论，这种危机实际上是社会主义者们的实践危机（芒德尔的说法）。因此，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者所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是回顾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尤其是苏东剧变的深刻教训，寻求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以此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其二，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矫正物而出现的，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平等、公正、自由是人类的崇高理想，它将激励人们继续为之奋斗和探索。苏东剧变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更不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冷战结束资本主义也没有捞到多少好处，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及一系列社会问题并没有因此消除，相反在加剧或恶化，新的工业革命尤其是信息革命将会引发和推动新的社会变革。因此，人们必定要寻求新的生存方式，利用各种手段和方法去解决种种矛盾和困难，这就将导致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复兴和发展，从而激发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索和革新。

其三，在21世纪，一个强大、繁荣、进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崛起将促进或带动世界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成功将使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出现“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⑦。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将成为各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一个榜样。就连布热津斯基在《失去控制》一书中也不得不对中国的成就刮目相看，并认为中国很可能

被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前苏联各共和国的人民看成是一个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模式。同时，在经历苏东剧变曲折之后，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从中经受锻炼，吸取教训，正力图从低谷走出，使社会主义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那么，在 21 世纪初，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前景如何？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过根据目前的研究状况及趋势，可以提出如下几点猜测：首先，从研究流派的角度看，现有的几种较有影响的流派（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独立学派、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及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还有相当的潜力，可能在未来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同时，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改良主义派别，民主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可能还有较大的影响甚至可能扩张。许多欧洲“左翼”人士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已在全球扩张，它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因而它对社会主义研究的影响不容忽视，必须加以认真对待。另外随着对现代社会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社会主义道路、途径、模式的探索，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流派；其次，从研究主题的角度看，下列问题在未来将可能得到进一步深入和充分的研究：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总结与回顾（包括对苏东剧变原因的进一步探索），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科学技术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基本特征，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以及未来社会主义的主体问题，社会主义的新模式，以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其他基本问题。再次，从理论研究与实践运动关系的角度看，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将有可能寻求新的历史依托，即寻求与社会主义政党或团体以及西方新社会主义运动的某种结合，并导致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研究的复兴。

总之，苏东剧变后，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受到

了一定的冲击，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的研究陷入困境，但并不像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所断言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社会主义已经失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面临真正的危机。真实的情况是，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尤其是学术方面的研究并未中断，这种研究的主题范围在扩展，某些方面的研究在深化，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者正在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革新、为社会主义的复兴作准备。可以预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在 21 世纪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不会一帆风顺。我们应该对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的新动向、新趋势、新理论加以密切注意，这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及对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科的发展都是十分有益的。

注释：

①⑥ 参见江流、徐崇温主编：《20～21 世纪：社会主义的回顾与瞻望》，13～14、31～33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② 参见周穗明、李其庆：《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动向——“95 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综述》，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5（4）。

③ 参见《伯特·奥尔曼谈西方十大马克思主义流派》，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5（1）。

④ 参见《西方学者论“社会主义新模式”》，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5（1）。

⑤ 戈尔巴乔夫、勃兰特等著：《未来的社会主义》，6 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

⑦ 《邓小平文选》，1 版，第 3 卷，195～19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参 考 文 献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列宁选集（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毛泽东选集（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邓小平文选（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马克思. 资本论.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74
-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马克思. 机器. 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 恩格斯. 反杜林论.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卢卡奇. 历史和阶级意识.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卢卡奇. 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 卢卡奇.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下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
- 科尔施.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 科尔施.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 葛兰西. 葛兰西文选.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 葛兰西. 狱中札记.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霍克海默. 批判理论.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 阿尔多诺. 否定的辩证法.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 启蒙的辩证法.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 马尔库塞. 理性与革命.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 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马尔库塞. 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文集).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89
-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 马尔库塞等. 工业社会与新左派.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弗洛姆. 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 见: 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2
- 弗洛姆. 弗洛姆著作精选.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 弗洛姆. 人的呼唤——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1
- 弗洛姆. 健全的社会.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3
- 弗洛姆. 对自由的恐惧.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 哈贝马斯. 交往与社会进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 施密特.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 施密特. 历史和结构.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 赖希. 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
- 德拉-沃尔佩. 卢梭和马克思.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 普朗查斯. 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 列斐伏尔. 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8
- 萨特.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 萨特. 存在和虚无. 北京: 三联书店, 1987
- 萨特. 生活·境遇.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0
- 莱易斯. 自然的控制.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 本·阿格尔.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 威廉·肖.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 柯亨.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一个辩护.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 米利班德. 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米利班德. 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 马尔科维奇. 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4
- 弗兰尼茨基. 马克思主义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 弗兰尼茨基.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 科西克. 具体的辩证法.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9
- 赫勒. 日常生活.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 B. H. 别索诺夫. 在“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反马克思主义.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3
- 戈尔巴乔夫等. 未来的社会主义.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4
- 索尔·埃斯特林等. 市场社会主义.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3
- 罗伯特·A·戈尔曼. 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9
- 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现代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批判.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1
- 约翰·霍克曼. 实践派理论和马克思主义.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
- 杜章智编译. 卢卡奇自传.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9
- 里希特海姆. 卢卡奇.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张伯霖编译. 关于卢卡奇哲学、美学思想论文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马杰. 阿多尔诺.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 柯林尼可斯. 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 台北: 台湾远流出版

公司，1990

P. 安德森.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汉斯·海因茨·霍尔茨. 欧洲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倾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R. L. 海尔布伦纳. 马克思主义: 赞成与反对. 台北: 台湾桂冠图书有限公司, 1990

李成鼎等编译. 当代哲学思潮述评. 北京: 求实出版社, 1984

乔纳森·H·特纳.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国外社会科学》编辑部编. 当代西方思潮.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9

安·拉布里奥拉.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普列汉诺夫.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 北京: 三联书店, 1973

B. 杰缅丘诺克. 当代美国的技术统治论思潮.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F. 拉普. 技术哲学导论. 沈阳: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李汉林. 科学社会学.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J. D. 贝尔纳. 科学的社会功能.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E. 舒尔曼. 科技文明与人的未来.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5

M. 戈德史密斯等主编. 科学的科学.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5

巴伯. 科学与社会秩序. 北京: 三联书店, 1991

尼科·雅赫尔. 科学社会学.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查·帕·斯诺. 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格·姆·达夫里扬. 技术·文化·人.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

丹尼尔·贝尔.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北京: 三联书店, 1989

- 阿尔温·托夫勒. 第三次浪潮. 北京: 三联书店, 1984
- 阿尔温·托夫勒. 未来的冲击.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5
- 约翰·奈斯比特. 大趋势.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舒炜光等.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 黄顺基等. 自然辩证法教程.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 黄顺基等. 科学技术哲学引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 戴维·麦克莱伦.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 高承恕. 理性化与资本主义.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8
- 伊安·克莱伯. 当代社会理论. 台北: 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86
- 徐崇温. “西方马克思主义”.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 徐崇温.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 江天骥. 法兰克福学派.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 邹永贤.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概论.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 邹永贤. 现代西方国家学说.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 许征帆等. 怎样认识当代资本主义.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 江流, 徐崇温. 20—21 世纪: 社会主义的回顾与展望.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 奚广庆主编. 西方马克思主义辞典.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2
- 奚广庆, 王瑾. 西方新社会运动初探.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 高放主编.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文献选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1990

陈振明. 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陈振明. “新马克思主义”.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2

陈振明, 潘世墨. 现代社会中的科学. 杭州: 浙江科技出版社, 1994

俞吾金, 陈学明.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

俞吾金. 意识形态论.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陈学明.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李忠尚. “新马克思主义”析要.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沈恒远, 魏宏远编. 国外学者论人和人道主义 (1—3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

欧力同, 张伟. 法兰克福学派研究.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

余文烈. 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张蕴岭.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选论.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0

张秋舫等. 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3

Adorno T W,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Music.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6

Adorno T W,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 1969

Althusser L, For Marx.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7

Althusser L,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1

Althusser L, Reading Capital.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

- Bottomore T, *The Frankfurt School*. London and New York; Tavistock Publication, 1977
- Colletti L. *From Rousseau to Lenin*.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
- Colletti L, *Marxism and Hegl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3
- Della-Volpe G. *Logic as a Positive Scienc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0
- Goldman L, *Lukacs and Heidegg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7
- Gorman R A, *Neo-Marxism*.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85
- Gorz A, *Ecology as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75
- Gorz A, *Strategy for Labour*.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 Gouldner A W, *The Two Marxism*. London; Macmillan, 1980
- Grahl B and Piccon P (eds.), *Toward A New Marxism*. St. Louis; Telos Press, 1973
- Gramsci A, *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 Gurland A R L, *Technological trends and economic structure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Vol. 9. no. 2 (1941)
- Habermas J,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5
- Habermas J,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1
- Habermas J, *Theory and Practice*. Boston; Beacon Press, 1973

Habermas J,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0

Held D,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Horkheimer M, *Critique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New York; Seabery. 1974

Horkheimer M,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Howard D, *The Marxism Legac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da Press. 1988

Jay M,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ch (1923—1950)*.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3

Kellner D, *Herbert Marcuse and Crisis of Marxism*.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84

Kearney R. *Modern Movement in European Philosophy*. Manchester; Ma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6

Kolakowski L,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 II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Lefebvre H,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Lefebvre H, *The Survial of Capitalism*. London, 1976

Lukacs G, *The Young Hegel*. London; Merlin Press, 1975

Marcuse H,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Marcuse H, *C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Boston; Beacon Press, 1972

Marcuse H, *Negation;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Boston; Bea-

con Press, 1968

Marcuse H, *Soviet Marxism; A Critical Analysis*. New York; Vintage, 1961

Marcuse H, *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3

Marcuse H, *The Aesthetics Dimension; Toward a Critique of Marxism Aesthetic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

Merleau-Ponty M, *Humanism and Terror*.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Conn. : Greenwood Press, 1980

Merleau-Ponty M, *Sense and Non-sens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4

Merleau-Ponty M, *Adventure of Dialectic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London, 1974

Miliband R,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Neuman F,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34*. London; Gollancz, 1944

New Left Review (ed.),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7

Parkinson G H R, *Georg Lukacs*. London and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7

Pollock F, 'Is National Socialism A New Order?'.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Vol. 9. No. 2 (1941)

Pollock F, 'State Capitalism; It's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Vol. 9. no. 2 (1941)

Poulantzas N,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Reich W, *Character Analyse*.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 Girous, 1970

Reich W. *The Sexual Revolution*. New York, 1973

Rockmore J, *Habermas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Roderick R, *Habermas and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86

Roemer J E (ed.),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Sartre J-P,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Sartre J-P, *Search for a Method*. New York: Knopf, 1963

Schaff A, *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 New York: Megraw-Hall, 1970

Slate R P, *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7

Tar Z, *The Frankfurt School; The Critical Theories of Max Horkheimer and T. W. Adorno*. New York: Wiley, 1977

Tompson J B and Held D, *Habermas; Critical Debate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2

后 记

本书是作者所承担的中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1991年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1993年度)两个课题的综合研究成果,它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并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它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加以系统、深入的研究,从中提炼出某些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全面、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等方面有益的理论因素及教训。

这两个课题的研究及成书历时近五年,是我们三位作者分工合作的成果。作为课题主持人,陈振明博士负责课题的总体设计及提出全书的基本思路,并负责全书的统稿和修改工作。各专题的研究及写作的具体分工是:

陈振明:绪论、第一、二、六、八章、结论和附录;

陈炳辉:第三、四、九章;

骆沙舟:第五、七、十章。

这两个课题的研究得到了中华社会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在研究过程中得到国内的一些知名学者的关怀和指导。课题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家教委社科司司长、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奚广庆教授,原中宣部理论局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靳辉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进修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许征帆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生导师

赵凤岐教授，原厦门大学政法学院院长邹永贤教授，厦门大学哲学系汪澍白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孙麾编审，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徐俊忠教授等学者的评点。特别是一贯乐于奖掖后学的奚广庆教授在百忙中拨冗为本书作序。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支持，责任编辑李艳辉同志为本书的编辑付出辛勤的劳动；本书也参阅了大量的国内外学者相关论著。在此，一并致谢！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厦门大学政治学系的一个重要教学和科研方向。近几年来，我们在国家及省级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出版了一些专著、合著；并较早为政治学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系统开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研究课程。1995年，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了我系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中外政治思想”硕士点，使我系成为国内政治学界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基地。本书是我们奉献给读者们的一部新作，期望它能对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鉴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物及流派众多，观点庞杂，加上我们的研究水平及资料条件所限，本书的缺点、不足、偏颇是在所难免的，诚望得到专家及读者的批评指正！

陈振明

1995. 12. 10